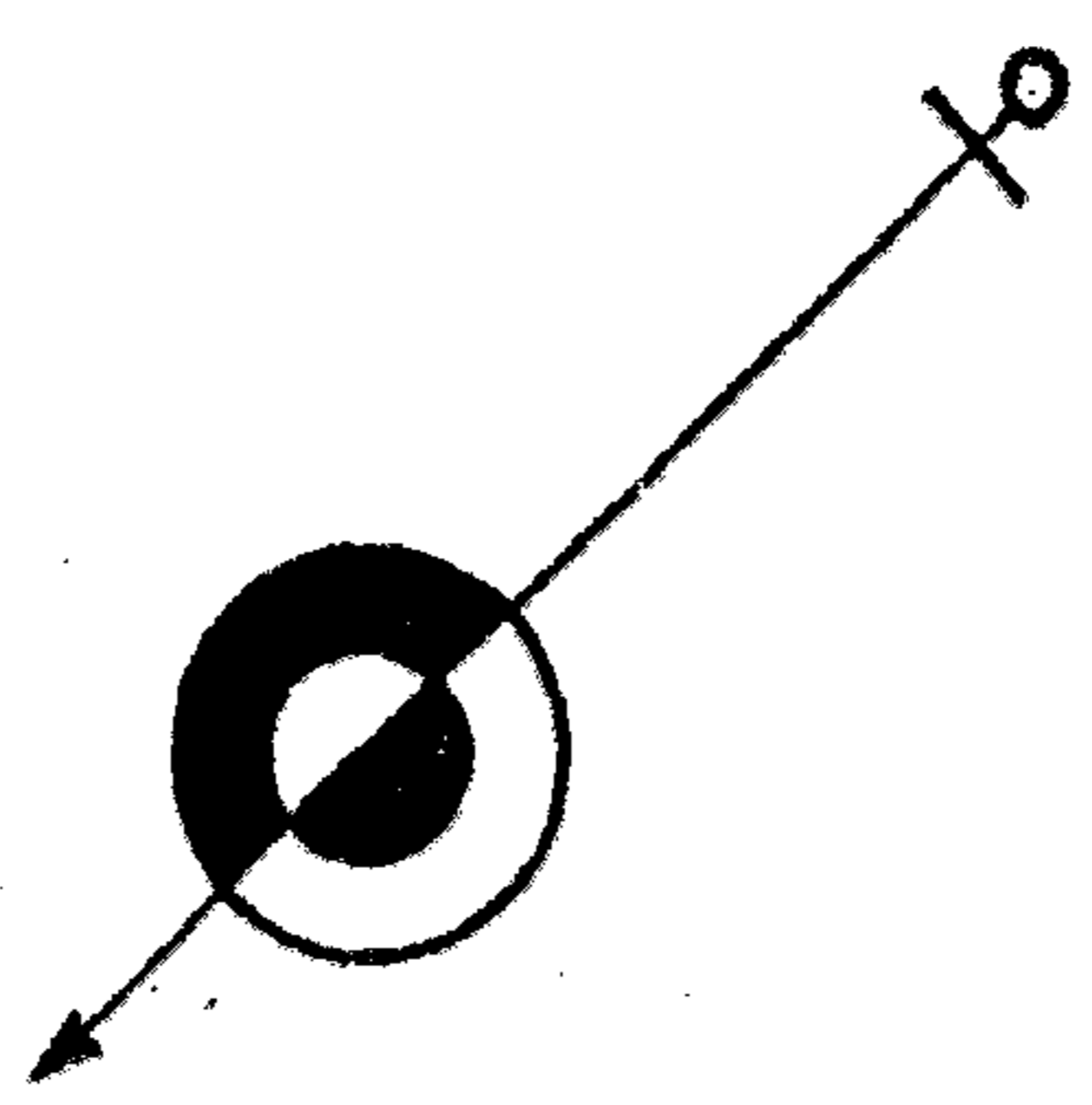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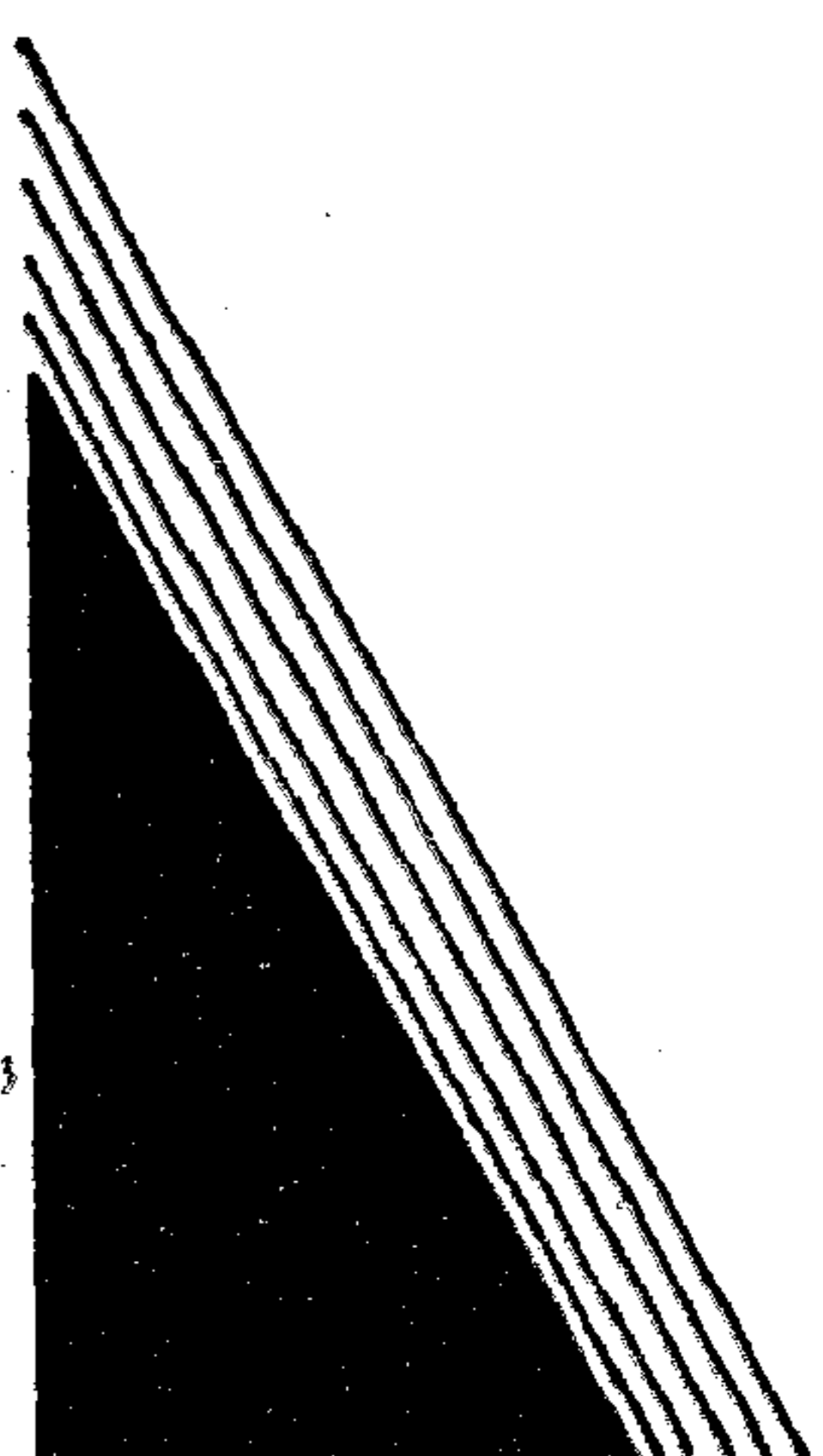


新數的奇原則及實際

崔載陽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崔載陽譯

新教育的原則及實際

中華書局印行

新教育的原則及實際目錄

莊序

原序

第一編 問題之檢閱

緒論 父母漸來參預教育……………一—二六

第二編 新教育的原則

第一章 健康第一重要……………二七

第二章 活動的兒童……………四三

第三章 兒童的自由……………六四

第四章 個別的兒童……………八六

第五章 培養社會的德行……………一一七

第六章 解放創造力……………一三八

目錄

520.148
239

2

第七章	我們要將兒童造成一本能動的百科全書嗎？	一六七
第八章	課程之克服	一八九
第九章	分數的橫暴	一一一
第十章	教師是一個引導者而不是一個工頭	一四四
第三編	從嬰兒學校到大學	
第十一章	待兒童如人類	一六三
第十二章	兒童應在幾歲入學校呢？	一七〇
第十三章	中學之失敗	一八六
第十四章	大學的問題	三一〇
第十五章	初級大學——一個解決	三四三—三六一

莊序

工廠式的學校教育在農村社會的中國本來是極不適用的，就是今日工業發達的歐美也感到這種教育是大機械化了，所以近來有所謂新教育運動的發生。這個運動簡單的說便是想把受教的人當他是個人來看待，給他一個做現時現地的人的教育，詳細的說那就一言難盡。中國近來對於這個運動介紹的很多，但是多為片面的偶然的。同事崔載陽博士對於這個運動研究有年，在教育研究及其他雜誌上發表關於這個運動的文章已不少。近見柯布（Cobb）所著 *The New Leaven* 一書，覺其內容對於這種教育的理論與實際作一有系統的敘述，深感有譯之以餉國人的必要，我也贊同此議。茲當譯成見示，因樂為之序。深盼此書之譯出，可供我國創造適合國情的教育之參考。

二十年六月澤宣在廣州中大教育研究所

原序

那種革命兒童的訓練，與變化兒童面目的進步新教育，是何等難於表達與描寫的！然我們亦已盡力解釋這種運動。如果我們已經成功了一種括概的與確實的描寫，那就因有過許多進步的教育者曾將他們以爲什麼是新教育的一切觀念貢獻給這本書，作爲本書一種可貴的助力。他們的名字將全在緒論中見到，所以此刻無須複述。我現在只有乘此機會多謝他們，多謝他們有助力的與極豪俠的合作，使能把所有新教育者認爲最珍貴的一種事物之本相，明顯地供諸衆人之前。

我還要特別多謝懷特 (Mary Josephine White) 女士極力幫助尋得那些爲本書基礎的一切問答材料，多謝哈特曼 (Gertrude Hartman) 女士校讀原稿及提出許多極有價值的意見，多謝我的兄弟柯布 (Perival B. Cobb) 曾爲一次批評的閱讀。又本書第十四章有一部份材料曾在家政上面發表過。

總之，在未申述本書之前，對於各種遺漏及代勞，我先要謝罪。我深知本書絕未完全托出這種內容極端豐富與變異之新教育運動；這種新教育運動，是必各人看來，各

人有新的習見。我現在所見到的與敘述的，或許絕不是他人所見到的與敘述的。因此，我這本書，只求在新教育運動著述之急激進展的領域中，表出些微的貢獻。假如牠有些方法能闡明這種運動，與能在不偏不倚的與輿論公正的大眾當前，把這種運動解釋明白，與引起眾人對於這種教育運動的重視，那麼，牠就已完成牠的主旨了。

柯布 (Stanwood Cobb) 一九二八年序於拆維撒斯 (Chevy Chase) 日校。

——著者與本書——

本書爲美國新教育者柯布 (Stanwood Cobb) 所著，柯布 於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六日生在麻州牛頓地方。他嘗肄業於達特馬司大學 (Dartmouth College) 及哈佛大學的三一學院，自一九零七年至一九一零年，他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羅柏大學 (Robert College) 教書。後復在歐洲教書兩年多，回美國後，嘗先後掌教於亞那波里 (Annapolis) 的聖約翰學院，阿士維爾 (Asheville) 男童學校，和美國海軍學校。

一九一九年，柯布 在華盛頓努力組織美國新教育聯合會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他在該會任執行秘書多年，現在杜威博士爲該會名譽會長，而他則實任會長。

柯布 在一九一九年與喜特籃 (Nayan Whitlam) 女士結婚。婚後與夫人合辦拆維撒斯鄉村日校，該校現已成爲著名的私立新學校。在一九二六年，他更在緬因 (Maine) 的愛略脫 (Elliot) 地方開辦 'Mast Cove Camp' 爲拆維撒斯鄉村日校 推廣工作之一。

柯布除本書外，著有 *The Real Turk*, *Aysha of the Bosphorus*, *The Essential Mysticism*, 和 *Simla, A Tale in Verse* 等書數種。本書原名 *The New Leaven* (教育的新酵)，美國新教育者現已一致推為敘述新教運動原理之最完美的書。

本書的材料非常豐富，大半是得自他個人的長久經驗，及用「問題法」採集而成的。著者通函詢問美國各地熱心教育的領袖「什麼是兒童中心教育主要的特性？」「兒童中心教育是根據什麼教育原理？」「兒童中心教育究含什麼元素而成？」有三十多個新教育的領袖，對於以上的問題貢獻了意見。著者就分析各家的意見，分門別類，歸納成表。所以本書不是零碎瑣屑的論列，而是整個運動的披露；不是主觀的抽象的意見，而是客觀的具體的事實；不是枯燥無味的表托，而是活潑有趣的描寫。

如果我們相信現代的教育，特別在他的方法方面，確已急激地趨於新教育——兒童中心教育之一途，那麼，這本書是值得我們一讀的。

新教育的原則及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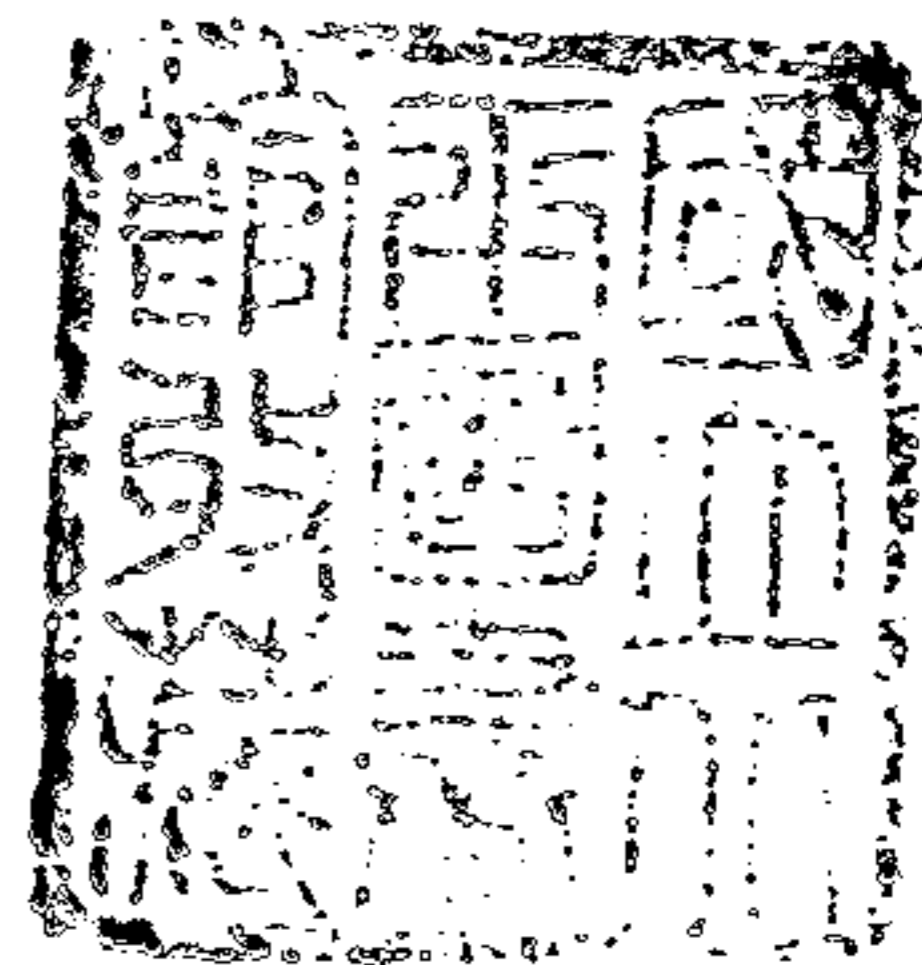
第一編 問題之檢閱

緒論 父母漸來參預教育

「我很贊美新學校的辯護士攻治那些最可怕的問題的勇氣。我亦贊美他們的堅定和他們的創見。我相信這些先驅者確正依據一種原理而動作。即是祇有他纔能使教育在美國成爲政治自由與工業自由的支柱者，和民主主義之真正的守衛者。」——愛略脫 (Charles W. Eliot)

「出來，看看我的兩個小孩，等我表明給你我知道我如何教育他們——更說妥當些，我如何幫助他們自教。」

我便外出到我的朋友家裏，這是布魯克來因 (Brookline) 地方一個美麗的家庭，內中有草地，有花園，有牛羊廐改成的工廠與體育場。有一個小孩正在花園內工作，其他一個則在書室裏剛要閱畢他的日報。他們大約在十二歲至十四歲之間，他們從未進過學校，只有每天下午到鄰校參加運動數小時。



我的朋友說：「我不能將他們信託與任何學校。據我的意見，平常學校的訓練與習慣不特不能幫助他們，而且會損壞他們。我歡喜計劃他們的教育循着真正發展的路線而前進，我現在聘得一位家庭教師來助我實現我的教育計劃。」

這兩個兒童曾經合編幾本關於旅行的書籍，當他們坐了汽車旅行，他們必寫日記，其後更寫成一種遊記的形式，編之爲書。

我問他們：「在何處找尋你所遊覽地方的地方材料呢？」

他們說：「在多德（DOD）所著袖珍書裏。」他們乃給我看在袖珍中的每一頁都附有他們所參觀城市的材料。

有較他們在美國旅行中著的書籍更有意義的，就是他們去年到歐洲旅行所寫的報告，每種報告都有許多寫真及從旅行印刷品中去剪來的圖畫貼在上面。

這兩個兒童，他們可愛的態度，深默的誠懇與天真，求知的慾望和勤勉的習慣——

——我想，這些都要從最好的教育養成，若要養成同樣的兒童，則非有一種特殊的學校——一種新式的學校不可。

數月前，我接了從尉勒德 (New Willard) 來的一次電話，說「這是從盆奈 (Penns) 的阿倫 (Allen) 城某先生打來的。我讀了你這篇關於中等學校失敗的論文，很感興趣。你關於我在家教育的三個兒童的意見，我現在很想領教一下，你可能來這裏，和我們敘餐嗎？」

我覺這位先生和他的夫人在討論教育問題時，非常高興。他們正在家中教育三個小孩，另聘一家庭教師來襄助。他們用特創的方法來發展小孩的悟性、創造性和個性。他們現在只差一年便要將兒童遣送入學。但是有什麼寄宿學校可以尋來繼續他們小孩的創造方法呢？這是一個問題。我對着這個問題，沒有滿意的解決，因為現行的學校系統是這種樣子的。

有一個不遺子女入鄰近學校的新英倫的母親致函新教育雜誌 (Progressive Education) 提出以下的疑問：

「在家裏和一個兒童來工作，就可有機會視教育爲生活的一部份，而不視教育爲弄過了畢業後便很愉快地拋棄不顧的一些事物。在家裏，很有時候去創造一個自由的环境，盡量發展個人的悟性，發見兒童精神的泉源，和教育兒童爲自己而用正確的思想。除了把初級教育變成一些最單簡的原理，我的時候大半耗費在品性的陶冶，與理智的訓練。當吾兒八歲時，每日教他誦讀一次，凡三個月，他便會讀所有的書冊。到十一歲，他學了一個學期希臘文，即能領略希臘文之美，而且讀來非常容易。他造了許多藝術上和手工藝上的工作，造來很好，進步也很自然，這種情形，我相信每一個兒童都能一樣做的。」

「我的小孩現在已是十四歲，他將進正式的學校；他的心靈比起同年歲的兒童可信更爲成熟；他不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他只是能用心，能用手，交人接物有好的品性。尋常的學校將來對他怎樣呢？他這些能力是否將受抑制或仍能發展？他的判斷力將會損去嗎？我的特別的工作將會無形取消嗎？」

同樣的問題，許多父母都曾感覺到，就是一方面明知平常的學校窒塞創造性，過重形式的訓練與傳習，不敢使他們的兒童去受這種標準化的教育；別方面又因社會的關係與其他的理由，覺得家庭教師的制度，亦非一種完善的方法。他們所要求的就是一種新學校：這種新學校，課程極富柔性，能適應個別的差異，他又能注重和幫助創造性之發展，及使教育成爲愉快的和有感動力的歷程，一如其本來面目。

常人對於流行教育法的不滿意，如是其普遍，那正足以暗示國內賢明的父母，對於從過去遺下的，和到現在還實用着的普通教育概念，要起而反抗。這些父母，驚疑着這種教育不能與生活發生關係，他感覺到今日兒童物質的與文化的環境，與前一兩代是絕不同的，而生活對於兒童的需求，也不同從前的。

他們感覺今日的兒童，至少有一大部份，因爲這種曾經變遷的環境，日趨於複雜與緊張，實大異於昨日的兒童。他們神經組織的感性更大，更富熱烈性及創造性，接受力及了解力更強烈；對於那些變更現代文明的原動力機械，更爲愛好且更適於習用；不甚愛好抽象的形式和與生活無關的書本。學習是急速的，對於惹人疲倦的重覆練

習，是不能忍受的，對於祖先拘泥固執的風習是不感興趣的。——所以這些兒童，對於以記憶而學習的舊方法，實絕不覺其需要，亦絕不覺其有能利用之處。

帕特喃 (Nina Wilcox Putnam) 在他所發表的他們不能在學校裏學得的東西一文中，用一種極盡譏諷的語氣說：「大部份的教育方法，都是在摩托車、電話、無線電、收音機、電影、飛機等等近代發明物之前發明的，他們怎麼樣能實用呢？這許多科學的事物，爲什麼不能在學校裏佔領更大的地位呢？我以為世界上最好的一本地理書，就是一張摩托車路線圖，而學地理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應用牠。你應用電影去教二十分鐘歷史，要勝過你用滿載無味年月的書籍去教兩年。我個人在學校所學的東西幾乎盡把牠遺忘了。爲什麼呢？因爲牠與我出校後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之故。」

二

晚近漸有很多受過高深教育的婦人，他們做了父母，他們做着許多公共的活動，因此他們便替學校造出一種家長，和以前的絕不相同。因爲當這些婦人做了母親時，對於他們子女的教育，很能分析，能選擇，能判斷。他們甚且能定出一種確當的教育方

法和目標。

這種有智慧和極開明的母親，亦常研究如何指導兒童的問題。他們大都隸屬「兒童研究會」和「新教育聯合會」和「大學女子聯合會」及其他組織，或讀這些組織的刊物。而這些組織，都是新近興起來，應近日父母的需求，使得他們能更了解什麼是教育，和教育可以變成什麼樣子的。他們又常將各種教育雜誌，如兒童進步的教育等等捐助各普通人民。他們常在各種文藝的或普通的雜誌上，努力批評現存的教育方法，或宣傳一種更能使兒童發展的新方法。他們購買那些最新出版的書籍，送給教育上一般讀者。他們去參觀他們兒童所入的學校。他們批評學校的教師和教法。他們小心研究他們兒女對教育歷程所起的反應，和緊緊觀察他們所起的不好的象徵。總而言之，晚近的父母已成在職教師的一種有興趣有知識的共事者去教訓他們的兒女。現代的教師亦很歡迎這種共事的人，希望藉此能對教育為進一步的改進。這自然是極重要的，就是為父母者應懂得多少教育的歷程，正如他們應懂得多少他們兒童身體的發展與需要。父母的事務是充滿責任的，是不應當且不能夠委託

別人代理的。無論那一時代的教育趨向都是當時父母欲其如此者。這是他們一種理智的或愚笨的見解的表現。因此，要想有最好的教育，我們必先要有最好的父母，即是要一種具有聰明自覺的主旨以對其兒童的父母，而所謂聰明自覺的主旨要包括身體的、心靈的、社會的、精神的整個教育歷程。

因今日有了進步的父母，所以就有進步的教育出現。這種有現代精神的父母，不但要替教育新原理辯護，他們而且合力在國內各地建立學校，使得他們的兒女可有一種所期望的教育。這些合作的和進步的鄉村日校的故事是很有趣味的。他們在開始時，許多都是極簡單，後來漸漸工作然後達到更大的成功。但是又有一些經濟極其充裕，故開始時，即有一塊極大的和極美麗的校地，建有宏敞的校舍，表現牠是一種最新的學校建築。經常費用得父母合作極形充足，可以為一切的設備。這種學校，目的絕非冀圖獲利，而在實施一種完全的教育，有如想得出和做得到的那樣完全。

愛略脫 (Charles W. Eliot) 在一九二四年嘗說：「新教育的學校在數量上影響上都增加極速，教育界的大眾現已漸漸認識新教育學校的好處，牠已經是歐美兩洲

將來的學校了。」

然而這種新學校絕不限於私人創設者，公立學校亦可採用牠的方法。在相當時
間，美國全個教育系統或都感覺到這種顯著運動的動力。然而此時必要美國父母都
能具有進步的見解纔行。因此，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教育知識的進展。

三

美國新教育運動的先驅者是帕刻 (Francis W. Parker) 他是支加哥庫克 (Cook County) 師範學校校長，曾依着裴斯托洛齊及福祿培所主張以兒童能力而非以課程為教育中心的學說，發展而成一家言，他并且拿去實行及教授學生。

在他於一八九四年所發表的教學談話 (Talks on Pedagogics)，他曾發疑問：「
什麼是被教育者？什麼是兒童？這是世界上的中心問題。兒童是一切上帝創造物的最
高的頂點。這是一條給你，給我，給現在及將來的教師解答的問題；或且他永久不能解
答。所以我們應由兒童的行動，及行動的趨向，去研究兒童，有如我們研究其他一切現
象一樣。」

帕刻極愛兒童，這樣使他深解兒童本性，他看兒童爲一活動有生氣的精神，具有等候教師的正當指導而發展的潛力。尊重兒童，滿認兒童應該研究，視了解兒童本性的知識比較教材的知識更爲重要，凡此種種趨勢都是今日新教育者的特性。

帕刻研究兒童得一結論：就是兒童確是一個活動的東西，教育應基於他的活動的需要，自然而有的好奇心，及尋求探討的精神，他說：「世界上如兒童其物者，永沒有生而懶惰的。兒童之年實充滿各種活動，常待外力之引起，與常爲外力所形成。兒童的試驗，除非得到這種終結，否則要永久繼續。」

這位大教育家與理想家得到布稜 (E. Blaine) 夫人贊賞他，和熱烈設法幫助他組織一間學校去實現他的理想，那是何等一宗幸事。從一九零一年起，在芝加哥的帕刻 (Francis W. Parker) 學校便開始他的光榮歷史。這間學校不只將理想的教育給與千百的男女兒童，使他們許多將來都有卓越光輝的事業，極端增進母校的光榮，而且在許多年間，吸引美國及其他各國無數的人到來參觀，和用他同樣的方法去組織學校。

要將帕刻的理想與工作歸納起來，我們可以說就是因他酷愛兒童，如裴斯托洛齊及福祿培輩之所爲，故他深識兒童品性之關鍵，於是他創出一條原理：要使學校適合兒童不要使兒童適合學校。從這點看來，帕刻確是兒童新世紀的先覺。兒童今日已得有自己的位置，父母與教師已另有新的眼光去看待兒童，尊重兒童，一任他們的內部能力跟着他們的天性來發展。

當着帕刻在庫克師範學校建設他的革命的教育原理的時候，有一個才華甚美，和富於創造性的少年教育家，他此時正在芝加哥大學教育哲學系主任，亦在一間小的試驗學校裏，進行實驗他的一種教育哲學和心理學。他這種試驗對於世界有這樣大的影響，故現在羣稱之爲「新教育之父」。這個少年就是約翰·杜威。他對教育科學的貢獻有兩方面：第一，他主張人類在方法上和知識上的成就既然都從他的實際的職業的活動而來，所以在兒童教育中，活動的課程最爲主要。第二，他特別注重兒童交際社會中的知識與經驗的價值。他的學校與社會，刊在一八九九年，就是發表這種新教育哲學的，即是第一，要從做中去學習；第二，在民主主義教育的需要上，社會的價

值與智慧的價值，要同樣注重。一九零二年，帕刻逝世，杜威繼其職爲芝加哥大學試驗學校主任。同時發表兒童與課程，提倡兒童心理的教育原理，這種原理後來便變成新教育的領導。

杜威說：「兒童是起點，是中心，是終鵠。兒童發展，和兒童生長就是理想，惟有他纔能做出標準。在兒童生長之下，一切功課都要附麗於其下，給他來應用。這些功課都是工具，其價值如何，都要看他能否有裨於兒童生長的需要。人格、品性，那比課程更重要，教育的目標，不是知識，而是自己表現。老實說，我們確要與兒童站在一起，不要離開他。決定學習之質與量的，確是兒童而非課程。」

「當着我們的心能活動和融化的時候，那麼，那唯一有意義的方法就是心的方法。教材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食品，可能消化的物料。學校內一切成爲死板的、機械的、形式的原因，皆來自以兒童的生活及經驗隸屬於課程之下。又正因如此，所以研究與煩悶同義，功課與事務同解。」

一九零四年，杜威任芝加哥比亞大學，因有這個優越的地位，所以他從此卽做新

教育運動的領袖。他嘗受聘到外國如中國及土耳其等處，以備諮詢來建立這種落後國家的學校系統。雕藍特 (Will Dunning) 在哲學的故事裏說：「一切進步的教師都認他爲領袖，亦沒有一間美國學校不受其影響；杜威第一次惹起世界人士注意的，就是他在芝加哥試驗學校裏的工作。在這期間，他已啟示着他的思想趨向，而到現在三十年後，他的心仍能接受教育上各種新運動，他在明日之學校裏的興趣永不弛懈的。我們隨處都可見到他很活潑地在世界學校的改造事業中活動着。

約翰孫 (Marietta T. Johnson) 在他於非耳和普 (Fairhope) 地方一九零七年所設的有機學校；斯密 (F. R. Smith) 在他於巴爾的摩 (Baltimore) 地方一九一二年所設的帕克學校 (Park School)；摩爾根 (A. E. Morgan) 在他於俄亥俄 (Ohio) 之戴通 (Dayton) 地方一九一七年所設的摩稜公園學校 (Morsine Park School)；及其他許多領導進步學校的新教育先驅者，都是建築於帕刻與杜威所造成的同一基礎之上，亦卽是建築於直接的或間接的從盧騷、裴斯托洛齊及福祿培諸大教育改革家遞嬗而來的同一基礎之上。

這裏不是撮述進步的學校之地，亦不是表出此種顯著運動的通史之地，我們只講到在美國確有十餘所新學校，實施新教育，一種意思使心滿意足。這既然是一種自然的和自動的運動，許多人的心思材力的結果，則對於自由原理及兒童自治原理之應用，從保守的及溫和的應用，至極端急激的應用如非耳和普的有機學校，或紐約的摩赫哥學校 (Mohagan Modern School)，各校所爲者，其間自有許多不同之處。

四

什麼是新教育呢？雖然已有許多著作論及這個問題，但是那些有用的材料都是關於零碎的事情，而很少論及整個的方法。在事實上，確是很難描寫那種進步的新教育的。因爲牠是許多不同氣質、不同觀念、與不同實際的人的成就。一個人的觀察無論怎樣深刻，眼光無論怎樣闊大，都很難給這種運動找出一種同時適合個別和括概的定義的。

要想定義正確，必須要有一種客觀的定義，使進步的教育成爲如此的那些教育家方面，有一個集成的與綜合的描寫。他們以爲什麼是這種運動的最重要的性質呢？

他們所依附的教育原則是什麼呢？在他們心裏什麼是新教育呢？

以上這些問題都曾問過美國的新教育者。他們以爲什麼是這種教育改革的特質及要點都曾細加分析列之成表。下面的新教育家，都曾幫助我們對於什麼是新教育作第一次客觀的規定。

（按所舉的人名校名見第一編末第二十五頁）

這些著名的教育者結果有什麼貢獻呢？下面所述的十種原則就是他們對於新教育所集成的見解。個人的特見及極端的見解是沒有的，彼此的異點亦盡量減少。因此這些原則是最正式的、最確當的、超個人的、和適合爲新教育之詮釋的。

第一原則 健康第一重要。

杜威說：「假如我們是尊重兒童的話，我們第一種特別要遵守的規條就是要確實使兒童有一種健康的身體發展。」所以新學校要把健康列在第一。這點不只解作檢查身體、預防疾病、廣開運動場、鼓勵運動。他還要解作學校生活自始至終都須適於

發達兒童的神經系統。他要解作坐位要可移動，在課室內走動更多自由，減少書本功課的分量，多用手工及各種機括活動來平均頭腦的工作，班級人數避免過多，使年幼的小孩不致受過多刺激。充分休息，多在戶外，家庭學校密切合作，以預防醫理上心身的病態。總而言之，新教育者承認他們的第一種責任，就是替每一兒童建築一最好的健康基礎，以發展他們將來的事業。如在必要時，書本功課要為健康而犧牲，而不要使健康為書本功課而犧牲。至於那種比賽的積分制度和因積分測驗考試等等而起的日常的緊張工作，非盡廢除，則盡改變。

第二原則 從做中去學習；用兩手幫助頭腦。

現行教育系統之所以常常失敗，而不能惹起青年的興趣與熱誠，就因他們太重取得書本知識，和太重培養被動的接受的習慣。這樣的教育方法，似只適於單靠讀書便能受高等教育的時代。至於現代的青年，則迷眩於週圍的機器世界，及其一切神異的發明。我們今日是要普及教育，如非大多數的，至少有大部分的兒童是要活動的，愛做勝於愛讀的，所以活動的課程應盡量引入學校生活裏，甚且引入學校的學科裏，手

工的作有許多重要價值。莎士雷得的幼年 (Shackled youth) 一書的作者，及加省奧加 鄉校 (Ojai Valley School) 的創辦人約門茲 (E. Yeomans) 氏甚且視手工工作為第一重要。「從做來學」的教育哲學之始創者杜威，證明學校裏活動工作的需要，在能產生誠實、負責、悟性、創造性、領袖能力、種種的特質，正如當昔日的家庭為工業社會亦當產生同樣的特質以訓練青年。如有用這種教育法的地方，他們的好活動的小孩子必不至逃學或反抗學校。反而覺得需要利用學校這種機會來滿足他們天才的發表。

第三原則 課室不要有不自然的禁制，外部的強迫須變為內部的強迫。

關於學校紀律方面，及學校工作方面，新學校的生活都有多量的自由。在一切的新學校裏，都有一些學生自治的方式。兒童都覺得學校是他們所有的。他們幫助訂立規則來管束他們自己求學的與社會的行爲。因此，他們對於學校規則都極盡忠誠。自由與民治主義由新教育引入學校裏的，在政治社會裏早已存在，而在家庭中則此刻方才發見。此後再沒有獨裁政治的時代了。當兒童學習管束自己，他們行爲都是很好。他們所以希望自治，就因自治理想對於社會團體是固有的和必要的。兒童不特需要

紀律的自由，他們而且需要身體的自由，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自由。這些自由，新學校都要供給他們的。

第四原則 要使教育適合各個兒童的差異。

人類的進步在乎有變異，而不在于重複同一模型。凡是堅持過於標準化的人們，都會斬斷後代進化的根兒，進步的新學校正式允許人格中的差異，鼓勵這些差異，並設備一個豐富的環境使每一兒童的天才都能含蕾結子。兒童需要這些東西尤甚於需要取得書本知識，甚或能力與技能。他們更需要教師的同情了解與指導，以成就他們的天然能力。現代教育之過於標準化，正應對於此種事實負責；就是許多兒童總覺學校不如家庭，而這些兒童對於人類進步都是最有貢獻的。

第五原則 要發展兒童的團體心與社會性；社會的適應，品性的訓練，與功課的進步有同等重要。

新教育的先驅者帕刻極端注重兒童的社會性，及兒童為團體而非為自己的工作。因此，他破除一切比賽的積分及獎賞。自從帕刻之後，新教育者都繼續這條思想的

路徑來走，大家都覺到在這個世界裏，比賽競爭的制度已開始漸漸變爲人類合作的制度。因此，他們設法發展的是兒童的社會性及合作性，而非競爭性、排斥性。團體的設計，爲實現這種目的的重要方法。因爲在這種設計中，一切成功都是由團體做的，和爲團體而有的。日會及週會，在其中的個人與團體能對全校各獻意思者，又爲別一重要的元素。從學校生活當中所起的一切日常事件，便可解說社會的必然性。在新學校裏的兒童通常有一種特性，就是他們的舉止總很文雅的，態度很溫和的。他們知道怎樣和伴侶一路前進去獲得一種功課，那是對於他們將來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

第六原則 兒童應有充分機會爲創造的發表。

新教育者極端注重兒童找尋機會爲創造的發表的需要，因爲他們相信教育是一種發表的歷程，而不是一種感受的歷程；換言之，他們相信教育是兒童潛力的自然開展。現在流行的教育標準化的系統，不特不許兒童多有機會去發表個性，而且要禁止發表個性，那是很顯明的。惟創造的能力對於種族既有極大的價值，故新教育者不得不視創造的能力發展爲教育的基本任務。進步的新學校只是給各種藝術訓練在

課程中佔領一種重要的位置，他們還是不覺滿足，他們而且要盡力鼓勵創造，及企圖技術在實際中發展，去改革各種藝術的教授。發表第一，第二纔論到發表的形式。兒童從這種方法便產生一些有非常價值的作品，其價值之偉大，直可比擬拉斐爾（Raphael）以前的藝術。一代兒童經過這種的訓練去創造，將來或者會減少工作的煩惱，而把一些愉快的和創造的東西去代替現在流行的工業主義的形態。

第七原則 要使兒童學得運用求學的工具，不只要使他們學得事實。

兒童不須變成遊行的百科全書，什麼都要看過。圖書室裏和家裏的百科全書，亦是很容易供給我們各種事實的。但如兒童經過研究方法的訓練，和取得如何搜尋材料的能力，那麼，他所得的自比得了許多不能消化的知識，更爲有價值，即使這種知識能確實得到。這種創造的教育法比起傳習的，使兒童爲教科書奴隸的方法，對於兒童實更有價值，和更愉快。

第八原則 把那種創造的發表的方法引入學校工作內使教育變爲愉快的。

新教育不只要改革藝術的教授，使其趨於創造一途，而且要進行一種更困難的

事業，要同樣的將悟性和創造性引到學校的其他工作歷程裏。例如以練習而學得的技術，也同樣的求其具有悟性與創造性。當此種方法能够成功，自即能够免除學校工作的痛苦，而使他成爲愉快的。新教育家說，兒童不是生而偷懶的，當他們自己的意思能够充分發表，他們定必不辭艱苦去工作，而務得成功；所以在新學校裏，兒童很愛好學校的工作，和視上課爲一種利益。這是一種事實。

第九原則 打破積分與考試的專制。

新學校并不完全廢除積分制與測驗，但用來減少學校的過度緊張及憂慮。新學校在課室裏例不用積分制，反之他們要設法打破一切比賽制度的弊害，因爲這樣常使俊秀的學生習於欺騙及自私，又使愚鈍的學生感覺失敗，感覺卑劣，或不公道。（因爲分數每不能公道地表出兒童的自然力及知識力的。）兒童常受鼓勵發表己見，及與自己先前的成就相比較，看自己有無進步。廢除積分制度對於兒童康健亦極有關係的。

第十原則 教師要做一個領袖，領導，而不要做一個工頭。

新教育是極端需要一種新的教師，即是需要一種有人格，有學問，和能引起及發展兒童創造能力的教師。這就是說：教師應有藝術者的氣質，而不要有官僚的氣質。這似乎不容易由教師做到，然而創造的教育法愈有效，則這種創造的教師愈易做。新學校很能夠吸引那些天才的男女入其彀中的。間常有許多母親，從前原是一個極有成效的學校教師，現在因為受了這種新教育法的鼓動，而重執故業，或因為想着自己的兒女能受這種教育法的利益而重執故業。有許多報告證明：新教育有不少價值是因為得有這種天才的教師而後能發生的。這點可是確實的，然這並不能減低新教育的優點，這反足以顯明創造的教育能吸引那些創造的人物去共同工作。其實亦只有這種教師然後能辦新教育。

五

以上略述的十種原則足以表明世界現有一種新教育，這種新教育不是一人的概念，而是一組富有創造才能的教師，根據其多年實際經驗所發出的平正與精練的表示。任何人都可見到那些盡忠於新教育的教師或父母，都是有一種優良的學識與

美滿的人格。他們在教育中所見到的、所信仰的、與所要求的，都是全世界人將來在一代內所見到的、所信仰的、與所要求的。

進步的新教育不是一種教育系統。牠不是某一人對其當時的教育方法與思想所起的反射，有如許多教育的改革。牠是一種自動而起的運動，從這裏，從那裏，在歐洲、在美洲，各處發生，去供應一種初時爲無意的，後來即變爲有明顯意識的需求，即是供應一種要求更適於新時代與新兒童之教育的需求。牠是爲父母的與爲教師的對着過去形式的反抗；那些形式是由新心理學證明爲不合於兒童天性的。牠也是課程專制的反抗；因爲有許多課程的內容，比起兒童在整個的和自然的途徑中息息不停的發展來，其價值是等於零的。

無數教育者將其全身的創造天才放在新教育上，結果使新教育成爲如此。然而他們所成就的，還不自滿意，他們仍然繼續前進，或則正在研求組織更能完善的先鋒部隊。新教育有他的謬誤與缺點，新教育者是願意承認的。因爲他們不是企圖創立一種教義，從而製出一種滴水不漏的制度。他們只想擴張教育的領域到整個兒童去，使

兒童發展的每一階段都給研究和準備。這是一種偉大的事業，沒有一個教育者能單獨完成牠，亦不是短少時間可以實現牠。進步的新教育只是一種開始，牠只指出這條途徑。

如有人能到新學校參觀一下，看看他們的成就，這種運動自然更能明白。這樣一種教育系統的結果是可驚的。當兒童在一個理想的教師養護及指導之下而發展，則愉快、誠實、智慧上的熱忱、創造的能力等等，就是兒童所有的幾種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將來一代新的種族是怎樣；過去所有的自私心、誇大狂、幼稚性和未有成人的動機與能力之前便即強作成人之舉動等等，一切都沒有了；兒童此時站在他的本來面目之上：誠實、富有天才及創造性。

Mrs. Ethel Dummer Mintzer Francis W. Parker School, San Diego, California; Mr. Angelo Patri Public School, No. 45 The Bronx, New York City; Miss. Flora J. Cooke, Francis W. Parker School, Chicago, Illinois; Mr. Eugene R. Smith, and Miss Margaretta Voohees, The Beaver Country Day School, Brookline, Massachusetts; Miss Katherine Taylor, Shady Hill Schoo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Dr. Otis Caldwell, Lincoln School of Teachers College, New York City; Mr. Francis M. Froelicher, Oak Lane Country Day School,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Mr. Frank D. Slutz, Moraine Park School, Dayton, Ohio; Miss Ethel C. Bratton; The Ethical Culture School, New York City; Miss Caroline Pratt, The City and Country School, New York City; Miss Margaret Pollitzer, The Walden School, New York City; Mrs. Marie D. Harvey, Winnetka, School, Winnetka, Illinois; Miss Luca B. Morse, The Junior Elementary School, Downers Grove, Illinois; Miss Nancy Philbrick, The Keith School, Rockford, Illinois, Mr. Peny D. Smith, North Shore Country Day School, Winnetka; Illinois; Miss Faye Henley; The Orchard School, Indianapolis, Indiana; Miss Helen Ericson, Sunset Hill School, Kansas City, Missouri; Mr. Frank R. Page, Utice Country Day School, New Hartford, New York; Mr. James H. Dick, Mohegan Modern School, Peekskill, New York; Miss Rachel Erwin, The Winbrook School, White Plains, New York; Mr. Erwin Zavitz, Antioch School, Yellow Spring, Ohio; Mrs. Calvin B. Cady, The Music-Education School, Portland, Oregon; Miss Louisa F. Palmer, Hanahouoli School, Honolulu Hawaii; Mrs. Marcietta L. Johnson, The Organic School, Fairhope, Alabama, Mr. Edward Yeomans, The Ojai Valley School, Ojai, California; Miss Cora L. Williams, The Cora L. Williams Institute for Creative Educa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Mr. Carl Churchill, The Unguowa School, Bridgeport, Connecticut; Miss Euphroysne Lang-ley, The Edgewood School, Greenwich, Connecticut; Mr. Burton T Fowler, The Tower Hill School, Wilmington, Delaware; Mr. Wilford M. Aiken, The Joen Burroughs School, St. Louis, Louis, Missouri; Miss Mary H. Lewis, The Park School, Cleveland, Ohio.

第二編 新教育的原則

第一章 健康第一重要

「假如我們是尊重兒童的話，我們第一種特別要守的規條就是要確實使兒童有一種健康的身體發展。」——約翰杜威——

健全的精神棲息在健全的身體中。這種千百年來關於個人發展的理想，在理論上是無人不承認的。然在教育歷程當中，我們曾經充分實行他了嗎？巴特里（Angelo Bate）說：「如果兒童的身體從頭至腳都不適合時，學校對於兒童是耗費的。」自然的，無論那間學校都宣稱視兒童的健康為第一重要的，和設盡方法保障兒童健康的。然在實際上，各校是否盡力實現這種健全精神棲息於健全身體的學說呢？

我們試參觀今日的學校。我們找得什麼呢？兒童本生在陽光普照與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愉快自由，但一到六歲就開始進到人數擠擁的課室，每天鎖在椅上的至少三小時至五小時，空氣是否流通，全賴教師的高興，課室內神經的緊張，教師的粗暴口音，笨重的課程和必須一年完畢的學科，教師對兒童授課時可惱的態度，短促時間的

休息，真正活動的缺乏，至在荒寞的學校操場裏往來追逐，聲音嘈雜，互相推撞當作身體的練習，不久又須歸坐於課室中。早上趕速上學，深恐到遲有犯校規，飯後又趕速到校。用嚴酷的紀律對付來自田間的小孩，他們放學後又要回家幫助工作——這樣的生活是否曾經考慮過，而認為可以增進兒童的健康？

我們既難於平衡智慧發展及身體發展的要求，那麼當二者互相鬥爭時，我們總須有左右袒。新教育家當小孩遇着這種情形，總以健康為重。無論如何犧牲，必須能確實使兒童身體康健。凡有妨阻兒童身體健康者，都是教育上的罪惡。不極端注意改善兒童健康，及建築一種強健的身體以為兒童將來的基礎，那亦是一種罪惡。兒童的身體不好，不特智慧的活動失敗，就是品性也難養成。懶惰，缺乏向上心……容易惱怒，以及人格上有時發生嚴重的缺憾，亦因形態上，機能上，及神經發生毛病而來。

克伯屈 (Kilpatrick) 說：「如果我們是要兒童有紀律的，那就因為想他們有一個愉快的兒童期，而健康在期內最為首要。兒童年齡漸長，我們仍望他愉快。我們都希望他們在兒童期內充滿活動，有把持力的活動，挑戰的活動，和種種活動；在聰明的指

導之下，愉快的兒童期充滿活動，有把持力的、挑戰的、和種種的活動，就必然能建立所需要的品性而毫無疑義。」

學校既然接收年幼的兒童，那麼，他的第一種責任自然要留意兒童期所最需要的東西——身體上的發展與幸福。學校裏無論會做些什麼，與會發生些什麼，兒童都須能夠為自然的、康健的、與正當的自由發展。這樣自不能由放任主義可以達到，必須要有詳明的計劃與教育的方法。

我們不要忽視各公私立學校，對於學生身體的幸福一致加以廣大的注意。現在有一種最佳的改革運動，是要求兒童的健康，公立學校即為其中最盡力的一分子。在必要時，免費送藥醫治那些有妨健康的疾病；在必要時，施免費手術的調治；或家庭有辦法時，勸告為醫藥上的留意；對兒童演講健康的習慣，學校為有定期的或無定期的身體運動，極端留意運動場及運動場的設備，其他一切體育的設備，甚或有時設游泳池。十分注重精神衛生，教師探訪家庭為協助的工作——這一切都是很好的，很有價值的學校健康運動。

然而還可多作些事情嗎？新教育者說當然可以，還有許多可作，以下就是他們所應做的。他們將學校建在城市的郊外，在空曠之中，有許多空地圍繞着。他們有長久的休息時間給兒童遊戲，就是天雨的時期，也有許多運動設備。他們每天下午都有運動，兒童必須全體去參加，不可缺漏。校舍爲衛生起見，採用近代最新式和最完全的建築方式，凡近代衛生學關於光線、通氣、健康，及易於到戶外運動諸點所認爲最完善的，都無不照辦。

進步的教育所出的學校環境問題專號曾說：「新教育主義既特重保衛健康的情境，那麼，新學校的建築自不能不注重一切關於課室中光線的與空氣的情境。課室誠然需要太陽。然而太陽如照在學生面上，或工作上，那麼對於學生的兩目便生危險。太陽從學生背後生出的陰影，亦能使課室內的光線不均衡。至於有陽光射上的黑板是很倦眼的。」

斯密 (Eugene R. Smith) 或比其他新教育者更注意學校建築的衛生需要。皮佛爾 (Beaver Country) 日校未建築之前，他嘗用許多種小心計劃的實驗去決定他的正

確方向，他將一間教室的模型放在一張試驗的桌子上，更以一個探海燈的太陽為適當的安置在空中，這樣便可以決定一年四季和一日各時的光線方向。

布法羅(Buffalo)的帕刻學校是一種小單位學校的有趣的模型，該校為許多的單層屋所合成，每間單層屋約容兩班，每班約二十五人，這些單層屋是很矮的，簡單的，和散漫的，但備有多量地方給各組兒童進行他們各種生活的經驗。大的房子是沒有粉飾和裝置的，那就留為兒童自己藝術表現的範圍，東南兩邊有大窗，可以透進和暖的空氣，使這種單層屋成為露天學校。每個課室之旁有一工場，這種「靜室」地而是用兵艦上的油布鋪蓋的，裏面燃着燈，專給兒童默讀，及戶內遊戲之用。且有許多門通到平臺，或通到蘋果園中，使兒童易為戶外的生活。

新學校極端反對書桌用固定的排列，使一般兒童感受心意上的甚或身體上的不良結果。在新學校裏，一切傢具都可移動的，或則由兒童圍繞一張大圓桌坐，或則設有一些可以隨時搬運的桌椅，使室內的桌椅可以很快的從團體研究的佈置變而為演講、演劇、或別的活動的佈置。

准許兒童有極大的活動自由。凡參觀新學校者，第一就會驚奇裏面的兒童能由此室移到彼室，而不需教師許可。他們或許做着一些研究工作，或許來來去去，尋書參考問題，與同學商量工作，搜集與所研究問題有關的手工材料。課室此時成爲一個忙碌工場。在這裏，一切限制形式及懲罰都盡破除。

在工作課室的設計當中，兒童不只有行動的自由，他們而且有社會的自由及機會去和同學商議，比較工作，談話，因爲這種社會的活動，對於室內進行着的工作是絕無妨礙的。

傳說部爾 (Ole Fin) 坐在校裏過久的時候，會忽然由窗門逃出外面，跑到曠野去。在溫和的季節內，涼爽的金黃的秋光，溫柔的銀白的春日，兒童們對於氣候、陽光，以及新鮮空氣的愛慕心情，似已盡被可悲的剝奪。誠然，教育必須進行，生活必須準備，然而愛好自然與享樂自然，就不能在教育歷程中利用的嗎？新教育者要建築他們的學校在易於接近自然之處，他們當中有些半露天的課室。天氣和暖時，便將課室移到戶外去；在大樹下，或在太陽中，一隨當時所喜。保守的教育者常發生疑問：當着天色晴明，

木葉滿枝，黃鶯兒在樹梢高唱，麻雀兒隨處跳躍的時候，不會擾亂兒童的注意力嗎？然而我們可以解答：第一，如果注意力確會分散一些，那亦不是教育上的損失，不過那種機械的效率多少為自然之美所犧牲。第二，新學校的兒童早已在放任的情形之下，受到怎樣去集中注意的訓練。

兒童不只常常到戶外繼續他的課室工作，他們而且常有教育上的曠野旅行。此外又有許多學校的設計，要兒童在戶外做的——例如園藝、飼養家畜、寫生、等等。所以新學校並不是將兒童放在樊籠的自然界裏，而不使其與自然的美麗及健康相接觸的。運動與身體活動都是一切兒童的需要物。新學校的課程使手工工作佔很大的地位，此點對着兒童的健康，即有直接的利益。此外在設計裏，遊戲裏，和蹈舞裏，尚有許多活動情形。然無論何處，都是以允許甚或需要運動的教育方式，來代替靜止的書本教育的。

這種學校與兒童以機會去發表他們的活動需要，而有裨於兒童健康，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那種要求兒童終日坐在椅子上，在研究與誦讀的學校，究得着什麼好處

呢？法蘭西學校正是這種學校，他們的好處就是能發達智慧，但是因為智慧的發展而至犧牲兒童的健康與人格的平衡，盜格羅薩克森的人民是不願意的。

近代教育之一種最大的進步，就是要使學校成爲頭腦比較不緊張的一處地方，斯密在教育的前進（*Education Moves Ahead*）一書裏說：從前兒童在學校讀書時期裏常感受身體減瘦，這是沒有疑問的。雖然解釋兒童爲何在年中某期體量加重某期體量減少有許多種學說；然而從兒童一經停學或轉學別校時，體即加重的種種事實，實可證明兒童腦力過於緊張足以影響到身體的生長，或且損害身體的情狀。那些繼續不斷的受壓制，長期的保持靜寂，和永遠不許自由活動的兒童，身體上必定沒有良好效果的。一個約十二歲的兒童違犯校規，坐在窗檻之上去觀着街上行人，他回家對母親說：「當我見着一個婦人行過，我自己想：假使當你被迫必須終日坐在座位內，而永不許活動時，你將會怎麼樣呢？我永不相信你能做的。」這個兒童想的是對的。兒童不易這樣做可以用測驗來證明：測驗就是表明兒童經過短少時間被強迫靜寂之後，他們常有很激擾的反動的。在別方面，一個安樂的學童，享受合理的自由，熱心從事

日間的工作與遊戲，那他真是處在一個日進於康健的環境中了。

二

新教育所希求的目的就是在兒童之均衡的發展。這些書蟲、冥想者、病態兒童，如果他們入新學校，他們的身體與人格，必能得一更健康的均衡。無論何時何地，新學校如得到年幼的兒童，他就充分利用他的機會，來使他們發展為一個平衡的人。每日間料理多數在生長時期的幼童的新教育家，對於幼童天性的每一部份，發展生長的每一階段，無一不是他所注念，他所負責的。新教育家密切與父母及醫生合作，不特為精神的紀律的訓練者而已，在廣義言之，他們而且是一個人格的建設者。

福勒斯特 (Follett) 醫生說：「新式的進步的幼稚園，正循着民主主義的教育哲學來發展，和正充分利用現代心理學、病理學、和衛生學對於未到學齡的兒童天性及需要所得的結果，所以現代的幼稚園是注重兒童各方的圓滿發展的。他們目的在設備適於兒童身體、社會、情感、智慧的需要之各種活動，來圓滿發展兒童。近代幼稚園的課程與方法，得有進步的報告，就是證明他們對於身體的、社會的、情緒的、與智慧的每

種發展的元素，都有相當注重的。」

關於誦讀方面，許多新教育者，都以為最好將這種眼球的不自然的應用（常常很是緊張的）人類之至後和至難的技藝，延遲到八歲或八歲以後纔教。又在學得誦讀的技術後，他們還要引誘那些太愛書本的兒童向別處去，免得他們對於偶像盡忠太過份了。他們大部的學校時間供給活動課程，手工藝、音樂、舞蹈、和演劇。運動是個個兒童參與的，決不能因為向內活動而免除。在這樣的方法裏，新教育是要保衛那些酷好讀書的兒童將來的與現在的健康——大部分亦因牠引導兒童入於夢幻的世界，入於超出空間時間的世界。兒童們都可以走向那書籍的神奇世界去，惟絕不要任他們去得太多或太愛好了，恐防他們玫瑰色的面頰，和頰上的笑容，跟着健康、平衡的心靈、運動的愛好一齊消滅了。

兒童是富於感情的情緒的和精神的因子，多數有關健康的狀況，因此，課室應極其整潔、幽靜、和諧，及愉快。教師要有優美高尚的人格，可愛的聲音和笑貌。課室人數應少，最好不過二十人。在這種快樂、同情、及和諧的空氣中，兒童必能完美發展。

斯密在某次演講中，說及他學校裏的兩個姊妹的大進步。在人學的第一日，他們回家，熱烈的大叫：「呵，母親，你以為怎樣呢？這位教員長日內沒有一次喝罵兒童的！」他們本來是很易激怒的瘦弱兒童，現在他們變為常態的和平的了！他們現在體量更加重，愉快，健康極有進步，同樣的例證也可在別的新學校得到。

健康與在專制的規則之下而受的壓制，是很有關係的。那些受壓迫的，強制的兒童及成人，面日常現青白和瘦削。所以「自由為健康的源流」一句話是真確的。新學校裏自由的空氣不特引導兒童精神發展，而且亦使他們身體生長的。

三

在通常學校裏，有一種使人悶惱甚或使人生病或死亡的原因，如分數及考試等，在新學校中經已減除了。許多兒童因為低劣的分數，在同學之前屢次的失敗，而致於頭腦紛亂，及滿心恐懼，凡研究兒童學者類能知之。分數問題將在下面一章詳細討論。這裏只引幾個具體的例證去表明分數與健康的關係。

本書著者當初在君士但丁堡的羅柏大學(Robert College)執教，亦曾碰着此種

青年的情緒問題。一個俄國的猶太人做拉丁文的工作不好，第一學期考試便不及格，他乃應允特別練習，只要第二學期能允許升級。現在到了第二學期之末，他考試的結果還差兩分不及格。因為他考試的平均分數在百分之五十，而他現在只得了四十八分。

他當考試分數定了後，便很急切地走到我房子裏，詢問他的成績若何。我告訴他不及格。他問我能否給他及格，任他來年努力償補。我和他爭辯他今年的工作，責他一再失敗而無進步，并告訴他知道，我不能給他及格的。

這個青年面色漸變青白，他說「柯布先生，假如我今年失敗，我是不要生命的。我的叔父助我入學，我的物理已不及格，若我的拉丁更不及格，我下年就必需留級。這麼一來，我的叔父便不會再使我入學校，而我的的一切事業都將失敗了。先生，我房內現有一枝手槍，如果我是不及格的話，我必自殺的。」

我怎樣做呢？他的恐嚇或許是虛作聲勢，絕不真確。然而，我深知他是一個奮激的青年，身體且常不康健。我亦深知歐洲青年因為他們的學業而出於自殺的趨勢。因此，

我就認定介乎他與安全之間，實有兩點，我應該盡忠我的職務還是盡忠人道呢？

那時候，我偶然憶起我在大學裏，有一個仁慈的教授，在我因體弱不能準備去應他所授的科學的畢業考試時，便勸我顧着健康，不要用功。然在授學位禮時，我很驚訝見到該科居然及格——不錯的，這確是我對他那種人道的記憶，使我將分數標準降低來成全這個猶太青年的。

我於是說：「很好，我許你及格。」他乃很心感我。所有東方人，當他感謝人的時候，都是很熱烈的，無論這是真是假。然而當時決策的真實證據，在次年年底方才見到，因為我那時很高興的發見他已能在羅柏大學成功畢業，康健、愉悅、很光榮的去應付他的事業。自此以後，我就認定這兩分分數是我們殘害青年的象徵。誰人能够在天秤上決定介乎四十八分及五十分中間的重量，與健康、快樂、事業有同等重要呢？

在同一學校裏有一個美國青年，他是一個最篤實的學生，學業分數極高。但我發見一年一年的過去，他的拉丁文的工作，愈弄愈壞，沒有生氣，不合邏輯，後來竟至不及格。我此時奇異極了，因為我深知他是一個聰明的、切實的、和刻苦用功的學生。我乃邀

他到我房間裏，詢問他準備功課的方法；他說他每日讀拉丁文兩小時，我於是發見他的失敗原因：他用功過度了，他現已鄰於肺癆。我關心他的健康，比較關心決定其學業如何的分數，更覺重要得多。

我對他說：「看呀，你用功過度了。你的工作不好，因為你勤勞過度，工作太多。我勸你這樣：忘記了這些分數，放手不要管他，不要憂心你的工作。多出外遊戲，假如你這樣子做去，我相信你的分數必高。」

他依着我的勸告做去，我很驚訝地發見（其實我自己對於剛才所說的話也沒有十分信心牠是真確的）他雖少用功，而他的分數確激增。他自此遂打破那憂慮與過度工作的難關，到了不必太用功即得好工作的地步。但如我不參預這宗事情，他必很快的染着肺癆病以至於死。

分數的殘酷還有一個例子：當我有一次在本鄉教書，有一個寡婦，她有兩個女兒，因沒有方法解決教育的事情，要請我和她商酌。她的一個十四歲的女兒正在悲傷的情境中，所以我也要看究有何方法解決。她這女兒對於歷史一科大為失敗，然她每

天至少有兩小時研究歷史的。她因爲屢屢失敗，所以神經漸漸錯亂，現在正在家裏哭着，鄰於絕望的情境，肺癆病已走進這個家裏，她很快的要死去了，而一切原因都是爲了學校裏的分數。

如果這個情形不曾發生悲慘的結果，那麼，試一研究牠，把牠的原因發現出來，那必是很有趣的。原來教歷史的教師是一個年少的大學畢業生，他現在要他的學生用那種在他考畢業試時所用的同一方法來研究歷史。他不指定學生讀某本歷史的幾頁，他要出一某問題要學生研究，報告，同時又不給他們各種參考書及各種指導。這個十四歲的女兒很難找得她受指定的問題的材料，我自己亦很難找得這條指定的問題的材料，到後來纔偶然發見有一本非常不流行的歷史書，而她的教師正採取這本書所指定的一切題材。我們於是就生一巧計：我使這個女孩子得到這一本歷史，她此後所要做的一切，都可以做，所要準備的功課，都可準備，只要誦讀這本歷史書一遍，因爲她的教師所指定的一切研究題目都是從這本書中採取出來的，不過小孩不易見這本書罷了。這個未成熟的教師，絕未嘗研究他所指定的工作怎樣困難，要兒童做

這種工作，真不啻要使兒童製磚，而不給他們原料。

四

我們在教育上的目標是什麼呢？不是由一種溫室的生長去產生一些精力衰疲，而生機虧耗的書本學生嗎？我們今日的教育歷程，不仍是一種畢業考試及格的教育歷程嗎？這種嚴酷的和可怕的最後審判法，不是在中等學校，甚至在初等學校創出一種恐懼的波浪嗎？分數，分數，分數！考試，考試，考試！報告，報告，報告！那麼就有最後的文憑或者沒有！這是一種正確的教育綱要嗎？

從這樣制度之下去解放兒童，這就是新教育的一種最重要目的。假如教育歷程是殘害個人的健康，生機，與將來的生活力的，那麼所謂精神的訓練又有什麼用處呢？學校各科的進步應在健康需要之次，而且應為他所限制。教育的目的應為個體的常態發展。父母與醫生，在兒童未入學校之前，每是出盡氣力去使他的身體有一康健的發展。如近代科學的養護所可能者。這種康健的身體基礎，在入了各級學校之後，不當受教育歷程的傷殘的。

今日的教育者負有一種新的任務。他必須在他的養護之下，留意兒童的健康，及將兒童健康的一切重要情形，筆記出來。其精細處，必須等於筆記兒童之智慧發展。他必須實行，提倡家庭的合作，以戰勝兒童身體的與精神的病態；其切實處，必須有如戰勝智慧上的缺憾。「健康第一重要！」這句格言必須標貼在全世界各校舍的牆上。

第二章 活動的兒童

「我們這裏現正開始相信小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手工作，在這手工之上，你可視牠如一種中心，將讀書、寫字、算術、歷史、地理、各科圍繞牠來教，而且可藉牠去養成一種更完美健全的品性，更好的思想判斷，和更均衡的心身發展。」

約門茲

紐約有一個童子，生長在最好的家庭裏，先後到克洛敦 (Crotch) 和耶魯 (Yale) 兩處受教育，都得了很壞的學業報告。在克洛敦，教師明顯地表示對他失望。紐約報 (The New Yorker) 嘗說及他：「這個青年當受了新英倫所能給與的最好教育之後，他的回答，只是將餘賸的時間，耗費在老虎鉗和一些鄙俗的方術上面。」克洛敦有一個教希臘文的教師爲着他乃寫了一首韻詩：

羅稜士 (Charlie Lawrence) 在工作時，
來得特別專心，

但這並不是學習拉丁文希臘文：

呵，不是——他曾造了一個精巧的小物品。

他正忙於完成那最後的工作，

好在他專利的新飛車上，

不停地飛行，

過大陸，涉重洋。

這位訕笑的教師，不曾知道他的訕笑正是一種預言：三十一年之後，羅稜士與柏林 (Chamberlin) 及拜耳得 (Byrd) 三人，飛渡大西洋，無不靠着這種推進器的發動機，(Whirlwind Motor) 而這種發動機正是這個完全失望的學生發明的。

巴特里 (Angelo Patri) 說：「教育不是藏在課本裏的。大部份要在課本之外尋得，永不繫在書本之內。最大的教育力在人，在經驗，和在他們之間的關係。兒童嫻習這

種教育力之最好的方法就是靠着他們的兩手。手能把人類從最小的鳥道，升到能走最強的發動機的大道。手曾賜與我們所有的一切。手曾使我們明瞭我們極少知道的「這個世界」。

在我們這個機械工業的世界，尤其在我們的美國，我們要告訴青年的，就是如何征服外部環境，和如何使用這個神奇的和革命化的有力工具去創造一種新的文明。現在甚至那些最樂觀的人文主義者，也不能希望卡味力（Sir Roger de Coverly）的論文集（試舉此爲例）能與摩托車、電影、和飛機的進步互相比賽，去滿足兒童的興味的。不是嗎？這些文詞豐美的論文，純是寫來供給沒有摩托車、沒有電影、沒有飛機，只有些少讀物的文化時代之休閒階級的人物看的。這些論文的古怪曲折的道途，已淪入年代溼遠的時代。我們還試從這種遺忘的年代去把一種爲着休閒階級而設的過去文化形式，恢復起來，再設法用他來轉移那些正在生長着的兒童，使他們不要對現在和未來的事物發生興趣嗎？又我們對於拉丁文和希臘文必須在現今的課程裏作生存的競爭，也應當去悲悼牠嗎？

美國在世界史上最先成就一種由羣策羣力而得的文化，這是美國的光榮，誠然美國也有利益階級，然而他絕沒有擁有特權的休閒階級。我們開疆闢土的祖先從荒蕪之地創出一種文化。這種原始的創造衝動到現在還未消滅的。工作的理想，與建設的事業的理想，正充塞着新世界的知識界，更漸從思想進而為行動。所以，我們的青年男女大都心身活潑，這是不須奇怪的。因此，我們必須去為他們計劃一種新式的學校，（新學校正從此而產生）這種新學校必須相當看重手工工作，看重在智慧進展歷程中其他活動的方式，和看重他養成的應付環境而我們稱為教育的能力。

需要豐富的手工作，去平衡從書本學習而得的智慧的抽象訓練，是關係全體兒童的。但是這樣的的教育特別關係着現在中小學裏許多生而活潑的男女兒童。我們現代的中等教育的面目，完全與過去時代的不同，因為在過去時代，高等教育的利益多為能受抽象文化的兒童所佔有，現在則不然。我們實不能有什麼方法去挽轉現在充塞於中學大學的人類思想的怒潮，我們亦不應該想去挽轉他，他實是現代最美麗的教育景色。

然則我們怎樣辦呢？由智慧與健康的提示，我們知道，教育當適應被教育者的本性與需求。在這樣的適應當中，一種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要用活動和手工，作為培育智慧和表達智慧的機會。

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的公立學校教育研究主任斯騰基斯 (John T. Steenbrunst) 說：「知識不只一種的：一個青年，他如能弄好一輛損壞的汽車，能駕駛飛機，及修理好一架機器俾照常工作，他都是有一種對於今日世界極重要的能力，而可稱為智慧者。機器的天才已嘗改革近代的生活，今日的文明，無時無刻不直接間接受着機器能力產品的重大影響。註冊入學的人數，日見激增；與其說他們傾心文藝，毋寧說他們是傾心機械而來的。因此，學校現正多多注意於啟發和擴充男女青年的機器能力。」

二

兩手確是由感覺到理解的一條重要通道，和在動物界裏表明應用分析能力之開始。唯一用手的動物是一種猿類 (Primates)，他們已幾於與人同類，而他們的知識亦接近原人的知識。用手，我們就可以考察一些非用手考察不可的品物。我們可以有

許多方法去權重、組織、平均、推動、操縱。若非手能自由活動，則擲石及射箭等等絕不可能做到。至於擲石與射箭這種能力都極關重要。有了這種能力，然後能使人為距遠的防衛與襲擊，及為動物界的統治者。當人類開始製造物件去供應自己的需要時，手的應用就更有一重要的進步。因那時候便開始技藝的文化。在進化程中再進一步時，兩手之敏巧的應用，得智慧的分析能力與發明能力所指導，於是使人類確保其能力去戰勝自然界，和佔領空中地上及海底。

兒童重演種族史，故多以使用雙手來開始為精神之發展。在嬰兒期，他表現着一種極欲把捉物件的傾向，因此常迎着目前不斷的刺激，設法滿足他這種慾望。嬰兒期過去後，他便有充分的把握去操縱各種品物，此時便極歡喜，極善領悟，以從事於製模、剪裁、鋸鋤、槌擊、運用畫筆、配置木料及別種物件、縛結及解結、變為建築者、製造者。在這點上，教育純為一種靠兩手來發表的事物。

科爾曼 (Satis Coleman) 說「每一個常態的兒童都有一種健康的與自然的慾念去製造物品的。當他的兩手製造着一件於他有趣味的工作時，他的心思並不懶手

樣那活動的每一塊鋸得合乎正當尺度的木條，每一塊貼得合乎方寸的紙條，每一塊用沙布摩擦得很好的鋼板，都能給兒童實現一些成功的事物。」

約翰·杜威曾將「從做中學」的觀念，引到教育哲學上。這正能使我們看到兒童賴手之助力，究能得到多少教育。在有計劃的活動中之現代學校的兒童，不過重演種族的歷史。例如用手製造各種居室的小模型，兒童即在具體的意想的方法中，學習居屋的進化史。他於是又製小碟、小泥碗，用木去製成不完備的桌子椅子，去供爲原人餐食所必需的用具。他在一架簡單的織機上學習織布，如他原始祖先所應用者。他掘地、播種子，注意種子漸漸生長以至於結實。他磨麥成粉，製成簡單的糕餅。他製洋燭，及原始牧人所穿的衣，穿了去表演原人的生活。其後，他或可製一古代的船隻，在想像中跟着我們勤勞的先人所行過之捕鯨的海路，駛出大海去。此後，他便可轉而研究文化美術，建造一所希臘的廟宇，和表演雅典與羅馬的生活。其次便是中古時代和這時代的砲壘，這時代的神異的禮拜堂，及行會生活，要靠他自己之心與手的工作造一行會生活的具體形式。他現在又可變成一個進香客，從大石纍纍的海岸登陸，建築木棚，

反抗那些印第安人。關於印第安人的習慣與文化。在他幼時，他或許已經學習過，然而刻下已是青年了。古代的理想世界，當沒有目下的真實世界能够使他發生興趣。現代的世界是充滿機器、摩托車、無線電、播音機、飛機等物的。所以，手工作如能與人類的生活需要相聯絡，而此種生活需要之認識又為各青年所要求的，則那手工作的教育價值必無限量。

美國新學校的手工作，又都採用杜威所設計的模型。我們如看一看那些新學校，那麼，我們就必見到這樣子的活動進行着，學校的課室當時可變成一間忙碌的工場。一條印第安人的鄉村正在建築當中。課室充滿活動、興趣、生命。其中沒有一個兒童是被動的或不動的，他們的注意力極其集中，當我們走入教室時，他們並不知道。如果我們要在兒童隊裏跑跑，也很難得到兒童答覆我們的問話，因為他們對於工作是極其忙碌的。他們只有極靜寂的，與極有秩序的往往還還，或取工具，或參閱書籍，或與他兒討論。這種學校課室當然不同平常所有的學校課室。因為他不是坐在固定的椅子上，靜默不動，手持課本的一隊兒童。

這種學校本質的變遷，豈不是一種大革命，其大有如哥白尼認太陽代地球爲天體的中心嗎？

爲便利兒童這種活動的工作起見，有些新學校便在每一課室之旁設一工場，有些則於課室的一條牆邊設幾張工檯，使兒童能即將觀念變爲具體的發表。手工工作因此并非縮在課程中佔幾小時的位置，或只在工作場中纔做手工工作，他實滲入學校的整個工作裏，與整個生活裏。爲頃刻間的觀察，一班或一個兒童可以從書本上跑到工檯上，或則可以從抽象的思想進而爲在客觀形式中的表現，讀、寫、算，常可以與這些活動一齊做去。（許多公立學校已將活動課程引入初等小學去，最著者如但維爾（Butter），嘎拉馬蘇（Kalamazoo）及舊金山（San Francisco）等。檀香山正計劃着盡將這種方法實施到他的學校裏。其他城市也都要效法。）

在各新學校中，活動的工作與學科的工作各佔時間多少，常不一定。約門茲（Yeomans）關於他的奧齋鄉校（Ojai Valley School）的手工作，嘗說：「我們這裏如今相信小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手工工作，在這手工工作之上，你可視他如一中心，將讀書、寫

字、算術、歷史、地理，各科圍繞着牠來教，而且可藉牠去養成一種更完美健全的品性，更

好的思想判斷，和更均衡的心身發展。」

尤其在小學方面，兒童要爲人類文化的重演。小學以上的手工作，分量與本質就

純是教師個人天才的表現，也就是這個教師所教班級的天才表現。然而無論怎樣，從

小學起至中學止，各級都有多少活動與書本工作相並行，以便闢悟及默啓那些知識

之獲得。

在這種有組織的手工作之上，有些新學校更設有工藝場和各種工藝，由高年學

生在下午去做。這種工藝工作可以與學校學科工作相聯絡或不聯絡。他視如創造的

發表之一種，除了爲學校學科的意義外，尚有別的存在價值。

三

在歐洲新學校裏，手工也視爲學校生活之主要的元素，已由英國勒狄（Oest

Reddie）開其端，勒狄在一八八九年創設阿波次（Abbotsholme）中學，採用手工作的

方法，訓練他的學生，以供應現代世界的需要，而不要他們修習那些只適於休閒貴族

階級的教育課程，這樣的寄宿學校，即建築在鄉村地方，有田莊、牧場、果園、林木，校舍常是自築自修的，自然有許多機會實際去幹手工工作，這種手工即鄉村的日校也不容易有的。

該校在建築時，花園滿目荒蕪，農場盡堆穢物。學生乃開闢道路，設立溝渠系統，油漆門戶，裝飾木板，準備及開闢球場。在工場裏，他們製了許多學校需要的傢具。那些書上的理論，無論何時，一有可能，即與實際工作相聯絡。例如在算術裏，學生計算學校及田莊的各種耗費及單據。在科學裏他們有許多材料來直接研究他們四週的動植物的生活。

法蘭西社會科學的編輯德莫蘭 (Ed. Demolins) 一日見到勒狄，他覺勒狄改良教育的觀念是很能鼓舞人的。勒狄對現代教育挑戰的理由，就是：「近代教育不能供應近代生活的需求。」「現代教育是為過去造人，而非為現在造人。」

這個法蘭西的學者就問他說：「但是你的學校怎樣安排去改革這種教育系統呢？」

這個校長說：「我們的目的是造就人類一切能力的圓滿發展。兒童要變成一個完人，使他能成就一切生活的目的。要達到我們這個目的，學校即不應成爲一塊人工造成的地方，專靠書本爲媒，而不與生活相通連。學校應成爲一個小世界。真實的、實際的、兒童能在該處發見自己的。理論是不夠的，同時必需實際。理論與實際這兩個元素應同存在學校裏，正如他們常在我們身旁。否則兒童將來必至走進一個於他極爲新奇的世界，他就會在這裏失掉他的一切應付本領。人不只是一種智慧，他實是一種附在身體上的智慧。因此，我們要訓練兒童能力、志力、體力，以及手工的技巧與敏捷。」

德莫蘭深覺有趣，乃參觀阿波次學校，更爲感動。他後來說：我以為這是在更能適合社會生活新需求的教育化中，開一新紀元。這間學校，在他的實際性裏，在他的養成完人，及發展個人圓滿能力的重要目的裏，實表出一種與我們近日學校絕端不同之處。」

阿波次的實例，與德莫蘭的文筆聯合起來，便將新學校的觀念傳播到法國德國。在德國，一種依着阿波次模型的新學校，從此便設立起來，這種學校的德名爲 Hör

erziehungshheim 意即「在鄉村裏的家庭學校」之意。那最有意義的鄉村家庭學校，便首推 Obenwaldschule 是 Paule Geheeb 在一九一零年創立的。在這校裏的學生是參加學校附近的田莊一切活動的。

美國亦有些同英國和歐陸新學校一樣的寄宿學校，其中最具有特性的就是紐約高地 (Highland) 的里奧丹學校 (Raymond Riordan School) 由里奧丹在一九一四年創設。目的在排除傳統學校的形式主義，和應用藝術及工藝去刺激那些創造的活動。兒童每人對於田莊及學校植物的培植，校舍之建築與修補，機器及產業的料理等等，都有許多負責的工作。

在溫座爾 (Windsor) 的盧密斯 (Loomis) 學院裏，學生要分擔學校的有用工作，料理他們自己的課室，住室，校地，操場。在農業科目裏，每一兒童都可向學校租一塊地，來實現自己的農場設計，租金可向學校借貸，除納息給學校外，贏利則歸學生自己所有。

在肯德 (Kent) 的肯德學校裏，息爾 (Sill) 曾實現一個充滿平民主義思想的學

校裏面所有的兒童，爲品性的訓練及爲其他的理由起見，除日常烹飪外，分擔校內一切工作。

當斯盧次(H. D. Sims)主持俄亥俄的摩稜公園學校時候，曾對手工勞作，創造了一種奇異的民主態度。我有一次參觀這所學校，在下午三點鐘時候，很驚異看見學生正親自灑掃揩拭，在放學五分鐘前，這些校舍與禮堂就是忙於粗笨勞作的舞台。學校將年中工役薪金儲蓄起來，等到學年之末，便將儲款拿來供給全校兒童野外露營的享樂一星期。有了這種動機，工作便是誠實的，專心壹志的，與快樂的。在該校的主持者之計劃中，我相信平民主義的動機是很主要的。

在美國一切新教育當中，我們可以說：那位鐵工的隱退者與加省奧齊鄉校的創立者與主持者約曼氏，最是看重手工工作的價值。他的第一種理由，就是要準備學生在將來能爲建設的休閒生活。第二種理由就是要使學校科目工作具體化。最基本重要的第三種理由，則屬於約曼的經濟哲學，和屬於他不贊成現代的工業系統，要使凡有頭腦的工人專心做別人的手工作，結果造成一種社會階級的和緩形式。因此之故，約

曼所以將手工作引入學校科目裏。其目的與平常的職業學校所持者相反。那些職業學校，視勞作爲勞作，是一種階級教育的形式，冀圖供給工人子弟以一種能繼父業的訓練，以便延長工人階級的壽命。「要使一雙手在心靈發展中有一個適合的地位，并由此去幫助破除階級的樊籬，和確實得到一種和諧的品性！」約曼即視此爲學校的一種重要目的。他又說：「工場必須尊重兩手，視他們爲心靈之保衛者，亦必須開始填平智慧與手工間的隔離，因爲他們這種隔離，就是產生現社會所有的仇恨與不公平的。」

英國的散得孫 (Sanderson) 曾由衛爾斯 (Wells) 在所著的散德孫傳 (Story of a Great Schoolmaster) 很清楚描寫過，他亦嘗將多量的工場工作，引入一間英國預備學校去。那髣髴成爲過重希臘拉丁文的解毒劑。每一兒童，即使他是專修古文的，每年中也要耗費一星期至十星期的時間在工場裏，這個工場是異常精美的。而且設有簇新的器具。兒童在場裏爲學校而幹一切手工作，及製造實驗室及工作場自身所需要的儀器與工具。學校甚且代村人打鐵及釘馬蹄。手工作在這裏的目的亦如在勒狄及

約曼的學校，要教授文化資產階級的兒童以手工勞作的尊貴，和要訓練他們習於使用雙手去爲文化的和實際的目的。

勒狄在阿波次經過幾年的教學經驗，乃在英倫創立勒狄中學，在這中學裏的手工作是用作創造能力的出路。這裏十一二歲的兒童，例在早晨做手工作，晚上寫讀。這間低年級的學校的校長說：「他們早上的創作能力是最豐富的，因此我們要在此時任他們自由製造物品，他們可以到任何喜歡的工場，和自由製作自由發表自由創造，那是他們的所有權。在晚上，他們身體倦了，然而他們的頭腦還清新，他們便很滿意的坐下來靜默讀習」。

在我所曾參觀的許多私立的新學校中，法蘭西的勞斯學校（Ecole des Roches）在工藝的工作裏，算範圍最廣大，成就最完美。勞斯學校爲法國社會學者德莫蘭氏受了阿波次的影響之後所創設。這間中學的兒童，每日下午必到工場工作一時或二時。跟着便用茶點，其後乃到空曠場中運動。我在該校裏見到各兒童繪圖，彫刻，木工，鐵工等等非常的工作。這些兒童是最真誠的，和最用功的。這樣豐富的創作環境復有能幹

的教師來任指導，及有精美的工場設備以供使用，那可謂理想的。這種環境只有人數極多的新學校如勞斯學校等，纔可以辦得到；否則必須有豐富的補助金。在公立學校中，巴特里所主持的紐約第四十五學校，亦有很出色的手工作，他的手工作常可躋入藝術之林。

四

新學校因此大概都很重視手工作，在小學及中小學間的班級，手工作佔時間尤多；至於專門以上學校則較少。這種遞減，似非出於新教育者的理論與願望，而是由於專門學校本身的限制。

我們已經看見：教育者要將手工作引入學校功課裏，理由是很複雜的。我們又確能見到手工作對於兒童確有許多利益。最有意義的利益可歸納之如下：

(一)用手來工作是幼兒智慧的自然表現。兒童在年幼時，機體都是活動的。在這種年齡，如使手工作成爲教育的一部，兒童便可在那適合神經系統與心理發展的法門中尋得知識。所以這種用手製物的衝動，是能引到那些有益的和教育的大道中的。

(二) 手工工作對於任何年歲的兒童都是有極大的價值，因他能供給一種健康的平衡，到那種本性沉靜的頭腦工作上去。學校終日監困兒童坐在桌旁，用功於抽象的書本工作，我們希望的便是使他快快變成中世紀的遺骸。因為人類如因要發達知識，便不惜犧牲身體活動，那不管自求毀滅。使兒童有相當分量的手工工作罷！那即有平衡的時日了。

(三) 兒童在手工工作中比在抽象的思想中，似更易於創作。我們想望兒童為自己來思想、創作、製造。但如從抽象方面去求達此目的，則必需許多材料與許多知識。那絕非兒童所能做到的。然在身體的範圍內，兒童便易創造和發表。

(四) 要幫助兒童不流入低能，手工工作是重要方法。有些身體活動的兒童，對於抽象的學校工作是很低劣的。這樣子的兒童或許極端聰明，然而他們在充滿抽象學科的課室內，他被迫而變成愚笨及低能。這對於他們原是一種心理試驗的情境。他們暗裏亦承認自己并非愚鈍及低能，不過公衆的意見每反抗他們。人們亦很希望能證明他們的能力并非低下，雖然未來世界的工作大部份要賴他們來做，然而他們絕不善做。

學校裏的抽象科目，而且他們的能力將來在生活裏證明極能致富。所以幼年時代在手工工作裏的大成就，正是養成兒童尊嚴與自信力之初步，這樣子的兒童亦確是極其需要此種尊嚴及自信力的。（此處似不必討論到低能兒的手工作，因為我們現在原是討論常態兒童的。說到手工工作對於低能兒價值極大，那是無人不知的。）

（五）許多手工工作能幫助我們發見兒童的性能。新教育者並不視手工工作為有職業準備的意味，他們只以他為有表出兒童性向的意味，而在表出兒童的性向當中，自於將來生活的工作，能有極大價值的指示。兒童對於學校的書本工作與課程，每覺不感興趣，惟對各種手工工作，却可以忽然發生濃厚的興趣，因此發現他們自己的能力，這原來是常有之事。

（六）手工可以發展兒童用手工作的技能，循致這種手工技能可成為終身的利用或娛樂。在職業餘閒作為消遣的最好方法，即是從這一類的手工嗜好而來。

假若成功了用手去改良自己的環境，那就是一種高興不過的事體。在普通的雜誌上，有許多顏料或油漆廠家的廣告；畫着管家的太太們，拿着刷子，很高興地親自來

塗染地板和傢具；這是表明塗染的應用，即在未嘗學過的人手裏，也是很通行的。現在有許多人自己油漆房子。尚有一種最有趣味的經驗就是將幾罐磁漆（Enamel Paint）塗在舊汽車上，看着他閃閃發亮。凡此在使用自己能力去改良事物當中，不是存有一種精神的價值嗎？

當我們很聰明的將手工作應用到園中植物上，則無論其為菜園花園，都會給我們以娛樂、康健、和土地出產等等的豐富報酬。兒童很愛幹園裏工作的。故園藝應為兒童教育之一部。

以賽亞（Isiah）寓言詩中有一段話，說人將來會各坐在自己所種的無花果樹下。他這種話或許是指這麼樣一個時代：就是此時平常的人都有一間自己的屋，一塊自己的地，除了職務及工作外，每天尚有些許時間來料理這些工作，能種植園地，使他有果、有菜、有花；而其所以去種植牠就是為着自己的健康愉快，也正同為着牠的出產物的真實價值相等。

無論兒童將來所執何業，手工工作的巧妙與技能都極有利於兒童，是沒有疑問的。

(七)在手工工作的結果當中，有一種最主要的結果，就是教授兒童以手工勞作的價值與貴重。而這樣便可以幫助填塞介乎勞資間的深坑，與介乎白領帶和污手勞工間的深坑。能破除階級間誤會的最好方法，無過於用腦的人也做些手工工作。當一個用思想的人，在一個工人旁邊來勞作時，那麼，一種同情與團結，自然會生出來。

歐亞兩洲的禍根，就是他們視休閒生活為最高鵠的，並且因他們有一種階級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確有許多人都沒有好好地使用其手而生活着的，至於大多數的勞動者，則要忍受那些最悲苦的生活，他們自己與他們的子子孫孫，永遠沒有聰明地使用其頭腦的機會。

美國的光榮，在其能崇拜工作。美國的理想人物，是一種智慧發達而又不妨礙其肌肉使用的人物。試看林肯，他曾伐木，曾不住地向前奮鬥，有實際智識，有偉大心，只有他最能得美國人無上的崇拜，在工作與活動裏，或許存有一些為道學先生所缺少的康健與精神的品質。

關於怎樣纔是一個教育家的理想，美國顯然不滿意接受過去的標準，或其文化

基於休閒階級的現代的人們。他將會鑄鑄出一種簇新的和雄健的理想。

新教育者今日要研究的問題就是：

手工工作與腦工作的合理分量是多少呢？抽象與具體的合理分量是多少呢？誰人曉得？然而無論怎樣，我們今日的教育者所志在養成的，總是一種均衡的與完滿的人格，這種人格不是只知讀書而不懂實際的，亦不是全無精良的智慧及智慧分析的能力的。

第三章 兒童的自由

「只有經過自由，人類纔能達到他的完滿生長。」

——太戈兒——

自由是生命的呼吸。因此人類在他的進步中發見了從專制的政治方式走到民主主義。自由能使人抬起頭來，呼吸週圍的空氣更爲自由，和享受那些以自己分得其觀念與領悟而幫忙去創造的文化環境。

民主主義的運動達到這點，那麼，就任何反抗牠的理論都無效的。牠是人類進化

的二部份。他有一些缺點，亦有一些不易戰勝的困難。他沒有獨裁政治那樣的大效率，亦不如開明專制君主政體那樣的容易補救。然而我們無論如何，無論此種專制政府如何開明，如何仁惠，總不喜受專制政府的統治。總而言之，能完成世界事業的並不是一個有絕對權能的人，而是普通一般的平民；他們有公民的意識，能自制，能為公眾福利來犧牲，與有知識能力來參預一個進步的政府組織。

因此民主主義雖然效率還不大，而他亦要進行的。他的價值，無論在訓練人民自治，抑或在完成一種法律的行為，都是一樣偉大。例如我們將美國那些准許自由設立教堂的各州，與那些不准許自由設立教堂而必須進州立教堂的各州，比較一下，則自由之有利的結果，可以概見。白勒斯爵士 (Lord Bryce) 前年遊美，看見我們自給的教堂活動極大，曾發生極深刻的印象。他在民主主義史裏曾說：「這種宗教的自治制度是美國人民一種最有建設性的經驗，這種經驗對於發展他們的創造性、自制、和辦事能力，都極有利益的。」

自由的聲浪最後已推進到學校和家庭裏了。在家庭方面，如我們以一自由的家

庭與一純以父母意志支配的舊式家庭比較一下，我們幾乎難於認識牠。學校對於這種到自由去的衝動亦有反應。特別在新學校方面，他充滿自由空氣，容許學校生活中各種活動。這種自由的意義，在兒童對教師態度方面，亦曾表出；因為教師此時似是兒童的領導和伴侶，而非兒童的支配者與主人翁。

我們在新學校時，即覺到這種自由的性質。自由甚且在兒童的面目上與態度中亦有明晰的表顯。在新學校內的輕微紛擾中（從嚴厲的遵守紀律者的立場看來）自由亦可給我們看到。這些新學校常有的混亂與擾攘，無非是自由的結果。有時甚且極端沒有效率；有如在民主主義的政制下，沒有效率是不可免的附屬品。從別方面看，兒童和學校生活，從這種自由之中自亦大有所得的。

自由在新教育運動裏成了這樣活動的一種元素，故一九二七年在羅卡諾（Lorcarno）所舉行的「新教育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the New Education）集中精力去討論「自由在教育裏的真義」那條中心問題。福勒特（Fola La Follette）在描寫這個會議的精神當中，說道：「大約彼此都承認為近代教育中之兒童而有的

自由絕非解作一種不分黑白的或極不聰明的放任，放任兒童爲極端自私的及有害的活動，而犧牲（例如）他自身的康健，或其他伴侶的幸福。他應解作組織一個環境去適應兒童的而非成人的需要。又使兒童在這個環境的範圍裏，有極大可能的自由，使他能隨己意去實驗爲着自己去發現工作的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意義，所以現在需要的是兒童之內心的自由，和兒童創造能力之解放。」

美國「新教育聯合會」(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一九二零年在華盛頓舉行第一次年會，這位一身教育事業都是爲兒童爭更大自由的約翰孫 (Margaretta J. Johnson) 女士演講學校與兒童。在演講中，他說「兒童需要自由的——第一是身體的自由。如果我們跟着兒童心理學專家所指導，那麼，我們就要對今日的公立學校革命，那些固定的檯椅應用活動的傢具來代替，課室內的兒童數目應該大減，或者要減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因爲我們的課室常常人太多了。」

「兒童亦需要心靈的和智慧的自由，兒童智慧的自由活動就是想及一些事物，疑問他何由至此，和他有什麼用處。每一兒童都欲知道一些他們不知的東西。只因成

人有許多外部的要求去阻礙他，故這種求知的欲望在我們近代的學校裏便被摧殘了。其次兒童亦須自由使用時間去思想。兒童現在常要讀課本，和要向教師報告。這不是思想，這只是答覆。思想是要從你們內部的衝動，和有所要求於你們的衝動找到一些東西。最後，兒童不只要有身體的智慧的自由，他而且亦要有精神的自由，今日世界上有一種最大的需要就是精神自由。」

從此我們見到新教育者所用「自由」這名詞實有許多涵義，絕不只包含行爲自由與排除昔日的及形式的紀律而已。然而當着一般羣衆和守舊的教育者見到這種新運動的時候，他們還以爲後一種自由應用到兒童身上已是最上等的。他們以爲兒童自由就是放縱兒童。誠然，參觀者到新學校時確隨處可以見到自由發展與毫無限制的行爲。但這是自然而有的，因爲教師與父母在反抗形式的紀律當中，自應盡量向着別的方向跑。其實在我自己初年的試驗中，現在我亦必須承認：關於兒童行爲方面，若給他們這樣子的一種發表自由，誠爲太過，我自己現在的經驗，確已使我去改變牠，使牠有更大的價值。

兒童應有多少自由呢？自由要比往時多，這是不錯的。然而是否也有一種於兒童有益的必要界限，使兒童能於其中自由活動，如成人世界有的界限一樣呢？

假如我們成人只顧念着自己的安樂與寧靜，那麼，我們就應設立一條明顯的界限，去限制兒童的自由；因為兒童自由，與我們的欲望、計劃、生活方式，常起衝突的。古時有一種學說，主張兒童應給我們看，不要給我們聽。此說曾成爲成人世界一種很利便的處理法，這世界即所謂中心階級，牠需要寂靜，需要不致有兒童的活動去擾亂牠。今日則不然，今日雖然他的聲音或活動每能騷擾成人，兒童是允許有自由或能取自由去製作無論任何一種聲音的。所以，如果我們只顧自己，我們就須恢復古代的統治形式，強使兒童寂靜，只許成人世界製作聲音。

但是新教育與新父母視兒童及其幸福爲最重要。因此他們常要問：什麼是使兒童最幸福的呢？他們又很願意犧牲他們自己的多少安樂，使兒童能有有益的發表自由。兒童在太陽系中一定要有他自己的位置的。無論怎樣，世界不只是屬於成人所有的；這是最近一種重大的發現，然而當着世界爲權力所統治時，這種發現是不可能的。

從此對於這個奇異的兒童世界，即是居住我們當中，牠自己具有自己的權利及自己的需要。又從牠的新鮮的幼嫩的生命能給我們以娛樂，從牠的潛在的能力能使我們加以尊敬；這兩點都能使我們珍視牠和寶貴牠這樣一個奇異的兒童世界，我們究竟要給他多少自由纔能有濟於事，纔能最有益於自身發展，纔能最有益於兒童本身及兒童爲其領袖的將來世界呢？

兒童假如變成無法無天，變成驕逸放縱；那有害於兒童本身，自是顯然。社會的基礎原築於自制與法理之上，而非築在自己表現之上。然而我們實不需根據兒童將來的（成人的）生活來測量兒童此刻的行爲，我們應該跟着那能在學校內產生一種最好的理想生活的辦法來處理此事。

在學校內，那種最理想的生活，大約就是能將自由、自表，與爲團體利益而自制的幾種元素合而爲一。無論何時，兒童自由都不應含有害及團體或其他兒童工作的意義。兒童活動及發表的自由，亦不應產生如是大的紛亂，致不特妨礙及團體的精神活動，而且擾亂及團體的神經組織。換句話來說：我們不欲有一種混亂的和患病的世界。

雖然我們所必須的世界亦要有各種活動，然而却是要一個平和的安寧的世界。

兒童在訓練中應該受不需要懲罰的指導嗎？這是近代心理學所發生的問題。常人自然說愈少懲罰愈好。

克柏屈 (Kilpatrick) 指出紀律不一定要伴以懲罰的，在別方面，懲罰又不一定能產生紀律的結果的。我們必須研究兒童心理，我們必須注意兒童的反應，必須常要看準我們所欲得的結果，不要將自己失陷在這種事情的領域裏而不能自拔，無論學校或教師都不可用懲罰來報復。懲罰不應視作一種善後的責任，有如在專制的政治之下，凡是侵犯風俗、法律、秩序者，必須受罰。

在他方面，當懲罰在認為公平及必要時，我亦堅決信仰必須懲罰，我自己亦採用懲罰，亦許其他教師直接應用懲罰，在必要時，且不須先行告訴自治的組織以得其同意。惟是這樣子的一種紀律應該是很單簡的、合理的，伸言之，是關係及行爲的本身的，而且在受罰的兒童及其伴侶看來，是很公道正當的。

正義要常與自由爲友，使得維持相當秩序，而保障團體中各個人的滿意。兒童頗

像在一株小樹中，他有產生好果的潛力，但他要人保護及訓練；在必要時，且需相機修剪。他不能單從發展的程途中便可達到他所需要的品質。誠然，原被棄於荒野中的兒童，如能成功維持自己的生活，自亦可以成爲一個完美的公民。然而我們實不能這樣說法。兒童要從一種一半有意一半無意之環境的暗示所修改的自動發展中，纔能發展到一種理想的成熟，而在這環境裏，父母與教師最爲主要。他們的任務就是：從各方幫助兒童，使他能走上那能領導他到品格及成就的道途上。

對於橫暴的兒童，那些自動發生的，或由教師暗示的團體的懲罰，常有效果的。在必要時，隔絕往來也生好的效果。但在實際上，社會的制裁，無論在成人社會裏或在學校裏都爲最有力量的行爲治理者。

可是有時候兒童不能由這種社會制裁的方法，引導到正當的行爲去。那時候應該怎樣呢？

在這種情形裏，可採用暫停學業的方法。有一間我極贊許其紀律的學校，正用這種的紀律法而收得極大的效果。我幾次將此意應用到我的學校，效果亦極好。又有一

個新學校的校長對我說過：他嘗將一個搗亂的兒童停學一星期，遣之回家。及他回校，性質完全改善。因他原愛學校，當他被迫離校時，覺着非常懊喪。

新學校最後的罰法就是要不率教的兒童退學。從我對兒童的經驗說來，我確感覺正如有些人未準備接受民主主義，兒童亦有些不能適應新學校所行的自由制度，而需要一種嚴厲的紀律，與正式的階級制度的。在事實上，確有一種兒童喜歡和成功於反應一種階級的編制。一種高級軍隊式的學校，在教育界裏尚有些少地位，新教育不能立刻完全代替了他，而認其為非必要。

二

學生自治的方式，每一個新學校都有的。斯密 (Eugene R. Smith) 喜稱他為學生參加行政，或稱為合作行政。這種名稱應用到許多新學校裏的確是對的，因為新學校的教職員常只保留那種最後的處決權。那好像美國人給與菲律賓的自治政府差不多。最奇怪的，就是根據我個人經驗所得，那些兒童——自然是小學學校的兒童——似乎絕不憤恨學校執着這種最後的處決權的，雖然他們也知有這種最後的處決權。他們不

會詳細分析所給與他們的自治方式。在小學教育階段裏，這種半自治，或合作的自治，自然是足夠；且我以為這種半自治比較真自治還要好，還要平穩易行。

然亦有新學校採用一種絕對的自治形式，學生的自治組織可以請教師出而為各種的報告及說明。他們如果喜歡，且可以變更日中的課程。比較這種制度還要極端的，就是德國漢堡地方的許多公立學校所採用的制度。在漢堡的學校裏，不特沒有教師的行政，即學生的行政亦沒有，這樣的一種學校組織真可用「無政府」(Anarchy)一字去描寫他。然而參觀這些學校的人們，看到在這些學校裏的情境，又絕不同公立學校平常所想像的「無政府」的情境。因此在新教育裏，從一種無治，或一種絕對的自治，走到我們稱為合作自治的較保守方式，其間實有許多自治種類。不過後面這種自治方式在新學校裏較有勢力。

在我自己的學校裏，一共有八級，第三級以上的兒童都加入學生自治的團體，這些團體的組織彷彿像昔日新英倫的市議會團體創制法律，施行法律，審判犯罪，與執行懲罰。我想這種辦法對於年幼的兒童，比較一個學生的行政會議形式更好，因為他

可以將所有的偏見與成見低減至於零度。

學生自治團體的集會可以給與議會法律一種最好的訓練。兒童可從這裏習於站起來辯論重要的事情。他們自己訂立法規，選舉委員會。最重要的為法律公安委員會。因為是由這個委員會執行法律，維持公安，報告犯罪，及接受他們犯罪的報告。他們會從經驗得到，最好不要給下層的人物抱怨。他們又學到，關於違反法律及秩序的事情，除由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提出會議，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每一宗控訴，如為犯罪者所承認，即開審判。犯罪者如不承認，即須找尋兩個證人為之證明。懲罰可以由該會委員用動議的方式提出，經過和議後，即行討論。這種兒童團體的正義意識，可為成人一種教訓。有時候，一個兒童因有成見，也許有失之太嚴酷，或太寬縱的動議，然而此種動議終必為發表兒童團體公意的正義的、人道的、聰明的動議所戰勝。

從這樣子的自治方法，實際上便可打破為兒童生活特性的結私黨與復私讎的制度。由口角鬭爭或個人受屈當中所起的困難，用這種審判的方法，亦能得到一種解決與滿足。在習慣上兒童例能自制，而將報復的事情交托給自治會辦理。偶然間也有

一些兒童願意「求現不賒」(用 Omar Khayyam 的辭句)然而這雖或可能，而平常的兒童，例多靜心等候法律的裁判，以滿足他們復仇的希望，如威尼斯的商人 晒羅克 (Shylocks) 一樣。

未到青年歲月的兒童，常復興舊約時代的族長生活，他們的道德觀念，就是摩西的道德觀念——「眼報一眼，一齒報一齒」——他們還未能做到耶穌基督的道德行為。然而這樣，他們已經在文化歷程中，進了一步；因他們已能靜候法律代他復仇，而不去糾合私人直接報復。一個這種年紀的兒童，雖然不能寬恕一種侮辱，然他已能從無法律的文化階段，達到一種有法律組織的階段，如波斯的 Hammurabi 法律與猶太的摩西法律所表出者。

在自治的進程中，兒童得到人類關係的最好訓練。有一個八歲的小孩，新入學校，在他的團體裏，和在他的自治會議裏，常很不聰明地做了許多特別的事情。一日他在慈愛與和諧的需要中，對各兒童做出一種很好的道德行為——這樣的名詞在抽象方面，我們是很可贊美的，可是在具體方面，我們則恐於行為者有危險。這宗事實是這

樣。這個女孩子有一隻愛狗，曾允許她帶到學校及坐在課室裏。但是在下次一個會議中，便有不許狗入學校的議案提出，附議通過，同時還委任一個禁狗委員會來執行此條議案。這個女孩子當時默然無聲。但當他同我一路回家午餐，她便對我說：「柯布先生，組織禁狗委員會不是耗費許多好材料嗎？而且，除了我的狗，還有誰的狗來學校呢？」我當時很留意她對新團體而有的這種自歎與改過的美德，我認他這種品德為將來參預她的新團體工作的一種很好的開端。

芝加哥的帕刻學校有一種很透澈的和很有效的學生自治制度。關於學校課程問題則不在學生自治範圍內。此外一切紀律的事情都歸牠料理，全校的安寧與改進亦附屬牠。牠採取一種學生議會計劃。維持該校的秩序、和諧、合作、與忠誠之特有的精神為其重要元素之一。兩年前，我曾研究該校學生政府的發展，該校校長曾寫信給我說：「你要問我校的學生政府，他在最近數年確嘗有許多改進。我現寄給你一種最近修正的約法。我很喜歡你觀察我校這一部分。在我想來，這一部分在我們校裏所有的一切中最能使我滿足；在最近數年，中學全體學生各種責任，陸續增加，即是很顯著的。」

同中學裏的議會、審判會、全體大會之集合次數，長足增加，那也是很瞭然的。學生間現有一種合作的精神，正義的嗜好，合力追求學校的理想、標準、政策和優美的傳習，這樣情形，很可使那些在權力統治與學生自治二者之歧路中而莫知所適的人們，發生一種新的信心。」

我參觀克利夫蘭 (Cleveland) 的哈塔威布拉文 (Hathaway Brown) 學校，見到一間大可容七十學生的讀書室正在開會，由學生自己主席。在與一個女學生談話當中，我知道學生自治的組織在學校生活裏佔有很重要的位置。我問他道：「如碰着一個不能改過的女孩子，你們將怎樣呢？你們有革退他的權力嗎？」他說：「有的，但我們從未用過。如你所說的這種女孩子，他們早會自動退學，不會安心在這裏。」

學生自治制度當然不是新式學校裏的專有品。他們的成功與新教育運動的成功是不相干的，公私立學校確是都喜歡用他。不過在新式學校裏，他就與那些為新學校素所追求的自由精神與自主行為結合為一，而產生一種密切的關係。

自由與自治對於學生大有利益，那是很顯明的。他的一種最有價值的結果就是

消滅介乎兒童與學校間的對抗，正如他可消滅人民與政府間的對抗，在一間專制式的學校裏，姑無論這間學校辦理如何善美，而學生對學校當局終有多少反感，怨憤，不滿意，不服從。那就是替那些勇敢的，自然亦是富於反抗性的學生製造機會，使他們用一種惡作劇的與不服從的行爲，去在他的同學跟前耀武揚威，大出風頭。在這樣學校裏的秩序，就純是從學校當局的壓制而來。我們必須知道：這種秩序是不穩定的，極流動的。無論何時，上面當局的禁制如果一有鬆弛，這種秩序立時掃盪無餘了。

那種唯一有價值的秩序，就是從參與者的秩序觀念而生的那種秩序。要使這種強制來自兒童的內部，不要來自外部；那就是新教育的呼聲。如果兒童自身之法律與秩序的觀念已經發展，他自己的意志已從事遵守法律與秩序，那麼，學校自可成功一種固定的秩序。當一間學校以自治及自由精神將秩序的觀念浸透學生的團體時，那麼學校雖然有擾攘之事發生，也只是暫時的與過渡的。

在實施這種自由的原理當中，教育者自須使用大的聰明然後可。他必須注意觀察那於兒童或學校方面不良的效果。我們切不要爲自由偶像的崇拜者。我們必須做

一個真實的心理學者，真實的科學家，去分析一切效果，而不應用一種好像自有其神祕的價值的定理。自由之有價值，是在他的效果方面，而不是在他的理論方面。我們所希冀養成的是一種有自由魂的、忠實的、負責的、服務的、愉快的個人；又這種個人，行爲極有秩序，然是由內部而出，絕非由外力強迫而成。世界上原沒有一種定理是盡善盡美的，能保證產生這樣子的結果的。人類的重量此時亦應加入計算。兒童是怎樣一個兒童，教師是怎樣一位教師，是一些最主要的元素，不過目的、理想，我們亦必須放在目前，並且要應用多少自由，要以我們的目標，能得到有價值的成就爲準。

凡是已曾參觀過新學校的人們，就可了解我現在所敘述的是一些什麼東西。他們可在一切兒童面目上和行動上看見他——就是看見合作的、與教師爲伴侶的、愛學校的、和忠於那可喜的學校的一種態度！這一種態度能補償從誤用自由而生的一切弊害而有餘的。

林肯學校的學生家長尼堪波堪夫人 (Mrs. K. K. Knickerbocker) 在探訪林肯學校之後，嘗投稿新教育雜誌，以證實學校的民主主義之價值。他說：「這是一種很有

趣的，和很感動的事情，去看我的兒童和他人的兒童在他們教師的指導之下來自己教育自己，和看見他們發展能力對自己事務爲聰明的處理，及一年一年的漸漸進步一種更高度的自制，自尊，和自信力。我已經見過民主主義建築在兒童生活的裏面，因爲他們的學校確是一處兒童真正生活的地方，確是一個雛型的社會。」

三

然而學校裏的兒童自由，其涵義決不止在給兒童以自導行爲機會而已，他應解作解放兒童的精神，使其免爲陳死的傳習所束縛，及應解作供給兒童各種機會使其自由思想，發表與創作。佛郎克(Glenn Frank)曾在他所著的哲學論 (Philosophies)裏簡單敘述過，自由不應解作容許兒童做他們所喜歡做的，使擴大其個人的壞習慣，壞態度，與壞行爲。這是自由概念的消極方面。「在積極方面言之，兒童自由(Freedom for the child)要解作給兒童所有良好的衝動以自由的操縱。他要解作任兒童自行試驗，順着他的好奇心，確定他的真實欲望，恐懼，困難，與觀念。他要解作任兒童嘗試他所想到的，與製造他所發明的。他要解作任兒童發現他的世界，而不要給他一種旅行

公司所指導的週遊世界。」

要供給兒童以創造的自由，那就必須「組織兒童的環境，使這環境刺激他的好奇心引導他去實驗，與鼓勵他爲自己需要而去發現及了解他的世界。」

要這樣子組織兒童的學校世界，第一應解作排除一切爲紀律而有的緣由。兒童在他所愛的學校裏，做他所歡喜做的功課，有若干自由去發表他們自己的欲念、本能、與人格，自不需要紀律來推動，老實說，一種理想的學校紀律，只是學校生活內的一種無心意的元素，而絕非一種有心意的元素。

四

那麼，別樣的自由又怎麼樣呢？——即思想自由、發表自由、別乎教師或其他有權的人的自由，及跟着個人的天才來幹的自由又怎麼呢？這些種種自由在新學校裏原是最基本的。

一個九歲的女孩子，有參觀人詢問她的學校如何與別的學校不同，她答道：「假如我們要講什麼，他們這裏就讓我們講出來。」

公立學校一種最反常的事物就是他們每班裏的四五十個兒童，要於這種形式的講授制度之下，絕對的要將自己新創的思想、觀念、經驗、壓抑而不使之發表。這是生活所能加諸人身（無論兒童之身，或成人之身）的最殘忍的專制舉動。我們無論何時都想有發表的機會的。我們思想什麼，我們就要發表牠，我們發表牠的時候，我們同時發育生長。小孩子亦是這樣的。爲什麼他們要被人剝奪這種成人世界極其看重和於精神衛生極其必要的權利呢？

在新學校裏，兒童被許隨意講話；對同學講，對教師講。他們的意思是受尊重的，甚或受鼓勵的。他們又有時間去思想，及有時間去發表。

我們各人難道不能回憶：嘗以成人隊裏一員的資格，參加過一些愉快的談話嗎？不能回憶參加過一些思想在這裏發展，觀念在這裏發芽含蕾，各人在這裏盡量發洩內心所蘊而不懼人訕笑，團體生活在這裏幾升至超出人類的、光明燦爛的、和充滿真理知覺境界的談話嗎？我們的心靈在那時不是生長着與擴張着，其程度有比靜聆一篇篇最有鼓舞力的演詞時爲甚嗎？

這是真正的自由——這是我們真有的機會。這是兒童所切要者。我們將為課程的需求，便要剝奪兒童這種機會嗎？然而這種課程的需求是什麼呢？人假如不使心靈生長與擴張的話，則我們稱之為教育的一種整個經驗，牠又有什麼意義呢。

然如使課程是有助於心靈生長的，那麼，我們還要允許這種奴隸制度繼續存在嗎？我們還因為那種抽象構成的課程不適用於具體生長的個人，便去縛束限制兒童的精神嗎？關於課程與教材，我們還是用一種固定的模型加諸兒童身上，抑是使兒童有若干自由去跟着他的愉快的嚮導——欲望，去為各種富有生氣的冒險與經驗呢？

杜威在學校與社會裏說：「柏拉圖在某處說，奴隸是一種行為表達他人而非表達自己意思的人。我們今日的社會問題，比較柏拉圖時代更為迫切的，就是方法、目的、了解、應該存在做工作的人的心裏，做工作的人應認識自己活動的意義。」

太戈兒(R. Tagore)說：「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不承認兒童是兒童的。兒童的受罰，是因為他們的行為不像年長的成人的行為一樣，又因為他們孩子氣的叫囂無禮。我們摧毀了他們心裏的自由精神，與生俱來的冒險精神，日日尋求新經驗的精神了。這

種自由的精神，對於心靈智慧的生長是必要的，對於兒童的道德性亦是必要的。」

意見的自由，特別是這個世紀的兒童一種需要，因為世紀是實驗的世紀，思想的範圍，最不固定，人們常追問一切事物，及偏於重新估定而不記憶及服從的那些信條。在兒童方面，他的意見假如不同課本的或教師的意見，自非一種罪惡，然而只許申述不同的意見，那還不夠的，此外教師還須不要專斷或曲從。一個兒童的世界是一種真實的世界，他的思想亦是最真誠的思想，我們絕對應給他注意及同情。或許我們能爲他找出更好的觀念，或許不能。但無論怎樣，我們必須使兒童能自由形成他自己的思想，能組織他自己的真理模型，我們可給兒童那些思想的材料，然而不要給他那些信條。

五

這就是新學校所要給與兒童的幾種自由，兒童的反應是很優美的，很專壹的：因此教學便變成一種愉快，學校亦變成一種烏托邦，這裏的公民在合作的和友愛的精神中共同生活。

一種這樣教育的人類，在其長大成人，當然較少互相侵凌，互相輕視，怨恨和報復。這些東西原是隨意增加權力的顯著結果。這種權力的增加法，政黨已受其害，然而輪到政黨執權，此種方法亦不停止，直至他養成一種更弱的人民，俾得在其身上施展所有的不自然的權力。因此一種凶惡的精神自於心靈不健全的人類當中腐壞着。因此這些好鬪的魔鬼（個人的或國家的）便得站起來而有所掩護。

然而設有一代的子孫會在自由空氣裏教成的，有同情、合作、欣賞、忠誠以爲行爲的模型的，在他的學校時期裏，友愛、愉快、自由發表等彼此互相滲透，正如那些金線橫穿着銀白色的論斷與求知的背境的——這一代的小孩，我們自可望其有好的東西幹出來。如果將來的世界爲着今日的教育不能成爲最好的世界，那麼，今日的教育便是很可悲的未能善用其機會。

第四章 個別的兒童

「沒有一個人有權去爲別一個人定出一種成功的標準的。在學校進程中，如果一個兒童發育，別

個兒童類接，那是極端不合公理的。」

——M. L. Johnson——

當一個兒童有多種科目考不及格的時候，教育者會怎樣辦呢？假如兒童是變態的，那麼，他的教育的材料是很容易決定的。但如他有一種常態的智慧利誠實的品性，只因為一兩種理由他纔在學校工作的進程中，碰見困難，那麼，那時候便怎樣辦呢？以前的學校自然開除他。而近代的學校是不會採用這種簡單的方法來避免自己所負的責任的。如果兒童一科不成功，就任我們再試別一科，直至我們找到他能在其中成功的一種科目為止。

英國奧恩德爾(Oundie)中學有一個教師對美國教育調查員富士本(O. Washburne)說：「學生中如果有一個表現沒有能力修習古文，我們就多給他一點近代語言與科學。如果他表現沒有能力學習某一門科學，那麼，我們就給他試學別一門。我們這裏不久之前有一個兒童，他幾乎幹什麼都幹不來，他已沒有自信力；然而我們發覺他實是一個巧於手工的人物。因此我們便給他包辦建築，你所看見突出在這裏的那座小工廠。我們僱用許多工人去受他指導來工作，他亦捲起他的袖子同他們一起幹起來。他覺得這個工作這樣有趣，所以他在聖誕日那一天還不休息。這個建築完成的

一日，他一口氣工作直至夜間十一點鐘，他是這樣地熱心建造這小工廠的初基的。從做了這次工作之後，他對自己便有了自信力，並且得到同學們的信心。我們已經發見他的才能了，和怎樣去發展他這些才能了。我們自然不把同樣的教育給我們所有的學生。我們正盡力去發現他們各個的才能，和使他盡量的發展。」

據現在事實看來，一個富有機器、電機、和收音機的偉大才能的兒童，必須要考及格那些法文、拉丁文、英文、文法等等的大學入學試，這是何等糊塗的事。然而一個稟有文學天才的兒童，為什麼又要做許多數學的苦工呢？因為我們崇拜課程的偶像，所以我們致令許多兒童在教育工作上失敗了，而這種失敗又確由於教育制度的不良，其實每一個兒童都應由我們幫助就其固有的才能去成功的。

有一個顯著的例，是說明俄亥俄一個城市如何將其教育制度去適應兒童個別的需要。這個例由文細普 (A. E. Winship) 在他的教育雜誌 (Journal of Education) 發表過：

「有一個十四歲的兒童不願意留在學校，而教師也不欲他再往該校。一個富於

友情的教育專家便問這個兒童說：「爲什麼你不喜歡學校呢？」兒童答道：「我不能在九點鐘上學。我在早上五點鐘起牀，跑到我的捕獸機，拿起捉得的野狸，帶到市場上，因此我就耽擱了不能到學校去。」

「在學校裏，你不是能學到一些你所想學到的東西嗎？」

「呵，當然的。我喜歡知道怎樣乾製狸貓皮。如果我能知道乾製，我可得到更多的收入。」

教育專家說：「好，在下星期一，你到中學來（他原是在第六級的）那時候便有人教你如何乾製狸貓皮了。」

「現在有一條更嚴重的問題給教育專家解決，是涉及教育制度方面的。就是（一）在新制和理想的課程裏，並沒有準備乾製狸貓皮的教材。（二）這個兒童未能修畢第八級的功課。」

「然而這個教育專家并不去想那些課程，他只想着這個捕狸貓的兒童。他在實驗室裏踱來踱去，直至他能找得一個亦喜歡研究怎樣乾製狸貓皮的教師，好準備在

下星期一教授這個兒童。

「這個兒童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校中有一個女教師曾由人送給他一張野狗皮，作粗布用，這個女教師問這個捕狸貓的兒童能否把這塊野狗皮來乾製。他竟能如女教師之意乾製成功。」

「這個兒童此後每日從朝至晚在學校裏，因為他要將那些關於有皮的走獸，他們的習慣，他們的價值，和獸皮的出賣等書籍，一一讀過。」

「這個第六年級的捕狸貓的兒童在中學裏是震動一時的。」

這不只是課外活動為發生教育問題的兒童所需要。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送到我們這裏來做寄宿生。她雖不是愚笨，然而除了算術一門例外，甚至第四年的功課她亦不能及格。有人告訴我們她不適於文科功課，應給她多習非文科的科目，如刺綉，家政，弓術，騎術，等等。這個女孩子一方面對於環境事情，及具體的事物有聰明的反響，和她在算術裏有這樣年齡相當的成就，在別方面，他關於抽象的和普遍的觀念則又幼稚不堪。這樣遂使我懷疑他的最大缺點是缺乏讀書的理解力。

後來我覺得正是這樣。她的發音是不完全的，她的認識文字是很低劣的，至於她的抽象觀念的藏蓄則簡直沒有。發音的訓練及識字的訓練已開始能改進她的讀書的理解力了。她到學校的第一年，已能從第二級的讀書能力進到第四級的讀書能力。在學第二年，她無論在那一門功課裏都已能做第六年級的。她此時已非不能在文科的工作裏得到成就，她此時已證明實可學識湛深。當其始，書本的工作於她絕無興趣的；然當她得到讀書的技能時，她已漸能欣賞各種書籍了。

這種兒童教育問題所受的最壞的解決法就是免除兒童一切文科的工作。這樣解決，他將永遠不能養成讀書的技能，亦將永遠不能取得知識。他在精神上已成了跛脚的人了。他現需要筋肉發展，他不需要拐杖。

斯密亦嘗說過同樣的例子，是關於有常態健康智慧的一個兒童的教育障礙的。斯密不斷進行他的精細的研究，最後就發見未曾給眼科醫生所發見的一種眼病，這個兒童因犯了這種眼病，遂至不能看字母或字。一經醫愈了這種眼病之後，學業上的阻礙便漸漸減少。

在無數的個別問題中，只有少許能引起教育者的注意。這自然沒一種包醫百病的靈藥去醫治這些兒童；這一個兒童需要排除功課的訓練，那一個兒童如沒有功課的訓練，或許至於死命。

兒童在教育上需要個別診治，正如他在醫術上需要個別診治。然當我們在文明的社會裏，每一男人女人及兒童，於醫術上已達到個別診治與調理的一種地步，我們還未能將教育發展到同樣完善的標準。

斯密在他所著的教育的前進 (Education moves Ahead) 裏，關於研究兒童的方法進步，說道：「在教育裏，新近最主要的發展或許就是研究個別兒童的科學方法的進步。假如我能稱教育為一種工業的話，那麼，教育或許就是那種最後的重要工業，需要發展分析原料的方法。各種商業和職業久已有其考察法與診斷法，只有教育還是繼續靠着那些沒有根據的個人判斷。這種因為缺乏診斷法而致發生種種妨礙，是不言而自明的。教師為勢所迫須從大眾着想，而不從個別着想。學生已經被視為「好」

「壞」「聰明」「愚笨」等一些事情了，但確只有特別例外的教師纔能把他們詳細分析。

在一切最好的學校裏，（無論公立或私立）那基於學業成績低劣的個別兒童問題，今日都已大為注意，而且爲了這種兒童已做過許多工作；在比例上其工作恐較學校其餘多數兒童還多。

二

假如把教育適應到那些低能學生的個別需要是必要的和願望的，那麼，要解放高材的兒童，使其不禁錮在爲常兒而設的傳習課程裏，那豈非更爲必要嗎？那些天才的兒童難道應該如大軍中待遇最後列的兵士一般嗎？去強迫那些聰明優秀的，和已完全了解功課的兒童在形式的背誦當中靜坐着，和給未能好好準備功課的學生做出的曲折花樣所麻煩，那不是很糊塗的嗎？那不只損耗時間而已，還有甚於此者；就是他表出一種情緒上的興奮損害天才兒童情緒上的興奮有損於天才的兒童，正如精神的壓迫有損於低能的兒童一樣。因爲天才的本質，當其自由發表內心的能力時，不

需興奮即能爲神異的成就；但如被壓迫而隨着厭惡的常規或制度去幹，那他就只有衰敗而已。

教育者及一般人，既已明瞭在天才兒童身上實隱藏着後一代的領袖，那麼，如忽略了他們的完滿的教育陶冶，那顯然是一種社會經濟的大損失。而所謂他們的完滿的教育陶冶，自要解作個別的陶冶，因爲你不能籠統一般去看天才的兒童的。

在新學校裏，教育能適合個別的兒童。這裏很注重個別的嗜好、傾向、天賦能力，并給他們機會去發展。兒童的創造能力不只任他在藝術上自由解放，而且任其在各門功課上解放。那些傳習的、絕無動機的練習，即用惹起興趣的方法以爲代替，這些方法且常留地步以爲高材兒童賦有的創造能力、領袖能力、及自治能力的施展。各種特別才能的發展，無論是音樂的、藝術的、文學的、科學的、或機械的特別才能的發展，在每日功課裏，是常常準備着的。因爲爲什麼這種文化人格的活動，要歸入課外活動的牢獄裏，而不爲各種正式功課所承認呢？新學校視牠們爲教育之一部，要在正式課程裏給牠們位置，不特留機會去發展這種異才，而且利用牠們的發表來增進學校的愉快，和

充實學校的文化生活。

甚至在公立學校系統的範圍裏，這裏或那裏也有不少試驗去給機會與天才兒童，使其循着個別能力來發展。在這種試驗當中，那最顯著的就是數年由斯忒德曼（Tulla M. Stedman）主理的加省大學的師範學校。這種關於天才兒童最有生氣的工作，原在匹茲堡（Pittsburgh）大學勞德博士（Dr. Root）參觀之後開始，因勞德博士久已不滿意我們過於標準化與過於埋沒個性的公立學校系統，如果機會的班級及個別的教法很有利於低能兒童，那麼，他們對於高材兒童又如何必要呢？高材兒童關於將來社會的事業如是重要，則他們此刻的教育自應取得社會最大的注意。該校創辦人心中正有這種信仰，故設機會室以供給兒童，從第四級至第八級，兒童智慧所得之數約在一百四十以上。

斯忒德曼說：「兒童們必須依着自己的步驟去獨立研究，選擇他們的目標，和盡其能力去工作。要能完滿發展，他們必須努力使用其能力以應付諸種情形。沒有關爭，就不能有真正的生長。爲達此目的，機會室的第一問題就是要教兒童如何研究，選擇，

與如何應用圖書，及如何幹簡單的研究工作。有此研究能力的兒童，他們得到真正的教育，必較從任何分量知識裏所得到的為多。這些兒童不只有能力獨力工作，而且喜歡獨立研究。他們不久即使我們驚異，他們能從多方面去探討一個問題。」

這些兒童的工作幾乎純粹是個別的。每一兒童都有特殊指定的工作；做完一種，又做別種，完全不需計及同班同學現正做着什麼。傳習的課室講授及背誦，此時已經排除了，此時做的，就是學生教師圍繞着一張圓桌子為隨意的討論，而討論的問題常由一個兒童引出。兒童亦在這裏報告研究的結果，而一種新的課室設計亦可在此時組織。既不拘形式，亦十分自由。平常學校的長檯長櫈用桌子椅子來代替。天文、地質、自然、歷史、地理、旅行、傳記，和各種文學書籍可以隨手應用。在可能時，不特允許，而且鼓勵兒童共同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使學校環境，能與家庭、職業、社會、密切相聯。

斯忒德曼說：「要為高材兒童計劃一種具着柔性的課程，差不多如把馬鞍馬韉放在飛馬之上。」平常使用的課程只可供平常學生應用，如要牠適應個別的需要，牠必須把內容擴大及充實。對平常學生為必要的許多訓練、解釋、及引伸，此時要刪除了。

平常給與各科科目的時間已經減少，課外活動和許多創造的工作就發展起來。

這些在機會室裏的兒童似乎有一種理想的教育。他們編戲、演戲，并繪圖、畫圖案、製服裝、佈景等等。要闡明史地的問題，他們又應用故事、戲劇、遊記等各種材料來對同學及教師家長演講。——總之，他們負起一切表演責任。斯忒德曼說：「很少大學新生能像那許多兒童一樣，講說得流利和均衡的。」

三

在研究這種完善的高材兒童的教育系統時，我們亦可懷疑這樣的方法對於常態兒童是否亦為一種理想。

忒孟（*Fernand*）教授關於這種教育實驗嘗說：「這不只對同樣班級的教師有興味，就是對一般的教育者或家長也很有興味的；因為這種最適於天才兒童的教育方法實可盡量應用到一切兒童的訓練上去。」

新教育者現正努力研究一種適於所有兒童個別需要的教育。要將兒童因智慧高下而分組，然後把教育適應到個別兒童去，他們不覺得此為必要或有益。人數少的

班級，（很少超過二十人的）每班分子雖然極端複雜，也可有機會來個別發展。每一種常態兒童，從愚笨的到聰明的，從最長於身手活動的到最長於學術研究的，都可用一種新的方法，在同一教育團體內，去為個別的發展。每一個兒童都可因着自己的特長來工作，以求貢獻於團體成就，或班級演講。聰明的學生貢獻多些，遲鈍的學生貢獻少些，然而團體的工作並不因此而受不良的影響的。

團體設計，為給各種高材兒童一種自由發表機會的有效方法。如以班裏演劇為例而言，如果那劇是關於古代的，那麼第一需要的特別才能就是文學的才能，其次就是長於歷史研究的才能。在試演時，又需要有創造性的導演才能，和表演才能。關於舞臺方面，又要佈景、砌木、定製服裝、（包含染洗及製飾）配置電燈光線，印刷戲劇目錄，最後又要招待聽眾。所以在編戲與演戲的全個計劃中，各種個別的才能都可以得到發表，在其他的團體設計裏，其得發表的機會亦如之，這是在基礎於記憶課本材料的平常班級教學裏所不能做到的。

新教育者不贊成因着兒童智力商數之高下或別種條件來把兒童分組。這種辦

法在人數過多的公立學校是可用來解決他的問題的。然而這絕不是一種理想的解決法。各種類的兒童，因着智慧生活而集合起來，能够互相幫助。聰明的兒童可以推進愚鈍的兒童，至於平常的兒童則可使用團體間彼此均衡。那些長於讀書的可以將研究的結果獻給團體，至於那些身手活動的則可將其特才爲具體成就的貢獻。各人都學得負責與忍耐，學得承認不同心理與不同品性，做一些不是要我們爲個別的比較，而是要我們互相了解、同情和服務的基本事情。

在現代生活裏，亦有比較一羣優秀的人，強要離開平常一般人來生活，更爲苦惱的嗎？然而強迫中人及愚人離開了聰明的人而居，絕不許與他們相接觸，那又是怎樣呢？不成，上帝是要我們共同生活，和互相補益的。在家庭裏，在社會裏，在團體裏，在機關裏，種種式式的人都聚集起來；而每一個誠實的人都有他自己對團體的貢獻。

因此如能根據那些容許發表個別差異的來聯合而不分離，那於各個兒童的完滿發展似乎更有助力，更合於常態。如果我們有一些極小的至於能任事物機械化的班級，有一些能幹的和有識的又懂兒童心理的教師，有一種不以課程而是以兒童爲

中心的教育學說——那麼我們就能注意兒童個別的需要，而不須把他們歸入團體，因為最美滿的團體也永不能純粹的，其故就因沒有兩個兒童是相似的。

假如我們使課程成爲神聖的，那麼，我們決不能完成牠。然而重心，已從課程漸漸移到兒童身上了。遠在一八九九年時，杜威博士已說：「凡是那些最好而最聰明的父母所欲爲着他們的小孩的，都應是社會所欲爲着他的一切小孩。此外一切別的學校理想都是狹隘而不足愛。如依他來幹，必至害及民主主義。社會爲着自己而成的一切工作，都是憑藉學校爲媒介，傳給未來的分子使用。所以只有能够使構成社會的各個分子充分生長，社會纔有機會自己生長。」

茲舉一所領袖的新學校的個別工作爲例，以闡明兒童如何能助個別的發展。荷爾（J. Hall）女士曾在帕刻學校教育研究裏發表個人與課程一文，敘述他在第七年級裏實驗使那些最主要的學科工作成爲個別設計（常自選擇的）的結果而發展。她的班級裏有三十三個兒童。課程中有幾種科目是不拿來實驗的，如音樂、體操、數學。

近代語、歷史等等，這幾種科目由幾個特別教師在每日下午教授。每日早上純粹做個人的設計，此種工作包括組織、預備、報告和朝會。在下午做許多手工工作都與這種個人的設計有關係的，由學生自擇來做個人研究及報告的功課中有：製紙、無線電報、兵器、美術史、駕船史、初期的地圖、攝影術、鐵路、手工作含有：製古偶像衣、製飛機、印刷術、繪無線電、製傀儡戲場、裝電線。

有一個學生敘述在預備期中做些什麼：「我們各處一齊動手的——有些在工場中製戲台。有些在圖書館裏讀着書，有些在實驗室裏做實驗，有些在美術室裏繪畫，還有一些在課室裏做各樣東西。」

甚至兒童的家庭工作也任他們自由選擇的。荷爾女士說：「我們使兒童在這些事情裏有選擇與自導之可能，那不是很好嗎？然而我難道應該由我去使兒童知道他自已不能選擇，不能計劃，與不能自導嗎？難道我應該表明我覺得他的興趣沒有價值，去破壞他的自尊和野心嗎？讓我們不去剝奪他這種合理的休閒——因為他對於合理的生活之重要，有如食物與睡眠。讓我們不要阻礙他習於使用他自己的時間。我要

他在校的生活與他在家的生活都成整個生活之一部——而這整個生活須是豐富的、有趣的、有目的的、滿意的生活，而不能是悲慘的存在。」

分給兒童回家做的題目是：以「小婦人」為題寫一戲劇；讀尼古拉斯傳；讀關於俄羅斯的書籍；為着童子軍測驗而學電信符號；我現正進行中的電話工作；史書索引；建築的精美繪圖；預備歷史測驗；室內裝飾的五色繪圖；製造傢具的圖形；讀聖法蘭西斯傳；讀華盛頓傳等等。

我們可以料到，這些問題之研究可以表出許多種嗜好、品性和家庭環境，一些兒童是身體活動的，他們就選擇活動的問題，一些是文學的，故選誦讀和寫戲劇。有些特別喜歡歷史，有些又喜歡旅行。更有一個兒童以為他最好利用他的時間去準備歷史測驗。

看這種方法能如何神異地適合個別的需要與欲念，和能在一種共同的文化模型下把我們統一起來。這些演講、報告、全體集會，還能將全班兒童得到每一個人的成就的利益，又在這種方法裏，可以養成讀書的了解、分析、綜合和作文的技能，因此那些

身手活動的兒童雖有各種科目的工作，仍不必視他們爲抽象的材料。在這些兒童心裏，那并非做着英文作文或辯術。他們只以爲這是他們準備報告或誦讀報告之自然而有的，及喜歡共有的一部分的成就。

這種有趣的個別訓練的實驗，因荷爾女士之死便成了不應停止而停止。帕刻學校校長庫克（F. J. Cooke）在該校組織的一種詢問中，答覆那種實驗影響說道：「這個計劃下的原則現方在運用之中，而我們就在形式的練習當中也施行個別的教育。兒童憑藉自己或在小團體中，因着需要而去戰勝個人的困難。所有工作都圍繞着個人的或團體的設計而組織，包括團體在發展中所需要的各種活動。又有各種科目工作的單位，去爲着科學、歷史、文學、各種目的而搜尋材料及知識。此外還有美術的設計應用，一切美術如音樂、戲劇、跳舞、繪畫、和造形美術。最後還有在學校行政中和團體生活中所要求的智慧的練習」。

各新學校所採用的實際方法雖然彼此不同，然而我們可說在無論那一校，兒童都有個別發表的機會。雖然這些學校遵守已成課程的程度彼此不同，而他們總一致

同意研究兒童個別的需要。而在兩者有所關爭當中，總是要把課程隸屬兒童，而不把兒童隸屬課程。

四

但是我們可以問問：平常的兒童也能利用這種靠自己能够負責、自悟、自導、忍耐而能成功的個別方法嗎？我們可以信任天才的兒童能够實現自己的教育事業，那因爲天才的人原來就賦有野心、悟性、自導的能力和戰勝困難的意志。他們不須別人強逼去幹那些原是其內部能力的外表的事情。他們能順利進行，而不須監工者或督察者，他們只需要一種更成就的、和更有頭緒的人物來作指導和綜合。

忒孟教授曾研究現在的一百天才兒童與過去的一百天才兒童的姿質，結果寫成天才之探源（*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一書，書中嘗以下面特點爲天才通有的特質：「智慧、好奇、判斷、創造性、狂想、堅強的意志、自信力、深慮、明見、力求完善的欲望。這些兒童還有一種特性，就是一種問題需要智慧愈少，他們愈不喜歡牠，同時他們覺牠似愈困難；在他方面，一種工作需要智慧愈多，他們覺得牠愈容易和愈愉快。」

等我們考察一下這些天才特質。平常的兒童難道沒有這些特質嗎？或者每一常態兒童都有，只是他們不及天才的分量多，那不是嗎？天才只是程度上的不同，這非可能嗎？一切兒童都有多少天才的姿質，只是他們所成就的不及天才這樣高而有力，這不是嗎？或則反之，介乎天才與常兒，其間有一明顯的裂痕，而大多數的兒童都需一種傳統的指導，一種制度主義，和一種專制的政治嗎？

這是教育者所要決定的一種重要問題。如果常兒不能自導的，如果他們沒有創造性、負責心和戰勝困難的能力，那麼，這些給與個人多量自由的教育方法自然不是好的和有益的。新教育者將他們的教育實際連在這樣的論理基礎上，就是平常兒童，如有機會，如有適當的鼓勵與指導，是能够自導和負責的。二十年來的實驗無不可以證明此種見解。每一兒童，如有自由與機會，在大體下，總不會負人所托。新教育正設法鼓勵這種創造的精神。而此種努力之成功亦可在許多新學校所有的成就上及人格上見到。

有些教育者相信介乎天才兒童與平常兒童，只有一種程度的差異，並沒有種類

的不同。近代心理學者關於天才本質的研究很可以闡明這種觀念。忒孟的研究就可表明：天才並不是病態的在生物學上退化的，而是剛強的、康健的、常態的，和能向各方為最高度的發展的。這些兒童善於運動，正如他們善於研究。他們有藝術上的天才，正如如有智慧上的天才，他們在社會上是成功的，不特人們歡喜他作伴侶，而且歡喜以他為領袖。換言之，他們純粹是常態的，不過在各方面都較常見較有天賦之才。那還是這些兒童一種特性，就是他們多來自有高出常人的智慧遺傳的家庭，和生長自高出尋常的文化環境。因此他們在人類進化途中，並不是一種彈性或變態。他們在進化的連續上，只表示出一種向着更完全的種類的常態進展。這種完全是身體的，亦是精神的，我們確實見到這種兒童，在初生時，重量已逾常人，又先常見一月而能行，更有較好的抵抗力，好的筋肉，好的肺部，睡眠比較長久，牙齒亦較常見為好等等。

這些發見，可使那些以為天才在本質上異於常人，為一種心身不平衡與不健全的人們，起一驚疑。我們不要忘記：坡（Poe）雖為病態精神的天才代表，然在少年時彼實為一最優秀的游泳者，并長於其他運動；在於他的乖離的人格實來自不良的兒童

教育而非有內在的原因。

筏委內耳 (Voivonel) 博士和勒夢德 (Remond) 博士在他們一九二二年所發表的文藝天才的研究中，有這樣的結論：「我們可認天才爲一種自然發表，在這種自然的發表中，人類的根本姿質達到一種最高程度的發展，而不爲一般人所能者——這是自然能憑神經組織而產生的最好的與最高的一種綜合。他不特不是退化的現象，而且應視爲「進步」及「完全」的人的表示。天才並沒有什麼異於常人，他們只是一種智慧平衡的最好姿質。」

天才 (genius) 只是人類中最完善進化的一種，自然而然地產生，並且常常產生。近於天才者，則有一種高才 (talent)，他們的心身姿質亦高常人一等。

然而我們所謂常人究竟是一種什麼人呢？實際上並沒有這種人。這只是統計學所虛構者。從那些最微細的分別程度（其微細處只有上天纔能創造）最大的天才，便降而至高才，再降而至常人，又由此一路到那最少天才的。所以在測量表上很難說定天才在何處始，正如很難說定低能在何處始。我們絕不能把常態兒童爲智慧團體

的分類，因為事實上絕沒有所謂智慧團體。我們只見有無數的個人，他們彼此皆有微細的差別，後由最微小的差度，從天才漸漸降至癡愚，亦有些在兒童時幾類癡愚，至成人時則鄰於大智。愛迪生就是如此一個兒童。桑德（George Sand）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天才兒童所表現的姿質，其他天才較少的兒童也有多少表現，例如一切非低能的兒童，不是都更喜歡和更努力於那能激起智慧的事情嗎？

讓我們再參看一下忒孟對於天才兒童的特質的記載：智慧、好奇、判斷、創造性、狂想、堅強的意志、自信力、深慮、明見、力求完善的欲望。這些特質難道只是天才兒童專有的嗎？不是的，平常的男女兒童也具有多少的。給機會去發表這些特質，好使他們變強，這正是教育的功用。待兒童如平兒，我們便保持其為常兒了。

然而就是常兒也可使他變為具有豐富人格的兒童，我們只要給他們許多機會去發表他們，如一個獨立的個人——這就是每一新學校都有的大發現。又許多兒童，在別些地方很像平凡，當其父母遣之入學，學校又容許及鼓勵他們為個別的發表，那麼他們便開始發芽，含蓄，吐豔。他們此時再不壓抑自己，恐懼別人訕笑，和仰望別人意

旨——一切由羣衆標準壓逼而成的習慣曾經漸漸閉塞了他的聰明，而阻止他們的照耀。他們現在開始認識自己，開始冒險，向一個友愛的世界中前進。他們更覺愉快，更覺得意。他們的面孔更富感性，更爲活動，更表出他們內部的思想與情緒。

是的，平常的男女兒童也蒙大自然多量賜與天才兒童的天資的。例如好奇心原爲天才兒的一種特質，實則也存在平常兒童身上，所以新學校以保存這種奇特的姿質活動爲其主要目的之一，認牠對於智慧生長之必要有如養氣對於火之必要。平常兒童，當其對着當前的實際問題，亦有判斷力，無論活動的問題，或學科的問題，都可給與他們，使他們的判斷可以藉此而發展。創造性在傳統的學校裏是極端枯竭的，在新學校裏則繁榮暢茂。

堅強的意志又怎樣呢？好，這種姿質，我們可以承認天才是佔有最高度的——同時這亦是判定一個偉大人物的真正的標準。但是他亦在各兒童身上養成多少的。自然這不能用一種人工的紀律法，把學校的意旨強加到兒童的幼嫩柔順的意志上而養成。兒童所需要的是發表其天性的機會，和學習在他們所願望的成就上，如何使用

其意志的機會。因為意志和欲望差不多是相同的。這些沒有堅忍意志去完成所指定的功課的兒童，當其為欲望所鼓動，每能專心致志，百折不回，以從事他們個人的設計，那足使我們驚奇的。

巴刻 (Baker) 女士說及一種設計足以表明一個兒童極堅強的意志的。這個兒童請女士許他對校內的水管與熱管作一研究，他每日在給與他的時間內繼續工作，凡六閱月。他畫出所有的水管，研究他們插口的和貯積的位置，充滿與放空浴室的方法，和放熱器。結果他做出一種這樣完善的計劃，至使後來凡關於這類事情都不能不拿牠來作參考。

這個兒童對於強逼去做的功課會表出同樣的堅忍心嗎？許多兒童在表面上總似是不關心，缺乏堅忍力，他們所以如此，那因為他對於他所任的工作不歡喜。就是一個天才，他對於強逼而做的沒有興味的工作，也沒有忍耐力的。實際上，他們當遇此情形時，確成爲一些最沒有耐力的人，其忍耐力甚且比愚笨的人還比不上。假如我們把這事分析，我們將發見這種爲天才特性的堅忍意志，常爲一些強烈的欲望的結果。

而這種事是真確的，就是我們在何處能引起和創造兒童的欲望，我們就在何處發見他們一種堅強的意志表現着。新學校極端留意這種引起強大教育的欲望的需要，和栽培這種意志應用到事業上和職務上的。

許多制度化了的兒童所欠缺的自信力，在新學校裏發展最速。那自然不要給他發展過速，以他在那些自由的、同情的、和直表的环境裏，變成一種反社會的特質。

力求完善的欲望，在天才心裏，極其強烈，這應在常兒心中，培植起來，因為他們對於不甚完善的成就即感滿足。而這欲望亦可培養的，新教育者亦費過不少氣力去培養他們力求完善的嗜好。

五

從此我們可以看到忒孟所認為天才特性的各種姿質，一切兒童都具有多少分量的。在一種標準化和制度統治的制度之下，這些姿質幾乎是完全受禁止的。從這種制度養出的兒童，於是成爲一種凡庸的兒童；因為這種制度，原來就是爲凡庸兒童而設立的。

新學校給與社會的一種最大的貢獻，就是牠證明常態的兒童，能超越平凡的領域，能發表個性，能跟着天才的模型，而不跟着平凡人的模型來行動、思想和生活。

誠然，這些新學校的兒童都各有許多遺傳上和環境上的利益，我們留意給與這些兒童的一種文化人格的發展，也可以給與進我們學校內的一般常態兒童嗎？我們不能確信此點，然而我們深信：當每一兒童愈得個別的待遇時，那他的精巧的價值和天才的姿質必愈能發展。

當兒童被禁和受制在一種形式的機械的制度之下時，他確有一些東西失掉，失掉什麼東西呢？就是失掉那些當他尚在那光榮的學齡期前生活尚是自由，和尙能爲所欲爲的時候所具有的和顯現着的東西。

這種制度禁困的結果便怎樣呢？衛爾斯在所著的深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裏說道：「每一個兒童都曾經過這種秘密的階段；他坦白對人的態度中止了；他要隱藏他這顆良心的珠寶，秘不示人……我相信我明瞭此何以故，然而我究不能說明這顆珠寶爲什麼不會隨着經驗而再現，而光榮、成熟、神奇和生長，我想這應

該遭遇到，這亦是今日的真詩人和真藝人所正遭遇着的。我想將來總有一日他變爲一切常態人類的生活。不過他常常似乎沒有這樣的遭遇。兒童從坦白的、美麗的、和怪單純的一種階段，渡過了強制的和不自然的生活之下的一種沉默和秘密。於是乎他們什麼都失掉了。在那些已經完成的、小心翼翼的、注意監視的、和事事限制的男女手中，再沒有小孩子出現了……」

將來的教育不去強逼兒童將真心深爲隱藏。不去阻礙其天賦的能力，只設法使其人格得在一種溫愛的、同情的、和贊美的空氣中自由發展，使社會在他們長大成人時，能得更豐富的收穫，這是可能的嗎？

人的世界所以超越動物世界的一種最大的光榮，全在乎他極端變異。（從生物學言之）人類的進步在於向前變異，而不在重演同一的種類。凡是重演同一種類的，都斬斷了在進化中新種的根苗。理想的學校必將允許不同的人格，鼓勵他們，給他們豐富的環境，使每一兒童的天賦能力都得以開花結實。

所有兒童都需要一些書本知識以外的東西。他們需要仁愛的同情，了解，指導，使

能給他們自信力、勇敢、和成就他們那些天賦的東西之鼓動。教育，從他們的目的與性質看來，不是顯然一種個別的事物嗎？如他不能成爲個別的，那他不是失了他的職務嗎？如有一間學校，能使天才兒童，和低能兒童，如同在家裏一樣有人格發表的自由，和能使平常兒童，與天才兒童，一樣感覺愉快，一樣依照各自的能力大小而成就，那麼，我們就可說這間學校是一種理想的學校了。

教育因要適應兒童的個別需要而至多所耗費，那是真的。因爲要每班人數較少，或許多不過二十人。因爲教師要有較大的能力，較深造的訓練，和要有些兒童心理的知識，及一種了解的與同情的心靈。然我們在實際上就是勸告公衆供給一般教育一些必要的物質設備，原也很困難的，又怎能使他們供給更多的教育經費，是爲尊重

和保全兒童個性而消耗的呢？

我們現在所據以爲理由的，就是這種耗費，於兒童是根本合理的和必要的。當公衆能夠見到這種理由的時候，他不久便會供給這種經費了。

我們可以指出：現在各文明國家一致接受的義務教育的理由，在一世紀或半世

紀以前是沒有人說及的。當時大眾絕未嘗以教育貧人子弟爲他們的義務。有資產的人只教育自己的子弟，一任貧民子弟失學。英國蘭加斯德（J. Lancaster）的神異工作，及其喚起和傳播免費教育觀念的領導制（Monitorial System）在教育史上算是一種最滑稽的事蹟。從蘭加斯德初下公共免費教育的種子時始，至其初次收成爲止，那是足足經過一百多年。現在一般公眾都無不人人感化，努力籌足經費，再應用多量生產的方式，去推行那集團的教育。

當到公眾探識那集團的教育不是一種真正的教育，探識到使兒童個別的教育趨於貧乏，更從此而至使人類本身因後代不能充分發展其能力，亦因而變爲貧乏空虛時，——公眾那時便很喜歡籌足經費去施行那些我們可稱爲「質的教育」的教育了。

我們民族既能在今日普及教育所造成的高等普通智慧之上，增加一種分析，創造性，悟性的姿質，亦顯然能在這個新大陸上，建設一種更繁榮的，更安樂的，更光輝的，和超出世界所嘗夢想的文化。

這種民族甚至現在已覺悟到這種大需要，此則從巴盧 (Ballou) 督學官對華盛頓 教師所發表的言論便可見之。巴盧氏之言曰：「這是我們如職業一般的事業去接觸和熟習我們所教的兒童之個別的需要，能力，興趣，和本領；去組織我們的學校，務使他能供給各人子弟一種平等的機會，各個兒童的異點是很多的，而且很有意義的。我們並未曾對一般人民盡了責任，除非我們已使學校的教育計劃已適合了他們的異點。」

這種時日將已來臨，就是學校將變成像一個花園，教師變成花匠，能給每種植物以牠所需要的；又決不責備無花果樹不能產生柑子，或蔽陰的樹種不能生果；栽培花卉，幫助牠們生長，按照牠們的種類如何而調理牠們，愛護每一個花苞，因為牠是與衆不同的。

據我個人的見解：我不以為不能如此的東西還能稱為教育。因為如司各脫 (Ogden) 所說：「沒有一種在某一兒童心裏的東西有如在其他兒童心裏一樣的心之生長恰如各種植物。牠們可生在同一的土地上與空氣中，然而牠們實各為着不同

的目的去選擇和使用營養。」

第五章 培養社會的德行

「教育的目的，在給各個兒童以能引他適應他的同羣之社會習慣的那些經驗。」

——J. V. Breitwieser——

這要一個很技巧的和很忠誠的教師，纔能將那些生性自私自利和有時殘酷的兒童，轉到那些同情的、互助的、和有社會心的路途上去。

海巴塔是一個很愚柔的母親的小孩，十歲入學校。假如有人欺負他或打他的話，他只叫叫，隨即逃去。他對什麼運動都弄得不好。打棒球，他總打不中，偶然打中，又出了界，那顯然是很低能的。打 soccer（美國式的足球）打得更壞。他自然是一個受人欺負的人。他在學校裏的生活是很可哀憐的。

教師對他怎樣辦呢？自治會似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知道，責罵、懲罰、或控訴都不能為力的。因此也只求助那團體的精神。這間學校似乎仿照印度的圖騰社會，把兒童分為幾隊，就是鷹隊、鹿隊、海狸隊。海巴塔隸屬鷹隊，但該隊的人很厭惡他。因此教師乃

在某日當海巴塔不在的時候，召集鷹隊全體隊員來談話。

他問道：「我們對海巴塔怎麼樣辦呢？（他將全責放在他們身上。）如果我們想我們的隊伍有如鹿隊一樣好，我們似應幫助海巴塔的運動進步些。」

兒童既受了重大的責任，便立意設法幫助海巴塔。班中的領袖厄味林（*Evelyn*）說：「如有人打他，他應還打。」這句話得了多數的同意。這條問題於是有一解決之路。——然而你們爲什麼不把這事給他說知，和訓練他成一個好鷹呢？因爲海巴塔如弱，我們的隊就不能強的。你們知道：古諺說得好：一環弱，則全練失其強。」

各隊員都贊成給海巴塔一種自衛的訓練，厄味林且被選爲訓練主任。當海巴塔回校，他同他一路跑，給他一切誠懇的和可感的忠告。

「當着一個兒童取去你的帽子，你亦須取去他的帽子。如有一個兒童打你，你亦應還擊他。你須努力運動，我們鷹隊不要鹿隊賽勝我們的，居我們之上的。你現在這樣子足以壞敗一切的。」

海巴塔原不是體小力弱的，他實是有勇氣的。只是感性敏銳，心腸軟弱，習於無抵

抗，他現在說：「但是，如果我還擊他人，我不會傷壞了他嗎？」

我們的女教師便竭力保證他說：「那絕不要緊，這樣便可教訓他們，使不敢侵犯你，不要掛心，你正要這樣。」

海巴塔開始胆怯地試驗鷹隊所貢獻給他的自衛方法。他的冀圖當初不大順利，可是他的隊友不特不怪責他，而且贊賞他，和鼓勵他。

「勇敢童子！」「取去他的帽子！」「站起身來對他！」「你正如他一樣好！」

這種團體的維護精神對於海巴塔確幹了一種神異的工作。海巴塔不久便學到如何以惡報惡。當他受侮時，他不再叫了，只是勇猛地極力維持他的信約。他不久便不至受人欺侮了。又在鷹隊指導之下，運動亦開始進步。他已得救了，未到年終已一路順適。他的隊友已不再以有他為恥。在一般發展上，他較校裏任何一個兒童都大。

這故事的精神不在海巴塔的改造，而在團體對他的態度的改造。因為他們了解：「一環弱則全練失其強，」團體因着弱的分子而變弱，但又能因弱的分子轉強了而變強。

二

各新教育者所極力主張的與實行的那些兒童個別發展的原則，與兒童自由的原則，不是任容兒童變作個人主義，或流為自私自利的。反之，在新教育者所共同表決的十種原則中，他們都以為發展兒童的社會德行，使他們仁愛、合作、和服役，在新教育裏最為重要。

世界感受放恣的個人主義的痛苦太多了。所以這絕不是新教育者的目的，因為他們理想的社會，是一個更同情的，更少以個人為中心的，和一個服務及仁慈的動機能在其中實現的社會。在各方面，我們亦已見到一種將以合作為主旨的新文化的曙光。這種文化現已影響到工商業方面的世界去，甚至那最偏於個人主義及受害最深的農業，界亦已漸受其影響。

專門研究合作問題的人已經指出：在一個澈底合作的團體裏，絕不會使個人因為他人而有所犧牲，他只使各個人把他的計劃與見解擺在桌子上面，使得大家能夠討論，而造出一種更大的與更好的見解與計劃。因此當合作真在實施的時候，他確能

使每個人在一種非團體中任何一人所能造出的偉大，和完善的設計裏發生作用，而增加個人的能力。（團體原是常時準備幫助和支撐個人的。）

團體的心——計劃的、創造的、和成就的心，能造出個人不能的神奇之事。在工業的生活裏有一個實例，就是由許多人合起來研究的電力實驗室的工作，這種工作嘗發生和正發生很多結果，然而這種工作，決不能由一個人來做的，無論這個人如何聰明有本領，例如長途的電話與發音機，大半都是團體發明的結果。

因此之故，在將來文化中一種最重要的成功條件，就是那種與同伴諧協與合作的力量，亦就是爲着團體力量與成就，而將自我消泯——更說得好些，是超脫自我的那種力量。

如果這種將來的觀察是不錯的，那麼，今日學校最重要的一種作用，自是準備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兒童很易偏於自私自利的，我們如何能助兒童超脫他這種自利的野心，使成爲社會的態度，與合作的習慣呢？在別方面，在流行的教育裏，亦有些實際的事情必須排除，俾能達到這種目的嗎？（所謂實際的事情，自然是那種過重自我，自負，

誇大、好勝、好名、自高自大而不顧別人，甚或犧牲別人的事情。）

適在這公民自尊與努力的時代，加之以民主主義與服務的呼聲充滿各人的頭，美國的保守者，於是很自驕傲地，認這個公立學校的制度是民主主義及公共服務的最理想的訓練者。然而那是真的嗎？我們現行的教育系統與實際，不是因其爲個主義的產物，過去自私性的表示，趨於發展兒童這些自私自利的姿質，而具有極大缺點嗎？

帕刻在他的對教師談話中肯定：我們今日學校之最顯著的產品，算是自覺心系統的培養。這種培養乃基於給與競爭分數和獎品之上的。得獎的希望固可以刺兒童，亦生出許多不良的結果。帕刻說：「一個兒童只給一種欲望所支配，和一種動所管轄。」我願意成功，當我能勝過我的伴侶，或我能做首領時，我就高興了。」兒童滿戰勝者的愉快回家去，他伏在他母親的臂上，叫道：「我在班裏第一，所有同學都我腳下，我打勝了他們了。」世界上更沒有一種祈禱會，一種基督教，一種信仰，能發這種神異的自覺心，如這些父母和教師常愚笨地願意地所能發展者，我們校裏的

賞制度的教育，就是一種非常的野心，把一切動機都埋沒到個人成功的一種動機上的教育。

「不錯，兒童必須互相競賽，不過這種競賽須是大量的，須能認識各人的優點與弱點的，那應有一種助人的，或求助於人的，和互相受授的欲望存乎其中……工作，完美的與教育的工作，爲手與腦和爲心與身而有的工作，最能發展全人的工作，全校各人最需要的工作，那就有他的甜蜜而愉快的獎賞了。」帕刻繼續表明兒童可以直接從自己的工作中競賽，不必將自己現在的成就與同伴的成就競賽，而可與自己過去的成就相競賽，看自己有不不斷的改進。

那些真正的藝術家都知道：最好的作品決不能出於與別人競賽的動機而得到，只有從個人的感悟，與發表的欲望而得之。在中國的古書裏，嘗講及一個雕刻師的故事，他的工作比別人特別做得好，堯帝當時乃問這雕刻師怎樣能够做出這樣好的工作，答道：「當我有一件事情要做時，我便去深思三日，以便忘却我自己。那時便放棄個人的野心，走入山林，選擇一株最好的樹木，動手雕刻。」

我們正要拿這種努力去鼓勵今日學校的兒童，是的，我們可任他們企圖優勝，不過不要企圖優勝於他人，而只應企圖優勝於自己。任他們超越過去一切的成績，任他們達到意想中最大的勝利，但只是一種在他們自己精神界裏的勝利，而不是那種壓倒他人的勝利，也並不是要當公衆的面前能顯出自己是高能，他人是低劣的一種競賽的等第。

在新學校裏，常有一種努力去防止學生個人的虛榮與野心，和把他的能力引導到團體的活動與團體的成就的一條大路上去。團體的戲劇，如果指導得好，大足以養成社會的品質。新學校設有各種運動與遊戲，使各兒童時時都能參預。平常學校裏的運動所以難於用來教育兒童，純因不是個個兒童都去遊戲的，尤其因那最需要遊戲的兒童反不得去。如視運動為教育進程上一種內在的元素，那麼，他自須普及全校兒童，有如在英國的中學及美國的新學校裏一樣。運動必須普及的，亦必須成爲每日課程之一部的。

然有比較那些如運動與操場等外表的問題更爲重要的，就是新教育者努力用

合作的實際與精神去透過全校課外的與課內的空氣，許多課內的工作都取一種團體設計的與團體演講的形式來做，因為在其中的每一兒童都不是爲着分數的報酬，和個人的勝利，而是爲着報告給團體和幫助團體完成工作，去爲各種問題之貢獻。

團體設計確爲發展兒童社會意識的神異方法。甚至在設計中的幼童，也常因爲他的自私自利和頑抗等事實，而被認爲擾亂團體的罪過，從而受整個團體的處罰與制裁。這並不是學校當局去處罰這樣的兒童，這只是出自兒童團體的公共制裁。因此，這些來自兒童團體之最強有力的制裁與動機自始即放到兒童身上，使兒童生出社會的幸福與愉快。

在每級的教材裏，亦可有團體發表的機會。例如地理，全班可共設一筆記簿以爲公共合力發表之地，而不使各有各的筆記簿，各與各競賽。在德可樂利的學校裏，各班兒童都備有可供全班使用的公共材料，他們且不斷的搜集到來。當兒童研究到某種問題，就可向這裏採取某種已有的材料。那末這種辦法，比較那一種兒童愈能接受已成的材料，愈是優等，和愈勝過那些不能接受的兒童的一種辦法，是何等不同呢！

在新學校的演劇當中，團體行動也較個人優點爲重，因爲並非選出幾個有演戲才能的兒童便了，那要全班兒童各盡所能來參加工作，而那些更有天分的兒童還要去幫助那些少有天分的兒童去記憶與背誦詞句。當表演的時候到了，那無論是一幕劇，一個音樂會，都成了一種社會的事情，要全班或全校來參加。這並不是一種表演，專意拿有才能的學生登壇，來給衆人爲靜止的享樂。正如奧柏藍麥高（Oberhammer）地方因有他的動情的演戲，至全城震動。在新學校裏，亦全校感覺自己在戲劇裏或他種演奏裏表現着。這種感覺原是由教師小心培養的。個人的成就雖然極端鼓勵，但并不拿來給學校喝采，或放在學校之前來炫耀。新教育者確曾極端小心防備那些爲人類最好的自我的仇敵——自私與自負。

學校的功課如由團體設計或個人設計而完成，則在實際上必減少許多競爭及其不良的結果。兒童此時再想不到如何勝過別人，亦不想到他們如何能有個人的成功。他們的心思氣力全盤放在事情上，而以幹這種事情爲目的。即在他們的工作裏，也可有些自利的動機，故新教育者留意察看這種病狀，設法戰勝他們，贊美社會的品

質，和幫助他們發展，這亦是當然之舉。

新學校裏有一個極好的辦法，就是任優秀的學生幫助較遲鈍的學生各種功課。一個熟讀他的數目表的兒童，可以仁慈地幫同一個較笨的學生學習數目表，而不去幹那些有益自己的工作。

我還記得幾年前一件事：有一個教師，她因為不能表達一種在當時以為太新的觀念，便退去公立學校的職務；因為有一天視學參觀她所教的班級，見到有些兒童幫助別的兒童工作，乃責斥她，說是受聘來擔任教授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兒童。

新學校聘請教師的目的，在使其幫助兒童充分成就自己，或成就他人。新學校所希望他做的，在用一種平和的與可能的方法，發展兒童的姿質、本領和悟性。他們有許多機會，和有一種明顯的責任，去幫助兒童自助。這種空氣，比起別種學校來，他們的教師只在教室內講解，兒童只是一種收受者，只按照他們接受和覆述的程度而受獎品或分數報酬的，是怎樣的大不相同！

在新學校裏，有許多校外的事業是有社會的價值的。（自然，公民的事業不獨新

學校有之，即公立學校，也曾幹過許多極優美的事物，去發展兒童的公民品質。我們可以敘述兩種這樣的活動：在伊連奈州格羅夫（Downers Grove）初級小學裏，第一二年級的兒童有一設計，要清除一條公共小溪兩岸旁的穢物。在新學校這樣的設計，所以與平常學校不同之點，純在前者視此為正式功課之一部，而不視為一種課外的活動，而必須將他排在正式授課時間以外舉行。又在支加哥的帕刻學校，兒童每年冬季總有一個玩物修理會：在會期中，兒童把家裏所有的已斷折損壞的玩物，帶到學校工場裏修補，修補好了，便在聖誕時節送到育嬰院。甚至兒童的父母也來參加這種可愛的设计，在晚上來幫忙做這種的工作，所以在每年聖誕節前，該校全體員生總有幾個星期為此事而忙亂。所以有許多公民的设计可以列舉和敘述的，那絕不限於新學校纔有。

新教育先驅者帕刻為欲養成社會的和友愛的精神，乃召集全校（庫克鄉村師範學校）的學生每日開大會一次，他開的會所以不同於平常學校的會，就是在該校

的學生，將文學、歷史、自然等課室工作的結果，或節日慶祝及歷史事件都作為自己的分內事來參加大會。一年內校中每班都要負責表演多少朝會。參加這種表演的，無論長幼，都知道他要使得坐在遠處的人聽見他們，和了解他們說些什麼。結果所以養成有秩序的思想利明晰的言語。庫克關於這種訓練嘗說：「我們要將自己的小小好處拿來貢獻公眾福利的那種習慣，原是一種精神發舒的，和心胸熱烈的進程，而此種進程正是社會教育的本質。」

許多，或者可說全體新學校，都跟着帕刻的成例舉行一個朝會，最少都舉行一個週會，使各兒童在這裏輪流發表他們教室工作一部的材料，或為個人的及團體的遊戲表演。這確如帕刻所預先看到的，是發展學校兒童社會態度的一種最重要的元素。全體兒童集會在這裏，高興、愉快，無論表演的或靜聽的，都有一種社會的獲得。因為恭敬地和忍耐地靜聽那些不甚成功的兒童表演，實於團體的友愛和互助中有生長的機會。常常還有一些功課很壞和運動很壞的兒童，可在大會中有極好的貢獻的，這當然可以增加他自己的自信力，和別人對他的尊崇。

在直接感受帕刻新教育的影響的新學校中，芝加哥的帕刻學校、狄克哥（Dick Diogo）的帕刻學校和劍橋（Cambridge）的喜爾學校（Shady Hill School）都有朝會。佛來銘（Martha Fleming）關於芝加哥的帕刻學校的朝會工作說：「學校是我們共同生活的一塊地。我們日中大部分時間是消耗在這塊地方，而兒童及教師關於學校的興趣，正如關於家庭的興趣一樣強。我們原是一個家庭，我們每日有個時間及一塊地方來集合，故他最有關於我們的統一、和諧與成就。朝會是共同相聚的場所，牠是學校家庭的祭壇，每人都以祭品獻牠，用觀察和研究所結的果子、音樂、文藝，等等來娛樂牠，牠是各人合作來為全體的娛樂與幸福的一塊地，又是各人獻給全體及自全體得來的精神生活和智慧生活的所在，亦是各人將他們最好的與最精選的經驗用一種最動人的方式貢獻出來的所在。朝會是將全校的統一印入兒童腦中的一種辦法，也是彌縫由各級分離而生的不良結果的好辦法。這種團體的興趣對於個人的自私常有所限制。每個兒童都學到：顧及全體的興趣及快樂，且對此負責；又學到他是社會團體一個公民，他不特有權利，而且有義務。」

新教育的目的既在兒童中完滿發展，那麼，他當然負責去爲品性的訓練，正如去爲知識的訓練一樣。我們理想的常兒，是要忠實、誠懇、自助、負責，及有和諧的、同情的、和勤勞的人格，又在此必需的利可贊賞的品性之外，我們還希望一些兒童，得以發展創造性和領袖力。

很好，那種模範兒童的圖形確已在我們目前站着。然而我們怎樣去達到這個目標呢？不如就反面說怎樣不去達這個目標，還容易些。兒童如在一種具有絕對不自然的環境裏受教，和生活在一種制度化的方法之下，沒有個人發表的自由與機會，那自然不會顯出一些優越的品德，那是我們可以確信的。

因爲正如克柏屈所指出：品性爲我們所有習慣的總和，我們如欲養成品性，我們必須有機會去爲實際的行動。例如如果兒童沒有機會去實行自導，他怎能取得自導的能力呢？又如兒童要想發展自助和負責的品性，我們就必須許他自己立主意和下決心。他必須有機會去實行這些好的品德，他必定要在社會裏活動，和在社會情境裏

活動，不然我們怎能望他發展那些社會的和合作的品德呢？

我們只要翻翻歷史，便可見到一種長久的佔領和統治對於弱小民族的結果如何，那種自由的和剛強的種族，大概都有勇敢、誠實、自信、高貴的特質，至於被征服的種族，總趨於發展那些伶俐、敏巧、詐騙、恐懼、和不自信的特質。試一研究近來的狀況，便可知道這裏今日確有這種情形。詐欺確是常遇暴力危險的民族的一種品性，因為自然界原以騙詐來保護沒有力量的昆蟲、走獸和人類的。

兒童亦然，實際上無論什麼兒童，都可以因暴力壓迫而變作不誠實。反之，任何一個兒童，又都可由柔和的規則和同情的指導改變他為誠實。當我在君士坦丁堡的羅柏大學（Robert College）教書時，我見到這裏的學生（大半屬於被侵略的種族的）常有出於本能的說謊。他們甚至在判斷中受人公開攻詰，亦說謊如故。他們說謊的習慣這樣牢固不變，所以甚至違反自己的興趣時候，亦要說謊。可是我還記得，我雖改變一班學生到這樣一種程度：就是如果有一件不妥適的事情發生，我只問問「誰人幹的，」那幹的兒童便會起身承認。

怎樣能達到這個地步呢？那不外是減少懲罰，破除恐懼，和訴之兒童的欲望去迅速學成英文。因此當一個兒童公開承認搗亂，我不懲罰他的。三句問話便可以使這個兒童改變這種壞習慣。「你是有意幹的嗎？」兒童會舉起首來。「你知道這個能擾亂全班嗎？」「知道的，先生。」「你不再幹那些事情了嗎？」「是的，先生。」

我覺得這些兒童，未到一年訓練，除了少許例外，便能完全誠實、自助、和合作。因此我們便見到克柏屈的論斷如何真確：品性確是我們習慣的總和，這些兒童可以說當初因為習於不誠實，所以結果便有不誠實的品性，後來因為習於誠實，所以便有誠實品性的結果。同時亦必須說明：大多數這些兒童都有誠意受教育的，和有興味讀英文的。

假如品性是由實際動作養成的，和我們是喜歡學校做一種陶冶品性的環境的，那麼，我們跟着便須使學校成爲兒童有機會應付情境，和有機會跟着自己意志來下決心的一塊地。因此，新學校便設法滿足這種情形，和多給機會爲那陶冶品性的決斷。他們採取的方法已有些在前數章敘述過。

我們試一回想，便可看見新教育各種不同的特質是互相連結的，我們很難實行新教育的一種原則，而不同時實行別種原則。例如，除非兒童已能在他們的學校工作裏覺得興趣和快樂，否則必不能運用那些新學校特有的自由；又除非給兒童以創造的機會，否則兒童的個別發展必難成功。同樣，新學校裏的品性陶冶，顯然不是教育者一種單獨的作用，存在課程之某部分內。他實應使全日、全週和全月的課程，變成一種道德生活的訓練，充分給道德行為以經驗的機會。

班堡澤 (Barthelme) 博士在新教育與品性教育一書裏說：「因此新學校的第一種作用不是教授算術，亦非言語、讀法和這類的事物；他實是教兒童學習製造、實做、創造、生產、研究，及合作地與同情地共同生活。」

在一間人數過多，過於重形式，和過於制度化的學校裏，他的道德講授、練習、讀物、或訓條，無論如何精良與能充分利用，其能供給兒童以發展品性的機會與環境，永不如那些新學校那樣好，因新學校每班只有少量的學生，但有多量的運動自由，有富於柔性的課程，有他們的團體設計，有他們的自治會，有他們與家庭間的密切合作，有能

使他們集中能力於學生人格的缺點上的兒童研究與適應。

在新學校裏，人格的發展比課程重要得多，即品性要放在知識之前，而不論新學校其他的好處。我們亦須承認這種學校，確曾培養出優越的品性：堅實、自信、合作、有社會的德行的品性。

馬立屋脫(V. E. Marriotte)爲宗教教育的著名人物，曾在宗教教育雜誌裏贊頌新教育者的品性訓練工作。他說：「新學校確是實驗的。他們不是由一種預先想定的品性開始，從而望兒童去適合這種品性。他們只將學校日常的問題放在兒童面前，盡力使這問題的涵義清晰，然後交托團體來判斷。他們不承認我們流行的行爲標準爲道德發展的最高點。他們要找尋一些更好的東西。他們希望要發揮各種力量，使能養成一種個人，較現行學制所養成的更仁慈、更和諧、更有創造力。他們所信賴的方法是：一種自由和勇敢冒險的辦法。他們相信：道理不是一些已經珍藏在金碗裏的東西，而是一些要待完成的東西。」

四

現代職業界和事業界中，總將品性放在才能之前，作為僱聘和成功的條件，不諧協的天才，在許多種事業裏，是不需要的。今日全世界人類，都現出一種可憐的破裂，原本人類的能力，可以保障自己有一種高度的成功的，只因他們缺乏社會的品德，到了這個地步，所以他們出了學校以後的事業，即就其外部的成功而說，已顯出一種不斷的退落。

近代的工業，為欲得到那種最正確的共同工作，所以他的銜接非常緊密，因此合作的能力是必需的。坡特 (A. POUND) 在大西洋月刊裏論近世工業中的人性的要點時，有一段是關於理想的僱傭資格的，他說：「不問其他，只求手足筋肉之力的僱傭，現在再沒有了。僱傭的選擇，人人都要以品性為基礎，以受僱者能否適合那些要求穩健和可靠的工作為準則。工作是依靠人來做的，但依靠能做這種或那種特別事物的人還少，而依靠他的善意和他的熱心盡職來做的人實多。」

教育已擴大他的範圍，明顯地含着發展社會的福利，以為他一種對社會的責任，在公共幸福基金團 (Commonwealth Fund) 領導之下而工作着的一種委員會報告

中公開地說：「從廣義說來，教育這件事，是與思想的習慣、感情的反應，以及行爲等的發展，特別關連的。這些發展，都爲造就合作生活的基礎。」

因此，在個人方面，最重要的是學習控制那些自大、自利、和自私的趨向。在一元的宇宙當中，人類和天地萬物，都受着唯一的運命與勢力所統制，早無餘地可容自私的野心與武力。那些自私自利的心懷詐騙與野心的人，遲早終歸崩壞；不然，這個一元的宇宙便即變成一個互相侵凌的無主世界。命運如何利用個人自私的能力達到他的目的上；他將其中好的抽取到來，不好的放在一旁。只有那些自謙的、和諧的、合作的個人纔能在能使各方諧協工作的法則爲基礎的世界內，永久的生存與繁榮。

其餘對社會方面，我們豈不知發展兒童這種社會的、服役的、和不私的品質是很重要的嗎？在過去的期間，世界也嘗在於因個人私鬪而造成的進步當中向前走着，然而他跛着腳，走得怪可憐。他常做着那些爲國家或個人的自私自利、互相鬪爭、和私人野心結果的戰爭犧牲品，所以這個世界必須找出一種較好的基礎來，建築牠的文明及文化，否則牠決不能免去那些最易用今日發明的殺人利器去戰爭的大危險。

所以新教育培養社會品德的努力，實是一種精神的努力。他直抵人類的精神本質與目的，而訓練出一個較好的社會。他能助兒童發展道德，比較祈禱和說教還有效。他能產生一種能融會全部教育歷程的優美精神與環境，和能指出一條唯一的途徑，走向品性去，即走向那處於精神高貴的環境中的日常習慣去。

哈脫夢 (Gertrude Hartmon) 把這個意思很好的概括起來說：「民主主義社會之將來，要靠着學校的社會化；當學校變成一個實際團體，使兒童能於生長年齡，學得善於反應社會，當學生樂於解決社會問題，當課程內容是由廣義的社會解說所充實而成爲豐富，那時我們就可希望創造一個能指導社會的變遷，而不爲社會的變遷所壓倒的社會了。」

第六章 解放創造力

「假如學校不能給兒童以一些比起兒童能在世界各處尋得的更多的活潑經驗，則學校對於他的時代決有一種有效的要求。」

——W. Franklin Jones——

兒童的自然姿質與能力，可以由壞的教育加以制止嗎？幾年前，在一個我常探訪

的家庭裏面，有一個八歲的女孩子，她富有天才，能爲自動的與創造的繪畫，及奏鋼琴。她那時候沒有入學校，只在家裏養育，讀很多書，她在繪畫中及音樂中，依着她自己獨有的方法去發表自己的意思，和享受自然界的各種美麗。當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能因着她的靈感繪畫，迅速優美。有一晚，當我讀着我所著的敘事詩裏的風景時（那是古印度的風景）她便坐在家裏的地板上繪畫起來表現這些風景。經過一小時半，她繪了八幅畫，都能很神異的捉到詩中的精神，而詩裏的東方的情境，及連帶說及的東方的衣服及面貌，亦繪得異常真切。她怎樣能夠學得寫東方主義的畫，和怎樣學得發表那描寫一個東方神人的作品，那是很難說的；因爲我永不曉得，在生命中我們究有幾許創造的作品來自潛意識的記憶裏，和幾許來自靈感的源泉裏。

這個女孩子在臨時彈奏鋼琴當中，成就也絕不少。有一天，我嘗加以實驗：我要她奏「這是一個天氣和暖的，和陽光普照的正午；田野中充滿着花卉，而蜜蜂營營其四周，」這種立意，她却演奏得非常妥貼及優美。我那時便換轉一種與此極端相反的樂旨，要他奏「海上起了大風雨，海風怒號，白浪滔天。」現在她的演奏當中，立即顯出一

種狂暴騷動力的性質。

這女孩子這種適應自己獨有的方式的能力，即這種真正的創造能力，很迅速地便由下面那種歷程摧殘盡了。緣因她的妒忌的鄰舍，看見她自由到各處玩耍，而自己的孩子們則要到學校裏，於是訴之於教育局，強逼她入學校。一個老婦人來她的家裏居住，教她學鋼琴，從她以為必應研究的地方教起，到我再見那個女孩子的時候，經已過去四年了。她現在再已沒有這種創造的異蹟，如其在八歲時所有的。她現在繪的畫與奏的琴已得到能手的粗劣的品質。她是聰明的，靈敏的，然而她已喪失盡了猛如火山的創造力；而這種力，確在其未受教育制度縛束的兒時曾經表現過的。

在我們美國一間最著名的大學裏，最近有一個詩人學生，許多愛讀詩的人們都深識其名的。這個詩人學生的名字，和這間大學的名字我不好說出來，因為這段意外之事是由該大學一個學生秘密告訴我的。這個詩人似乎因缺課太多，所以被召到學長跟前，告知他以今後決不能繼續這樣缺課。然而他說：「假如我仍留在這裏的話，我

就只能這樣做法，當我創造的心境到了，我必須寫的，上課不上課是管不了的。」學長說道：「好，如果你繼續缺課，你不能留在這裏。」這個少年的詩人，他的名譽或許還未達到學長的耳朵裏，所以現在只可退學。大學中久聞該少年詩人的聲譽的學生，聽見這種情形，認為是一種絕大的損失，便將事之始末詳呈學長，結果學長便允通告這個少年詩人，他此後回校肄業時，可以完全自由發表他的創造衝動。然而那時候已太遲了。他的心靈已轉為反對這制度和規條；他渡海到倫敦，在這裏寫詩，因他深恐如再入這種著名的大學讀書，說不定他的創造工作會過受妨礙。

這樣的例證，已明顯地表出天才是很少出自這種學問機關的，因為流行的教育方法，一方固然供給很少，或許沒有機會來為創造的工作；在別方面，他們且會因太多傳習和規則而麻木了那些創造的能力。

「父母和學校不能創造天才或高才，他們只能使他喪氣，或摧殘他。他們自然亦能鼓勵和發展他，這一種事實，我想是今日每一父母與每一教育者都知到的。」柯克（C. H. C. K.）最近研究生於一四五〇年至一八五〇年的天才生活，研究的結果寫成

三百天才的早年精神特徵一書，由斯丹福大學刊行，內面就實說上面幾句話，他研究各種人物如佛蘭克林華盛頓哥德洪保斯德（Humboldt）的士累利（Disraeli）等等的兒童生活的結果究竟表明什麼呢？第一，這些天才在兒時所有的特徵，極似今日的高才兒童的。第二，父母或其他人物的知識興趣，類能供給過去的少年天才以必要的發展機會。由此類推，我們今日天才的兒童，亦應有多量機會來尋豐富文化的經驗，和來為創造的發表，使其結果能充分發展他的天賦才能，以為他們個人及社會全體之利益。至少不要當他在校時，為學校重重規則所妨礙，或因學校不能以方法去適應他們的需要，而至將他們逐出學校系統之外。

如果那些錯誤的教育法，會逐出天才於校門之外，那麼這種方法對於能力次於天才的兒童，會受到什麼影響呢？是不是創造的姿質所凝聚的兒童，我們就稱為天才，並且我們相信這種姿質也有多少分散在每個兒童身上？是不是這些在我們校裏很受束縛？我們現在的學校制度，或許意欲將所有兒童提高到中等的的能力，而這樣模仿來產生一套庸才，這其實是把種族裏的天才當作愚人看待。

我們今日在教育裏正站在歧途之上。一方面有一種古老的形式主義要將兒童看作一個智識的機械，行爲的規律純自普魯士引伸而來（其中自然亦有優點）在別方面，則是一種新時代的精神，特別是新世界的精神，他要把教育憑着機會自由創造性及發表，去做成開發能力和發展本領的一種歷程。第一種方法是從外而內的，他要根據一種固定形式，去製造兒童的心靈。第二種方法是從內而外的，他設法從縛束解放兒童的心靈，和鼓勵他及暗示他去開展。

教育界現已開始感覺這種活動的、悟性的和創造性的衝動了。這些新學校正是集中他們的工作在兒童的創造力上。

這不單是一種趨於自己表現的運動，這更不是一種對近代個人主義趨向的降服。這原是直接改革教育本質與本性的一種努力，使教育根本地成爲創造的，而非接受的。在無論那一種努力領域裏，兒童創造力都是要受提醒的，他的影響是從兒童各種活動出來的。

美國俄勒崗(Oregon)的波特蘭(Portland)音樂教育學校校長卡的(Cady)氏說：「創造的思想最主要的作用，不在於他『自己表現』的實際當中，而在他對個人天性、能力和內容的默啟當中，和在他所給與兒童真能發現自己的機會當中。這種存在各種思想問題裏的創造精神的默啟，就是他能應用到個人一切觀念（全心內容）的表示。所以無論什麼問題，都可以和應該給醒覺的創造精神役使的，而他的影響，亦必能在兒童的各種精神活動裏感覺到的。」

這個青年人的鼓動者，和成年人的啟發者門茲(Hughes Mearns)所著的創造精神及其在教育上之影響（見一九二六年四月進步的教育）說：「凡是我們留意青年生活，從新學校所給與他的培養精神的機會當中而逐漸生長，由倚賴他人的無把握到有獨立的能力的生長，必定確信有一些比優美產品更為重要的東西，就是教育上新自由的結果。人格在這裏是發展的，其發展之有把握，不啻如乾的種子落在濕地上。品性在這裏是出現的，跟着品性而有的一種智識，他的判斷是這樣確實。故直能使我們教師靜聽與注意，而不須命令與教授，嗜好如我們所有，永沒有虛偽的自信力。」

可進到精神裏面，而且可在這裏繁榮昌盛，因為這種爲舊教育所公認的工具，恐嚇與迷惑，永不能使兒童取得自信力的。新的飢慾起來了，此時新的慾望和新的滿足，便是教育的食品。創造精神的培養是爲着大藝術家、大學問家、和大思想家而存在的，他是一種優越人物的藥方。種族領袖的歷史，差不多就是不藉學校而能養成創造精神的人的歷史。我很奇怪：爲什麼我們不留意這種事情呢？這種較新的教育，正是學習去應用這種精神的神奇力量，好使個人能教育自己去滿足一切重要的生活需要。近代這種尊重兒童天賦的才能，和以同情來幫助發展的態度，自應溯源於盧騷。然而自一七六二年愛彌兒出版時候以至於今日，無時無人不抱持這種根據牢固的態度。裴斯托洛齊、福祿培、海巴脫，對於兒童自由的理論與實際之潮流都各有其偉大的貢獻。我們美國的帕刻、杜威、喜爾諸人的工作對於建設一種活動的、和發表的教育方式，使滿足兒童的需要，這也有極大的影響。亞丹 (John Adams) 說：「兒童已確實證明走進他自己的王國了。」

在確已看見兒童本性是一個藝術家和創作者的學校裏，他們的工作便圍繞着

兒童內部所有自表的慾望來進行。兒童自表的慾望在這裏不特不受阻礙，而且常受鼓勵與激動。有一個可欽仰的父親嘗致一信到一間進步的學校裏，那信正可代表現代父母看見這種教育的價值。那信裏這樣說：「我們深深的贊美學校去年爲着我們三個兒童做過工作。這些在一個善選教材的環境裏而有的愉快的自由之運用，及巧妙的刺激，曾大大引起他們濃厚的興趣，和發展他們獨立的和創造的活動能力。我們特別喜歡你們能注重每一兒童的藝術發表，不管他們的年齡及特別嗜好若何。演劇、紡織、製模、繪畫、園藝、建築、奏樂、唱歌、跳舞，等等，所做的一切，能這樣擴大兒童的視線，和這樣充實兒童的享受生活的能力，我們亦很喜歡他們能捉摸得他們於每日進程中所碰見的各種事物的意義。我們或許最贊賞的，就是你們均能愛好和了解給與那三個極端不同人格的個別發展。我們現在看見每一兒童都在其特別人格之下生長着——本恩生長在興趣及品性中，約克在自己人格的固守中，而彼得則在觀察與綜合中。」

幼童的創造慾念自然地發表在手工藝裏，及製模、繪畫、音樂、詩歌、演劇、跳舞裏。故新學校無不設備許多用具與機會使各方面都能循着來發表。在發展這種藝術的方式當中，新學校并不採形式的方法去教授那些專技，他們只鼓勵兒童自由發表自己；在需要中，專技自會完成和表現。

兒童在這種藝術發表的自由方法裏，曾幹過一些神異的工作。那些最驚人的和最爲公衆所認識的，或許就是維也納雪材克（Ciznek）的兒童所做的工作。他的展覽曾經在美國各處舉行過，而且曾用各種視覺，證明兒童當自由創作他們自己所見到的和想到的東西時，他們究能些什麼。雪材克的方法就在請兒童入他的工作室裏，使他們看他自己及他的學生創作來感悟他們，和使他們的創造慾念自然發生、生長，進而自己表現。當兒童感覺有專技之必要時，就給他們專技的訓練。這種方法最好的證據，就是他所產生的結果。他的兒童所做的稀罕而富於自動品性的藝術工作，當其在原來的作品或翻印的作品中展覽時，曾給美國藝術教學以絕大的影響。

這裏或那裏的其他藝術教師，亦嘗做同樣的工作。在美國，兒童嘗成就許多極著

名的創作品。有一個最昭著的教師，就是孟雷味脫（Mangravitte）他最近幾年是與華盛頓京城的蒙台梭利學校和普陀馬克（Potomac Park）學校的兒童工作。五歲、六歲、八歲的兒童，在他的鼓動之下，確成就過同樣的效果。

孟雷味脫的幼童一些驚人的樣本，和其他兒童的許多藝術創作品，在美國新教育聯合會所刊行的從藝術去創造發表一書裏可以見到。這本書是時代造成的出版物，是兒童藝術創作的第一次的搜集。書裏的圖畫極爲美豔，最能表出兒童從鼓動所能幹的，遠優於從古板的練習裏所能幹的。

我永不會忘記佩特里在他的精巧的、有禮的、聰明的微笑中，繞着他著名的布龍克斯（Bronx）第四十五小學的藝術室手揮指畫着，和向我講解兒童的繪畫。他指給我看貼在牆上的和在紙夾裏的各種美麗的創作的貼紙，說道：「這就是兒童所曾做的；後來有些人要我們學校注意我們不採用傳習的藝術教學法，我們那時就只得採取紐約公立學校所指定的計劃來教學。這是一種石膏製造品」他說這句話時當用手一揮。

這種石膏製造品的教學方法，不用說是不在新學校裏通行的。

在別種藝術發表的形式裏，如在剪紙、製模、彫刻木工、各種工藝，兒童亦能表出奇異的勇敢、敏巧和創作力。這種工作嘗在新教育聯合會的年會中陳列過。如將一間新學校的這樣的具體材料來研究，或參觀他們的製作場，比起言詞上的敘述時，更能認識兒童這種潛伏的能力和這種創造的教育法的價值。

四

在音樂家的教學中，也有些創作的方法可以尋得的。科爾曼(S. Coleman)曾發見一種教學法，是要使兒童經過一種音樂發展的要略，一如他在人類歷史裏所發生的。他們開始用那種最簡單的器具——鼓來學習他的音節。其次他們學習木笛、竹簫等樂器，再其次的則學彈弦線的樂器，這種樂器可以古希臘的豎琴為代表。此後再學拉絃線的樂器，如五弦琴等——學過以上一切樂器，便可開始學習那最複雜的，和較近代的樂器五線琴。兒童自己設計和製造自己的樂器，他們學習合奏。我們看見一隊六七歲的小孩子，很快活地和很誠懇地用簡單的樂器來合奏，那是很快樂的。

關於鋼線琴，佩特里曾在他所著的兒童問題裏提議：兒童開始學習之理想的方法，在於未為專技的訓練前，要得到創造之樂。「愛好音樂的兒童應有一些音樂研究室之自由。兒童未能奏樂之前，以為定須經過長久的練習，這樣觀念，必須破除的。兒童不是這樣子的。據我所識的最好的音樂教師說：兒童絕不必如此。假如你許可他的話，他即能到鋼琴旁，奏一曲，演一節。這種專技，與藝術的苦工，一當兒童領略到音樂的愉快，即能迅速學得。」

教兒童學鋼琴之一種新發明的方法，就是用一種電光球在琴鍵之後照耀着，兒童可跟光之指導演奏一曲，而不須顧及任何音的符號或樂譜。這種樂器可使兒童自始即能演奏真的音樂，和享受發表的快樂。據支加哥音樂新聞的意見，這種樂器對於兒童音樂教育曾有極好的結果。

關於音樂最有趣味的，就是在許多新學校裏，兒童實行自己製作簡單的樂譜，這種創作發表的機會，在音樂教育裏為重要的元素，正如方法在繪畫藝術裏為一重要的元素，因由他能使感悟，創作力，與美之發現，是在取得專技之前而有，而且足以鼓動

去取得專技。

西摩 (Harriet Reynolds) 在他與兒童的工作中，述及音樂的創作事情說：「我們所犯的錯誤就由我們不採用一種最簡單的方法去陶冶創作的的能力，因為兒童無論如何愚笨，亦總可以提醒他內部所有的創作力的火星，這是很容易發現的，所以現在的音樂教學已起着大變動。我們正從機械到創作之間各處擺動着。」

音樂的教學，如何適應那種改革一切教育的自己表現的動機，伊里諾斯州 (Illinois) 格羅夫 (Dorothy Groves) 初級小學敘述最有生氣，他說：「我們初級小學的樂隊，是從兒童特別喜歡演奏某一種樂器所表出的濃厚興味而來的，他們到小學第一班時，或許更喜歡有節拍的跳舞。樂隊的發展絕非強逼的，然而學校亦須用力設備一切材料，以供應兒童在奏樂能力進步中須使用一些更困難的樂器的要求。大約有三種直接的源流，能貢獻這樂隊的興趣及發展，用教材的話來說，這三種源流就是印第安人的生活，仙人故事，和原始人類。」

在團體歌唱教學中，塞里脫 (T. N. Smetana) 曾成功一種充分使用感覺與發表

的方法。他說：「在兒童的學校生活當中，靜聽應該是音樂課程中之一部分，兒童在初年時，先教以簡單的樂曲。附以演劇，進行，跳躍，跑走，等等，作為練習音樂符號之基本。」如用這種方法去學習複雜的符號，那麼，讀音樂譜就不會有多大困難。皮佛爾（Peveral Ogbey）日校跟着這種音樂的教育法，在讀樂譜中，和在合唱中，都收得很好效果。

關於在兒童生活中的音樂價值，塞里脫又說：「那可以證明音樂是活動的一種，全校兒童可以參加的，同時又可以創出一些美麗的事物出來的。牠好像戲劇一樣，不過少去一種優美的身體活動，然而却增加精神的優美。牠要求一種最正確的團體工作，牠是不自私的，引起同情的，創造愉快的，解放心靈的，及諧協身體的。有什麼學校能忍心去忽略牠呢？有什麼學校能給與兒童一些較少於牠的全體的事物呢？」

在新學校裏，音樂與藝術在教育上有這樣的重要，故他們絕不被貶謫到課外活動的範圍裏。在英國和美國的統計，都表明音樂和他的美術價值，是最能刺激精神的。克雷波因（R. W. Claiborne）在兒童雜誌一篇文中說道：「音樂的研究，特別能發展下面的才能：就是發明，記憶，思想的敏捷，正確，明瞭的觀察，心意的集中，廣大的精神把

持、比較與分析的能力。除此之外，還可加上下面的情緒性質——忍耐、自制、優美的感情、好的嗜好、影像、尖銳的感性、感官的、道德的知覺，而最重要的就是那些能戰勝困難所必需的意志力。

五

在文學的藝術裏，英美學校的年幼兒童，已由他們的創作品，證明創作的天才如何普及。好的教師，很能鼓動和幫助每一學生，和所有他的學生，為創作的發表。那最善於引起兒童天才的兩個人，就是英國劍橋拍斯學校 (Pulse School) 的庫克和休斯門茲 (Hughesmeans)，後一人與紐約城林肯學校兒童曾做過絕好的工作的。他們每人都嘗將解放兒童創造精神的工作寫之成書——其一著拍斯劇本，其他則著創作的少年。此外更有一種在學校兒童間極為通行的詩集，名為歌唱的青年 (Singing Youth)，那是由曼特西耳 (M. Mountsier) 收集英美兩國最好的兒童詩歌而成的。這書實足使我們加以極大的注意。

這些教師所用以保障兒童詩歌發表的方法，極像雪材克用以鼓動藝術衝動自

由發表的方法：有一個極豐富的詩歌材料的背境供給兒童。兒童可與詩詞共同生活許多時日，然後始暗示他們自己創作。他們此時的意識中，如浮現着美麗詩韻與情感，和既有要寫的觀念，那麼他們自己便創作。如在一個好的情境之下，有天才的教師加以指導，更有班中同學之鼓動，每一個兒童都可弄出一些有詩歌價值的東西，有些兒童竟能寫如畫眉鳥歌一樣自然的抒情詩。

在我們的學校裏，在着這樣的一個教師指導之下，一個七歲的兒童曾以「雨」為題作了一首詩，此詩曾選入歌唱的青年裏。

「雨」

呵，落下的溫柔的雨，

呵，真要說給我知道：

你喜歡落在這裏，

豈不是去充滿那些乾涸的小溪，

和灌溉那塊口渴的大地？

然而難道你絕不悲悽，

拋離去了你的雲家，

和所有你的姊妹兄弟？

另有一首詩，是同班一個六歲的女孩子寫的，我更喜歡這一首：

「一個蝴蝶」

我是一個蝴蝶！

在含蓄的花上處處飛，

試一回思！

我一個蝴蝶，

原只從一個棕色的，和黃色蛹繭，

變作一個蝴蝶！

現竟能憑着那翻天的豔翅，

要到何處我便飛到何處。

在一九二七年新教育聯合會會議中，曼特西耳敘述一間初級中學某一教師採用鼓動兒童爲詩歌發表的教學法，讀者亦必覺得很有興趣。站在幕後看看的。「這個教師有時用一個能惹起一串思想的普通字暗示出來做中心問題，例如「損失」這個字，舉出一種顏色，如「朱色」等等；或奏一節寫景的音樂如杜馬（Dumas）的「魔術的學徒」或拉而（Rallo）的「母鵝」等等。一切這些都可做成功一首很美麗的詩。在這教師所教的一班中，動作與節拍之研究，都證出有許多暗示的。在讀了史蒂芬孫（Stevenson）和洛塞諦（Rossetti）及其他作家關於「風」的詩歌之後，兒童便嘗試解釋各種不同的風，從微風到颶風。要使這種動作顯現明白，有些便示之於跳舞，有些便繪之於圖畫，更有些擺動他的雙臂。他們最後便將這種動作寫之成詩。下面就是一個七歲的兒童關於微風寫的韻詩。

「風」

我正站在窗檻前，

我正靜默像一隻鼠；

我等候着這些風，
來繞屋而歌唱。

我不想乳母來看我，

她將要說：「呵，你將受寒了！」

她正在廚房裏煮茶，

所以我覺得如此勇敢。

微風說出仙人的故事，

說出有趣的妖怪和矮夫，

說出用草織成的地氈上，

魔術環中有仙女來跳舞。

說出仙魚游泳各處，
在樹林中閃光的水裏；
又說出小山岡上的小屋，
有鬼涼傘來做頂蓋。

「爲什麼你站在窗前呢？」

當我喝茶時，他們這樣問我。

但我永沒有說出這些風，

曾經對我輕言細語。

兒童作詩時須有多少模仿，那是難免的。所有的藝術家，都這樣的來開始他的創作事業。美國兒童所寫的詩，大都是自由詩，或則沒有一定節拍的詩。現將與此相反的，而爲一個十歲的英國女孩子所寫，刊在英國兒童詩文選集，名杏花集的內面一首詩，

引到這裏來，那亦很有趣味的。

「當星兒在靜寂的天上」

星兒在天，

夜靜無聲，

鶯兒來唱，

小山岡上。

仙女亦來，

樹間舞唱；

但靜默的星兒將照耀着

高在一切這些之上。

這些細小的朋友齊來跳舞，

樹木在微風中搖來搖往；

但星兒常常

照耀在一切這些之上。

這些詩及其他許多的兒詩，都確能使人相信如門茲在進步的教育一篇動人的論文中所說：「兒童說話，自然而然地在一種我們成人所慣稱爲「詩」的形式裏。那因爲他們的心完全注在他們內心的真實事物，言語原是本能的，故只能得到他們附帶的注意。他將言語形成一種有意義的形式，正如別的藝術家使用他們的用具，很迅速地，而不須擾及在他們之外的標準的思想……然而很不好，就是兒童早年的「詩」，其不學而有的自然性只在有耳去聽，和有判斷力去容許的兒童當中繁榮着。只有在一個適宜的環境裏，從不斷的練習，藝術者的自然性然後生活着。」門茲認定：每一兒童都自然地是一個詩人，一個藝人。這是圍繞着他的成年人規約的世界後來毀滅他的藝術性的。

六

戲劇在新學校裏，佔極重要的地位，這無論是劇之創作，或是創作劇及他人劇之表演。在這種創作活動的範圍裏，芝加哥的帕刻學校及其他學校，每採用團體合編的方法。這樣的一種作文方法有一種利益，就是牠能供給團體各人以創作工作的愉快與練習，而免除由各學生間競賽而選擇的弊害——這種由競賽而選擇的事情，新學校是極端認為足以產生欺騙和自私的壞結果。合作、服役、爲團體需要而犧牲個人的慾望，那都可在這樣的設計裏很好地顯現出。帕刻學校許多班兒童用這種方法所創出的戲劇，都曾付印發表。這些劇極短小，極簡單，多是圍繞着希臘神話，中世紀的傳說，或文學的知識各種中心問題來構成。有些題目是洛賓和德 (Robin Hood) 是由第八班依據匹而 (Howard Pyle) 所著的洛賓和德的愉快冒險而成的；又都格勒斯之歸來 (The Return of the Douglas) 一劇，是第八班依據湖上夫人 (The Lady of Lake) 而作的；兒童的樂園是第五級根據霍桑 (Hawthorne) 的兒童的樂園而作的；愛德斯之歸來，由第五級向部柝 (Butcher) 及耶 (Yang) 譯的奧德賽 (Odyssey) 採取編

成。

兒童不特利用現成的材料來這樣寫戲劇，他們也常由一個兒童創作戲劇，由團體共同表演。

在演劇中，戲情的發表對於兒童情緒及美感的發達很關重要。在許多新學校裏，這樣子的發表，絕不同學校戲劇的普通形式的發表：第一不同之點，在他們每個兒童都參加這種活動；第二，表演動作在兒童意識裏自然而然地流露而出，絕不同由別人立定方式，要兒童勉強來學習發表。新學校演劇的主旨不在其能表演完善，而在其能表演在每年的課程內，學校內每一兒童都應有一次或數次機會為戲劇的發表。

關於自抑的、古怪的、畏羞的、不善發表的兒童，這樣一種演劇經驗的效果是很顯著的。新入我們學校的，有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初次演劇時，非常拙劣，她只當一個僕役的閒角，然而也驚惶失措，將一個滿載檸檬汁的玻璃杯墜落地上；不過到了第二年，她已能在華隆勒的兩個斯文人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一劇中充當主角，而且

演得非常文雅，真切，與完滿。同樣，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在第一年，什麼劇中的角色都不能充當，但經過一年有半的經驗，他表演凱撒（Julius Caesar）時具有這種的想像力及描寫力，居然能使觀者潸然下淚。在我常與兒童演劇，歷九年之久，上述各種及其他許多偶然碰着的事情，便使我確信：每一兒童都有一種藝術家的靈魂，並且那能使觀衆驚奇的，常非那種聰明兒童之特別完善的表演，而爲那種平常兒童之確實優美的與藝術的表演。

七

所以，假如任兒童幹他們所愛好的，他們就常表出一種只候機會來爲藝術的發表的潛伏創作力。

在有韻律的節奏裏，我們亦可見到兒童心靈這種同一的力量去形成各種節奏，——即形成那些使人覺得最能挑起產生美麗的生活力之流質的節奏。

在一切的新學校裏，節奏在課程中總成一種全體不可少的元素。用作發展發表，調節文雅的一種方法。牠對年幼兒童之有益的效果是很直接的。因節奏的發表既在

人類所有的藝術形式中是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所以牠對於幼兒算是一種最自然的和最適合的美術形式和人格發展。然而牠的作用絕不限於在幼稚園裏和在小學裏，目的在要使兒童完滿發展的學校當中，某種形式的節奏，是繼續不斷的存在課程裏的。

在一些學校裏，到了甚或超過青年時期的男孩和女孩，一樣地幹過很有意義的工作。本書作者曾在紐約的城市鄉村學校 (City and Country School of New York) 裏，看見這裏有一種極巧妙的，和極適於十一二歲兒童的性質的節奏。第五年級有一組兒童臨時配以音樂演奏驛車之停止和保衛。在我們自己的學校，節奏的教師要從跑馬、印第安人射箭、打棍、手索，等等之節奏練習，來取得兒童之適當的反應。在格林維基 (Greenwich) 之厄德飛華特 (Edgewood) 學校，及非耳和普 (Fairhope) 之有機學校，青春期後的兒童總愛舉行英吉利的民間跳舞，這是在累堡德 (Raybold) 指導之下，而表出沙普 (Cecil Sharp) 的傳習的。

我相信節奏為人格發展之一種主要的方式。在個人或團體臨時舉行的跳舞裏，

有許多機會來創作和做戲劇的發表。這樣工作足以喚起想像、象徵主義及其他之稀有的創造能力。兒童的面容或許永沒有這樣美麗，有如他當他對着音樂去發表觀念的時候。然而如果面容能表出心靈，那麼，當心靈果已力將自己不可見的形式形諸外面時，面容之表出心靈自更真實。

身體候着節奏而為發表的活動，不特於審美教育有極大的影響，而對於神經與心理之發展亦有同樣重要的影響。假如一切兒童都受節奏的訓練的話，我們大可懷疑：後一代的種族會不會全異於目前的種族。

八

甚至在遊戲裏——或者我們可以說特別在遊戲裏，兒童是創作的。遊戲沒有縛束的形式，也沒有專技或什麼已成的方式，必須兒童適合牠纔能發表自己者，在遊戲中，兒童有絕對的自由去表現自己。其次在遊戲中，兒童只滿足他們自己的慾望。因此在遊戲中，兒童能表出創作的品質，如想像力、悟性、發明、豐富的內容，對付困難的毅力，應用現成材料去適應內心的可驚能力，比從任何一處都來得明顯。如我所敘述

過，一羣兒童正在外間臨時造一營幕。有一兒童忽然起了一個觀念，後來竟爲全體所採用。最初營幕用棍作孔，其次在後面每一優勝之處作起戰爭模樣，再其次有一紅十字隊出來，昇一以兩根棍及一件雨衣製成的牀。這時候忽下大雨，這場大雨不特不能阻止這種設計，而且增加創造的能力，使其需要遮蓋。雨衣盡量舖在椅上，以爲臨時之遮蓋。但在下次動作中，便想有一種更久遠的形式，就是要建築一個木架，將營幕、雨衣、背囊等物張掛在上面。翌日，一個兒童帶一小狗的帳篷回來，把他樹在院後。他們在何處及如何完結這宗事體呢？這樣子的一種想像遊戲並沒有外部目標限制的。這種事實自有他的美麗，這是真正創作的本質，他的結果絕不是在開始可以看見的。

九

在一切這種方法裏，新教育者便在課程內，而非在課程外，去準備兒童爲創作的發表。學校被看作一個兒童的家庭，滿充美麗、高貴、和偉大，又被看作一所工場，一間工作室，俾那些是各個兒童之心的藝術家，能在這裏愉快的和有青年朝氣的創作中發表自己。這樣的教育家確已和富士本一樣看到學校不應用爲「一種訓練和教授的

方法，而應視爲一塊地，兒童的生活力能在這裏解放，和他們的心靈能在該處的自由中充分生長。

第七章 我們要將兒童造成一本能動的百科全書嗎？

「教育的對象應在於教授心靈如何認真地和經濟地去行動」

——Henry Adams——

一個受訓練於舊制度下的新教師問道：「你要我將各州的首府教兒童嗎？」

「不，地圖集有什麼用處呢？每家人家都可用購一張戲票的價錢來買地圖集。那不是將沒有用的材料去混亂兒童的腦子麼？」

「歷史上的年月又怎樣？」

「等兒童合起來弄一張他們以爲應要記憶的單子，然後去記憶那些。」

「然而他們將要選擇一切他們希望知道的年月嗎？」

這個教師的疑問，便使我們遇着近代教育一條最流行的問題：一個兒童應該曉得多少東西呢？一個兒童應該得到多少東西纔稱得上受教育呢？當他在小學、中學、大

學畢業時，他應吸收多少分量的知識，和什麼種類的知識呢？

教育者與常人關於這條問題永沒有完全同意。因爲一人認爲主要的，別人則認爲較不重要。老實說，兒童是不能學習和記憶一切事物的。今人常說：一個人將其終身時間放在一門特殊的研究上，也不能盡量通曉牠的。因此，究竟多少知識，我們纔認爲是一個受教育的人所要得到的呢？

自從愛迪生（Edison）將他的非常的問題詢問世界，那條「你知道什麼」的問題便流行一時。成人一如少年，都要洗刷他們的知識，試去得到那些通常各人所認爲重要的運用知識，卽是足以構造文化的知識。

然而教育是不能用這種名義來測量的。他不是一種取得事實的歷程。他只是一種取得能力、技巧和活用學問之工具的歷程。許多沒有關係的事實究有什麼用處呢？他們只是一些知識所由造成的材料，在某種限度內當然是必要的，惟絕不是教育裏最主要的事物。那些肯定、估價、和運用事實的能力，比較更有價值。換言之，任我們教兒童思想，而不去強迫他記憶一團不能消化的事實罷。

在中世紀裏，書籍稀少，故當時的學者不得不將自己做成一個能動的知識辭典。這些知識，是由他在世界上所能接觸的幾個圖書館裏寶貴的手抄中看得來的。這些記憶的和保管的能力，因此成爲一個學者的必要條件。這個時代的一個有學問的人，就是一個吸收許多書籍內容的人。

然而自此以後，印刷術已能將各種書籍、雜誌、圖書館介紹到各城市去——而使牠們得由各人隨意應用。那時候再不須將許多正確的知識存放在腦子裏，這時候只要曉得到何處取所需的知識。

太多固定的知識積聚於腦中，那不會阻礙他去回憶、默想和判斷嗎？在別方面，那最分析的、最能集中能力在某種問題之上，循至有所發見或發明的一類心靈，原是很忽於記憶平常的事實的。因此之故，心理學似明顯地表出：如要努力發展兒童一個百科全書的心，那必會阻礙他的思想力爲成功的發展。

然而我們看見今日的學校所進行的是什麼呢？他們充滿了無用的知識要研究、吸取和吐出；他們滿含着在絕短的時間內必須忙速的和緊張的去背誦及口授的一

種意義，他們所有的結果便是禁制兒童思想。

在學習功課的歷程中，兒童很少時間去思想，因為在一種有限的時間裏，要聽講和記憶這許多頁的課本，在誦讀中，亦很少機會用思想，因為兒童方面此時實沒有真正思想的問題引到討論和分析之可能，一班四十個兒童必須於半小時內背誦一課歷史或地理，除了一些敏速的和正確的答案，亦確難有時間幹其他的東西。而所謂敏速的和正確的答案，就是一些由教師認為與課本字數相符而沒有錯誤的答案。

這不是思想，這或許是反思想。試將受這樣教育的青年，與一個在家庭或圖書館閒暇讀書，能細細玩味歷史中的浪漫時期，或奇異民族的傳記，能自由停頓，能用思想，能設身處地深入這問題中的青年，比較一下，我們覺得怎樣呢？所以最近有一圖書館專家演講，說新聞紙與圖書館是唯一的真正的教育者，即是此故。

我們自然不應反對兒童取得一些適當分量的事實，我們能應用的事實愈多，那雖不是互相連絡的事實，我們所得的材料也愈多，可以助我們了解那些我們的和世界上的生活與經驗。如果如上所說，那事實的知識記憶不會阻礙思想的能力，而只是

幫助牠們。

我們可以分別記憶知識和我們所稱道的參考知識。大部分需要的知識都可歸入後一類。決定何種記憶知識是比較最重要，而應教授兒童；其次，又應如何訓練兒童使有尋出材料的專技，這是教育者的任務。匹茲堡 (Pittsburgh) 大學魯特 (W. F. Root) 教授說：事實不應由不求甚解的態度而學習；我們需要變為一個有智慧的不學者；應該允許兒童更閒暇地受教育。這種更閒暇地受教育的可能，在新教育者看來，實是一種必要的變遷，因為現行的教育制度，課程太擁塞，學習太急速和太緊張了。

二

世界知識的總量在近百年來擴張得這樣利害，所以許多人以為實有如山積的知識要兒童領受，然後可視為曾受教育的兒童。現試將今日各人都可接觸的各門知識，與百年前文明人類所有的知識比較比較。宗教學在這百年中出現了；古物學，即是從古代和已經湮沒的文明遺留下來可以了解的知識，亦始自這百年中；在歷史學裏，因為考古學的發現，及最近這個世紀學者的探討，問題亦大為擴張；比較文學不特到

了歐洲文學比較的領域，而且達到亞洲文學的比較；自然科學完全改變了內容；物理學已加上各項氣體、電氣、物質之最後的分析及其活動等各門研究；化學範圍大為擴張，因元子與電子的探討，變為更加綜錯混雜；商業化學及其神異的綜合藝術，在近代生活中亦變成一種非常重要的元素；生物學亦於此期加入，牠所牽涉的範圍廣闊而重要，不但涉及過去生命而且涉及現在生命的內容；地質學會遇見一次海洋的變遷，於是今日的面目絕不是百年前的人所可認識，而地層學在今日人類的知識中尤能增加絕關重要的一頁；社會科學是簇新的，今日的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科學之廣闊的和複雜的內容，絕不會累及一八七五年以前之學生的心思。這樣一路縷舉下去，我們還可說出許多其他極關重要的問題來加進人類的知識裏，要學生必須學習。

我們對於這些東西將怎樣呢？我們應為那些前世紀學者研究得的大量的知識所重壓嗎？我們對於這些知識應變成焦急和煩惱，更從而將這種緊張的意思傳到兒童那裏，驅逼他向前跑，當他脚步鬆緩時，便大叫「快點！如果你要吸收現代的世界和知識，而得到你的文憑，你是不能憩息的。」這纔算對嗎？

說一句老實話，這種緊張和煩惱的意思，全是一種幻覺。我們切不要任何急速、緊張、和工作過度，然而我們相信必能精通今日世界的文化知識。

在中世紀裏，學者每埋怨那些擁塞的課程——說起來亦覺奇異，他們除了文法、修詞、哲學、語言、微小的歷史、微小的數學，他們原是什麼東西學習，然而他何以亦要經過很艱苦困難的時間，然後得到他們當代的文化知識的標準量，在我們今日看來，他們的心理態度確是可笑。然而今日以後一千年，地球上的文明人類當迴顧一下，發見今日的教育文字裏，常常一致抱怨有無限的知識學習時，他們必也要訕笑我們和懷疑我們，此種煩惱究有什麼真正的原因。

三

生活中每一事物都是相對的。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得到一種勻配的知識，識得怎樣將較不主要的事物附屬在比較主要的事物下。

從前有一個神仙故事，說及一人在漫遊中經過一個銅山，這人便很貪心地將銅塞滿他的衣袋。後來行遠一些，他到了一座銀山上，他又很聰明地棄去袋裏的銅，然後

塞上滿袋的銀。當他後來到了金山時，他伶俐到極點，絕不煩惱地和絕不緊張地空去了他的袋，然後將黃金滿滿裝進。我們可將這個故事的意思應用到教育裏。邁進的人們可以明白了。

「什麼是重要」一條問題，在教育者製造課程時，算是最重要的。淘汰的歷程必須具有的。因為我們的袋裏決不能充滿過去的銅或銀，而同時又可將現在的黃金搜集起來的。在教材裏我們必須選擇，必要有最嚴格的和不顧惜的淘汰。

這種教育之重要的需求，已為許多科學研究的教育者所發見。地理、歷史、算術、正為一組有權威的教育者所查勘，看他們何處應受淘汰。編印教科書的人們正留意着這種查勘的結果，和正搜尋這班教育專門家之各種獲得，好印出一些更單簡的教科書，以供應新環境的需求。

不過在數年前纔在一切歷史裏發見，應該取消每國朝代相繼的編法。從前所有美國歷史的編法，都是以各個總統當政為中心，書內一章敘述一個總統當政。我們的祖母藉一些粗劣的詩文之助，能認識英國所有帝后的年月姓字，本書讀者對於這些

詩文或許亦能熟識。今日每一個聰明人都已知道：我們的心實沒有地方來載英國帝后的姓字年月；因爲，如果我們要在世界裏好看些，我們應該包括他國如俄、德、法、意。而且爲什麼以歐洲爲止呢？我們更應學習亞洲和牠的變遷的朝代，如中國、日本、印度、波斯、土耳其的朝代的。

我們可明顯地看見：只在這種歷史的材料裏，已發生了很大的變遷，而現在還繼續工作着。在教科書的作者中，布雷斯特德（T. H. Bristed）爲最光榮的第一人，能將世界史實變爲可以讀的、有趣味的、和擺脫一切朝代記載及其黯淡無光的瑣事之一冊。威爾士（H. G. Wells）不久便跟着著世界史綱，盡將朝代之雜亂的圈套排除，同時表出一種如何有趣的和容易的經驗，能使平常的讀者去精通世界史。自此以後，許多同樣的著作陸續出現，使世界史變成一種撮要的、和有趣的形式。

在地理問題裏，哥林比亞大學的摩曼立（O. A. Mowbray）對於使地理單簡化一層，極有貢獻。他的方法是在某一類事物中，選出一最好的例子出來，充分教授，然後將其他同樣的例子所需的正確知識，輕輕放過。他說：「在地理裏，如果澈底和詳細了解

一種代表的事物，那麼，就可得到全部地理知識的關鍵。這種代表的事物，一經明顯地認識，便可跟着解釋許多同樣的事物。一條河流，一個山岡，如將他們各方關係描寫明白，必然可以做好多同類的榜樣，一種代表的事物之研究，因此乃是解釋多量知識的捷徑。要將地理研究的計劃分析，那就最少有兩種重要的問題：（一）在無數的事實當中，一些最主要的代表的觀念之選擇。（二）如何將這些觀念集合起來教授兒童和使兒童發生趣味的一種方法。地理知識的數量，實際上是無止境的，較之兒童所能精習的何止一百倍，所以一種聰明的選擇是必要的。如果我們相信澈底精通少數代表的事物，就是向着精通全體廣闊而變化的地理領域進行；那麼，我們便已發見一種極好的方法，減輕心靈擔負，同時可使世界受我們思想的支配。這種不費思想而能將地理上的名稱與事實充滿腦袋裏的人們，實與在海邊拾介殼的小孩無何分別。」

關於地理教學問題，柏克立（Berkeley）學校督學威爾遜（H. B. Wilson）和波士敦大學教授威爾遜（G. M. Wilson）在他們合著的學校工作動機之促起一書裏說：「目前地理教學的運動在要從兒童的觀點，和從適應兒童需要與興趣的觀點去

改組該科的內容，地理中形式教材的組織未免太多了，牠的目的全在給兒童以一種世界各國地理的百科全書的知識——充滿兒童以事實——極端變異的事實——只有事實——一切事實。只有人類抵抗的天性，纔可以去挽救兒童，免得變成一所收集不相連絡的事實的儲藏室。一個在第六年級裏的兒童，除非他打算自備一船環遊新大陸，不然，爲甚麼要強迫他學習北美洲沿岸的海灣和海角的名稱呢？況且就使他自備一船，他亦須在當船長許久之後，纔能充分認識這些零碎事物。

「地理中的事實必須視爲次要的。要教授兒童地理，那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教他那種地理的方法與習慣。而那種方法與習慣，最能從選擇與兒童興趣密切相聯的問題當中去養成。無論在何處，這樣的工作的組織，如能成功，該處教學的結果必然滿意，甚且只用事實的聚積爲標準來測驗他，亦必然滿意。因此，在惹起地理學習之動機和生氣，第一步就必須盡量淘汰大部與地圖相聯，和與其他地理上之形式狀態相聯的工作。」

教育上的天才能夠使算術同樣的單簡化嗎？教育者用力於這方面，是很誠懇和

活動的，可是還沒有歷史地理一樣的好效果。

關於能否把外國語的研究變成簡單的問題，因全世界彼此的交接長足增加，和因各國的大團體常彼此往還考查教育、科學、文化等等，所以很能造出一種形式極端簡單的世界補助語，或許這即是世界語（Esperanto）。在本書作者所教過的羅柏大學裏，學生常很流暢地說至三四種言語，俾得供應近東國際生活的要求。他們很望世界語能夠普及國際，因為這些可憐的學生，常因耗費許多時間去學習各種言語，乃不能不丢掉許多有趣味的、和有價值的文化材料。

新教育聯合會在羅卡拿舉行會議的時候，到會的代表有四十餘國。他們討論時要用英德法三國言語；這種方法，耗費這樣多的時間與精力，故當時就決議在丹麥舉行下屆會議時，只用二種翻譯——這種翻譯就是世界語。日內瓦盧騷學院院長部味忒（Bovet）先生當時做該會的主席，他說四種比我們說一種還容易還流暢，首先熱烈主張採用世界語為公衆之中間語。此次每一到會的人物，無不實感世界內要有一公共語的必要，因為世界內的國際交接與了解，此時是這樣需要的。

世界一切學校必須採用世界語，不特大有利便於國際旅行、交換和交通，而且更適合我們的目的，能使全世界的學生對於外國語的工作變為極端簡單，他們此後將只有一種補助語學習，絕不必學到二三種。況這種言語如是簡單，一個成年人如為着談話起見，只學他一個星期，便很精通。

四

假如有人說：初等教育不能像這個範圍裏的專門家說得如是有威權，至少有許多從懂得近代教育法的父母觀點說出來的啟牖人心的事物，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論文裏，說出他關於教育必須改革的感覺，說：「第一，對於傳統的課程，要有一種功效猛烈的補救，要指出其中各種不關重要的東西，使牠讓出地位，給那舊式教育不懂其重要的新知識與舊知識；同時要將一切方法簡單化。第二，小心免除過度的教訓，例如足令人作嘔的教訓。」

這確是一種愚笨的和迂腐的人，纔覺得重要的事物，不能變為簡單的形式。我記得嘗有一個社會學演講會，由兩人主講，其一是麻州某市一個社會黨的市長，敘述他

的行政，其二則是荷爾（G. Stanley Hall）。這個社會黨的市長首先登壇，他說了兩點鐘之後，直至我們要因煩惱而退席，當他亦被勸退席時，他還說很失望沒有充足時間來說明他的講題。荷爾只有二十分鐘演講，而且所講是一條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是講得異常透澈。

我們流行的教育，有一個謬誤的概念，就是教授物理科學時揭發無遺，教得過爲詳盡。又如生物學，牠最初在實驗室教，至於牠的簡單的大綱，就要留到高級課程纔教，其實應該反轉來教纔是正理。我在大學讀書常有一個愉快的經驗，那是現在流行的分組制度所沒有的，就是在美國一最有能力的生物學者教導之下，選修生物學大綱的（並沒有弄實驗室的工作。）半年功課，每週二時，他把進化的大問題，表達得非常清楚。我認此爲我全部教育中最有價值的功課，我不欲專門研究自然科學，我所需的生物學，是爲着陶冶的目的。每種自然神學都能夠，和應該向將來不欲專門研究的人，爲描寫的和簡括的講授。

所以絕不必存心以爲不够時間去取得今日世界的知識的。絕不必在教師心裏

和兒童心裏產生一種緊張的和擠擁的感覺。這是一種謬誤的觀念，足與兒童以極不良的結果。無論如何，我們回想爲夫耶壘斯泰因（Frankenstein）所征服與支配的整個近代生活的趨勢，這種趨勢原是由他在文明的技術裏創造出來，作爲進步的結果的。

你們必會聽到我們近代城市的人們，每怨恨他的生活過於擠擁和緊張。實則在許多情形裏，這大不必要的。近代科學嘗將我們工作、享樂、文化的機會，增加十倍，這種事實，不一定就使我們爲我們環境的豐富與福利所壓倒。我們是環境的主人，還是環境是我們的主人呢？我們因爲在同一日內連接音樂會、演講會、牌戲會、棒球會等等的請帖，我們便逼得煩惱和緊張了嗎？我們不能接受一切邀請，我們要選擇，我們可選其中有益心身者，犧牲了那些次要的機會，絕不使牠們在我們心裏盤旋。不然，我們絕不會享受我們所參預的事物。我們而且常會分心，及有過度緊張的感覺。我們究有多次因爲沒有閃避的能力對付我們文化環境的福利和他許多誘惑的機會，循至我們心中煩惱呢？生在二十世紀的人們，他們如不征服這種環境的誘惑，免得煩惱與緊張，則他們必歸環境所征服。如果文明是能生存的，他必要待文明的人們有很大的意志力量。

和判斷力。

我們成年人必須先行擒拿和戰勝這條問題，然後能為我們的兒童解決牠。我們必須達到均衡、寧靜、容易、和有許多時間。這種空氣，我們亦必須在學校中創造。如果成年人很可憐的為不必要的文化環境的豐富所征服，而至犯着神經緊張，又將同樣的緊張去處罰兒童，那實是一種罪惡！

新教育對於世界有一種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他能夠成功對付這種問題，勇敢地對付牠，聰明地對付牠，直能成功將牠排出兒童的學校生活以外。

五

總之，那為我們所需要藉以變成一個有教育的人的，就是本領、技巧、能力之發展，而不是某種知識之整個的取得。例如兒童有能夠快讀和了解的本領，兒童知識上的好奇心能夠維持和增加——這已是教育的絕大成就。如果我們勉強兒童儲積事實，我們就容易殺害兒童在知識上的熱心和興趣。在他方面，如果我們協助兒童練習讀書的速度及了解，同時保存他對知識原有的好奇心與慾望，則我們對他後來各期教

育和生活的本身，都樹立一種理想的基礎。

這就是新學校所要做的：以設備極有趣味的圖書，與極動人的兒童百科全書去圍繞兒童，以惹起兒童對各門學問的興趣，或任他隨意為各種不同的探討，新學校便去訓練他們大多數的兒童來做研究，及成為將可利用的材料拿回來——這種能力無論在某一種生活的活動中都有極大的價值的。此外更加上言語和文字發表能力的發展，那麼，你就成功養成一個真正有學問人的主要條件。

現行的教育制度，盡將牠的氣力用在練習和苦工上面，故絕不能達到這點。不特這種必要的求學基礎不能建立起來，甚且牠會受着阻礙，因兒童對於知識之求得早已發生一種不好的情感。因此，我們嘗一致埋怨現在的中學大學，因為他們的學生對於正派的文藝並沒有興味，亦沒有能力去了解牠，精通牠，和收取牠的內容。

我應稱這個兒童很有教育，如果他有誦讀的了解能力，和有一種足夠使他去閱讀和去享受我們的思想 and 文化的雜誌書報的一般興趣。這樣子一個人確已走上了文化之路。因為今日的雜誌世界，是最近新知識的神異的備辦者，牠而且用一種很動

人的形式來送給衆人，無論那一個人他如得有愉快地閱讀正式雜誌，和從報紙中看得關於世界進步的事件的習慣，那麼，他的家裏就已有了一所非常有用和有力的大學，這間大學，比較我們現存的高等學問機關還有用和有力。

這些優越的人物照例喜歡看原來的材料，而不喜歡由能力或比自己較低的他人用編輯的計劃經過一番整理的材料，或亦不愛受久已爲着一般人的需要，從而只有很低標準的教育制度的陶冶。

在這種情形裏，狄斯奈立 (Benjamin Disraeli) 就是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在這個著名的作家與政治家的最近傳記中，雷門 (Raymond) 嘗說及他的少年時代：「這是一個不善學的童子，但亦是一個不知足的學生；他不喜歡課室內的苦工，但當他在父親圖書室亂翻書籍的時候，他就永沒有這樣快活。狄斯奈立說及自己道：「我嘗讀過我所拿到的所有書籍，可是在我教師的偏用文字的書室裏，我只能儘最少的研究。」有人說他的在服爾退謨斯托 (Wolthamstow) 地方的教師，嘗怒責他永不了解文法上的虛擬法。但是他了解許多更重要的東西，而且他了解一切他以爲於他是重

要的東西，他喜歡世界的直接經驗，過於他的大學功課……在後來生活中，他承認從社交方面說來，如沒有了伊吞（Eton）中學，和牛津大學那就是一種極大的阻礙；但從精神方面說來，他以為這是一種極大的利益。」

在教育的歷程中，教材與課程可說是極重要的。然而整個的生活能給與我們一種更大的均衡，在此均衡中，教室常犯的自炫博學，便顯現為一種極滑稽可笑的舉動。威爾士曾說及他自己一件有趣的故事：他有一次參觀衛爾茲力大學（Wellesley College）適該校學生將女公主（The princess）一書編成戲劇來表演，學生見威爾士忘記了女公主的作者姓名，大為驚訝。威爾士說：「我往時還記得誰人著女公主，但此後我學了許多更重要的事物就忘了。」威爾士覺得這間中學的女學生的態度十足是一種自炫博學的態度。

技巧比較任何一種數的知識都還重要——技巧是一種能力，牠在需要什麼材料之後，能夠很迅速地，和很有效地進行搜集，消化牠，和為着需要的目的來成功使用牠。這樣得到的知識，在沒有需要時我們拿來怎樣處理，這是我們本身的事情，而不是

世界的事情，世界上最成功的人物，常是那些忘記許多事物的人物，就是能將這種已經用過的事實，從意識內移到無意識內，使其蓄積在這裏，而不任其在精神往來的通道上肆其喧鬧。

六

我們必須爲嫻熟而教育，而不要爲着不求甚解的學習而教育，那是很顯明的。然而還有一條問題，就是我們將要使每一學生都同樣的嫻熟課程內所有的教材嗎？或則我們任那些善於閱讀的學生忽略數學上的嫻熟，和有文學天才的學生忽略讀書，和文學上的技能呢？我們將任不喜外國語的學生免讀外國語嗎？當兒童在一種藝術，或在力學，或在電學，有其特長及天賦的才能時，我們將怎樣辦呢？究竟到什麼限度我們纔任他培育他的天才，而犧牲課程內其他技能呢？

愛略脫 (Ellis) 採用選科制來解決這條問題，這表明高等教育的一種革命。他勇敢地接受此問題，而採取放任政策去解決牠，這種政策可使學生隨其所好及志趣。今日的專門學校發見這種選擇的自由不滿意，然而覺得固定的課程亦不滿意，於是弄

一種較調和的辦法，依此辦法，學生在完成了一些極低限度的文化課程之後，便能自由將功課集中在一種或數種興味中心，而發展其特別的傾向。

然而這問題在初等教育裏，我們又有什麼解決方法呢？我們亦將要求兒童一齊達到精通小學課程內的各種科目嗎？這原是我們現在教育制度的實際，各科都需要精巧純熟，學生的等第如何，要看他能得到總平均的分數如何。我們只覺得這是謬誤的政策，我們必須採用稍給個人以自由發展他的嗜好、天才和技巧的那種方法。

羅素爲著名有偉大天才的兒童教育家，曾發表一種極合道理的定律，他說：「男孩或女孩如表出一種強大的傾向，和一種鮮明的態度，那麼，雖不必一定盡量排除其他學科，但自幼便應特別允許他去發展。約略說來，有特別才能的兒童可以分爲三種：一爲藝術的，一爲文學的，一爲科學的。假如我接觸着一個兒童，是在這三種之一的方向中有明顯的傾向的，我們應當很願意給他一些最少限度的教育，是他覺得無關於他的重要衝動的。」

我們的智慧傾向，從整個看來，確是一種可靠的指導，因爲牠是氣質之結果，而氣

質乃是一種天賦的事物，各個人不同，能使各種才能為各種作用，以實現人類之最大的福利。在於一種合理的最低限度內，每一個人都應被允許在無限量的知識中，隨嗜好來選擇。

工作的方法亦不應由學校作不自然的強迫，愛默生(Emerson)因為他自己及後人斷定健康與氣質是很充足，故早年即決定尋求知識，但仍不強迫自己去做那些延續性太大，或過於精練的工作。他靠着這種與平常教育者所規定迥然相反的方法，於是成功他的哲學著作。曾給美國思想生活以一種最深影響，如果某種教育制度是要給這種人類貢獻一種地位的，那麼，他自己就必須不要過於標準化、手續化、官僚化。

新學校現正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這一種非常困難的事情，無論那間學校，如欲冒險容許兒童因為熱心一種科學，循至忽略數學的熟練，必惹起極端的批評。同樣，假如他准許文學創作的發展而致犧牲綴字及寫字，或許酷愛數學而忽略文藝的技巧，則其惹起評論也是一樣。無論那一個教育者，或那一種方法，如欲將要求各科分數總平均的課程，澈底改革，必有重大的責任問題發生。

有幾種技能，是每一小學生所需要，所應該學習，那是很顯然的。這些技能可包括閱讀、抄寫、作文等等的專技，隨時均要應用的基本算術，分析所讀材料的能力，和於必要時運用這些材料。新學校正以一種使兒童專心合作的方法，去發展兒童這種技藝。如在教授音樂藝術的方法中，他們先要製造這種靈感與慾望，而必要的訓練隨其後。兒童將極用功以達到所慾望的目的。

將責任放在兒童面前，任他有發表的慾望，求知的興趣，冀圖實現自擇的設計的熱心——任兒童首先由此而覺到技藝的需要，這些技藝只是能由練習得到的，那麼，兒童爲着達到成功，他必願意進行各種練習，這樣一來，比較學校或教師將練習不自然地放在兒童面前要好得多。

過去教育制度的騷亂，皆由牠不顧兒童心理中的意志原素，太偏重智慧，又不明白情緒的本性與智慧如何分擔，如何合作。利用兒童的情緒，使他轉移到才藝的路上，你便將有一種更自然、更愉快、和更有效的教育了。

第八章 課程之克服

「我們不願受教材支配，也不願使兒童爲教材所支配；我們希望兒童們能養成直接探討的強固的習慣，和能應用自己所尋得的知識；我們希望他們在具體的事物中發見各種關係，好讓他們在研究抽象的事物時，也知這些關係是存在的。」

——Caroline Platt——

賴安 (Carson Ryan) 教授說他曾有一次同一班學生到喀桑大學 (Carson College) 研究這裏所採用的方法。喀桑大學原是非列得爾菲亞州 (Philadelphia) 的孤女學校。第五年級在一種創造的方法中研究歐洲中古的歷史。他們又曾將全年的時間去造顏色玻璃窗。他們第一步考察那著名的中古窗門的式樣，其次則旅行到非列得爾菲亞州參觀各種顏色玻璃。最後他們更深刻地研究引到這種藝術的和宗教的發表源流，和鼓起這種藝術的和宗教的發表精神。他們小心學習有色玻璃的製造專技；他們然後實行繪畫和製造有色玻璃窗。

這種方法比那種指定課本，和背誦課本的舊方法極端不同。牠對於兒童是多麼愉快和感動呢？牠是怎樣能發展兒童的忠實研究、感悟、想像、和製造能力習慣的一種

好方法呢？然而人們亦可疑問：這種團體活動，究竟能否完成他所要取得中古知識的主要目的？此種答案可在賴安教授所說過的話中尋求。因為他最近所參觀該校的一班，正在研究中古時代。他據該校高年學生報告：這些兒童了解中古的生活和精神，比他們還要澈底；而所了解的材料亦比他們多。

但是這種好結果，或許由於這些兒童特別聰明和有能力；但亦不是從智慧測驗方面來看，這班兒童都是中下人材。他們所做過的都可由好教師和好方法指導其他任何一組兒童去做。

伊立孫(H. Erison)曾將堪薩斯(Kansas)城的散塞脫喜爾(Sunset Hill)學校所用的創造方法，在進步的教育雜誌裏發表過，他描寫一種美國歷史的設計如何激起一組第六年級兒童的想像和努力：「他們當研究美國史中的革命時代，對於美國國旗的構成與發展，特別感覺興趣。這似乎可以產生一種能為創造發表的研究問題的機會。這組兒童原是長於想像和戲劇的，所以他們對於搜集材料，將此問題弄成編劇本的一種暗示，即熱烈的贊同。一切書籍與雜誌，報紙的論文，凡曾應用這個時期所

有的材料的，無不爲兒童所閱讀，教師間亦有許多有趣的事實貢獻出來。一些論文在上課時間朗讀，兒童即記起其中可用爲戲劇的材料。每一學生在他所選擇的材料中都用他的判斷力。

搜集材料及忙了一刻之後，兒童們便合起來編劇。他們亦研究這個時期的一切衣服、器具及產業，俾能表演正確無訛。

這種設計，顯見有多種價值：歷史的研究、文學的創作、戲劇的表演、悟性、執行能力、和領袖能力之發展，而最有價值的，就是兒童由學習合作，和愉快地貢獻那不是爲己的創作工作而有的品性發展。

二

一個從南美洲烏拉圭（Uruguay）來的考察員參觀我們的拆維徹斯（Chevy O'Leary）鄉村日校，看見第五年級研究地理的方法，極感興趣。這班兒童正靠着搜集得的郵票去開始接觸地圖和地理，每一兒童都用四角錢買一包載有五百外國郵票的包裹回來。回後的第一步便將郵票拿出來整理，那絕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因爲各

國的名稱是用各國文字來表達的，有些而且不是用羅馬字母的，拿出來整理的時候，必須有教師幫忙，小心研究和比較各郵票的文字、圖印、符號等等。這種研究自是一種有價值的精神歷程——我們還可有趣地注意着，就是這些身體活動的兒童，比較學科成績優越的書本心理的兒童，在這裏常表出更有能力的。

整理了郵票之後，便拿一本活葉的筆記簿去造一本郵票簿。辦法是這樣：在一頁的上面，寫下一國的名字，再從百科全書、年鑑、或地理書上搜集關於那國所有的知識寫下來——即是關於那國的大小、人口、政制、統治人物、和兩種最主要的出產，在這些知識之下，然後粘貼那國的郵票。在可能時，亦將各國的國旗搜集標貼。

除了兒童用這方法直接得到每一國的許多知識外，還可有一些副產品。有許多郵票雖然他的模型不大，却用一種精緻的彫刻表出鄉土的生活和動植物。有時候歷史的事實亦用圖畫的形式表在郵票上。有一個兒童從家裏帶了一個希臘百年紀念的郵票回來，這個郵票刻着擺倫(Bylon)為希臘軍歡迎的圖畫，註明年期為一八二四——一九二四。這個小孩子很了解這個附帶的意義。這塊美麗的圖畫表出幾種具體的

事實就是希臘在一八二四年爲自由而戰爭，擺倫去幫助牠，牠終得自由了；希臘人極感激這種自由。這種文字的意義，當兒童參考其他許多國家的郵票時，亦可同樣領會到。又在此上上下下，還有一種浪漫的情感滲入地理的教材裏，使情緒與智慧相融和。這種從智慧的事物中引出情緒的滿足能力，不是一些真正學者所有的事物嗎？

歷史地理的本身，尤其最適於用創造的方法來處理。兩者之中都充滿各種傳奇故事，從前墨守成規專以兒童課本爲職責的迂夫子們，亦能潛隱在許多繁文冗語裏和不重要的小事裏。現在這兩科目之表現已成爲生活本身之描寫，密切關連着兒童的需要與環境。此外亦可利用幻燈影片，近地旅行，以搜集有趣的材料，和做各種團體的工作。那尤能刺激全校兒童的，就是兒童自己演歷史劇，做地理上的陳列展覽。當兒童研究各時代各地方的服式及其他附帶品物的時候，和預備化妝與登臺的時候，全校兒童都滿充興趣、期望，和活動參加，整個星期內或整個月內都生活在一個過去的時代裏，或別一個國家裏——以期達到成功之最高點。

歷史及地理的教學法，現在所發生的變遷，味門茲 (Veomans) 嘗敘述過，他說：

「我常常沿着紐約南街行走，執着我的父親的手，舉頭遠看着一排建築物，及從建築物伸出來的大船桅及帆杆；至於前面汪洋浩蕩的水上，又有許多帆檣舟楫，密如蛛網。紐約的學校兒童，也有時來這裏看看那些人類勇敢與技術的偉大象徵嗎？也讓那些偉大的東西，與兒童們從學校課本中得來的那些渺小事物之間找出一些關係嗎？永沒有的。他們起什麼貨，這些貨從何而來；他們落什麼貨，這些貨從何而去？學校兒童亦絕不知道。這些都不是從前學校環境裏的東西，然而現在却正是的了。這就是從前學校與現在學校的最大區別。雖然還有別種重要的不同，但這個却是最大的。此所以一個良好的學校，常是充滿着新奇的事物的——此所以兒童在星期六日還要回到學校，當假期滿了時便十二分的歡喜。」

英文文學的學科也富有創造教學的可能。演劇、誦讀、同學間的討論、和讀偉大的文學等等所惹起的創造工作——這都是優美文學在興趣的、動人的、創作的形式中的一種表現方法。一種須要確實訓練的學科如英文作文，亦能同樣基於兒童的興趣和生活經驗之上，排除其大部的傳習，而承受創造的價值。從到博物院、工廠、和社會生

活之別的具體表現中，亦得有許多口講的和筆述的機會，此種口講的與筆述的亦常兼用畫圖、攝影和剪畫來表現。用研究的方法來學歷史地理又需要做筆記，好寫成報告，提出全班或全校大會。校報在許久以前已供給創造文學的動機了。文學的新教法，尤其是詩的新教法亦如上一章所說，惹起兒童創造的工作。

下面一篇文字是一個七歲的小孩子從創造的活動中寫來提出學校大會裏的，他的文字發表來得何等自然與容易！

我們的印第安人的搜集物

「我與華德昨日將印第安人的搜集物提到大會去。我陳列我所造的印第安人村，是做在一個沙盤裏的。華德在一隅的桌子上陳列許多珍奇的品物。在印第安人村裏，有些土人的居屋，其中一間屋是酋長的；別一間則是巫人的。屋裏有些三腳架，紡織架；在酋長的屋門，又有一根圖騰的木杆。」

甚至在教授形式的文法裏，亦可用遊戲及其他方法創造有趣的和熱烈的努力。綴音，可算是最機械訓練的學科了，亦可在綴字協進的機會裏惹起很大的努力和刺

激。有些天才的教育家還進一步，創出一種綴字的籃球遊戲，這種遊戲在我們學校實行起來亦很成功。他的遊戲法是這樣：一班分作兩隊，每隊有一發球人。參加這一隊戰鬥的人，接受敵隊發出的字，綴合一字便以擲中一球計算。反之綴不中則以敗一球計，三敗作爲出界——四球作爲一盤。棒球的遊戲法，亦應用到拉丁文與法文字彙的教學中，一個有本領的教師，且可以更進一步去應用他。

我們可以看見這種遊戲的許多利益：第一，牠可以惹起細心準備的動機。不特每方都努力學習，這個發球人（同時亦即是隊長）常常訓練他們隊中的懦弱分子。訓練的重任因此乃在學生身上，而不在教師身上。假如學生當中，稍有忽略，那麼，同學即要對他抱怨，絕不用教師爲之擔心；第二，牠可供給一種興趣和機會，去解放那些被縛的肢體，因爲在可能時，這種遊戲應在戶外舉行的；第三，那或許是最重要的，就是牠將愉快與教育進程聯合起來。這和同樣的遊戲可使兒童對教育的態度成爲一種誠實的和愉快的態度。又可養成他們一種精神的渴想與慾望。這種渴想與慾望，對於知識有融化的必要，正如身體之渴想與慾望有與食品的融化一樣必要。

外國語怎能應用這種創造的方法呢？有兩種方法：第一，在未研究某種外國語之前，可將這國的歷史和風俗，先為單簡而須有生氣的表现，這種辦法應繼續整個學程，在可能時，應直入到所翻譯的原文裏；第二，盡量應用直接教授法，我們中學裏的近代語教學是很壞的，在這一部分看來，公立學校并未能如商業上的近代語教學這樣大進步。所以學校在教授兒童法語當中，常採用直接教授法，和應用許多遊戲和活動。

算術也可用具體的方法去惹起極大的趣味。這些方法，如遊戲、設計和標準測驗之最進步的形式，可使每一兒童能用一張表記他自己進步。我們學校裏的一班因為研究丈量，曾數次到正建在鄰近的一座大屋處去旅行。他們第一計算從地窖底起所嘗掘開的碼數和牠所耗去的用費（建築者曾將每碼的價格說給兒童知道。）其次他們計算地板，與屋牆面積（減去窗的面積）計算裝飾的和木料的價值等等。這種團體的設計需要很巧手的測量，所以分兩部分來做。分頭去測量，校勘錯誤，及研究進行中的建築工作及耗費。

我在事實上確曾見到算術一科，當為一個有能力的和有熱誠的教師教學時，是

兒童一種最喜歡的學科，極宜於做課程中的最通俗的學科。那是不是因為他能得到這樣確實的效果，給成功的學生一些確實成功的意義呢？但無論怎樣，算術決不需成爲課程中最可畏的野獸。服爾嘿耳(M. Vorhies)女士現在皮佛爾鄉村日校教書，當我參觀他在巴爾的摩爾(Baltimore)帕刻學校所教的一班時，嘗對我說：學生嘗在暑假要求她給他們一些算術的額外工作。算術顯是他們愛好的學科了。

三

因此我們可以見到：正如藝術科教學法爲雪材克的方法所革命，使感悟和自由的發表得在其中先專技而進行，和得在專技的發展中變爲一種重要的元素，那些文字的學科亦爲新教育之主張所革命，使這樣的工作不首先拿來滿足成人界的要求，而要從兒童的慾望與潛力在整個自然創造的發表形式中流露出來。這不只是一種方法的事情，這還是一種新的綜合，有一種根本不同的辦法去對付兒童和他的需要之特性。

兒童在新英倫田中所受的訓練，可以拿來當作創造教育之一種理想的模型。這

樣一個田莊裏的小孩發展，是由於見着週圍成人所做的工作，因而立意和想着幫助他們的結果。他們所做的事務是關係及鋤地、種植、收穫、和飼養禽獸、及各種家庭的出產、和家事的需要——在這樣的事務裏，小孩子很喜歡參加進去，和很感覺自己這樣就是變成重要的生活工作之一部。因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兒童便漸發展有更大的專技和能力；又當其氣力及技巧增進時，他便可托以更大的責任，及器械的使用，使在危險時，得以隨身應用。最後，完全的學習已經完成，而兒童此時亦變為成熟，有能力，可與成人並駕齊驅在田莊裏工作。

兒童所以喜歡做這些事務，約有幾種原因。那種兒童天賦的模仿意志就使他要做見到成人做著的事物。其次，無論那一個兒童都生有一種慾望，想加入必要的生活活動中，兒童在此參加之中，便感覺到自己地位的重要與人格的高貴——兒童的心靈，從此便很膽怯地和熱望地進到這些努力的和成就的高頂，這些努力和成就，是他看見能力為其羨慕的成人具有的，但原因中最有意義的，就是兒童發表為行動，擴張其能力去支配環境，及尋得支配發表有用事物的滿足等等自然的及內心的趨向。

這種田莊的訓練是很好的，那可以由許多青年們，做野外的各種工作，而得到生活上的成功來證明。這種往城中求幸運的田莊青年，他們的成功，不特因他們有健康的身體，尤因他們有很大的工作能力，和很高的責任意識。田莊的兒童能擔負那些真實的、誠懇的重要事務，他們的娛樂，純來自職務上所節省而得的餘暇；而別的青年們，却毫無責任地度過了他們的青春。

同樣的元素也能够應用到兒童學校工作的活動裏嗎？這原是新教育者的目的。他們很想幫助兒童自然地在能力與技巧的擴張中而生長和發展，幫助他們在學科的成就裏找到不斷的滿足，正如田莊的兒童在田莊的成就中發見他們不斷的滿足。在兒童未能用我們在田莊的最好生活中所見的同樣動機與滿足去進行他的學校功課時，必先掃除幾種阻礙。那要戰勝的最大困難，就是那分離功課與生活本身的那條鴻溝，教育是生活的本身和靠着生活的本身而進行。他是具體的，他是活動的；這兩宗事物都是倚賴兒童的。在別方面，學科的功課太抽象，太枯燥無味，太遠離生活與生趣。新教育者所以要排除這阻礙，必由將活動引到學校課室裏，和盡量將具體的

材料引到抽象的教學裏，而最重要的就是學校功課的組織，務要使他對於生活上極關重要，甚且成爲生活一部分。當學校功課能這樣引起動機，能這樣深入兒童欲爲創造的發表的熱烈慾望裏，那麼，那時候——亦只當那時候，課程對於兒童纔具有不斷的興趣與愉快。

四

本章對於上述材料所顯示的一種方法，正足以供應這種要求；這種方法即名爲設計法。設計法是一種活動，由兒童自己所選擇與悟創，作爲自己智慧的需要及欲望之一種發表。這是一些具體的事物，基礎於生活的需要上。他視兒童興趣爲最重要及最有價值。在這張桌子旁，兒童坐起來很愉快地和熱烈地工作，正如田莊的兒童熱烈參加田莊各種重要的設計。教師的任務只限於暗示、鼓勵和指導。

「設計法」這個名稱，與本章所描寫的這種運動比較起來，——即是要求更多創造的與活動的學習法的運動，——原沒有那樣賅括；然而他有一種優點：就是他是一個極流行的名稱，而具有教育歷程中這種活動力量的一般性質。

當設計法爲團體合作，許多兒童參加入內，而產生這些最後的成就時——即產生一些爲團體所計劃，與爲團體所視爲有用和想望的成就時，那設計法便非常有價值。牠可以是代學校製作需要的工具之一種製造，牠可以是如養雞（包括築雞屋，調飼母雞，和出售雞卵）等等的。一種事業。牠可以是一種戲劇，由兒童計劃和編演，使他們各種外國的知識成爲具體化。牠可以是鄰近一種旅行，去研究食物的種植，準備，及分布，或研究建築屋宇的各種形式。牠可以是一種歷史地理的旅行，牠可以是學校銀行之開創，和牠的各種計算，牠甚至可以如在一間新學校裏，是一個飛機之製造。設計的範圍只有爲師生的想像，學校的設備，和本地材料所限制。

因此我們見到設計法，實是將爲兒童理想教育所必要的興趣與愉快，投射到學科工作裏的一種重要的工具。設計法要想改變學校的性質，要從充滿抽象的，課本的，大半枯索無味的工作之一種被動接受與吸收的機關，而變爲充滿健康的，愉快的活動之一種兒童學習的家庭。

約翰·杜威說：「那比起只有知識之聚積更爲主要的，就是要切實取得少數的

代表經驗，好學到如何對付那些經驗的問題。在形式的教育裏，不論在算術、讀書、地理、物理、或外國語等等的學習裏，那些常能成功的方法，試將牠們小心考察一下，就知牠們所以成功，純在牠們能回返到那能惹起學校以外的日常生活的反省之一類情境。牠們給兒童一些要做的東西，而不是一些要學習的東西。但因「做」具有要求思想，或有意地去考察各種關係的性質，所以做的結果自然就有學習。」

五

那些冀圖應用這種方法的學校究竟怎麼樣呢？數年前紐約城的道德文化學校 (Ethical Culture School) 決意成立一試驗班，俾能試驗出一種較形式課程更爲創造的方法。谷德蘭德 (Mr. Goodlander) 女士當時擔任做此種試驗工作，她在試驗的學校裏有以下這種報告：「在試驗班裏，我們曾力將小學對各種形式研究的注重，轉到構造的工作與遊戲上面，注重各種藝術方式的發表，注重關於兒童各種活動的社會工業活動的直接知識。要想兒童容易使用知識的工具，我們又相信必須盡量應用那於兒童概有興趣的設計法然後可。」

這種創造方法的價值曾經過充分的證明，故他目下已在道德文化學校的小學部切實施行。

普利特 (Caroline Pratt) 在紐約的城鄉日校 (City and Country Day School) 曾盡力應用創造教學法的觀念，其應用之優美，遠出乎美國其他新學校。「我們不願受，也不願兒童們受教材所支配。我們希望兒童能够養成直接探討的強固習慣，和能應用自己所尋得的事物。我們希望他們能在具體的事物中發現各種關係，好讓他們在研究抽象的事物時，也知這些關係是存在的。我們要他們有一精美的發動機的經驗。因為他們自己是發動機。我們亦要他們能取得和保留從身體上的知覺所得到的一切。」

普利特女士在其研究與實驗的結果，發見在某種年齡內的兒童自然地會在某種活動中發表自己，例如在六歲的兒童，他們總是一座一座的建築城池。在七歲時，他們會在一種永久的方式中建築一城之模型，建造木屋，後更施以顏色，設備傢具，電線，復有街道，車線，有充分地方容留船隻的水道。到八歲，兒童喜歡為學校設貿易部，自己擔負全責管理及計算出入的銀錢。七歲以前，他們不開始讀書。在這種年歲，女士又發

見平常的兒童開始脫離那只有遊戲的世界，而希望人家對他說故事。

在紐約的莫希根近代學校 (Mohrigan Modern School) 有充分自由給兒童發表個人的偏好與慾望；學科功課之修習絕非強迫的。該校校長說：有一次六班學生三天早上沒有到校。探求的結果，便發見他們自己在流到田莊的河流旁邊建造了一個堤，和一個蓄水池。蓄水池之高部的水流落到低部的水，中間用一塊木片來做磨機。又從低部的水流到河中，其中又滿佈海角、海灣、海島、大石，等等。該校校長狄支 (J. B. Dicks) 說：「如果教師只為繼續形式的課室工作而阻止兒童這種實行做事的精神，那不用說自是教師之狂妄的舉動。」他更將該校的目的與理想括概如下：「我們近代學校立於一個反抗者的地位，要反對那些阻礙兒童幸福與自由的一切勢力；並且完全重視一種事實，即是在生活上有一些為思想、為動作、為個人與社會力爭自由的許多事物，是決不能加以壓制的。我們生活在試驗的空氣裏，我們要努力使每天都能完成每天的任務，認定生活是最大的教師。」

一個兒童若僅憑藉設計法，充分任他跟着他自己的智慧、慾望、好奇心、和興趣而行，也能受得教育嗎？這樣一種試驗，現正在北卡羅來納（Carolina）州的刺里（Bar-ling）公立學校統系裏舉行，由哥倫比亞師範大學亞歷山大（Thomas Alexander）教授主理。他的計劃是在十五年間尋出一種基礎於兒童興趣的實驗課程，從第一級起，每年增加一級。

然而在多數新學校裏，設計法不是用來代替課程，只用來增加課程的力量和改進課程的性質。一種課程的形式仍然保存，不過各種學科的教授採用這樣一種方法，故能有機會以與兒童創造學科的工作，盡力與真正的生活需要相聯絡，此種需要原為兒童的興味中心。

設計教學法可應用到課程內各種學科去。而那些必要的形式訓練，也可與設計法一齊並進，或由各種設計惹起動機。鄉村的學校更有一些特別好的機會把形式的教材聯絡到那些有生活興趣的設計去。那些設計確能奇異地完成填塞家庭與學校之間、及書本與真正生活之間的深坑，不特田莊的生活，能直接地豐富他的工業生活

與公民生活。馬利蘭蒙特奇美利 (Montgomery) 的郡督學布魯謨 (B. O. Broome) 氏正從這方面做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坡爾忒 (Poffert) 女士所用以改變密蘇里 (Missouri) 的鄉村生活的那些顯著的教育成就，已在杜威女士所著的新興的學校 (New Schools for Old) 一書裏給讀者充分的認識。

七

要使兒童在學校期間保全他求知的自然好奇心與慾望，那爲什麼是不可能的呢？這些好奇心與慾望，原是兒童與生俱來的。不過給平常的學校方法摧殘消滅了。兒童思想是一種常態的事物，正如他跑路與遊戲，是一種常態的事物一樣。凡是那些能引起他的注意與興趣的事物，他都會常態地去思想。他如被強迫去思想那些不惹起注意與興趣的事物，真是變態的、難當的、痛苦的——困難，其困難有如禽獸在主人的威迫之下，被強制去學習事物。

兒童可以在形式的方法之下來訓練，而他的心靈亦可發展，然而這絕不是平常孩子一種愉快的經驗。在班級中人數很多，課程很擁擠的忙迫學校裏，兒童何能有機

會在自己的教育裏來活動和創作呢？其實他就想問一條真實的問題，或答一句真實的句語，也是不可能的。他所想知的事物，必給教師放在一旁，視爲不重要。至於那些教師（其實就是教師背後的教育制度）欲兒童知道的東西，兒童又不願意。因此，兒童不久即已學到他必須犧牲他自己的興趣，和必須放棄他自己自然而有的智慧慾望的滿足。因此，那些求知的慾望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今竟因不能找得滿意的發表，便開始收縮；及當青年期到時，他最後便沉沒下去了。

新教育說這是學校的過錯，而非兒童的過錯。新教育還從教育兒童到青年時期，和渡過青年期，使他還保存此種求知的好奇心與慾望，去證明這種議論。兒童是熱烈尋求豐富他的知識內容的；學校在兒童看來，確是一種愉快的機會，絕非一種可怕的苦工，而須設法避免的。

然而，在平常的學校裏，我們確看到這種熱心漸漸冷淡。他掙扎在第三、第四、或第五級，到第六、七、八級便一天一天減少。在中學的時期，他就顯然的死去。到大學時，便發生一種厭惡研究的態度。學科功課爲得到文憑的必要方法，那就不能不學的，然而平

常的大學生總以熱心修習課內及課外的智慧工作爲一種惡劣的滋味。巧於去避免學科的工作，惟一在取得分數的表面粉飾，甚至缺乏道德的責任，而至於欺騙，或欲取得文憑而無真正相當的資格——這就是現行大學學科令人哀痛之處。當他們欲在大學裏反抗這種潮流，那就好像欲挽轉從遠處而來的狂瀾。他如欲醫治有效，只可回到那爲大學始基的初等教育裏，根本改變其性質。

糾紛的原因，由於學校要兒童做的工作對於兒童絕無意義。這種工作絕不能滿足兒童各人所經驗的需要。牠亦不能助兒童解決在實際生活中所遇見的困難。因此在平常一般的學校裏，我們見到他們常無精打彩地坐下，看看，聽聽，當被問時則答答——絕不是感悟，實做，和創造。

然而我們確實知道兒童之生長與支配，只能來自認真自動的結果。什麼是補救的方法呢？威爾遜 (H. B. and G. M. Wilson) 在所著的如何引起學校工作的動機裏說：如果兒童能有機會，在那些於他是真實的和有價值的問題及情形之上，去施展他的能力，因而對於自己的工作有深厚的動機，那麼，爲什麼不能將興趣更切實努力保存

在學校的工作裏呢？爲什麼不把兒童極有興趣自去完成的工作，來代替學校實行的那些形式課本的學習呢？而且站在那些作爲合理的學校實踐的最後決定者之上，即在教材與教法之上的，還有那些兒童，和兒童們的態度、興趣、動機、與問題。

八

然而人們可以疑問：這是否欲分離教育與精神紀律的一種企圖？而在兒童的訓練中，那對於生活極其重要的習慣之養成，是否准許他忽略了去？假如是這樣的話，那對於兒童自不是一種利益，而是一種損失；雖或他的學校生活極爲愉快和熱心，這亦是一種損失。然而與新創造教育法同來的，不一定有這樣一種危險。當設計法能正確地引導到那種成功的效果時，當在設計法之上還加有這些必要的學科材料時，那自然不會忽略兒童的精神習慣，而對於常態的課程內容，亦不會忽略他的充分成就。那正如新教育實際的證明，新教育所以招得許多信徒，那全因爲牠有一種比較別種學校更能完備爲精神訓練和陶冶的能力。我深信這種能力正在活動着。

第九章 分數之專橫

「在我們裁制兒童之一切不合道德的對付中，記他們的分數恐怕是最壞的了。」

——Eugene R. Smith——

我們正參觀着理查斯坦 (Richardstown) 的厄特吞 (Homer Eaton) 公學第五年班的地理教學。這班有四十二個兒童，教師似沒有特別的鼓動力或知識力。當他正努力說明貿易風的性質時，坐在黑隅中的約翰 (John) 就捲起一個紙球，在桌子頂面各處來捉攪。坐在靠近走道而接近教師面前的巴德 (Bert)，幸而身材甚小，得藏在一個肥大的女童後面，不爲教師所看見，故將頭放在桌子上，他似奄奄欲睡，但還張開一耳，故當他給教師喚起來解釋薩加索 (Salsasso) 海的原因時，他即跳起身來，他解釋并不好，但教師似乎不發覺這些，其他的兒童亦不發覺這些。

別一個兒童又睡眼矇矓的被叫站着，和答覆教師的問題，他答了「我不知道」之後，便頗沒有自信力地坐下去。他的沒有自信力或許就是他的低能的符號，但同時，那坐在前列的小蘇斯 (Susie) 忽將他自己的手臂很癡妄地擺動一下。教師終於跑到他的跟前，給他一個求之不得的出頭露面的機會。然而他的敘述也不見得正確。或許

他的手臂擺動頗爲美觀，只志在造出一些好的印象，及一些分數。下課鐘現在響了，所有小孩子的面貌立時現出一種更生動的神態。

第二次鐘響了。教師命令說：「收起你們的地理書來。」課室裏於是有一陣的變換——兒童其時乃發出內容可以一半聽聞的嘆聲，去作二十分鐘的誦讀。他們現在脫離了背誦的苦惱，大半轉而靜默地集中在讀法裏。

讓我們參觀別一課室，看看教歷史那一班。這裏的教師比較聰明些；他懂得一些史事，他現在要將他的知識分給兒童。兒童在自己方面亦用問題來幫助他一切的機會，不過這些問題似不是基礎於真正的求知慾的，因爲很少人留意靜聽。差不多半室內的兒童都不很安適，因爲他們的眼睛總不斷的去看那時鐘。下課鐘終於響了，教師便起勁的講授來結束那課。後面兩個兒童彼此使個眼色，其中一個說：「很高興，沒有叫着我！」這個小孩沒有充分準備他的功課，故很願意教師多講一些。

這是言過其實的事例嗎？這種事例，實在很能代表去解釋何以現代的教育者趨向於決絕排除這種背誦教科書及抽取分數的教學方式。從心理方面說來，他是很壞

的；這又有許多原因。再比不上這樣煩厭的，就是一個聰明的、充分準備功課的學生，必須起來靜聽班中愚笨的、或沒有好好準備的學生，用不正確的和極混亂的方式，去把功課背誦出來。當到這些聰明的學生活潑地參與背誦的教學時，雖然或因他有一出頭露面的機會，從而感覺愉快，然而這正示他以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人格之門路，如昔日一般的成功所表出者。

至於這種教授與背誦的方法，對於低能的或遲緩的兒童又有一種什麼結果呢？當教師翻開名冊，或許要叫他背誦時，那就心裏充滿恐懼的情緒，恐懼教師加以侮辱的標記，恐懼為同班兒童所訕笑。兒童由這種恐懼就變成一種癡癱之病，思想不靈，言語躊躇，由是所有成就都不能盡展其才。年年都視為低能，長久低能的結果，便養成習慣上的失敗，此時不特於兒童心靈產生極不好的結果，就是他的身體也極無裨益。

對於中材兒童又有不同的結果。中材兒童之玩弄背誦法，正如成年人之玩弄撲克牌——有時測錯了手裏的材料，有時很巧妙地自壯觀瞻，很伶俐地去研究教師，及找出他的人格之元素，好能利用去滿足他的主要需要——即取得高的分數的需要。

在美國亞那波里(Annapolis)海軍學校所通行的教學法裏，便可以看到如何澈底利用背誦法去爲着獲得分數之傳統的目的。這裏在每堂授課之初，例發命令：「各人向着黑板！」班中十六個海軍學生，每人即跑到課室四週的大黑板旁站着，然後由教師傳給每人一張寫着課本問題的紙片。

十六隻手平衡地高舉在空中，拿着粉筆，忽來第二種口令：「寫！」十六隻手便起勁地和發狂地寫去。約十分至十五分鐘之久，一切都如死的靜默，只有粉筆有節拍的得，得，得，聲。

每一個海軍學生，當他寫完，便站在原有地位。當各人都寫完了，或所限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教師便命每一學生輪流誦讀他所寫的。每一人讀畢，教師將分數記在筆記簿上。因爲他必要每日得到每個學生的分數的。當學生誦讀最後的背誦時，這課的時間常已終結。

雖有討論的意念，絕沒有時間討論，其實海軍學生亦很少問及關於功課的問題

的，除了拿一種俏皮的目的去暴露教師的愚笨。一個海軍大尉的教官用一句答語去抵抗這樣一個問題，這句答語遂成爲亞那波里之歷史的成例，答語是說：「向書裏查考他罷，我在這裏只是看你們研究，不是教授你們。」

這種制度的結果是怎樣呢？我們必須承認，在某方面，那是很可贊嘆的。一種飲食睡眠之嚴厲的制度，常能幫助第一年級每人增加十磅重的體量。海軍學生原在養成有海軍官佐的資格，他們受着這樣一種訓練，確是極好，其中最好的，有該校校尉在大戰時的許多紀錄可以證明。在學校的事情裏，甚至如正確用英語一事，他們也比較美國任何團體的人都來得好，在四年長久時間，每日都有幾種功課的筆寫工作，教師不特紀錄此種工作的內容，而且紀錄其形式，又每一積分都有報告，而此種報告即爲一生海軍事業之上進的基礎——這種制度是能產生一種確定的結果的。

在他方面，我們可以想到：海軍學校的背誦法完全排斥人類的興趣或思想的成分，對於精神紀律之被動的接受即爲這些青年人之學校生活的特性。他們幹了一束研究，但很少思想，更沒有所謂創造。

海軍學校是精神紀律的教育法之一種極好的代表。跟着牠自己的路程，和對於牠自己所立的目標，牠是有效率的。在某種意義裏該校一切工作都很能惹人起興，因為牠確能將人們送到某種選業上的成功裏。全班學生對任何一種功課，都幾乎做到盡善盡美。沒有一個學生不準備功課而上課的，很少失敗的。

然而這一切價值，在傳統的教育裏雖然很為重視，實則是一些致命的瑕疵。海軍學生這樣做他們的工作大半是因為他們有，並不是因為他們愛。他們努力做這種雖飽猶食的進程完全是被動的，而他們所吸收的文化分量完全是不足留意的。一切他們的美感，他們的創性，他們的文化力量都變衰弱，循致死去——因為沒有自由空氣來呼吸而死去。「我們這裏沒有時間來思想的，先生！」這就是當我問一個高年級生關於愛默生（Emerson）的「超靈」一種絕非由記憶力可能解答的問題時，所得的天真的而又帶憤慨的說話。

與海軍學校所主張的辦法相對的，就是新學校和他的自由教育法。這正如民主主義反對專制主義。每一制度都有牠的價值，牠的成就，和牠的缺點。然而從批判的智

慧力之構成，和從一人發表與創造的自我之生長等立場來評判，則兩種方法中那一種方法是較好一點，那就必無問題。從新學校養出的兒童都有一些很濃厚的文化嗜好，心胸曠達，求知慾熱烈，他們在世界裏的生活都是一種在文化發展中不斷的進程。在這種重要的特色中，訓練式的學校是不會成功的。

三

要高材的學生坐在背誦的煩惱之中，那顯然是無用的。在許多公共學校的系統裏，已開始找尋方法去解放天才的兒童，脫免那些較無用尤壞的強迫背誦。

例如在芝加哥大學教育學院附屬中學，在社會學的功課中，就有下面這樣的自由方法。這門功課的材料組成一個一個的單位，每一個單位都要大半學生費三五個星期來研究，纔得精通的。當研究的時間到了，每一個學生即例得有一張導書，上面寫着這個單位功課最精要的內容，和一些特別的參考書，如書籍、雜誌、小冊子等等，在其中可以尋得一些最精要的討論的。課室第一步用作研究的地方，而不看作背誦的地方。在習課時，所有的補充材料與參考材料都堆集在內面。要澈底明瞭每一單位的精

要，除了上面的辦法外，學生都要做大綱或筆記，比較和教學測驗刻刻舉行的。惹起困難和需要實驗研究的問題，又常提出課室裏來解釋與討論的。

判克赫斯脫 (Helen Parkhurst) 女士更進一步，她在道爾頓實驗室方法裏，實際上已經打破兒童各科的背誦法。兒童一週一週地和一月一月地去學習和報告教師所指定修習的功課，到了年終一切應做的工作都能够因此完結。課室此時已不是背誦的地方，而是一些實驗室 (Laboratories)，專拿來給人應用課本及參考書，利於必要時得教師幫助去準備必要的材料。於一定的時間，舉行每科演講，但其目的純在解釋，而不在記分數，這種方法對於那些高能的和負責的兒童特別有價值。在英倫，只有少數最有能力的和最負責的兒童是升學的，這種方法就流行極廣，和取得極大的成功。說到這種方法，是否為那些不負責兒童的理想，那還待實在證明。

個別教學的文內特卡 (Winnetka) 方法是窩士本在伊連奈州文內特卡公立學校所創出而應用的，其他公立學校亦漸漸跟着應用了。此法的大部分亦是打破背誦法的。

在高等學校裏，如在斯瓦特謨耳 (Swarthmore) 及其他地方的高等學校裏所採用的榮譽制 (Honors System) 亦是免除高年級及低年級有能力的學生許多聽講和背誦的——他們所做的工作純是個別的，只是要聽演講和參預最後的考試。在哈佛，現在正試驗着一種新的計劃免除一年級以上的學生上課和聽講，第一個學期免除兩個半星期，第二個學期為三個半星期。在每年這六個空閒的星期中，學生可完全幹他們自己的研究。佛羅里達 (Florida) 的洛耶專門學校 (Rollin College) 亦正試驗着一種計劃，要完全打破上課聽講和背誦的。他們學生和教師每早聚集演講兩次。在晚上，一次講授，一個音樂會，或別種文化的儀式則為課程之必要的一部分。(在高等學校裏破除形式的背誦的趨向在第十四章將更有詳細的研究。)

因此我們看到現在確有一種廣佈的和迅速生長的趨勢，去大大變更那形式的背誦性質。——此種改革，大部分雖發生在新學校裏，實則亦不限於新學校。

四

姑承認需要一些確定的辦法，去測量和紀錄學生對於功課的技巧與成就的進

步，那亦不必一定要應用背誦來做取得分數的辦法的。在新學校裏，形式的背誦絕對廢除，兒童功課的成績，在必要時，則用別種方法去測量。代替背誦法的，是活動、設計、研究、報告，假如還指定讀習課本的話，則功課的討論只在一種講解的方式之中，分數的事情絕對不在兒童心裏。

一個巧手的教師如這樣去運用教材，興趣和真誠始能生效。如兒童問話，因為他們真要知道，並不恐怕表出自己的愚昧或缺乏了解力，那麼，這種問話就決不加以挫折，只表示歡迎，且以相當的時間給他們討論。別個兒童或許會答覆這個問題；亦可使發問者向字典或百科全書去搜尋必要的知識。教師供給兒童知識要盡量減少，因恐反為阻礙學生的研究和創造的力量了。在這樣的一種課室教授裏，我們確實可以看見學生能夠思想，功課中困難之點已經沒有。那使功課材料豐富的貢獻都由兒童自己去弄，而且都自他們的經驗與知識而來。每一兒童都是活動的，每一兒童都極有興趣而極機警。

當然的，有能力的教師，常能鼓動學生的興趣和熱忱的，使教學成為訓誨的，機械

的、固執的、使兒童苦悶的，那只是些庸才的教師纔如此。真正的教師，無論在那一種制度之下，都是一個自然的心理學者，曉得如何引出兒童精神的創造方面，幫助他去爲成功的發表；這種發表，雖是由教師根據課程的要求計劃出來，而終是含有兒童創造的性質的。

那種歸納的教學法，自蘇格拉底那時候起，已經爲有能力的教師所採用而得到極大的成功。據我的見解，要在抽象思想的途徑裏，取得兒童的興趣與創造的發表，這可算是最好不過的一種方法。在柏拉圖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見蘇格拉底如何精細地惹起一班能力不同、氣質不同的學生的判斷和推論。蘇格拉底方法的一種顯著利益，就是他能應用到一個分子非常複雜的團體去；而現代的教師，亦發見一切班級無論如何隔別與分離，如在兒童性質方面說來，都必須異質的，而不要同質的。

蘇格拉底常將那些論及抽象的，甚或秘密問題的皮球拋擲出來；這些問題，如沒有他的幫助，決不是這團體裏面的任何人能够分析明白的。然而他們一個又一個這樣冒險發表意見，全體向着同一問題來工作，一度一度的閃光便開始出現，而從問題

的黑暗處尋出光明來——蘇格拉底的老手常將團體握着應握之處，這全靠着他的巧手把那紛紜的討論回復到中心問題去，將一個字加到這裏或那裏去照耀這中心問題，和默啟各門徒心裏的新鮮思想，不久之後，他們各人都在真正的、誠實的、和冒險的意見裏去用思想。其中有些意見只有微小的價值，但有些却很有大的價值，蘇格拉底將這些發表過的言論，組織成一個模型，使能一步一步的近似真理的形狀，最後的接觸，他總要他自己來，真理從此便很顯明地現形，全體學生因是亦很激發和滿足，因為他們感覺這種發見有一部分是他們自己的成就的。這就是我們所稱為使人運用思想的創造方法，和那些強把已經弄好的材料塞進學生腦袋裏，要他們學習和記憶的訓誨的方法對比起來，他的創造性質即大顯現。

那些團體化的背誦法，亦是一種敏巧的方法；在此方法之中，各個學生都可輪流領導背誦。假如運用得適當的話，他就有惹起全體學生興趣和熱烈參加的一種好處。例如一個新學校的教師可將習古代史的那班學生，組織成爲一個團體的形式。任他們舉一個學生主席來指導背誦討論，又舉一個學生做書記來紀錄一切進行；這種紀

錄在下次背誦開始時，再誦讀一次，作為前次功課的一種溫習。這些任務一月輪流一次，所以在一年功課中，每一個學生都擔負一些任務。

但是這種團體化的背誦法也有危險。除非領導背誦的兒童很有能力，否則沒有生趣。其次，功課之解釋，其知識智慧的程度將不會高出於充作教師的學生，除非當時的教師以為那些不確當的或不清楚的印象都是確當的。但如應用得好，那不止增加學校工作的興趣和鼓動，而且有機會發展創造性和領袖能力。

形式的背誦，可憑劃分一班為兩組而變成一種遊戲。每一組的領袖預備一些問題來給與對組，對組答中了一題即取得一分。兒童很喜歡這種團體競賽的。他有一種社會的價值，因每組較弱的兒童，都被勸告或訓練而相當的準備功課了。

在我們校裏流行的事件，如果依着這樣組織起來的，都證明很能惹起和刺激學生的努力。在事實上，這種競爭變成這樣利害，用力又這樣緊張，循至常常覺得即應取消了這種競爭的紀錄，因為新學校的目的，是要鼓動每一兒童貢獻出他們在常態中所能貢獻的而不許緊張的情形發生。

甚至在重形式的學校裏常要求按步就班取得分數的，也可將背誦變爲一種演講，或在上課之始，給學生以一種簡單的測驗，而將背誦變爲一種裁判。其餘的上課時間此時可用作自由討論。當我在重形式的學校授課時，我嘗用這種方法去教授英文和歷史，而得了極好的極愉快的結果。

五

與背誦功課密切相聯的就是分數問題。新教育者大都很輕視分數和考試的專橫，因他們對於兒童心理及健康都有極壞的結果。新教育聯合會於一九二七年在格里來蘭（Glerland）集會，曾表出極端反對傳統分數制度的情感。斯密史（Ferguson R. Smith）曾得到極熱烈的鼓掌，當他說：「在我們制裁兒童之一切不合道德的對付中，記着他們的分數恐怕是最壞的了。我希望所有用分數作爲一些懲戒兒童的東西都在短少時間內盡量破除。」

分數和一切其他賞罰方法的弊害，在於牠們立起一些外部成功的動機，而非兒童自然而有的發表慾望的理想動機。我們已經知道：藝術家能有最好的作品，純在他

能够發揮內部的需求或默啟，近代教育者亦宣稱，兒童同樣喜歡着那些爲非外部的目標來工作着。教育之精粹在協助兒童盡量發展，故那些能阻礙發展之分數和考試的問題，自此變成極端嚴重。

因分數與考試而惹起的神經緊張，已爲一切教育者認識。現在的問題就是要研究此種緊張，是否爲教育之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附從。牠是不是一條鞭，必須拿在手裏來鞭策兒童，有如訓練禽獸者用索來產生一種所希望的動物教育呢？

芝加哥大學附中主任里維斯 (W. G. Reavis) 關於高材生的教授法，嘗很着力地加以否定。他說：「在管理一種廢除分數和班級的學校制度中經過兩年的經驗之後，作者認定還有一些對學生少機械而多強刺激的請求。特殊工作之贊許，賣氣力之挑戰，跟着原有的知識興趣之機會，被許去幹會有悟性的工作之負責，個人貢獻給功課工作之利益，以上無論任何一種動機都較學校分數，或過度的聲價獎賞更能惹起高材兒童去工作而有效率。

不幸得很，這常是勤奮的兒童，有極高感覺性的兒童最爲日常背誦和考試之緊

張所影響。

在蒙特克雷耳 (Montclair) 地方某君的十歲女孩子忽然得了哭泣的毛病，而且不肯上學了。那學校原是非常好的，這個女孩子在這裏自來都很愉快的，某君對於她這種情緒變亂的原因，於是大為懷疑，最後纔發見出來：原來有一個新的教師，每週將學生的功課成績標貼出來。這個女孩子幾個星期都名列第一。她現在開始恐懼不能保持第一的地位，而學校的功課對於她乃變成極端緊張。

對於許多有野心的孩子，無論對於高材如這個女孩子，或對於比較成就較小的孩子，分數與獎賞制度，常是一種不必要的和不合理的壓迫原因。我們確信絕不必要這種外部的刺激；因為愛好研究及成就，原是小孩子到自表和進步的常態路徑。

那些得分極低的小孩子，常為失敗的感覺所重壓，我們如一觀察他的面孔，我們便會承認這確能給小孩子以一種極有害的精神經驗。年幼的兒童應住在一個神異的世界裏，在這裏，沒有失敗的感覺，且不應有；在這裏，慾望是思想的根源，而思想又要變為成就；在這裏，一切成就在創造者看來都是美麗的。年幼的兒童必須很柔和地從

好的引到更好的，或從壞的引到好的成就。責罰與嚴格標準的不好結果，失敗感覺的惹起，那都應該避免的。

長久失敗經驗的結果，對於兒童，足以阻止其生長。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兒童決不能自然擴大與自由發展。兒童無論有什麼天才，如他們沒有這種機會，他們就決不能炫耀出來。這樣一來，我們也可得一個結論：兒童如此經歷的所謂教育的歷程，在實際上對於他們不是一種「無教育」或「較壞的教育」嗎？不是一些能阻礙他們，因困他們的心靈，壓抑他們而非高舉他們的事物嗎？

我們各人不是都認識曾為教育犧牲的兒童嗎？據我看來，我們好像一些病的靈魂，需要一種特別的診治法來恢復康健。什麼是他們所需要的診治法呢？那很簡單，只要鼓勵他，幫助他，依據他最好的能力來工作，沒有時間催迫的感覺，亦沒有從外部強加諸其身的各種人為制度壓迫的感覺，那可以用半年時間，亦可以用一年時間去給他們從新抬起頭來，和學習呼吸那些自由的空氣。從此，他們乃開始畏羞地回答，發表他們所有的知識和能力，他們真正的教育便從新開始。

一隻靈龜天賦有自衛的方法；因為要避免外界的侵犯，她只須縮着頭，閉着殼，那就成了不可攻擊的動物。人類從命運手中亦嘗取得同樣的救助，他們為逃避同伴的譏諷與時人的攻擊，亦會退回自己身內，把自己關閉起來，不與外部的世界為真實的接觸。然而這是一種危險的情形，容易走到精神的病態。我們所稱為教育的亦應幫助來誘導這樣狀態嗎？抑或教育之初步目的應為誘導精神的健全狀態，將精神訓練的歷程用作一種達到這種目的的方法，而不用作一種有害的方法呢？

六

即使我們不管上邊所示的害處，而要設法來維護分數制度，也不成功；因為分數制度尚有其他一種弱點，就是極難找得一種絕對的甚或適當的標準。分數的制度正如在藝術中為藝術者所鄙視的獎賞制度。誰人是評判者呢？我們已屢屢見到在藝術史裏，藝術者每為其伴侶或時人估錯價值。一個謙恭的藝術者為文藝會所卑視，其陳列品為公眾所排斥，而彼實為一偉大的天才，那又是何等一件常事呢？

兒重的工作怎能用百分數給以正確的估價呢？這已常常用有趣的教育實驗，去

證明各教師對於同一的工作價值，彼此每具極端不同的見解。數年前，美國曾有一次實驗，就是選出代表最有能力的英文教師多人，要他們用不限定的方法去評定一束英語作文。其所得結果在同一文章上，有些給以百分之三十，有些給以百分之九十，而平均差數亦百分之三十。這就是說，同是這篇英語作文，有些學校給以九十分，有些學校給以三十分。一個學生如一星期變換教師一次，發見他自己每次所得的分數極端不同，那不會使他非常眩惑嗎？他會怎樣想呢？他如何評定自己及自己的工作呢？他對於原來當作適當的價值符號的分數，會不會變成輕視的態度呢？他會不會作一個結論，以為分數沒有別的，只不過是一人對於別人工作的一種估價呢？

然而你可以說：英文是一種極難評定分數的學科；在一種正確的及一定的學科如數學等，教師所定的分數自必有更好的結果。為證明這點起見，於是亦在數學裏作同一的實驗，結果只覺稍微好些。例如教師對於一個因為一點小錯而致產生一條不正確的答案的例子，和對於不在歷程上弄錯，而是根本上弄錯的例子，應如何給他分數呢？這個例子應給他零分嗎？假如不然，則介乎零分與一百分中間，應給他什麼價值？

當我在中學當教授時所偶然發生的一種事例，足以表明用分數來評定學生工作之困難。在我所教過的一間很著名的男女預備學校裏，牠的第二年級學生曾受鼓勵創作詩歌。我很驚奇地發見，正在當年入學而英語作文極壞的一個很畏羞的鄉村青年寫了一些異常精美的詩。他這首詩很是秀美，他描寫一個山上鄉村，當着太陽西下，陰影模糊時的景緻。陰影如妖巫的手指慢慢伸出來，捉拿這塊為太陽作睡牀的草地，是他所用的譬喻，這首詩在表達中是坦白的、清鮮的、創新的、和美麗的。然而這個青年，如果根據他的入學作文的成績看來，他確是本班中最壞的一個。他的綴字不好的，文法是錯誤的，句的構造法是拙劣的，至他的平均分數，如嚴格地算起來，最多不過三十分至四十分。

一個對於創作的價值具有評判眼光的教師，應如何定這個青年的分數呢？學校入學章程說：假如他的綴字不好，文法錯謬，不要給他分數。世界上的人說：容我們獎賞有創造才能的人；我們藉專家之助，便能修正綴字。這樣一來，學校入學試驗所持的標準和世人評量功業所持的標準正相反對。許多有聲名的偉人及領袖，在他的鄉土裏，

省裏，或國家裏所發的言論及文字，八九是或完全是由一個年俸平常的書記給他作的。這個書記能寫最完善的文字，在學校成績裏是必達九十分以上的一流人物。這個有聲名的偉人用語言時儘可充滿錯謬，然而他的觀念可以有效。因此，如果我們要評量那些正在生長、發展、和向着成功的事業而前進的青年，我們將定那一個最高呢？我們將定有完善專技的人高呢？抑或他們有創作觀念的人高呢？

七

但我們如果認分數爲心靈的束縛與冒瀆，那麼我們將以什麼來代替牠呢？我們只要排除分數與考試，使不佔着兒童的意識界裏，和任兒童自己推進自己，任他內部求成功與效率的刺激與慾望去使他進步嗎？有些學校正進行着這種大膽的試驗。他們完全打破分數的外部刺激，只應在那種在工作中之更自然的愉快刺激，和欲得更完美的專技與精通的慾望刺激。

在兒童團體設計的工作中，絕不需要分數制度，且亦沒有牠們存在的餘地。在這裏，所有兒童都共同工作去完成他們所希望的成就。他努力去做他們所能做的，至於

團體慾望的刺激，就很足以推進其中賦性不大小心的，不大用功的，和需要一些東西去推動的兒童。在這裏，團體的公共制裁就已在生活本身，且有一切必要的刺激和評價。這是團體設計的一種極大的價值。換言之，團體設計的一種極大的價值在他是生活本身之重摹物。成就一天一天進行，絕不需要那些無關係的和無意義的分數，然而不特可以由團體本身判定其最終的價值，而且可以由全校、學生家長，及來參觀的人們判定去。

大體上，新學校雖然有時用某種方式來為學校辦公處或學生家庭去紀錄學生的功課成績，決不用分數來做刺激的方法去強迫兒童，他們亦決不將上課用做一種表現分數的作為。因此，他們雖未嘗取消記錄，而他們却已絕對排除了分數之專橫。

然而這些學校不去測量成就和進步嗎？有一種測驗正作這種目的的，那即所謂標準成績測驗。這種測驗可以用來測量算術、朗讀、默讀、綴字、歷史、地理、文法、各科的進步。他們可以幫助學校打破這些嚴格的和硬性的課程，使他們可以測量各科的成就，而不須舉行連續的背誦、打謎語、和考試。這種標準成績測驗每年可舉行兩三次，發見

學生各種缺點，以便設法補救。這些在新學校裏是很通用的。固然凡是製造和應用這種測驗的都負有一種重大的責任，就是不要視他爲一種過分標準化的方法，不過這種標準測驗之在新學校裏亦沒有何種危險的誤用。反之在別方面，他對於不爲固定的課程與背誦所限制，而能享受一種更創造的教育方式的兒童，確有能保持其功課爲常態進步的一種益處。

華盛頓美利堅大學教授心理學家本特力(John, W. Bentley)採用一種很好的評定等級的方法，這種方法可有刺激人去求進步的結果，而不會重蹈如我們在上而所表出的分數制度的謬誤。學生成績的記錄不是根據他們競爭的標準，而是根據各人自己能力的標準。至於自己的能力，則可用智慧測驗的方法去評定，而給以A B或C的等第。每季時間，每一學生的工作都測驗一次，而與他自己以前的智慧等第相比較。一個A等智慧的學生如做C等的工作，則他的工作當然不是滿意；於是可對他這樣說，因爲他是能做A等工作的，假如他誠實做去的話，他是能够做的。他現在只得C等成績，那就表出他未嘗誠實或勤勞工作。在別方面，一個C等智慧能力的學生，如

做着C等的工作，那便可滿意，因他能好好地做他在常態所能做的工作，若他能做B等的工作時，則已表出他極端用力，故有值得贊賞的成就。

許多新學校所用的報告制度，不特用百分數以外的辦法來記載兒童學科的工作，而且記載他們的品性發展、創造性、努力和其等等——估定整個兒童，不只他的智慧方面。此種報告制度，不特計劃使父母知道兒童各方平均的進展，而且使父母與學校合作去設法減少壞品性，發展好品性。

紐約倫理文化學校第三級關於學生理查 (Reno) 的報告，就是上面所述的報告制度之一種好例證。「理查在他工作內的興趣是很可贊賞的，因做事妥適，所以得到很大的榮譽。他的思想極好，問的也是有意義的問題。有時候他所問的問題是他應該想得出的，然而他們至少亦足表明他是注意所學的。」

「在英文、地理、歷史、工業藝術、美術、和音樂裏，都做得很好。他的綴字較弱。在算術中，他需要用更大的努力。」

「他所成就的并不足以量出他的能力。在行爲上自然有很大的進步。我希望他

將來繼續好的自制。當團體在堂中隨處動着的時候，他仍不能做到他所應被信賴的程度。當他沒有一宗特別事情去使他的心靈忙碌的時候，他似乎很難忍耐不去騷擾旁的兒童。這種欠缺自制力是很嚴重的，我希望在這種情況之下不久能夠留意，正如他現當全班工作能夠留意。

「在自然研究中曾很精進地學習，他是可加以協助的，他問些聰明的問題，答覆亦好。

「在體操裏極爲努力，但不免有些惡作劇；然無論如何，一當工作，他即做得很好。

「在藝術裏，我們見到有一種天賦能力。他的教師則相信他有時很難在藝術工作裏發表自己。一方面有一種趨向去明確地做各種事物，別方面又看見別人做一些更自由的工作，於是使他惑亂，無所適從。他很想由團體去做各事物。

「在音樂裏，他的教師很高興見到今年的進步。今年已再不如前是一個搗亂的分子，他已在各方面變成合作、互助和有好的自制。

「在家事科做過很好的工作，常常表出一種最好的態度。他已是一個誠實的工

作者，他曾用工精細的工夫去做中等的工作。」

大多數的新學校都是將兒童工作的報告保存起來；照例這種紀錄不給兒童看見。偶然間也可用等第的形式給兒童知道沒有成績，俾能幫助他們。

我們可以總括一句：每一新學校如果用分數，亦只在適合兒童心理的方法裏來用，好能幫助兒童自己了解自己，而不是用作一種恐懼、自私或緊張的原因。

紐約文布魯克學校 (Winbrook) 的厄文 (Dr. E. E. Ewing) 氏嘗敘述過一種并非過激，亦非保守的報告制度，他說：「在文布魯克學校裏，我們不給兒童分數。我們要他們工作而不以分數來作一種動機。他們對於所研究的材料或科目發生興趣，他們從他們成功的感覺取得滿足，那就是他們一切學校工作的動機。我們爲了要幫助教師正確地知道對每一人什麼是最好的，和每年做兩次報告給學生家長報告兒童在學業上和品性上的進步，常很細心研究每個兒童。這種報告是於每年的二月一號與七月一號用信的形式寄給各生家長的。我們寫這種報告，最留意說出什麼最能幫助他們

關於他們兒童的一切。這只給家長看，兒童是不看的。

對於兒童，分數制度的刺激力極大，那是不能否認的。牠是兒童努力的最顯著的根源，牠是每日成績的主要元素。在別方面，反對這種分數外部的和機械的刺激則是基礎於兒童的心理上。誠然，在第六級以下的兒童，在與兒童生長和發展的公例一致中，亦能因分數及進步而更愉快地、更健康地、和更常態地去學習。但在第二級之上，這種確定的標準重量迫近更高的教育階段的就會變為一個必要討論的元素。——因此，分數的事情甚至在新學校裏此刻亦不能純從牠好的一方面來了結。

假如一定要有分數的話，那麼就任我們用一種精細的智慧來使用牠罷，這種精細的智慧，是耶穌基督教我們拿來對付制度主義的，因為在違犯了安息日的規例之後，他說：「安息日是為人而造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造的。」

八

與分數及考試問題有密切關係的為編級及升級問題。我們對着有幾種科目弄得不好的兒童將怎樣辦呢？我們將要他留級，使他與年齡較小的孩童重習上年的功

課，同時眼看着他同伴升到別一個課堂嗎？這種學校制度所流行的風習，要一個功課失敗的兒童，下年必須重習同級的功課，在教育上曾發生這樣的不良結果，所以在公立學校裏，也發生一種運動設法來減少這樣降級的行動。如在人道上是不可能的，許多教師都喜歡和被准許使兒童升級，雖然他本年的工作不大滿意。

當兒童被迫留級時，他會怎麼樣呢？如果這個兒童是有精神的，是富於筋肉活動的氣質的，和是真正聰明的，（這是常有的情形，雖或他的學科功課不好）這樣的小孩，見到自己與一班年幼的小孩留在後面，是必極感痛苦。他會盡失他所有的學習興趣。課程內的學科對於他原已索然無味，若當重習一過，自然更變成可憎，他眼見自己的功課在一羣年齡較幼的兒童眼前失敗，而這班兒童的聰明或許絕不及他自己。他常在惡作劇方面表出自己的悟性與領袖的能力，或者最好的就是悻悻然不管功課。這就是他的學問失敗之始；此後除非有一種新的元素加入來拯救他；不然，則自然的結果自更討厭教育，要盡其所能，早早設法逃避教育的制度，愈早愈好；要出外工作，俾能尋得那不能在學校四面圍牆之內所能尋得的成功的滿足。

我們所描寫的絕不是一種想像的事例。實際上有這樣一種青年男女，他們的教育事業之失敗，確嘗延續到成年。許多事業界的人，都可很悲楚的告訴你同樣的故事，說他正從這樣的經歷而失去了一種於他此刻極為有用的高等教育。所以今日的學校裏，必有許多男女青年將來很悲哀地回顧他們耗費的學校時光，和怨嘆自己停學過早就走入市場和世途了。

約翰孫 (Marietta Johnson) 女士甚且更進一步，要求沒有一個兒童應有失敗的感覺；他應每年由別人幫助，在最適合能力的各條途徑裏去發表自己。他每一年的工作都應自然而然地從他的興趣裏流出來，而不要使他屈服在一種形式課程之下，因這種課程，是具有兒童本身以外的目標，由成人依據以為有益於文化生活的模型而去訂立的。因在女士所主持的非耳和普 (Fairhope) 有機學校，和幫助設立的格林維基的厄治武德學校 (Edgewood school)，其中並沒有班級，只有依據年齡而組織的生活團體；例如八歲的團體，九歲的團體等等。一當年齡足夠，兒童便自動地從一個團體轉到別個團體；同樣的實施，在紐約普洛脫 (Flora) 女士所指導的城市鄉村學校裏亦

可見到。

此外還有一種減除編級與降級的方法，就是富士本所發明的文內特卡方法，前章略已說及。照這種個人自學的方法，並無所謂升級降級，只有按着各人的步驟，慢慢上進。柏克（H. Burke）爲二十年前三藩市州立師範學校校長，曾將這個觀念發表到教育界裏去，打破教育上的連鎖步伐（Lock-Step），這是他給與升級的一個名稱。他這種觀念當時並沒有人聽。然而富士本的天才（他曾做柏克的學生）和教育理論的進步，此時混合起來，就使個別教育和解放兒童受制於團體標準化的福音宣傳到各處。此刻所有的公立學校，都研究個別差異的問題，和設法打破這種因他每被認爲很簡單，其實是很複雜的團體（即班級）的制度。酵母正在發生作用，過去的傳習，正要到那基於更了解兒童心理的新教育原理與實際來代替牠。

九

降級固有弊害，越級而升亦有弊害。要兒童留級對於兒童是很不好的，但推兒童上前，以他爲心理能力的模範，那亦不好。如果兒童不宜從同年齡的班級遺下來留級，

那也不宜超出同年的班級來爲兩重的升級。數年前大西洋月刊發表過一篇極有趣的匿名論文，分析和描寫這種越級升班的不良結果。據作者報告，他在成年的生活中極難從他的社會事業裏，補救過來；一種社交上低劣的複雜心理，常將那種惡果表現出來，即一方面自慚不足，羞見同儕，別方面又以地位較高，很想炫耀自己，這種嚴重的缺點像一根黑線貫穿了他一生事業中。

十

讀者可以看見，關於分數、考試、和升級等事情，實不容易得到一些確實的結論。又高等專門學校的入學資格，對於中小學所精通的教材，與百分計算法所表出的種種要求，一天不改，則新教育者亦一天不容易從初級中學起，將傳統的分數制度之有意義的改革，自由實施起來。

人們常要懷疑：專門學校是否有一日如約翰孫女士所要求的，所有對於某種年歲的聰明誠實的願意入學而無學歷的青年，加以收容，並引導他們前進，從他們現在的境地引到他們所欲往的境地。這就是成人教育所做的，這亦是新學校所流行待遇

從小孩到青年的辦法，新教育的勢力從成人一路工作而下，又從兒童一路工作而上，或許終有一天克服這個堅固的堡壘即高等學校，戰勝他的孤軍無援的屬國即中等學校。（柏蘭斯頓大學校長希本（Hibben）氏說：「如果我們發見一個青年學業不大好，然而這個青年是有領袖的才能的，證明他對於同伴有廣大的影響的，對於生活有廣大的眼光從而顯出他有道德上的光榮的。這種青年，雖短於各科，亦應為我們大學所歡迎的青年。」希本氏這段話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可以說：生活的自身就可以考試我們和把我們分級，那是不錯的，不過世界所要求我們的成就只在一途，就是我們所選擇的一途，他有許多時間給我們準備。他亦不會要我們去實驗能力，除非我們自己覺得能夠表現。因此之故，世界所給與我們的測量是很確實的和很透澈的。

即或高等學校，不用考試制度去把他自己的權力投射到低等學校去，即或一切教育者，很自由的去解放兒童免受一定的成績標準之壓迫——我們亦必感覺到兒童幸福（不是教育機器的需要）會指出一種確定的（雖然也是廣大的柔性的和

人道的）測量進步與成績的制度，不過在這樣的測量制度裏，所值得注意的只在兒童的幸福，至於一切其他制度的苛虐都會盡量剷除。

第十章 教師是一個指導者而不是一個工頭

「我要為我的孩子們找尋的教師有多少是在這個世界之外的。因他對兒童有一種深切和強固的忠誠的。」

——Angelo patri——

新教師是兒童的伴侶。在紀律方面，他們並不如過去的專制政府所表現的。學生參加學校管理，新學校一般自由的空氣即拿來建立師生間一種基本的和諧。同樣，在功課方面，新學校的教師再不是課程和班級標準的專制推行者，他只是一個知識的指導者，在學習的道途上為兒童的伴侶，為兒童忠實的助手，幫助他們達到知識、道德、和精神命運的完成。

因為教師是同情的、了解的，因為他們幫助兒童使自己止於至善，而不採用那些嚴峻的和人工製造的紀律，故我總見到新學校裏的兒童，是大無畏、天真爛漫、誠實、自動、敢作敢為、和勇於表出本來面目。

新教師常接受兒童的問題，和他談話如一件侶，我們應打破成人對兒童的專制態度。我們教師與父母對兒童要有一種更好的精神了解。兒童不只是一種未成熟的智慧，他簡直是一個心靈；在本質上，是與我們自己同代的，因為心靈不繫於地球轉動的年月多少。介乎成人與兒童之間，有多少地球繞太陽而轉的差異，不應該就武斷兒童的心靈一定較幼於成人。心靈的比較顯然是在完成程度中的一種比較，而不是在地球運行年月多少中的一種比較。

心靈於初生時顯現在一個孤立無援的身體裏和一個未完成的心裏，這種事實，只是表明這個年幼兒童為心身範圍所限，和為這個新來居住的地球的知識所限。他未有一種完善的方法去和外部的世界交通，那並非證明他內部的精神生活之缺乏。兒童的觀念，當能夠明顯地表出，在本質上，是與成年人的觀念相頡頏的。因為在觀念世界裏，兒童和成人一樣慣熟，一樣無限制，即在成人世界裏，論同情、公正、高貴等等，也沒有什麼比兒童的觀念為優越。

因此，我們必應刻刻誠敬地待遇兒童所發表的思想。在這個柏拉圖的觀念世界

裏，我們必須誠實地、柔和地、尊敬地待遇兒童像同代人或伴侶一樣。如成人有微些自卑或自大，兒童的心靈即刻關閉起來，如一朵美豔的花當受強暴接觸時即將花瓣關閉一樣。因為兒童是一個富於感性的機體，他只在同情、愛情的空氣中纔自由地伸張、發展和發表自己。兒童多年在制度的約束裏，便漸漸將自己收藏起來，和停止發表；那最寶貴的恩物——他的人格，此時便變成障礙、抗拒和貧乏。

因此新教師很尊重兒童的意見，和很鼓勵他們發表意見。教師的同情和了解，在新教育裏是一種很重要的原素。他極看重從自表與創作而發展。門茲曾成功使兒童用文字為創作的工作，說道：「我們對每一意見都很尊重，姑無論這種意見在我們較年老的，和假設較聰明的人看來很覺可笑——我們尊重兒童的意見正如醫生尊重那些自白的症候一樣。因此我們很容易使兒童要在我們面前來誠實地和公開地說話。說話誠實，是我們必要有的，因為這是新教育的起點。」

最重要的，教師切勿憤恨兒童的個性與能力。憤恨的性質是我們各人都有的。牠雖是很悲慘一種事體，而師生關係間亦常不免有牠。天才兒童較教師更有本領，更聰

明，即常能惹起憤恨，此種憤恨每在微小的專制中表現着，是即以惡意去壓抑兒童的高貴優越的心靈，或阻止兒童去表現他的光榮的人格，所以海頓（Haydn）憤恨他的學生貝多芬（Beethoven）（德國樂聖）到這樣一種地步，循至他們不得不決裂友誼而分離。貝多芬明白表示海頓再不能教授他，而海頓亦不能使貝多芬歸附入他以爲最完善的那種音樂方式中。貝多芬雖在言辭上未免太欠禮貌，在事實上是對的，海頓再沒有東西去教他了。在這事例上，就是學生較教師有更偉大的天才。這種事例在教育歷程上是常有的，在教授一個聰明優越的學生當中，教師將採一種什麼態度呢？我們必不要歡迎這樣事變，雖然學生有一些固執，我們也喜歡發見學生有這種才能嗎？當然的，教師必要自謙，他必不可壓抑天才學生發表個性。

新教師很明白他自己已掌握一些人類的材料，這是世界上最怪異的材料，其怪異之程度，比較科學者、藝術家、或事業家所掌握的更甚。不用說，在新學校裏的教師，雖照常用盡了自己所有的一點一滴的能力，而對於自己的工作都是愉快的。他的教學變成一種藝術，正如變成一種科學，所以他實是一個藝術家。他所創造的一切事物都

是爲着兒童而有的，而兒童所創造的一切事物都由他贊許和協助來發表的。在這種愉快的「融洽」裏，使師生之間，彼此常在創造當中，這纔是形式教育所不常有的愉快。

當學生被許去幹他所欲幹的事情時，則介乎師生當中便有一種新的關係。當教師協助兒童去完成他們所渴望的事物，去完成他們所悟出的設計，而在此種完成之中，兒童亦知道需要成人協助的，和很歡喜感謝此種協助的；那麼，兒童此時何等高興呢？在此點，我們介乎前代與後代之間，就有了一種最完全的關係——成年人服務和協助，少年人感謝、尊敬、和忠誠。

然而聰明的教師，只當必要時然後加以指導。他要容許兒童盡量嘗試他所有的建設能力；不需幫助，不需過大的權力去擔任。凡參觀新學校與看見一種課室設計逐漸發展，人們必會驚奇，不辨那是學生幹的，或那是教師幹的；因爲他們一切都共同工作。常時還是這些聰明的，有領袖能力的兒童來爲各種的提議，和給團體以命令。教師儘量袖手旁觀，有時候或且任兒童弄錯一些，然後由錯中學習真理，而不須教師小心地守着各人，預先防備一切錯誤。

這種新的方法的運用，對於昔日的教師是何等困難呢？因為昔日的教師訓練是要代兒童預先計劃一切工作的，處處領導，處處要預先提防錯誤，和要趕快根據課程所規定的途徑去改正學生的工作。課程是教師的主人，正如教師是學生的主人。這種政治的絕對主義，從抽象課程的嚴酷要求做起點，中經督學、視學、與教師，然後到了各級最年少的和最柔嫩的學生去，處處指導他們。然而在新學校裏的教師，有更幸運的位置與更好的機會，他絕不在任何縛束中，感覺課程、學校制度或校長要求之壓迫。他很自由去研究兒童，去尋求他的需要，去幫助他為最好的發展，和跟着天才來發表；這樣地看待學生，比起處於舊式階級的和訓練的制度壓迫之下看待學生，那是何等更愉快呢？

要從新學校的教師免去大部分教學上的緊張，因為此種緊張，只是從強迫兒童跟着規定的步伐前進的學校系統而來。如果我們把牠好好地分析一下，是一種何等傷心的事體！這專去擠逼着兒童的脚跟，刺鑽那些落後者使其保持步伐。不管兒童的意志，而驅趕他們走向他們不知是何處的地方，我們要哀憐這些兒童軍隊的師長、旅

長、營長、連長、排長和一切官長，因為他們在這種訓練的歷程中，絕不覺到愉快。他們是不足責的。制度強迫他們，正如他們不能不強迫兒童。制度使他們激擾，使他們未成熟而先枯痿。使他們許多一到每天晚上就過度疲勞，在每學期之終，呻吟憔悴。

我們不會在新學校裏找到一些困惱的教師。在這裏，教師也像自由的兒童一樣，在創作中發表他的自由。他確實在每一件事情都需求創造的。而創造的工作既然是興奮與滿意，所以在教學上常有一種愉快，能補償所過用的一切氣力。

一個教師在新學校裏所找得的實行創造的機會，從實行中又會增加創造的習慣。一個新到某學校的教師這樣熱心去為兒童擺佈各種設計，他竟然有時放學回家，還打電話給校長，去報告一切。他說他從創作中所得的愉快，正如一個藝術者在創作中取得的愉快。（因為他是一個作家，所以他亦知道藝術上的愉快）當他在訓練的學校裏，該處不喜歡創新的見解，他說他那時心裏是空虛的，沒有什麼教育的觀念的，從此我們可以見到無論學生或先生，都會由發表而長進。

新教師不欲多說話的，因為新教育不將兒童看做一個空的要人去充塞實的器

皿，只看做一種由實行而生長的有機體，所以假如需要說話時，那兒童說話就更比教師說話爲重要。學生如一被動的接受者，要從教師嘴唇裏接受各種知識及學問，此種見解已經從教育的舞台上過去了。高等學校的學生，他們被請報告如何改進高等教育的觀念時，就表示他們最反對的是講解辦法。其實在最重要的背誦裏，教師亦很驚奇的發見他所耗費的時間之多。

我們在霍奇啟斯(Hotchiss)所著的課室工作中的設計法(Project method in Classroom Work)裏面發見一個很有趣的和很著名的歷史背誦的速記報告：「歷史背誦法原是美國通行的課室背誦法中的代表方法，尤其是在小學高年級、中學及大學的方法。在一小時的功課中，班內各人答案的總數不過八十一，教師却答了七十六次。其次在背誦中，班裏各人所共說的只有七百六十四字，教師却說了一千零五十五字。這就是表明教師和他的問題在背誦中佔去百分之五十八的時間，僅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時間是給全體學生答覆的。又從大體說，教師的問題原應惹起思想的，然而學生所有的答案絕不見興起什麼有意義的思想。」

這種背誦的方法，包含學生的記憶答案，教師負全責去指導一切事情，自然不是新學校的特性。新學校的教師而且極口反對日間課程之過度的專斷。課程的自由，可以使人更能準備將知識傳給學生去。而聰明的教師，能知何時與如何說些需要的話，和何時停止說話的。

二

新教育需要一種更有能力的教師，那是很顯然的。而這種更有能力的教師就是新學校所要找尋的。他們的校長終日在國內各大路上找尋這種教師——找尋那些能適應的，能感覺到兒童氣質和需要，同時又有一極強固的人格，在必要時去支配兒童和管束兒童的；找尋那些藝術的教師，創造的教師，能指導兒童創造的教師；無論教材怎樣，能引兒童去思想、發表、擴張、和生長的教師。又為新學校而有的教師，必須是自然而然的或訓練而成的兒童心理學者。因為新教育要負全責去訓練整個兒童，而不只訓練他的智力。

為要實施新學校的教育法，要吸引有能力的教師固定他的職業，那是很重要的。

那種給兒童以極多自由的新教育法，不能由低能的教師實施成功的，在事實上，對於平庸固執的教師，要得到一定之結果，則那些從頭至尾都是一種固定不移的課程與視察的舊制度確是必要的。至於新方法之成功，則全在於能應用新方法的教師身上。例如那舊有的形式的紀律一經取消，則教師就必須敏捷精明，和能知如何協助兒童自治，究竟必需的運動與喧嘩是多少，同時要准許的活動是多少，及如何將兒童這些無數的活動保持在一種社會的紀律裏。在入新學校參觀的人看來，各課室裏都有一些從活動而生的混亂與擾攘。杜威博士在學校與社會裏說：「然而從這種作業中，從這種產生效果的工作中，和從在一種社會合作的方法裏而工作之中，就會生出一種自己特有的紀律。」

要想這樣合作的與社會的紀律能夠產生，那就必須一種富有能力的教師來負責，在這樣自由的境況之下，那要聰明、技能、精神能力和人格力量，纔可以保持兒童彼此和諧及有秩序來工作。新教師於每刻間都要活潑，能很精明的去反應他所照料的兒童，預先察見他們的需要，和保持他們像一個個人，像一個自動的團體，而非如被動

的隊伍之活動。

其次，在解放兒童避免過於固定的課程和課本當中，那些低能的教師常感覺忙無所措，絕不能收得兒童應有之效果。杜威早已指出新方法這種缺點，當他說：「有一個問題常時這樣問（關於新教育的）如果你開始就讓兒童的觀念、衝動、與興趣，都這樣粗暴，這樣散漫，這樣少精細及精神化，兒童怎麼樣能養成必要的紀律、文化與知識呢？」他的答案是這樣：我們必須指導兒童的活動，和引導他到必要的目標。這要一個很高的人格去指導兒童自己所選擇的活動，和幫助取得相當價值的結果的。

復次，在創作的工作與藝術的事情中，只任兒童隨意憑形式與顏色為媒，去發表自己，那是不夠的。杜威說：「假如你只縱容兒童這種興趣，使兒童一路無止境的幹，那只有有一種偶然的生長。然而任兒童先行發表他的衝動，然後由批評、問題、與暗示，使兒童明白他自己所曾幹的是什麼，他所需要幹的是什麼，那麼，這些結果就大不相同。」那要教師有一種天才，纔可以產生兒童之天才的工作。那並不是每人都可從兒童身上得到雪才克（Cizek）及滿格累味特（Mangravitte）所能得的工作。要使兒童

在初年的教育期間，寧可接觸一種創作的教師而不與一種形式的、官僚化的、和低能的教師相接觸，這是何等重要的事體！

凡庸的教師常戀戀於傳習的課本。現在入學編級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是這樣低微，故平凡的教師在學生時候通常很少文化的修養，因而沒有能力去補充課本的工作。在非分科教授的教師，必須擔任課程內一切的學科時，此種情形尤為真確。所以那並沒有什麼奇怪；他們不敢離開課本所供給的知識過遠，不去鼓勵兒童問話，若當問時，就徬徨煩燥。此種煩燥的情形，及教師恐慌多問的情形，每為敏銳的人們參觀公立學校時所覺察。

新教育運動之本質既在於自由發表，我們所要求兒童具有的，既在智慧上的好奇心、問話、研究事物底細的熱烈慾望，從人事關係中得到知識，以及擴充眼界——那麼教師必要有多量的知識及修養，纔能回答一切奇異的問題；當他不能回答所問的問題時，必要十二分的忠誠，必要用同伴的態度完全承認。那就是絕對必要的。在舊制度之下，教師是假定教授兒童，而兒童要從教師及課本吸取一切要得的知識。然而在

新學校的情形裏就不相同。教師不作爲知識的輸送者，而是知識的指導者。他在這裏是幫助兒童，尋出他們所要知的東西。他可以表明給他們知道如何爲着所希望的知識去應用百科全書，和別的參考書。如果他不懂得一種欲知的事實，他絕不遲疑說出，他將去找尋，明日上課時補說。或使兒童自己負責研究。因此兒童與教師在知識的尋求中是同伴。無論是學生，是教師，都不懷疑地承認對於各物的愚昧；因爲他們的欲念是去找出他們所不知者，而不是要掩飾他們所不知的事實。文飾既經免除，一種誠實的智慧和精神乃可以在兒童身上發展。

三

然而何處可以找出這種理想的教師呢？平常的學校當局會說：「這有什麼希奇呢？如果給我一間學校，同時有這樣的教師去管教，那我亦能得到一種更好的教育效果。因爲無論怎樣，總是教師製造學校的。」所以教師真是教育上之極重要的元素。而新教育運動之發展，得過他們的力量不少。在無論那一新學校裏所做的工作，不是校長一人的理論與實際。那差不多都是全校人員的共同工作。而教師在課室裏既有多

少自由發表他們的觀念，所以在他們方面有許多創造，他對於學校工作和新教育的實際，都有極優越的貢獻。

人們或許以為：如果沒有一些元素幫助他們去找得這種教師，就不能跟着這種新教育的路程前進，因此不免失望。元素是什麼呢？第一，工作的創造性會吸引許多缺此而會罷教，或因此而繼續執教的人。他們很望在新學校裏教書，雖然薪金本身不是一種足夠的報酬，而可以在與兒童創造工作的愉快裏得着補償。那是科學者在實驗裏及在找得的新途徑裏所感到的愉快。許多青年人，家中富有，不必藉月薪以維生活，於是跑到新教育的領域裏，帶着許多文化給與新學校的工作和課室，很少想及薪金，只喜歡得一機會，在此靈感的領域裏，表出他們對兒童的愛情和他們自己教育能力。這種的青年婦人比起平常的教師，亦常有一種更文明的家庭環境，更廣大的教育，和更多的旅行。

第二，許多新學校比平常學校能給更高報酬，因此，他們便可吸引一些更有能力和受過新教育法訓練的教師。新學校之所以能付給這種較高薪金的理由，就由於此

種學校多爲學生父母的合作團體所管理，這些父母都喜歡爲他們的孩子得到這種教師，和很願意在這樣的學校裏供給他們必要的報酬，校款在年終時常常欠缺，於是

由學生家長自由募集維持，他們對於學校的預算絕不想加以限制，而致於不能聘到這種的教師。

第三，新學校在結婚後而退職的教師隊裏常找得極有能力的教師。此種教師或則不必教育他們的家庭，或則只有一個小孩，常渴望回到他們的教學工作。從新教育的實施方面看來，這樣子的「母親教師」是最好沒有的。他們有爲母的經驗，他們能對兒童有同情和了解，爲不曾做父母的人所少有的。他們還具有一種已婚人的安全有恆的氣質；這種氣質在教學的事情裏絕非小事，而且這種辭退職務來做家庭事務的教師，在初級師範學校畢業的團體裏，算做最優美、最富吸力和最有能力的人。他們如果生性是具有教師的天才和品性的，就易發覺從前課室裏的一種誘惑力，如今仍未消滅，且常與無生氣的家庭生活相交戰。他們就其所專長的出來服務，那對於世界和他們本身，是有何等大的利益呢？用他們的薪金，就可以請一個管家婦來料理家

事，維持家庭，他們爲什麼不出來教書呢？在學校時間，他們很可以帶小孩子到所教的學校裏。所以這種已結婚的婦人，確是新教師中優秀的一種。

四

教師的職業，從報酬與地位方面看來，在國內並不見得更優厚，那是很可惜的。在歷史的某時代裏，與在教師得到社會人士高度尊崇的國家裏，有能力的人便選擇這種職業。然而在美國，那裏的工業界和財政界不特有豐富的收入，而且有更好的機會去接觸社會的人物，去遊歷，去修養，去和國家的領袖親熱聯絡；那麼，今日最有能力最活動，和最有天才的青年人，自然會趨於這條途徑去努力了。

我在這裏並不是單純地主張教師要有較高的薪俸與較好的社會待遇。我的懇求是爲着小孩子。我想見到有能力的，能創造的，和有鼓動力的男子女子，能專心致意於教育事業，好使這個偉大的和繁榮的美國兒童，能與近代文明在文化與品性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最好貢獻，在教育上互相接觸。如果將自己的兒童，放在從不盡力職務，或只求自己的安樂與愉快，然後勉強執業的下品教師手裏，還覺心滿意足，那簡直是

犯短視病的人。

然而情形漸漸變好了，在開國先驅者已首先能擴張美國的能力，於清掃山林，制服自然的困難，和開闢富源而使我們得享福利的工作中，這是在事業界所稱為極有本領的人們，而他們正在這裏被需要着。這點並沒有遺憾。他們已盡將他們的能力貢獻到美國現在所享受的物質進步中。柏爾從教育事業轉到發明家的事業去，這或許更為重要，應該如此。然而我們此時的家庭，已充滿電話、摩托車，我們的山林已經清除，我們的礦山已經開發，全國已滿佈鐵路，我們已達到人類自然能力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了。

所以今日的聰明父母比較往時更注念兒童的教育，和更能判別所需的教育。他再不滿意只有訓戒的教育了。他要見到他們的兒童在最好法門中發展，他要能找出上品的教師去擔任這種事務。那些實際事業的美國人，對於能發展兒童的人格，幫助他戰勝缺點，幫助他向着理想之身體的、心理的、社會的、精神的發展的教師，與對於那些只能供給一種學科於兒童及父母都無興趣的教師，所具的態度是大有不同的。自

然的，那些實際事業的美國人對於只曉得希臘文、拉丁文法、約翰孫王朝時代的作品和法文詩的教師，是沒有多大尊敬的。他用金錢去酬報替他教育兒童的人，正如他用金錢去酬報替他修理汽車的機器師一樣。然而他或許渴望着別一種教師；因為和這些豐富的人格及偉大的心靈互相接觸，是可以惹起求知的想像與熱忱的。他這樣子的態度可算是一種最可尊敬的態度。

因此我們可以見到：教育界不能從公衆得到應有的尊敬，說不定一半由於教育者及教育制度負責，其他一半則由父母負責。我們不想過於嚴酷批評現存的情境，我們只想用力去改善教育的事業，使他能吸引世界上最優秀最能幹的人物，來領導發展整個的兒童，而不只來教各種學科。

時日將即來臨，而且爲時不遠；那些盡其生以發展兒童的教師，將得到光榮、尊敬、將得到能給他們以繼續進修機會的薪俸，及得到在社會裏和在國家裏能常接觸別界的成功人物的一種位置。這個時候，我們最優秀的青年男女，即會很自傲地去充任教育者。

新教育似趨向這種目的而進行。因爲他有特異的機會去創作，因爲他與新父母有一種密切的同情與合作，所以即使現在的新學校，都有些不平常的機會給與教育界。或許他所給與今日教師的最大機會，就是助他們學習變成一個教育者。如果一切學校都變成新學校一樣，成爲兒童之第二家庭，與他們的父母家庭密切合作，相信教育者必能在社會內取得確實的地位。因爲能創造的青年男女，無論努力着那一種人類事情，總會得着別人的認識。何況我們所需要的新教育，其創作性是超出一切事物之上的呢！

第三編 從嬰兒學校到大學

第十一章 待兒童如人類

「教育之目的不應在被動地去了解死的事實，應活潑地向着我們能力所可創造的世界而活動。教育必須受社會正在發生之聰明的見解所默啓然後可。」
——P. Pansoll——

讀了上述各章之後，我們不要以為新教育只是一些實際進行的原則與實施的綜合。不是的，牠是一些比較更有深遠意義的東西。牠是基於那能貫通整個制度之統一的基地工作上的。這種潛伏於一切新方法之下的統一的概念，就是將兒童看作人類，和具有多少權利的一種概念。

新教育者之看兒童，不是看他做一個空的瓶子，等候着被動地充滿一些東西，也不是看他做一張白紙，可以給成人任意地寫上一些東西，更不是看他做一個弱小的和無助的生物，教師可用無限權力去支配他——新教師看他像自己一樣，是一個人類，應待他以禮貌、尊敬，和相當的了解其天性。

此種成人對兒童態度的突變，一部分由於有更精細的，和更真誠的人類天性的評價，一部分則因今日文明比較昨日文明更有人道主義的理想。從這種立場來看的新教育，嘗為辛德 (Morton Synder) 在新教育聯合會一文裏描寫得極好：「新教育不是一種方法，或一種專技，或一種計劃，而是一種純正的運動，範圍很闊大的，性質很明顯的，請求是難抵抗的。他在教育領域裏，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對本世紀的美國或世界生活力求改進。他是人類事業自由解放的趨向之一部，與公共衛生，職業關係，社會情形，及國際事業的各種運動密切相連。他是各種科學與理想主義間的一種聯絡。他是近代男女成人對着兒童及青年之一種倫理的精神的新態度的發表。」

從幼稚園到大學，如兒童一日被視為教育的專制君主的臣民而不可逃避，那自然有一種不自然地對付他的趨向，亦自然視那些無效的和不合心理的教授方法為滿足。如果我們想看到那處的教學方法是最有效，和應用得最愉快，我們就只有轉到成人教育的領域來；因為這個領域裏，入學者之自動的天性迫使教師採用有趣味的和合作的方法。

我們在誦讀卡內基會社(Carnegie Corporation)的主席刻拍爾(F. P. Keppel)論及成人教育所必須的論文，我們便會很驚奇的看見成人教育亦需要應用兒童教育之同一的方法。他說：「成人是一個自動的學生。他不能如高等學生被強迫來繼續的。他必須要有興趣纔能繼續……他的教育必須有關他的日常經驗，而他的日常經驗必須拿來為教育所用，因此，必須採用新的教學法，編配新的書籍，和創出新的學校環境。因為在這裏，師生必須如一些共同研究者的集合體，而不能儼然是教師與學生。總而言之，成人教育是一種新的教育，如不包含一種新的哲學，最少須含一種新的科學。他還有一種新的作為……那是很顯然的，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為教育的，絕未將落在人民身上的事業，給以足夠的準備，使他們能支配自己的命運。現在必須有多量的教育，尤必須有不同質的教育。」

不錯，不同質的教育是各人都需要的，成人需要，正如兒童需要，而這就是新教育運動的目的，去供給一種新性質的教育，能取得兒童的興趣，而不必強迫，而不必需要

強有力的教師去施行一種專制強制的方法。

凡是見到施行新教育的人們，同時總見到發展着一種新的兒童。他在人類關係中，算是一種極大的革命現象，滿載着重大的結果；其重大之情形，有如騎士時代初興時婦人地位所起的變遷。騎士的尊崇婦女與敬禮婦女，尊重他的美麗，和自己約制自己，使得不用強力而以溫柔的方法去贏得他的興趣和忠誠——這種態度之改變，嘗大為促進婦女的心理和精神的發展。因此，今日成人對兒童的態度，如有同樣的變遷，必將促起——已能促起兒童本性之顯著的發展。

在騎士時代，婦女第一次被視為有精神的生物。新教育者待遇兒童的態度亦惹起同樣的變遷；我們在歷史上是第一次留心兒童的自我，他的品質，他的心理，他的主要天性。我們今日不特精細研究兒童究竟怎樣構成，而且在我們的環境中尊重他，遵從他。我們待他如人類。我們第一次給兒童以教育，而不要他被動地接受一種從外部準備好，絕不顧及兒童天性、需要、和欲望的教育制度。

今日以前，那種專制的教育法算是對付兒童的最好方法，而專制的最重要元素，

課程中，超個人的專制，原是從知識稀罕，又無印刷術去傳播的時候遺傳下來，在這個時候，課程是得到知識的唯一法門，由此而幫助人類進步。這就是他取得人類重大的尊重，不能任個人加以估價及懷疑的緣故。然在現代，我們有一切知識，容易取得各種知識，故此時最神聖的不是課程而是兒童自身，他的人格，他的本性和他的潛力。

杜威正從這方面對新教育盡他的貢獻。讀者恕我再將本書第一章已經引述過的他這段最動人的話，而可視為兒童的大憲章的，重說一遍：「兒童是起點，是中心，是終鵠。兒童發展，兒童生長就是理想。惟有他纔能做出標準。在兒童生長之下，一切功課都要附麗於其下，給他來應用。這些功課都是工具；其價值如何，全要看他能否有裨於兒童生長的需要。人格品性，都比課程更覺需要。教育的目標，不是知識，而是自我表現。老實說，我們確要與兒童站在一起，不要離開他。決定學習之質與量的，確是兒童而非課程。」

這就是新教育運動的中心及本質。新教育要設法找出兒童的本性，幫助他自己去發展個性。那些特別的教材，比起這種跟着天賦才能的方向而發展其豐富圓滿的

人格之目標，那有什麼價值呢？因此，兒童常要反抗學校制度，俾能解放他們自己的興趣。我們現在反轉來，新教育要努力發見和供應兒童的需要。這確如杜威所指出，是人類思想一種大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天體說是一種大大的革命一樣。新教育之最大的發現就是要課程旋繞着兒童，而不是要兒童旋繞着課程。

從上面的觀點去討論新教育似是不可少的，因為這樣可以使人明瞭這種新教育并非靠着任何一種獻議。這寧是一種新的教育精神，一種成人對兒童的態度之改進。在新學校裏所採用的各種方法都是對兒童的新態度的結果，而不是方法自己有一種獨立的原因。那不是這些方法使新教育成爲如此，那反是新教育的精神使這些方法成爲如此。

與此互相關連的，就是沒有一個教育者，能憑採用一些新方法或新原理便可以實現新教育，除非他對兒童完全接受這種尊重的、了解的、和友誼的新態度。如果教師對兒童有合理的態度，他便即有新方法。若果教師沒有這種新態度的話，則什麼新方

法都談不到。

總之約翰孫(M. Johnson)女士是不錯的，因她看見兒童是一個有精神的生物，看教育的職務爲助兒童發展和發表這種內部的精神，她曾寫信給著者發表她對於新教育的意見，她的結論最動人，可作爲新教育之主要方針。她說：「總之，我相信生長的兒童之最基礎的和涵義最廣的需要，是屬於精神方面的。如果我們能供應這種精神的需要，給他愛情與了解，使他誠實、公道、不懼、和愉快，他的神經系統就必互相聯絡，他的身體生長必能保持，他的天賦能力必能盡量發展，因而保證爲最良善的智慧生長。所以如果我可以用一句話去表達兒童的需要，我將說他的需要是精神的或情緒的。」

這些近代的小孩在新學校裏受指導，得到一樣豐富的人格與精神，我們見到他們何等美麗，何等高貴，何等可人！他們確是一個簇新的種族，我們對於他們能具有無限希望的，赫胥黎(Huxley)以愛爲發明真理之一種條件。我們亦可以說：聰明的教師善於指導的愛，對於兒童及其潛力，亦確能有神異的發見；這些發見不特能引兒童到一種更豐富的發展和更大的愉快，而且最終必然達到一種較高的文化，和一種更甜

美的文明。

第十一章 兒童應在幾歲入學校呢？

「嬰兒學校的觀念就是承認兒童早年的教育在兒童生活中非常重要，就是創出一種確定的計劃好在兒童訓練的科學及藝術幫助父母，去補充有時而窮的父母知識。」

——Dr. E. L. Woods——

兒童應在幾歲入學校呢？一代兩代以前，入學年齡通常在六歲。後來幼稚園出現，收留五歲大的兒童；幼稚園當初原只零落散漫在各處，但後來就成爲人們一致贊助的普通制度了。私立的幼稚園跟着成立，收容至四歲大的兒童。現在還有一種最後的創舉，要組織「前期幼稚園」(Pre-kindergarden)或嬰兒學校(Nursery)，收留十八個月大到幼稚園年齡的兒童來訓練。

正如在先前一切的運動一樣，每當新設的學校出現，人們就必追問：「這是合理的嗎？」因此在未討論嬰兒學校運動的利益之前，容我們先去考察牠的原因。

幼稚園與嬰兒學校的報名入學，既然全是志願的，那麼，這種制度就顯然表出母

親方面至少在日中一部分的時間，對他幼兒的教育上的調護。有一些實在的有意或無意的需要，然而什麼是這種需要？和這種需要是怎樣來的呢？

舊式的家庭，雖當父親要到城中求生活或做事情，也住在鄉村裏的。家庭之四週例有一個大的園圃，有些可攀援的樹木，臨風搖曳，和有許多待掘的地孔；如果那塊地是沙地，那麼，那些地孔還可直掘，弄成一些地窟。在屋前並沒有那些旋轉的，足以致死的汽車交通。屋的後面，則有空曠的土地，伸張到樹林和草場去。在兒童看來這簡直是一個神異的世界——是一個無論用什麼引誘的校舍都不能交換去的世界（其實當時的校舍亦決沒有這樣引誘）。

遊戲的伴侶嗎？很多呢！第一，在自己家裏，總有三兩個幾乎同年紀的人，一個年幼的妹妹，天生出來受戲弄的。一個大姊幫助遊戲及演劇。大哥製造玩物及小船等等。其次，鄰舍還有幾個小孩。遊戲的伴侶太多了——在大家遊戲當中，不用說有無限好玩的事物，及良好的健康的品性的訓練。

那時候，還有鄰舍的成年人能來幫助增加生活的愉快，和品性的訓練。例如有一

個慈愛而細心的約翰太太，他常給我們一些最精細美味的好東西吃，如果我們能最先洗乾淨我們的手，給他用讀書鏡照着來檢驗過。

因此我們不希望在三歲、四歲，甚或五歲那時候入學校去，假如母親要我們在這個幼小的年齡入學讀書的話，我們必用盡能力加以反對。不過我們的母親絕不會有這種提議。他們很樂意能得他們的小孩在身旁遊戲、玩笑。雖然他們沒有保姆看着我們，他們還有很年長的兒童可以擔任略為料理我們，此外還有那個什麼工作都做的說埃爾蘭土話的女僕人，一當有空閒，亦很高興地來分任管看兒童的責任。

不，我們的母親不會使我們在孩年入學的，他們對於任何教育者欲在他們鄉村裏組織所謂「前幼稚園」或嬰兒學校這一類的東西，必很憎厭的。

但此後一切都改變了。情境變換過，一種簇新的和完全不同的事物便映入眼簾。家庭再不是從前一樣，學校也不像從前。城市裏的家庭再不是兒童一塊娛樂的和理想的地方。至於那些新學校，固不是一塊禁制兒童的地方，他而且變成一塊自由的、安樂的、優美的地土；因此時年幼兒童所抱憾的不是到學校，而是留在家中。

大的家庭現在是稀有了，兒童如若在家，只有他自己和他母親，間或有一鄰兒，在城裏家庭天井是很小的。樹木只是拿來點綴，並不可以攀援。摩托車風馳而過，街道成爲禁地。母親並不如昔日的母親常能留在家中，他此刻有更多的公民責任，和更多的社會義務。僕婦再非家庭的保持者，所以再不是理想的兒童管理者。保姆，曾被試驗去照料別人的小孩子，而結果證明太沒有效率，或太易厭倦。我們要是個獨子，一天只有母親來遊戲和鬪嘴，亦覺得厭倦。

在鄰近地方，此時建有一間新學校，他是收留四歲有時還收三歲的兒童的。我們看見這些小孩子每天早上都聚集起來，很愉快，很熱烈，都表出很高興來這裏。九時許，我們又見他們入到一所類似家庭的建築物，他們還喜歡我們同去。不久，我們聽見音樂了。這些小孩子正舉行節奏的活動。我們何等喜歡和他們一氣呢？小孩子現又合奏音樂了！何等動人的！他們此時又出戶外，共同遊戲，很是高興。至於我們就只有一隻貓和一些木塊來玩耍。在積極方面，我們確欠缺一些東西。幸而，有一天，母親說也任我們去，明天早晨我們開學了。

母親同時亦很留意新學校從九時至四時代她管理小孩，使他快活，教訓他，養育他，給他睡眠，接他來，送他去。這種聲音頗具引誘之力。柏替 (Betsy) 已漸漸膽大了，變成頑強執拗了，漸漸生出些衝突的情形，日子也很難度過，因為似乎很難使他愉快地作業。母親沒有作業的設備，亦沒有作業的專門技能來供應他的需要，而他需要中最急切者，恐怕就是其他兒童及團體生活了。

然而柏替現只有三歲半。母親頗以使之離去家庭為慚愧，祖母更不贊成此事。鄰人及親戚要疑心她所以遣女入學，全在離開她，使自己得安心去讌會，讀書，或買物。自然的，在日間這樣子脫離她，於母親確有大利益的，不過母親還未想到這樣做去對於柏替是否最有益。然而無論怎樣，見到布朗太太也遣他的三歲半孩子季曼到新學校去，那似乎沒有什麼弊害的。

布朗太太對於學校非常熱心。季曼在這裏不只愉快而已（他在這裏覺得這樣愉快，所以如果有一些事情阻礙他上學，他就必很失望。）他的行為而且很有改進，就在家裏也變好了。他比前較靜默，較服從，更有辦法。就在飲食的習慣中也改善許多。他

已學得吃菠菜、蘿蔔、和生菜之類，對這些絕不會不吃。他愛教師，他找到他的同伴爲快樂之源。在事實上，一個新的社會界已開門給他進去了。

因此柏替的母親便進一步，探訪這間學校。和校長一談話，他對於所見到的事物有很好的印象——優美的、可愛的教師，和家庭一樣的學校環境，豐美的遊戲玩具，愉悅而可愛的孩子。然而他關於類似放棄父母的義務，將幼年的小孩交托學校養護一事，還對校長表示慚愧。

校長後來說：「夫人，如將你的小孩交托在一個有訓練的教師管理之下，在有組織的團體裏過活，不和你一同在家裏一樣嗎？即就小孩子，你自己和一般社會講也都很有益處，而沒有損失的。第一，近日一般的家庭，有美麗的傢具，過高的熱度，欠缺各種設備，絕非適於兒童活動的地方。第二，你的小孩已開始拿他自己的意思來反抗你。他成爲事物的中心太久了。你若是供應他和招呼他過於限度，和他成功用意志來反抗你，那對於他的品性發展就很危險的。在這學校裏，他將在同伴當中施展他自己的意志（其實他之使用意志和拿來抵抗別人實是很應該的）惟同伴決不會仰他之鼻

息，惟他之命是聽。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在世界上找到他的常態地位及價值，和發見怎樣纔是聰明，及何時纔不應當堅持己意。他的立志時期，將由有許多時間及辦法來應付這些問題的教師來料理。他們是受過教育兒童品性的訓練，和對這些問題有許多經驗，有許多管理專技的。例如那些最嚴重的紀律，都不過暫時將兒童離開他所愛好的團體。惟有家庭裏，你是不能這樣子做的，因為你並沒有團體。如果柏替來這裏一兩個月，他回家而不更服從與和諧，我將極端驚異……

「說及你自己方面。你原是有知識有本領的婦人，你有精神的和身體的能力。如果學校和有訓練的教師能代你做這種瑣碎的事情，他們比你還做得好，那麼，為什麼你應耗廢時間來做這種非特別適合你去做的事呢？你如每日將六小時到八小時的能力用在別種事業上，而不用在教養孩子上，那麼，還有什麼理由能證明你和世界不是都能得益呢？如果小孩在學校確比在家裏為好（你將來自然會見到）那麼，你將能力解放用在別種事業上去，社會不是很能獲益嗎？我不以為那是為娛樂而解放，因為我不相信如你這樣子的一種婦人會在娛樂的途徑裏度過空閒的時間，我以為那

是爲着文化、公民、人道、甚或職業工作（如果你喜歡）的目的來解放。我明知道你在未結婚以前，你很善於執行工作。所以最好爲着你自己的經濟收入及爲着世界，將你的能力放在世界工作裏，而不要完全放在一個小孩子的訓練上……。

「而你萬不要以爲這是不眷顧你的小孩；你在每日的最重要時間，和星期六及星期日的全日，你還有他在你目前，你並未放棄你的責任。你只是允許學校代你分擔一部工作，使能幫助你及你的小孩……。

「還要記着，我們與家庭是有密切的合作的。如果你有關於兒童的問題，則那些問題無論是校外的或校內的，都不可不來這裏要我們幫同解決。在我們方面，亦時時將我們對兒童知識、品性、康健的常態發展各種問題報告給你，使你觀察和使你接觸。」

這個母親給他說服了，他便送他的小孩子入學。而他的住在鄰街的朋友格來謨太太也送他的孩子們去。此外還有許多母親一樣的跟着做。在多少時間內，親戚間每發生一些批評，可是不久便停頓了。祖父以母親不負責任，也曾埋怨許多時日，直到後

來他到學校參觀，見到兒童們的成就，始釋然無事；他看見他們的好儀容，有微笑的面孔，和有可愛的教師，非常愉快。當柏替領導兒童音樂隊奏樂時，祖母更爲自誇。他現在成了新學校的發起人了。

「前幼稚園」因此就在教育界裏出現。牠將能永久存在，那是不成問題。牠表出革西耳（Gesell）教授所謂幼稚之向下擴張。如果平常的兒童五歲入幼稚園而有益，則平常的兒童三歲入前幼稚園或嬰兒學校，那也自是必然有利益的。這是教育向着下面領域而擴張之自然的發展，這領域日前未嘗開闢的，而現在的開闢與實驗，對於兒童發生最有利利益的結果。其中更有價值的，或者就是嬰兒學校能代幼兒的父母及教師，成功一些重要的發明，幫助他們建立兒童訓練的最好理論與實際。

二

對學齡期前兒童作緊張的和科學的新研究，算是近代心理學影響之結果，因爲近代心理學曾經發見我們人格和行動的模型是要追溯到極早年的原因；搆成品性之理想的時期，就是在這學齡期的時期中。在此時期之後，一切物理的、精神的、情緒的、

和社會的習慣都很難改變。據兒童心理學者的意見，兒童身體的、智慧的、氣質發展的基礎，建立於五歲之前，有時尙較此爲早。

耶魯大學革西耳博士說：兒童人格之構成，包含着無數的約制反應、聯想的記憶、習慣、和他學習而得，及爲他人教育他之結果的態度。

如果兒童所接觸的人物是特別要負責兒童所發展的品性，又如果兒童在學齡期前所接觸的人物大半爲他的母親，那麼，爲母親者須了解兒童心理，須知道兒童構成錯的人格模型之危險，和知道如何巧妙地避免危險，及在積極方面如何建立兒童一個健康的和常態的人格，那是最爲重要的。

現代已很注重身體的培育，所以近日的母親都曉得兒童許多的身體衛生，和養成身體習慣。但爲父母者現在必須加上知得精神衛生的責任，和要負責養成兒童之良善的精神、情緒，及社會習慣。所以在幼稚園之合理的和自然的向下發展上，嬰兒學校也成爲學齡期前的兒童心理研究的地方，和成爲現在的母親和未來的母親及教師而有的一種訓練學校。

整個的運動原是簇新的。在一九二零年，革西耳博士開始研究一組兩歲的兒童於耶魯精神療治所 (Yale Psycho-Clinic)。在一九二一年衣阿華 (Iowa) 兒童幸福研究所創設一個「學齡期前的實驗室」 (Pre-school Laboratory)。研究兩組兒童：一組從兩歲至三歲，一組從三歲至四歲。這些研究所，目的純在增加現在可以得到關於學齡期前的兒童的知識。

在一九二二年，底特律 (Detroit) 地方的麥利爾判麥 (Merrill-Palmer) 學校，為着訓練女子「實行賢妻良母的作用和職務」，乃開辦一所嬰兒學校，作為該校活動之一部，以亨頓 (E. Henton) 女士為教師，女士嘗從英倫帶了許多知識及訓練回來，而此種知識及訓練即為他在該處接觸嬰兒學校運動而引伸得來者。一個範圍很廣的訓練課程已經發展了。許多高等學生報名選修關於兒童養護及發展的各種學科，或參加研究工作。這些學生是從各大學來的（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共有十八個學生報名）對於麥利爾判麥的工作都曾得了很滿足的大學積分。

在衣阿華城，各學生有觀察和招接兒童入「學齡期前實驗室」的經驗，正如他

有訓練去研究的經驗。

在一切這些嬰兒學校裏，做母親的都有權利去選修一些課程，從中得到一些關於理論的和實用的兒童心理學的訓練。

其次在麥利爾判麥，在衣阿華城，在哥倫比亞師範大學的兒童幸福研究院（Institute for Child welfare Research），在波士敦的塞格來斯（Suggles street）嬰兒學校，學生都可以準備嬰兒學校教師的工作。

有些更進步的師範學校，亦爲着將來的幼稚園及小學的教師而設備學齡期前的兒童心理學的課程。那些管理年幼兒童的教師，要了解他們早年的特性和反應的方式，這似乎很屬重要。他們應該知道兒童自初生時始——即應知道他們的興趣，他們的社會性，他們的行動模型，在那些師範生所希望教育的年齡之前。因此厄凡斯吞（Evansston）國立幼稚園及小學學院與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密切聯絡，使彼此的學生可以交換選修心理學和學齡期前兒童的訓練課程。同樣，克利甫蘭（Cleveland）幼稚園及小學的師範學校亦變爲西累塞（Western Reserve）大學教育

學院的嬰兒——幼稚——小學系。

一種很高的教師資格，正引入這個新的和動人的嬰兒學校的領域裏。訓練這種學校師資，純基於大學畢業之上。除非先已得有大學學位，否則必須選修四年大學課程。嬰兒學校教師的主科至少要有文學士的學位。所以這種學校的訓練方法與教授方法，比較其他任何一種教育機關，都有一種更高的，與更科學的基礎。教育部大衛斯 (Mary D. Davis) 說：「嬰兒學校正對教育發展着一種科學的態度，為其他任何事物所未嘗有的。」

在學齡期前的學校範圍內忠實工作的人們，所有的希望，就是這種科學的兒童研究，要能漸漸透過幼稚園去，和這種教育三歲兒童的嬰兒學校，能變成正式的學校系統之一部，作為在幼稚園前的一個團體，正如幼稚園剛纔變成小學系統的一部分。如此，兒童的教育就將變成基於兒童心理學的一種繼續不斷的科學工作。同時還具有我們各個大學之有益於指導或教師訓練的一切科學的力量。

如研究各州關於幼稚園的法律，就可見到學校的年齡限制，都是慢慢向下而降的。入幼稚園的年齡，如在中部許多地方仍規定五歲，但亦有二十五州已定為法律，准許幼稚生四歲入學。加利福尼亞威斯康辛等五州有命令要幼稚園收容四歲大的兒童——無論那一處地方，如有二十五至三十個家長要求，就可設立幼稚園，而由政府的普通基金補助。還有蒙大那 (Montana) 等三州要幼稚園允許接收三歲大的小孩，因此在公衆意識中，有一種要給兒童一些更早的教育機會的新運動，已在徐徐發生，那是很顯然的。

現在將嬰兒學校作為我們公立學校系統之一部的，在華盛頓有四所，（這四所學校都是在貧民的區域裏，他們的目的在使兒童離去街道的生活，及防止他們染上不良的習慣。）都是收容三歲大的兒童。在密竭根 (Grand Rapids) 也有四五所，（多是中等階級的子弟入學，學校供給設備房舍，而公共團體則支給教師薪金）在嘎拉馬蘇 (Kalamazoo) 有一所；至於在加州的奧克蘭 (Oakland) 有十八所，都是准許三歲兒童進校，為公立學校之一部。這種運動發展得這樣迅速，實沒有一種敘述能擔保

恰如其分地表出公立學校採取嬰兒學校的最新情勢。

然而大多數的嬰兒學校，一如幼稚園，都是私立性質；將來有多少時間亦必繼續如此。在某處地方，如在芝加哥，一個嬰兒學校由一組父母合作建立，其中每人都貢獻一部時間來幹學校的事務。任何接近的父母團體都可合起來開始的。然而在未開設之前，總要知道一個嬰兒遊戲的組織及實行，極端需要小心研究學齡期前兒童之科學的領域，和需要一個在此領域內曾經妥適地訓練過的教師。為幫助父母與教師組織小規模的嬰兒學校的團體起見，哥林比亞師範大學現設函授課程教授，而由兒童心理的專家擔任。

嬰兒學校運動一種極重要的情形，就是他在父母教育的方面有很大貢獻。美國許多嬰兒學校，都很留意從觀察與實驗去訓練父母所需要的兒童心理學知識。在許多這些學校，父母每日都用一二小時來合作的。

從這種研究的中心，關於學齡期前兒童的習慣與行爲的科學貢獻，曾有許多著作發表了。

從此我們可以看見，這種學校數目雖少，正做着一種極重要的工作，去將我們關於兒童受教能力所有的知識領域，擴張到極早的階段。關於學生年齡的限度，這種運動將終止於何處呢？沒有一人能說的。如果行爲的模型與人格，在初生時即開始構造的，那亦沒有什麼道理推到這種有組織的研究會重新改造學齡的限度，低降至兩歲，或一歲半。不過華特生博士（Dr. Watson）及其他的個人心理學者，亦已開始研究初生的兒童，所以嬰兒學校或許亦會擴張他的診治機能，包括初生的兒童，使教育在實際上成爲一種生活的歷程。

美國各州中，首先正式承認，必需爲一般父母，設一種公共教育的就是加利福尼亞州。本州公共學校監督在初等學校雜誌（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說：「當其始，我們提議組織八班，四班在州之北部，四班在州之南部。每個中心都設立（一）一種爲學齡期前的母親而有的功課；（二）一種爲青年男子的父親而有的功課；（三）一種爲介乎六歲至十二歲的兒童之母親而有的功課；（四）一種爲青年女子的母親而有的功課。這些班每兩星期聚集一次。一部分的時間用來講兒童心理、品性教育，及同類問

題，及組織訓練兒童的單簡設計。教育局爲實施這種計劃，就請求所屬的團體幫助；即如休茲 (Selma Hughes) 的行政人員，家庭擴充與大學擴充的人員，兒童衛生局，和處理犯罪兒童的機關。

說到新教育方面，嬰兒學校運動的內容是最具鼓勵能力的。在這種新教育努力的新領域裏，既沒有束縛的傳習，也沒有必須遵守的制度。兒童必須年幼的，方法可極自由的。教師懂得兒童心理，和常時留意兒童的反應。最後，這裏亦是教育的一段落，兒童在其中是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注意的中心。什麼一種事物都是爲兒童利益而有的。自表、創造、悟性，是鼓勵的。其中亦有社會享樂的餘地。在事實上，這些階級的兒童的社會發展是被認作最重要的。分數與考試絕不存在。教師是兒童的伴侶及愛護者。

總而言之，我們發見在這個新的教育階級內，一切教育人員都承認和實行新教育的原則。或許嬰兒學校之自由的與真實的空氣，透過了幼稚園及小學校，直達全個學校系統，而將由小孩子引路去改革教育。

第十三章 中學之失敗

「學校裏所有死板的、機械的和形式的事物之根源，顯然都來自將兒童的生活與經驗隸屬於課程。因為這樣一來，研究便成了與苦悶同義，功課與苦工同解。」

——約翰·杜威——

法國批評學家孚約勒教授 (Professor A. Fauriol) 在耶魯大學過了六個月，嘗這樣寫着：「在精神的事物裏，美國的學生太過柔順了。他的批評感覺和他的求獨創的欲望，是很遲鈍的。這種青年人，能够瘋狂地委身在戰爭裏，這種天生的冒險者常很高興找得環境有真正的阻礙，而當他們參加入觀念的鬭爭時，則又幾乎怯懦不堪——那確是很奇怪的。這自然無疑地由於他們常被訓練着去學習而不去思想。」

這番話並沒有呵斥，亦沒有高聲的譴責，有如一個人發表他自己的意見，而他自已已預知這些意見會被反駁的。不，這些意見確能正確地、活潑地、同時又很恬靜地表出美國教育制度的缺點。

我將在孚約勒教授良善的意見之上，加上第二種意見。這就是：我們的預備學校，名副其實，確常預備他們的學生去求一種教育，而永不即刻給他們。這就是他們到了大學時，還不能思想的緣故。

那好像一個人，他作工和爲人牛馬去賺金錢，使在他將來後半生能享受旅行之樂，和文化之修養；及到了這個時期，就發見不能改變自己的心理習慣，去享受他以爲是準備着的文化。他的準備是一種錯誤的準備。我們中學所實行的對高等教育的準備也是一樣錯誤；這一種準備實不是爲着較高的文化，不過爲着一些心理上孩子氣的习惯，在使我們大學裏的青年，對於歐洲智識，要如嬰兒走在森林裏，茫然不知所歸。因爲你決不能在他們一生最能受教的四個年頭裏，訓練他們學習而不思想，而當他們入大學去時，則希望他們能做那種真正教育上非此不可的思想。

然而這不是中等學校的錯誤，乃是大學的錯誤。要勸善懲惡，那尤其是大學本身要先受懲罰。他要求中學交付一些沒有思想的而飽吞事實的學生，他們就支付那應給的罰金，來收受這些無能爲力的物料。

在昔日，當大學入學試驗考試比較簡單，那就生出許多給真正教育和訓練思想者的中學校；至於今日，大學入學程度的要求使中學變成這樣壓迫與束縛，遂使他們不能不在青年最寶貴的四年期間，將教育壓榨出來。

怎樣醫治呢？各大學雖然具備誠心冀圖改革，然仍保留着極端專制，這並非實有類於諧談的，我就想提出一種嚴厲的醫治方法：廢除大學。因為，老實說來，我寧可見到大學不留存，好讓真教育施之於中學；而不願見我國的青年在中學四個年頭，在精神上大受束縛。

二

容我詳細表明大學對不起牠的預備學校的兩種主要事情：第一為課程，第二為教法。

說到課程方面，大學很自私地，和很短視地立意強迫預備學校幹那牠認為於教育是必要的苦事，教那一切為精神練習而有的形式學科，和那所有不關於生活的抽象學科；至於那些有趣味的，和最具靈感的學科，如近代史、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生物學、地質學、哲學、近代文學，等等，則留為大學自己所有。

因此中學便不能不將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教給於語言學絕沒有需要的學生；他們又不能不將代數與幾何教學生，這於學生每篇都是一種苦工，而學生亦絕不識

其將來需要的目的；他們亦要訓練學生一些由他們大學老師所選出的英國古文——這些古文，除了從大學英文文學系畢業的中學教員，其餘大多數的中學教員自己亦永沒有讀過，也將永不會誦讀的。

當我們美國青年情緒最熱烈，品性最發育的時期，這個是不是我們所供給他們的最上品的智慧食物？在他們一生各時期，這原是最應給以靈感的學科及最與他們所開展的生活有關的學科的一種時期；這原是一種理想年期，可以教社會學、心理學（對於個人內部生活之了解）、經濟學、近代歷史與文學、進化史的故事、地球的故事（地質學）、星宿的法則（天文學）等；同時這亦是一種理想的年期，去將文明之進步——從他的最晦昧的原始，到那最光榮的現在，同時亦不失在預言中去預料將來的那種文明之進步，——簡單地、明白地描寫起來，好能鼓起他們為種族而服役的努力與野心。

預備學校現在的課程，匪特不能鼓起與培養那些真正論斷的能力與習慣，即一個學生的興味，他亦很可悲地不能惹起及維持；結果美國的青年，在這個教育期間，便

最高興和最努力去爲各種的課外活動，第一是去幹學校的體育運動。這種體育上的興趣既自始即透進青年的教育年齡裏，則其到了大學的時候，即生長成爲一個夫朗堅 (Frankenstein)，那尙有什麼稀奇？大學體育運動和學校場地活動的問題，給今日的大學校長極難解決，而他的力量純由於中學的教育課程毫無生氣而來。這點也是低級學校向大學復讐的。

爲什麼我們的孩子不更莊重地受他們中學教育呢？下面的事實可以表明這個問題。我的朋友的兒子，回家過春假的假日，被遣送到我這裏來學拉丁文。他的母親很懇切地問我他的功課，很抱怨他的學科成績低下。他既從聰睿有爲的父母及祖父母而來，則他的學業失敗自必惹人視聽；而其更惹人注意的，就是他出外時，每隨身帶着退耳 (Thayer) 所著的加富爾傳 (Life of Cavour) 一類書籍來讀，這足表明其心理的特性。爲什麼一個以讀加富爾傳爲樂的兒童會成一個低能的學生呢？這種頗費思索的事情不久即行解決。我問他正研究着什麼，他告訴我：化學、幾何、拉丁文、英文、法文——所有都是抽象的科目，都無關於生活的科目。當着路人皆知的世界最大的戰爭交

鋒開彙的時候，當着生活技術中的發明與進步正急忙地進行的時候，在這個充滿奇怪的事實與遭遇的世界中，給那個十七歲的聰明青年一種何等智慧的課程呢！我們還會懷疑他的興趣落後嗎？

有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是一個京都偉大報紙公司的承繼人，因為拉丁文及幾何學的分數太低，便不能入柏靈斯頓大學。要想進去，他必須補習一年這兩種科目，然而這對於這個青年並不是一種能鼓勵其前進的前途，所以他在暑假期間，即為他的報紙來工作，而且磨拳擦掌與世界相見。他的父母很想他入大學，但他的立意適與此相反。他要放棄教育，在他自己的報館裏執業。這種年華不讀書，那是很可惜的！那尤其對於前途事業如此的青年為可惜。為什麼他不能有足夠的先見與忍耐，勉強完成他入大學的準備？你或會這樣子詢問。那正是這點，他已倦於準備一種教育了，假如他在這誠懇真切的時期，早已有一種真正的教育，而不是常常準備教育，那麼，我深信他決不會放棄那到知識之路的。

假如我們替他想想：他有一種基礎於研究他自己城市的社會學，他在公民學裏

研究閣議中及議會中的工作；在近代史裏有各種精細而生動的問題；英文作文科目大部由教師合作，以供應報界的需求——你看他會不會放棄他的教育權呢？然而惜乎不是這樣；他有拉丁文、和法文、和代數、和幾何、和古代史、和課本的英文，他要準備了這種科目便可入大學，而化在大學裏的真正教育就成了一種抵押品。然而這不是他結束他的準備，而是他的準備結束了他呢！

三

我們的中學，不特在他的課程裏是錯誤的，而且如我說過，他的方法也不能不錯的，其原因則由大學的需求過於嚴重。這些需求使中學發生價值的標準。每一個私立學校都知道：他們學校成績優劣之最後的評判，全在他們入大學的畢業生百分數之高下。自然，每一公立學校也這樣子受評判，然而對於私立學校，這却是一種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因此，在初級或高級之末年，全校的師生便竭力預備大學的初試及決試。學生是憂念的，因為今後他有些學習的需要，所以負有一些責任，好能應付目前的測驗。教師是憂念的，因為他們職業的地位正堪虞慮。

如此，經過兩三個月之緊張的工作，大部分揣摩去年大學入學的試題，和在精神捱苦與掙扎的一陣紛擾當中，我們所稱爲中學教育的四個年頭，便宣佈完結。這裏，並沒有時間去思想，去爲智慧的成熟，去爲這樣子的心靈成熟的態度，有如一個偉大的教育期間完結之日所表出。他有的只是勉力、苦腦、和精神的掙扎。

然而這不特在中學教育末年纔弄出這些錯誤的價值。大學的把持力實達到中學的第一年級工作。不論這些男女學生在這個特別的學年如何適於進步，而其標準亦常向着入大學的目標。這常阻礙真正的教育。例如在我所教的一間很大的私立男子預備學校英文班裏，有兩個學生，他們思想的成熟與有創造性，實爲班中第一，然而他們所寫的工作包藏這樣多的錯字與錯句，我乃不得不每月給他們在班中最低的分數。我只能根據大學的標準來給分數與他們。因爲如果這兩個童子由我給他們及格，因而送他到將來是必失敗的戰線上，就會顯出學校的判斷和我自己判斷的錯誤。

四

預備學校之反面的謬誤，就是牠是那些所謂注入式的雖飽猶食的學校，牠取得

牠的成功，在乎細心研究過去許多年的試題，和要學生細心預備他們認爲下屆考試必會出的試題。這種分析是一種技術：例如在幾何學裏，如果有一條定理，於過去五年內常出的，那麼，今年或許就不會再出，因爲主考的人會以爲牠已是太顯著了；但或許也會再出，因主考的人實在歡喜他。在幾科裏，那可考的主要試題，是有一明顯的範圍的。從研究某一大學過去的試卷，一人就確知那主考所特別愛好的問題。如果有些問題在這年內還未發現過，他們就很會在這年出現。在別方面，大多數的問題正在去年出現，他們今年就將不再發現。

因此，注入式的學校，並不要首先將一門學科充分教授給學生，因爲如果這樣，校內平庸的學生，便會有全部失敗的危險。但如趕快將一門功課約略讀過，然後將裏面的主要問題選擇出來去充分訓練學生，直至他們能合起眼來也會答覆，或心裏明白。這樣子預備功課的學生在考試裏面失掉機會的至多不過十分之一。他可以在那裏發見注入式的學校未能成功訓練他的題目，然而如果將熟識的問題答得很好，他亦將及格。

這是一種很大的遊戲——你可以說這是一種賭博。牠在某方面好像打撲克牌，在他方面又有類於那著名的游艇競渡。他實是一種富有吸引性的遊戲。預備學校的教員，熱想入大學的學生，和大學的考試人，都參加入內的。

大學的考試人在這種賭博裏佔些甚麼位置呢？爲什麼他要絞盡腦汁去找尋那些不顯著的和不希望的問題呢？他爲着自己的生活起見，必須找出一些不易爲對手預先料到的問題。因此，他常被迫求援於那些新奇的和隱秘的問題。這自不是公正的問題，因爲他們這樣微瑣，就是最有準備的學者，也難熟於解答，然而考試的人要採用他們，因爲別的試題過於容易了。

這是一種大的美國遊戲。我也知道一些牠的內容，因爲我也曾參加其中，在其中做過一個學生，一個預備學校的教師，一個大學的主考人，和一個試題的製造者。

與我們最著名的一間大學爲非公開的相聯絡的一間注入式的學校，他的有本領的校長不過在數年前死去，計他直至死時，從教育工作裏所得的入款，比起一個大學校長還多。這種工作的一代居然使他致巨富，而躋於百萬財富的階級裏。他能很安

樂地告老退職，然而遊戲還很倚重他，與他結不解緣。他之最娛樂的時間是在課室裏，準備他的門徒如何挖掘那間古代學術機關之可怕的牆垣，這個機關就是在他的課室窗門對面的。

如果我們的朋友法國孚約勒教授，能參觀一間這種注入式的學校，他便能明白何以那些青年當入到大學時，絕不會思想。他們在一切的教育歷程中，永遠沒有時間去思想。誠然，美國人的能力并非在於抽象思想的途徑上。在這方面看來，我們都是小孩子。其原因，則由於缺乏興趣，並非缺乏精神能力，這由我們能用精銳的思想去幹實際的事時，其成績即使不能超越世界最好的，最少亦等於世界最好的，由這一點可以證明。所以在教育歷程裏，凡有機會可以訓練如何思想者，都不應該糟塌去。現代的高等學術機關，專門學校，大學，不去幫助中學達到這種極好的目的，反而用我們在上面說過的那種重壓的愚民政策施於低級學校，以阻礙他們自由思想的趨勢，那確是很可憐的。

五

這種情形怎樣補救呢？要想妥適地解決這條問題，那必須從兩方面入手。第一，大學必須發展一種更廣大的、更公正的、和更實際有效的入學考試法，使中等學校將來得到方法上的完全自由。第二，大學應允許中學改造他的課程去滿足他自有的需要。

關於第一點：由大學入學試驗委員會（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之努力，已得有許多好的成就。他們所提議出來用以代替舊式考試的那種內容非常豐富的考試，就是向着正確的方向而走的第一步驟，因他已離去瑣碎的事物，而趨向一種更廣大的教材招接在許多大學裏，一種完全新的入學需求之概念正建立着。根據這種概念，今後入大學的條件就很注重學生以前學業的堅實與努力。從智慧測驗所表出的自然智力，由教育者及負責的朋友所保證的品性，甚或健康，以作能否擔當大學時期緊張工作之身體能力的表明。這種條件並非替代而只是補足大學入學考試或證書。這種新辦法自非很能解放中學的教授法，然而牠也有一種長處，就是能使那些低劣的學生較難於從注入式的後門竄入大學裏。

達特馬司（Dartmouth）還採用一種更解放的辦法，不用考試，而收容中學生，只要

這些學生在他們的學科裏有前列的成績；他的立意大約就是這些青年，無論他所準備的課程如何，都顯然有一種本領或努力爲大學所欲的，和表出在他們的大學學業裏能够成功的。

在英國和在歐洲大陸，考試的方法，一方要考驗學生是否有更廣大的和更精深的智慧能力，別方面則考驗他們對於教材是否全部精通。在德國，中學生於畢業時，要由一個委員會考口試和筆試，這個委員會包含畢業生最後一年的全部教師、校長和一個督學。考試的教師，要共同負責詳盡地報告學生在校裏之精神及道德的發展，其中包括理解力之明晰程度，與速度、想像力、創造力、發表力、特別的天賦才能、校內及校外的特別活動，在研究界裏之成功、運動、學生的領袖才能、個人缺點、家庭的經濟情形與社會地位，和將來執業的志願。每科的筆試包含着從極狹窄的選擇範圍裏選出一條簡單的問題。

「從三小時到五小時的時間，應考人要由他的題目上竭其所能，來表現他的智謀才具；在切當的知識裏，在分析和邏輯上的推斷的能力裏，在個人的識力與辯證力

裏，在思想與措詞的體裁，長短，和切合程度的感覺裏，——總而言之，是在一種由長久的經驗與一種成就事業的擴張觀念爲有效的接觸，而共同產生的一種智慧元素裏，去表顯他的豐富的能力，」這段話是我們在一卡內基金委員會「一九二七年第二十二號的報告歐洲及美國的教育歷程之特質」一文中讀到的。

除了目的在表出智力的程度，而不在表出零碎的知識之筆試外，還要學生應口試。這種顯著的口試對於新教育的需要和要求是特別有意義的。這種考試是在學生預先選定的領域裏，而爲學生所曾特別注意的。這是一種測驗，非在學生自己所不喜歡的功課裏的測驗，乃是在他自己最愛好，和自以爲有特別能力的功課裏的測驗。

我們最後在這裏得到合理的考試方式了。生活本身就是根據這種方式來考驗我們。生活問教堂的候補人他能說教怎樣好而不問他能考察怎樣好。生活問唱歌者他能唱歌怎樣好，問藝術家他能繪畫怎樣好，問教育者他能教學怎樣好，商業者他能出產交換和分配怎樣好。應試者要想入這個世界大學裏，被允許自選他自己的科目，常修他所需要的功課，和再次又再次來應考。這裏絕沒有最後的失敗，沒有生活成功

的最後妨礙。

在這種考試裏也是一樣：學生被指定一種練習，和被給一種相當的時間去思想他。他乃應用一種自由表達的方法，用某種原文、地圖、圖畫、或別的可得到的幫助，然後把這種練習拿回來。（比較美國學生和主考者在大學入學試驗裏彼此所玩的捉迷藏遊戲，那是何等不同的。）主考者要特別指出「他的智慧的綜合力，他的判斷，他對於所研究的問題全部的了解，和他的表現能力。」

口試與筆試之結果是平均來算計的。最後的決定則由會議。至於學生的成就，亦不能用數學的方法來分析，而必須用直接的判斷。要想避免那包含有精神與道德性質的機械判斷，則任何一種數學的計算方式都要禁止的。

「卡內基基金委員會」的倫得（William S. Learned）氏在將這種方法與我們方法互相比較而去解釋的當中，說道：「當美國的情形放在這種非常的配景當中，一些對比的元素立即呈到眼前。我們所謂和緩地適用的智慧，乃是我們放學生在其中活動進行的意識產品；這種概念是這樣的含糊不清，直使我們沒有勇氣來下定義，更

不敢去測驗他。我們教師的本身許多未嘗受够教育的；當他們碰見智慧時，他們不能認識他；如他們試去批評那些他們未有學過的，和他們自己尙未明白的歷程。他們恐怕對不起應考者，因此他們便回頭採用那種校對知識的簡易方法。「知」之與「不知」對立，正如拿本綴字書一樣容易，而可得到美國學校的贊許。美國的教師在測驗暫時的知識當中，無疑地是很有效的。我們忙着由無數問題測驗或其同類事物來改進這爲達此種目的的機件，以期事實無所隱匿。其中許多在初步或是有用的。可是同時已引帶我們的教師離開那在歐洲原爲教師及其職任間關係中之中心的一種事情過遠了。這種事情，不是問：這個學生能給回什麼事實？而是問：他在他的觀念領域中能否正確地和豐富地思想？我們似希望將一切可能的成分亂七八糟地放到一隻磨機漏斗裏，然後聽天由命地等候他有結果出來。至於歐洲人則要研究什麼會生出來的意義，並依據着去改變這些歷程。」

假如美國大學能採用這樣一種入學試驗法，他自必能改革中學的教授法。并沒有人能有理由去反對我們的大學爲着自己的目的與宗旨，立起一種高的入學標準

來取錄學生。誠然，在許多較好的大學裏，學生報名的比較他能收容的，常多二三倍，那自難望他們降低標準，使愚庸的學生也能及格。他們選擇，他們是很自然的和很公道的。一切中學及新父母所能問的，只爲選擇的基礎應該廣大、合理、和無阻礙，好待男女青年，在完畢了他們的中等學業之後，能得到一種人格之發展，其發展之豐富、妥適、及開展，將如我們在初級階段內見到的新教育所能造就的一般無異。

新教育者的最悲痛之事就是要將中學不合理地服從大學。關於這種情形，阿密頓（Beniah Amidon 是教育觀察雜誌的編輯，和兩個孩子的母親）嘗在新教育雜誌說過：「到了現在，新教育運動還未在中學與大學裏明白地顯出自己，「新」學校的校長常抱怨中學收容那些來自試驗小學自由環境裏的二十歲或十歲的兒童，他們有自起動機的設計，自動的團體活動，而要訓練他們去適應中學裏傳習的功課。中學又常反駁：以爲他們也很不滿意於那些訓練，和那些陳舊無用的學問，不過他們實沒有旁的辦法可以預備他們的學生考入大學去，故此這必須從大學本身發動，去使青年有我們在小學開其端的生長與發展之機會。」

六

關於近代課程的事，中學比較小學真是落後得多；小學在最近幾十年間確已將他的教材澈底清理，向着增加趣味及生活上切當之目標而走。惟當我們看看中學課程，我們就發見許多絕不能適合今日的需要，的傳習元素，和發見他缺乏能使中學男女青年發生興趣的材料。

現在所需要者，就是中學自己應在兒童的教育生活中成爲一種獨立的單位。正如小學收容青春期前的男女兒童，和給他們在這種歷史發展的階段內那些最必要的和最有價值的一切，中學亦應被許在這青春期的四年間，盡心爲着學生現在的教育需要，而不強迫他們準備在教育的未來階段中抵押的需要。

中學分子的性質在最後幾十年間改變得這樣大，所以傳統的教材變成爲完全不適合。這個階段不再爲小數的利益階級而有了。中學有這樣多人找尋，和這樣多人想望，所以他的分子是我們人民一種純粹的橫截面的。在實際上，中等教育在數十年後，無疑地必能如小學一樣普及。

由教育部所發表的統計看來，從一八九三年到現在，中學入學的人數曾有可驚的發展。在一八九三年至九四年間，學生的數目爲四八〇・三五八人。此種人數比起今日大學生的的人數亦只得一半。在一九零三年至零四年中間，學生已加倍增至八二二・二三五五人。再十年後，（即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入學的人數即增至一・四五九・三九九。再後十年，雖在歐戰期間，數目仍有可驚的增加。在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學生總數有三・七四一・零八七。這個數目比起前十年已增加百分之二百六十。兩年後，即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我們註冊的中學生數目已達四百萬以上。再正確些，即爲四・一三二・一八五。這已不是選擇的歷程（經濟的或文化的）發生高等教育的需要，而顯然是中等學校從我們各階級的人民中辛苦地製造出來的。

這種青年男女，姑無論他們入中學的目的如何，都應受歡迎的，都應給以最好的和適合的教育。這是國家的責任與機會。因爲感到中學教育陳舊欠缺的痛苦的，不僅是青年，這還是社會的本身。那末，爲什麼社會還應繼續允許大學規定中學的教育形式呢？

這可以回答：在中學裏，那些不準備入大學的學生可以免除大學準備的限制。他們是這樣子的，惟他們仍不能避免大學準備的影響。公立中學與私立預備學校之較好的班級，都是隨着大學的要求來定方針；絕沒有相當的注意給與普通的學生，亦沒有從課程及方法的自由裏拿一些利益來給一般普通的科目。這因為大學不情願古典功課有所缺乏，仍要將他的淡影投射到普通科去。

新教育聯合會的秘書斯奈得 (Mr. Snyder) 在一篇論及大學入學的論文中，報告在新學校的校長當中所有探討結果，情形如下：「你覺得大學的要求會強迫你在對於學校所持的教育觀念上讓步嗎？」在答覆這條問題當中，竟有一致的肯定。這點情形與在一些學校裏所得到的觀察亦相符合。因為這些學校高年級的課程與教法，都顯然為着大學入學考試及格的利益而一切讓步；教學的讓步大約趨於專門的訓練，而課程的讓步則於幾種書本的功課中代以一種或幾種技藝，於許多數學或拉丁文中代以較多的科學和歷史。

「你們所有的學生是那類最受現行教育制度的不良影響呢？」這條問題，有

四種重要的答案：（一）富於藝術與機械才能的學生最受損失；（二）只是常態的而沒有文學心思的女子很少機會；（三）沒有言語能力或數學能力的學生受很嚴重的影響；（四）不進大學的學生完全犧牲。

七

最後，又爲什麼應有這種不公平的差別呢——即是爲什麼預備入大學的學生，要假定他是較優越於不入大學的學生呢？這是一種謬誤的假設，不通的推想，完全基於近代心理學所反對的過去教育理想。難道身手活動的兒童，真較志在書本的兒童爲低劣嗎？那絕不是的。這只是一種不同的智慧，在一種稍爲不同的方式裏表現自己。其實這兩種學生的發表與活動，都有那些構成智慧的特質：如推理、分析、應付等等。

那些新學校，當其在能自由活動的初等教育系統裏，很曉得如何使身手活動的兒童，與善於誦讀的兒童，很愉快地和很妥適地排排坐起來學習同一的教材。如果給他們在中等階段裏有充分的機會，他們必能而且必會同樣的幹去。

在俄亥俄一個城裏，有一間極好的私立女子日校，其中有一個教師曾告訴我：高

年級有一組不進大學的學生最有優美的品性，和最是真正的學校領導，無論在自治會裏，或在其他的學生活動與組織裏，都很能領導一切。教師又告訴我：這些女孩子不能够冒險嘗試大學注入式的功課。

他們怎樣呢？他們是低能的嗎？假如他們是低能的話，那麼，根據同一的標準，那些擔任今日世界工作的男女領袖亦必是低能了。

不，他們比起那些受着大學注入式的功課的女子來，決不是低能。他不過具有別樣的精神能力。他們其中一個要負責使我的參觀得到充分結果，她對於事物的解釋，她的聰明的行爲與護持，是如此其滿意，那決不會使人懷疑她沒有真實的智慧，或沒有好的品性。她是該城一間領袖報館館主的女兒，這間報館是全國知名的。

爲什麼這個女子，及千百同她一樣的女子，要和那些長於讀書的女子勉強分離呢？每一個人都需要別人所供給的，而能適應今日的需要，將機會給與各個的差異，如新教育爲一般兒童所要求的一個理想的課程，就必能使我們中學裏這兩種分離的學生——即身手活動的，與善於讀書的學生共同工作。

我們的中學制度還有一些別的缺點，可以在此略述：第一種缺點，就是我們中學的教師常是沒有修養和沒有靈感。第二種缺點，就是我們整個的中等教育都是狹隘的和獨斷的。第三種缺點，就是要使智力未到成熟時期的兒童，即由中學渡到大學，由是而犯心理學的錯誤。四年的初級大學，如能建立，或能糾正此種謬誤。

同一樣的新方法，能應用到初等教育去，而使他能感動兒童，亦能應用到中等教育去而得成功，那是沒有疑問的。現很需要這種改革。人類能力有一種最悲慘的耗費，就是男女中學生的軍隊化。這樣的年齡，應該充滿成就，領導他們造就一種對文化的誠實和愉快態度，和領導他們養成正經用功的習慣；如今這種光陰不特白白費去，而且遺留在這些年男女的精神裏一種對學科工作讐視的精神，當他們到大學去，那就必把高等教育的利益之享受，活活摧殘。

希望公正無偏的公衆，注意中學問題，和協助進行這種切要的改革運動。希望一般父母有兒女困頓在預備學校教育的中古主義裏的，急切要求最大的自由，和更聰

明的教育方法，而最緊要的，我們要求大學准許中學自成一個單元，自己組織課程及教法，以便適合於他的衆多的，而仍然陸續增加的中學生。容我們只要求想要走進高等教育去的中學畢業生有一個曾經訓練的心靈，誠實對學問的態度，對於國語能有完善的專門的使用，和有一種能力去妥適地使用大學文化可貴的和廣大的利益。

第十四章 大學問題

「教育絕不值得什麼東西，除非他能理會到那些於個人生活有關的問題。大學此刻的難關就是他對於學生生活有關的問題未曾盡量理會。」——Harry A. Overstreet——

當高等教育還是一種難得的機會的時期，那時的大學青年絕不同今日的大學青年的。在今日，不特那些學業較差和讀書力較弱的青年能入學校，而且甚至有許多絕頂聰明的人不打算入大學，就是進去了也不大留心準備功課。這種現象很使教育者與父母發生煩惱。其實這是推翻傳統教育的發端，而為大學當局極嚴重難處置的時期。

青年的冷淡，漠視，幼稚不檢等態度，顯然存在。此是誰之咎歟？近代青年之咎嗎？或

或是大學不盡近代化之咎呢？那不是一種將新酒注入舊瓶的一種情形麼？教育界常說，當一教師覺得他班中必須有四分之一的失敗，那麼教育本身就必有不對。在高等學校和大學的初年級，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五的學生失敗，那究竟能不能證明他們制度的過失呢？

大學校既有此種自覺的懷疑，自不能不對他們的方法，加以考慮，甚且欲取得大學學生之助，以求解決。大學內教授與課程的革命似乎必需的了。然而此種問題對於父母方面，及大學本身方面都未免過於嚴重。

每一問題都有兩面。父母的一面：我怎樣能使兒女入一間好的大學呢？我怎樣能確信他入大學後能在這裏誠實工作呢？大學的一面：我們怎樣能得到那些最好的學生呢？我們怎樣能使他們在入學之後能誠實地工作呢？

現將格雷 (Hazel Gray) 來做一個例子：格雷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女子，具有一種卓越的人格與美麗，是一個極有知識的父親的女兒，她從父親方面得到一種堅強的意志，清明的思想。又從母親那裏得到一些社會的文雅。然而當她在中學時，她便一天

一天變壞了。她學法文極壞，數學極壞，拉丁文不及格。雖然這間特別的中學在美國算作一間最好的中學，那或許因為教師不好。當她投考大學入學試驗時，有一半不及格。下年再考，成績居尾。她乃入一間私立學校來受注射。年終再考大學，復又失敗，有什麼辦法呢？唯一解決的辦法只有入一間細小的和容易投考的大學去。

現在可一研究這的原因：這個女子有什麼困難呢？沒有聰明嗎？不是的；沒有能力嗎？不是的；因為他在有興趣的活動中并不表出缺乏意志的能力及勤懇。我們不能相信這是她的過錯。我們所能確實相信的，就是學校不能引起她的興趣及情緒的參加。而這個例子或許是普遍於全國的。

有些父母有時比較格雷的父母更易使他們的兒女進到一間好的大學。然而就是這樣，也不能使他們的教育問題得到最後的解決，因為他們在大學裏說不定還繼續不斷地成績低劣，而入於失敗之途。最可憐憫的，就是那些不能好好地受得高等教育的青年，曾是一些最聰明的青年。

現在試從大學的立場來研究這條問題，十年來，要入大學的青年異常擁擠，全國各大學共計學生數目，在一九一三至一四年爲二一六·四九三。到了現在陡增至八〇〇·〇〇〇（從個別大學看來，其數更可驚異。例如十餘年來波士頓大學生的數目從一·五六六增至九·八七二；加州大學從三·二九四增至二四·一一二；哥林比亞大學從七·四一一增至三〇·〇二二；伊連奈大學從四·六五九增至一六·一三六；般思維亞大學從五·一八七增至一五·二八五；華盛頓大學從二·一三六增至七·二二五。）那好像每一個人都要設法入大學一樣。而其慾望顯然不在熱心求進一步的研究與學問，而在希望享受大學生活的誘惑，取得大學學位的資格，因而博得在社會內與經濟界內一些較高的地位。

然而有誰敢非議這些動機呢？我們都不是很想求上進嗎？不是所有報紙雜誌內高下不等的短評都勸我們好好地做我們的生活嗎？他們又不是常常指出那些大學畢業生比較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們平均能有更大的收入嗎？我們當中凡從大學讀過書的也有不堅持從大學所得到利益和結果的嗎？

聽聽一個新聞記者說的話，他在指出男女青年如何容易從大學及憑藉資格、款項、等等之助力，爲部分的或全部的去進行他的事業前途之後，他說：一個美國的青年男女，怎樣能排除他們所嘗享受過的這種最大的愉快——即這種大學生活、文憑、和能擴大及弄好他們的全部事業的愉快呢？

這樣一幅大學生活的圖畫，乃是鋪張過甚的嗎？然而從我自己的經驗量度起來，那就絕不過甚。他如公衆的材料，惟大學教育是給與一般男女青年的最大機會，則是根本真確的。

美國青年爲這種隊伍所招請，乃羣集於大學之門。他們有不多的錢，和少的學問，那並不使他們彼此顯出差異，然而那能使大學間顯出差異，他們正滿心驚懼地站在爲近代報紙所鼓動和爲美國之模仿的和爭勝的氣質所回應的這羣不能控制的人裏，大學何以不能如近代的工場大開其門來招接顧客？其主要的理由，就是大學處在一種特別的情形裏，他收學生愈多，他收的愈不好；其他的事物也是一樣，因爲學費只能供給學校支款三分之一或一半。換一句說，平常的大學是一所從一半到三分之二

的濟貧機關，然則他的慈善，放在那一個人身上呢？那自然不是在每一個湯姆、狄克、哈利的身上。這種高等教育的利益似乎應該留給有能力、訓練、和品性去誠實地受他的利益的，利用他來增益社會的人們。

自在達特馬司的校長霍布金司提起「學問貴族」的理論以來，報紙上曾發生很大的叫囂。霍布金司爲他的托拉斯及畢業同學所撐持，仍在一種選擇的歷程上來工作，這種選擇的歷程對於被那些超過收容量三倍的學生所包圍的大學，似是必要的。所以達特馬司在入學的方法中，雖然自由寬大，他在大學中是頭一個除了由分數及考試去報告學業成績之外，還留意到學生賦有的智慧及能力，以及對於中學各種功課之負責與用功的程度，和白璧無瑕的姿質。這種在許多求學者當中選擇的方法，其是否聰明及有無權限，雖可爲外界人士所疑問，然在大學界裏已贏得極確切的證明，因爲在最近的學年，達特馬司只失敗百分之十的一年級生。至於根據各大學通常的事例及達特馬司以前的事例，那總有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五是失敗的。

達特馬司每年在一五零零到一六零零的報名入學的人中，只能收取五百五十

人，其他的人必須轉學別校。達特馬司解釋：「不能入該學校的學生不一定是學業上沒有能力，或有其他方面的不好。這只因為依據所得的材料，這種學生似乎比不上那種學生好。」畢業同學雜誌又說：「此刻所用以選擇新學生的制度似乎正產生着一種更好的學生資格。」

所有領袖的大學（不是州立大學）都似乎十分需求採用一種選擇的辦法，這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公衆與父母都不能怪責的。他是供求上之合理的結果。處理大學期前的青年之新教育者，絕不批評大學採用這種選擇的辦法。他不過提議這種選擇的辦法必須聰明的，能適於現在青年的標準，而不要求合于過去的古典準標的。其次他更誠懇地勸諫那些入學的方法，應使受中學教育的學生，不至為教材及教法所困迫纒好。

新教育者對大學說：「你需要那些最好的青年，很好！我們覺得你的想望是合理的和合正義的。然而不要用一種不合理的標準，去排除那種雖無極好的學業成績，却有高度的創造性，人格，領袖能力，和品格的青年。而且不要這樣強制中學的教法與

課程，使我仍不能不極端限制或取消各個學生，依着個人與社會的需要因而爲豐滿的發展機會。」

有一個最健全和最有功勞的新教育者，即林肯學校的科德衛爾（Odis W. Cull-
pell）他在一篇說及新學校與大學教育之關係的論文裏說：許多學校當局反對大
學入學的情形，并非無理的。如果中學應用近代生活事物的教育，能與應用古代生活
事物的教育一樣地發展；如果他發展一種訓練興趣及判斷去應付實際問題的教育，
那是對的，那麼，學生之入大學，也應根據他們所學來測驗他們嗎？有些大學已經很久
強迫中學努力這些陳死的和無意義的記憶事情。他們做這種舉動之時，實沒有十分
研究，亦沒有一些接觸那種中學的新教育運動。幸而這種情形在很多大學裏已經改
變了。直至現在，美國中部與西部的大學，變遷得更爲顯著。

三

大學的第一問題（這問題也很關及父母和中學的）就是入學的問題。第二問
題或許更難解決的就是課程與教法之理想的組織。在大學界裏，現有一種極大的醒

覺。覺得必須有些變更，好使大學能適應近代的青年和近代的環境。現代公正無私的公衆亦參加進來批評大學。雜誌的論文及書籍更盡力告訴我們大學一切的錯誤。

美國外觀報 (Overlook) 有一個隱名的人嘗投一篇論文。名曰我的教育給我的傷害，用諷刺來揭發大學怎樣不能盡他傳授知識的任務，語極淒楚動人。「公立小學與中學已經失望了，我於是再進一步，求入大學。我希望在這裏尋到智慧、美點、能認識真理的精細心靈，和能協助我發見生活意義的老朋友。這就是在十二年前，走進一間著名的高等教育機關裏去的一個女子的期望。」

她已經大大的醒悟了。「一年級生的作文，已確實證明，是付託給一個污穢不堪黃面駝背的人手裏，他的尖刻的批評，矯飾的滑稽，已深陷入乖僻古怪之中。」下一年那就很明白爲什麼沒一人能够把捉自己指定的功課，又爲什麼有這樣多的一年級生失敗退學。她那時精神頹喪極了，在夏日間，便很悲慘地陷於一種長久的病態情境裏。

初年級的哲學，「由一個古代的退職大臣擔任，這個人有一束聖經裏的鬍子，一

雙流淚的眼睛，和一副鄰於老邁的精神。他由很便宜的薪水傭僱得來，要他教書是太老一點了，可是他有一個極年少的後妻，和一排小孩子。當他很用心地在台上作嚶嚶聲講授時，那正如一弱小的蜜蜂棲息在這裏漫叫；我們吃朱古律糖，交換小紙兒，和誦讀別的功課。我們不是天生頑皮的，只因我們是一種實際的少女，我們實覺得沒有價值去筆記那些材料，是教師昨晚方纔在我們自己那本大而幽暗的青皮教科書裏讀習得來的。」

然而爲什麼還讀下去呢？情形比前更壞，那顯然是屈服。我們從空虛的、無害的一種人物，轉到一種壞心邪行的人物。青年們托在他們手裏時即於生命極有傷害。該文作者說不願將自己的姓名表示出來，因爲他不在證出是某一教師，只志在指明是我們們教育系統裏的一類教師。

大學的錯處在什麼地方呢？在讀了幾篇這一類文章之後（這些文章有由畢業生做的，或由大學本身做的）我們就開始發問：大學的錯處在什麼地方呢？然其中也

有一種樂觀的情形，就是大學也留意他們自己的錯謬，也很歡迎學生批評，和開始努力解決和補救。

在整個批評運動中，那最有趣味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參加入內的那一方面。達特馬司最先歡喜這種批評。一九二四年達特馬司學生報告的刊物曾引起很大的熱忱，和鼓動起別處的學生報告，如哈佛大學，俄勒岡（Oregon）大學，衛斯力燕（Wesleyan）大學等處為最著。他們的結論明顯地彼此相同，而且明顯地表出這些畢業生對於他們的大學有一種怎樣的希望。

還有別一種學生批評的和有趣的方式就是得之於學生報章雜誌裏的，這都由高年級生執筆，批評到他們所選修的功課，內容，教法，教師人格，和讀功課之價值等等。

學生意見之構成，還有第三種機會，就是美國全國學生聯合會（National Student Federation of America）布勒壘立治（M. Breckinridge）乃學生聯合會的副會長，在新教育雜誌裏寫過一篇論文，名曰從學生方面看，表出全國學生對於下面問題的意見：大學的宗旨，選擇學生的態度與範圍，研究的學科與方法。這篇論文很豐富地

表出畢業生的意見和欲望。

四

從教師、從畢業生、從高年級生、等等各處所得到關於大學的批評，歸納起來，便可知道美國大學有如下的缺點。

(一)大學生最主要的怨望（其實他們的怨望普通都是合理的）就是因為教授法過於陳舊。講授與誦讀的制度所以成爲傳達知識的手段，只因昔時沒有書報雜誌，只有一些塵封的手抄。凡不能與那些寶貴手抄本相接近的人們，就只有仰賴一班學者們輾轉傳抄作爲講義，來嘉惠他們了。然而爲什麼近代的青年要被追坐起來靜聽教師從筆記中講授那些各人都可接近的材料呢？講授制度常給我們近代青年痛罵的形式的背誦要學生重念課本中所定的教材，於學生亦不見贊成。

(二)更可怒的，就是教授的內容異常貧乏。這尤其在初年與畢業之年的學生，沒有什麼東西學習，其實這些學年的教授內容，如望大學生養成自修的態度與習慣，正應格外重視。這種缺點大約由於我們聘請講師的制度，因這種制度常使一經得了博

士學位的學生即能任大學教席，至於他的人格怎樣，教學能力怎樣，則很少過問。

不特沒有企圖去給這種預備的教師一些教學的訓練，和一些教學的經驗，而且考博士學位時所需要的研究學問的方法，還適於惹起乾燥無味、精神狹隘、和思想的卑屈。又這些讀死書的人們，在離開寧靜的大學生活去任教職時，常覺自己為大學初年級之龐大的班級所對抗，況這些冷酷的青年又不是忠心追求學問的。那種教師怎樣從這些壯偉的、愛自由的、不愛書本的青年贏得尊敬和領袖的地位呢？那是一條問題。

(三) 影響於大學教學本質的第三種元素，就是教師研究的能力與做文章的能力比較起教學的能力來，更受人尊重，和更認為重要。在平常的大學裏，那能得受人愛慕的最確實的路途就是多發表作品。一個講師，或一個助教，雖然是一個最好的教師，最愛好教學，很盡忠於他的學生，在課室工作裏有極大的成功，但如果因為用盡了他的能力去教書而不多為文字上的發表，那麼，比起那些在文字上得有聲譽，因而增高大學的聲譽的，似更少升遷的機會。這種升遷的辦法不論能否應用在高級的教學裏，

而對於那最需要良好教師的初級教學就一定應用不着的。大學第一二年級的教師對於某種高貴的聲譽殊不需要。那可以會，而且常會變成教學上效率的阻礙。然而大學成功之路是憑教員的聲譽，而非憑他們的有效的教學。如果大學永久的這樣制裁那些好教學法的教師，那無怪他們不注意這點了。

（四）大學校長是行政者而不是教育者。選任他們不論是否基礎於他們之辦事能力，然而他們耗費過多的時間在行政的細微事務上，那是必然的。訪尋未來的教職員、演講、和留意全校的一般事務。平常的大學校長雖或有意做一個教育者，亦實在沒有時間來做。

除此之外，還有大學的傳習，例使每一系主任，每一教授，每一講師，在他們自己的領域裏至少有半獨立的封建主權。大學校長參觀教學，並沒有這種事例。（系主任也不參觀。）那麼，怎樣知道教師的姿質，和課室內的教學工作呢？只有從間接方面知道，決不能由自己去看看。

大學校長在他們的大學界裏而似不是教育的主管人，而只是各學院的主席。這

種習慣自然從昔日的事例引伸而來，在昔時，大學只是各分科學院的綜合，而各分科學院是半獨立的，自己從各種不同的基金取得津貼來維持的，他們是組合而不是隸屬，今日的大學校長無論在他們的領域之那一部分，都是一個完全的負責者，可是關於教育方面，他就為不必要的傳習所限制和阻碍。

(五) 大學的課程需要檢查。愛略脫 (D. H. White) 創行選科制，便打破中古古典主義的符呪。然而我們此刻又覺得不宜給大學生在許多教育功課中逐一選擇。平常的大學生太缺乏背境和判斷去為適當的選擇。其次，他每非為修養而選擇，是為貪得而選擇。當我在哈佛大學的時候，我們很奇怪的見到那些著名放蕩的人，常去「聖神學校」選修神秘主義及教堂的歷史。理由就是：只有聽書，而不要讀書或講書，又每學期只要溫習兩三日時間便可及格。

如果我們不要傳統的文學為必修的文化課程，那我們就必須拿多少東西去代替他們。這是愛略脫以後的人的見解。大學現在的課程太不調和太不平衡。每一科系，都好像馬戲場中高聲叫喚引客之人，盡力自己贊美自己好，而學生的選擇，基礎於不

足的材料，常趨於失望之一途。其次，在每系中都有十餘高深的科目，研究高深的學問的。那麼一個學生自很可能選擇這些高深的科目，循至在大學功課完畢之日，他雖然很用功，他亦沒有很闊大的視線，和很少真實的修養。

近代知識增加得這樣多，所以人類的智慧實很難去綜合牠去統一牠。然而這種重要的步驟，教育者在未希望大學的青年在這個不斷增加的大學材料之極完密的系統中見到頭和見到尾之前，那亦不能不經過的。大學還未足夠管束和弄簡單他的廣大的知識材料。他自己亦不知道什麼是構成文化的。多耳曼 (Henry J. Doernann) 說：那些有希望的學生去找許多的大學章程，看看文學的目的究竟何在，然而終歸找尋不到。今日那一間大學是要在顯明的宗旨上來招收學生的呢？什麼最低限度的文化課程我們要決定呢？這些問題各大學還沒有確實的答案。

(六) 許多人說大學生不高興他們功課，因為這些功課對於他們的生活沒有關係；大學的課程在近年雖然已很近代化，而大學的學問還是一樣留在書本的學問裏，因此那些革新中小學校教育之大改革，那些新教育運動，從做中去學習之原則及實

際，那些在生活活動中，和由生活活動去取得的教育——都需要應用到大學裏，這不是說大學必須變成一些職業的機關，這只是說大學生在他們所選修的課程裏，必須找到一些材料及方法，而這些材料及方法須能給他們一些生動的和必要的經驗的意義，一種生活和思想的意義，一種在功課裏的滿足，一種工作對於他們是有價值的和很重要的了解。

五

現在大學裏所實驗的重要的改革就是教學法，與課程的改革，和使大學文化與學生的生活需要更加接近。

怎樣最能傳達知識於大學生呢？這是所有新大學的當局所要研究和試驗的問題。講授制度已受嚴重的考察，牠有許多弱點，他要引誘教師年復一年去重述同一的材料，要求他們出最少的能力，他很使學生發生困倦——這是在他們批評教授法當中所最反對的事物。

在改換了講授和形式的背誦之後，有些大學就試行採用英倫通行的一種辦法，

使學生自己負責在某科裏研究和探討；到了年終，就來考試，司瓦特謨耳（Swarthmore）首先採用這種英國辦法給美國學生，這是受了阿狄羅得（Frank Adyloffe）的影響，阿狄羅得少時原在羅德斯（Rhodes）讀書，後來就做司瓦特謨耳的校長。這種方法對於這些誠心到大學讀書的男女，比起那些講授的和形式背誦的方法，自然有很大利益，而免去機械習慣，故在司瓦特謨耳這種所謂「名譽的功課」亦只限於給與那些高年級和低年級在頭一二年學業成績極高，足有能力去自修，和對他們的功課常極有責任心的學生。榮譽的學生完全免除平常一切大學的練習與限制，雖然他們也可隨意聽講，和有時也特別要他們聽講，但可以沒有平常所謂上課這一回事。他們沒有點名證，沒有分數，沒有學期考試。學生在人類知識之一些廣大的門類裏面注全力去準備，舉行一組廣大的考試，這種考試是由該大學專請別一大學的教授來主持的。學生各人的工作由各專門研究某科的教授所指導及監督，學生與這些教授每月小組相會兩三次，常會於教師之家。司瓦特謨耳極滿意這種制度的結果，而這種制度又極爲其他大學所留意，因爲他們正爲全部的或一部的仿效。

這種從形式的傳習裏去解放學生的觀念，由佛羅里達(Florida)的洛朗大學(Louisiana College)校長霍爾特(H. Holt)推而至於極端。打破所有演講及學生的課室背誦的實驗正在六個月中進行。在此期間內，教師不演講，學生不背誦，師生在早上聚集討論，晚上讀書，音樂或其他文化計劃，那都成爲課程之一部。芝加哥晚報有一社評議論這種有趣的試驗，說這裏所尋求的顯然是學生方面思想的刺激，而不是知識與學說的強力注入。討論的方法是用來激起學生的精神反應，他要引誘起見解的衝突，和需要解答的問題，教育的歷程是在學生精神裏活動着，而不只是全爲教師的工作。

在哈佛，有一試驗，要在每年第一個學期給學生以兩個半星期絕對自由的時間，第二個學期則給以三個半星期絕對自由的時間。在這些時間內，沒有任何講授和功課。學生絕對可以幹他們所喜愛的。六個星期內，他們就可以有機會自己實習自己教育。去看看一般學生用怎樣聰明的悟性和文化的能力去使用這種絕無功課限制的自由，那是很有興味的。

在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學裏，舉行一種最值得注意的試驗。梅克里約翰(Me-

Hele John) 氏，嘗很勇於爲東部的小大學而實行他的教育觀念，被威斯康星探自由主義的校長佛耶克(G. Frank)聘到該校，給他充分的機會去試驗如何使教育惹人愛慕，和真能陶冶大學一二年級生。課室教授盡量減少。有二百個選擇出來的學生，做成一組，去實現一種研究計劃：就是將一年時間研究希臘文化，第二年研究美國文化。目的在多少了解這兩種文化。這種試驗，我們可以見到，他不特改變了教學法，而且改變了課程。此時乃基礎在人類經驗之上，整個教育界，特別那些人文學者，都很有興趣的留意這二百有幸運的學生之教育上的冒險。

從普通說來，我們可說大學學生之最要求的，是一種研究的、思想的、和發表自己的機會。研究而非講授，討論而非上課，由一個有鼓動力的教師引導去做團體辯論，而不是背誦——這就是一些最成功的方法，甚或對於大學一二年級生亦然，而這些方法實無異於中小學新教育所有者。這些方法在本質上是健全的，並且是以心理學上的識力，能窺到興趣與發展的公例本質裏面爲基礎的。

六

現正進行着的第二種大改革，乃在課程的事物裏，因為選科制度過於缺乏均勻和陶冶上的統一，而對於大學初年級生特別危險，故許多大學都以為大學新生最好有一些必修科，使能將人類知識之最主要的部分，為廣大的和陶冶的解釋給這些少年學生知道；好讓他們在後幾年自由選擇。這樣子的科目，要盡量包括人類知識的種類，常名為「指導的科目」(Orientation Course) 因為他想引導那些文化標準尚未建立的新生的途徑。

哥倫比亞是一個去發展「指導的科目」的先鋒，他並視此為社會科學對大學新生的需要之一種適應。該校感覺大學新生將來無論要求何種專業，而學生的功課亦必要給他們一種機會去知道一些近代文明之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背境，而當利用這些認識的材料時，又希望他們找出將來研究選擇可以基礎於其上的標準，(關於這第二種目的，那可名為「訪查功課」Exploration Course)。

哥倫比亞總名這種功課為「近代文化」卡曼(H. T. Carman)教授伸述其目的如下：

(一)告訴學生他的自然界與社會環境的那些更特出的和更有影響的元素。(二)考察近代文化的歷史背景。(三)提出現在的必要的問題來供討論。(四)使學生了解自己時代的文明，和使他們爲更有效的參加進去。(五)最後在大學學生早年的功課當中，給他們一些客觀的材料，使他們將來的研究能基礎在這些材料之上。

關於教學法方面就是這樣：那些爲新生所必修，每週五段而一年修畢的功課，大約以三十人爲一組，每組都根據智力測驗所表示之智力等級而劃分。日中上課時多爲口頭上的問答與討論，並不講授。每組的教師皆選自歷史、經濟、政治、哲學、經濟各系，選時極小心，務須其有能力引起學生間的興趣和合作。

這種「指導的科目」因開始時過於極端，故受猛烈的反對。有些教師頗不願意因這種工作而去降低他們在這些科目裏之專業的標準，不喜歡就着新生低下的程度來教，或將他們的科目做出一些太過普通的和太過膚淺的表現；然在今日，這些反對者多已成爲熱烈的撐持者。如果有的，亦很少有教授對這種功課批評。至於學生方面，他們就熱烈贊成。哥倫比亞大學的最近兩班高年生竟投票選他爲最有價值的功

課。

在民涅梭塔 (Minnesota) 大學，這種「指導的科目」不特包括社會科學，而且包含自然科學。在自然科學題目之下，要研究（人在自然裏），即包含自然界是環境，人是自然的產品，人類行爲，社會行爲。在社會科學題目之下，要研究（人在社會裏），即研究人對所居地方的物質器具的適應，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的發表與發展。除此之外，凡修習這門功課的學生，還須由教師教以研究的專技，圖書的使用，選擇大學功課之範圍與問題。

達特馬司 大學在一九一九年新設「進化論」一科，一學期修畢，新入學的學生是必修的。其後在第二個學期又增設「公民問題」一科。大學入學章程說明這門功課的旨趣如下：

「公民問題」一門功課，研究經過選擇的最近的和最有趣味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問題。他在所用的歷史原理，經濟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當中，並供給研究的和推論的方法。這門功課的目的在提醒學生對於他無論以個人資格或以公民資格，都必須

接觸的生活問題爲一種聰明的討論；在鼓動學生的書本中的分辨力，在指引選修上面所說及的大學學程。

達特馬司最初弄出的錯誤，就是用口頭的講授，和指出一些相關的參考書來進行這門功課，學生回答得不足夠，後來就改良教學法，打破這種講授的制度，將一年級生分爲許多組，每組十五人，又爲之善選導師。這些組的會議就是解決自己的問題，學生在其中可自由發表意見。爲刺激起他們自己的思想起見，凡是提出相反的意見的同學都可指定一些書籍給與別的同学參考。因此他們在課程的開始，就知道將課本認爲正確無誤，這個觀念是大錯的。達特馬司一個學生告訴我，這點就是介乎他的中學教育與大學教育之一種最大的不同。同一的學生告訴我，一年級生在這些團體討論中覺得這樣有趣，循至他們常常在宿舍還繼續辯論。大學的教育能否把執得住學生的思想與生活，這就是一種酸性的測驗。

許多大學受了剛纔所說的「指導的科目」的影響，都重新建立他們大學一年

級生的課程。「指導的科目」原於學生初入大學時即能開始。可是到此時止，這門功課之開始總在學生習慣於文化工作之後。其次「指導的科目」似還能解決課程的問題，因為他能給大學學程以一文化統一。這種統一自選科制盛行，打破人文主義的課程以後，早已不存。許多世紀以來，教育界確是以人文主義的課程（數學、古今言語、哲學）為一種必要的和理想的文化統一。到後來，却輕輕地給選科制破壞。從此，這種傳統的學科就永不再來做一種文化的理想了。在他的地位裏，「指導的科目」便供給出一種合理的代替，供給出一種集中在我們所生活所活動和從之而來的世界裏之最低限度的知識的統一。然而這種指導的科目之成功除了依賴他的教材，還須同樣的依靠他的教學的方法及教師的本質。

喜替厄 (W. P. W. W. W.) 大學的哲學教授科芬 (Joseph H. Coffin) 為這種更新的教育哲學的學習與實行者，他視這種指導的科目是那些使課程簡單化和作用化之最重要的步驟。他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新教育雜誌》寫着說：在今年一百六十八個大學中有二十個是有指導的科目的。這種普通的趨勢就是趨於發展一些莊重的、和內容

充實的功課。在「近代文化」「公民問題」「進化論」「反省論」「今日的重要問題」等等當中，這些功課可督促去解決個人的和社會的爭論。如欲使文科大學發生作用（使學問聯絡生活問題）那最需要做的，工作自是發展和擴充這種指導的觀念。他需求進一步去分析這些根本的生活作用，用一種足夠廣大的眼界去養育一代有能力的人物；需求把課程弄成簡單，及圍繞那指導的功課來編配，以指導的功課做教育設施之中心；又需求用這門功課來指揮，去解決生活問題。

七

怎樣移去在大學裏隔開學問與生活的深淵呢？安提阿大學（Antioch College）現在舉行一種有趣的實驗，他把學問與生活相聯到這樣澈底，直至修畢整個大學學業的學生（六年畢業）幾乎有一半時間做職業的事情。當安提阿大學在一九二零年被破壞時差不多只餘一個空名了，戴通（Dayton）地方摩梭公園新學校的組織者，和世界著名的河道工程師摩爾根（Arthur E. Morgan）被請去長該校。這樣他便被許完全改換該校的組織。舊的保管人完全辭職給新的接任，該校的組織乃重新做起。

換一句話說，摩爾根有一種完全的機會去實現他的教育計劃，其完全之處，正如一間新的大學給他設立一樣。摩爾根原是一個事業成功的人，他自身并未嘗得到大學的學位，而現當壯年時候，竟有一個機會去說那關於大學教育的話，而且他用一種最有效力的方法來說——那就是把這些說話見之於實行。

摩爾根從他所組織的摩梭公園學校 (Moraine Park School) 和安提阿大學兩校去對世界說教育的話正像杜威的「從做中去學習」的見解一般。在安提阿大學裏，同時學，又同時做。這兩宗事情是同時並行的，而且是密切相聯的。

學生一對一對地去選擇他們想拿來做他們生活的短期工作——一種在事業界裏，在工程界裏，在教育界裏，在家庭經濟界裏等等的短期工作。兩個人中每一人出外去作短工六星期，到期便由他的同伴去代替，而他回學校繼續他的學校研究工作。

這樣子一種制度的利益很可以見到的。第一，學科的工作極為職業的工作所推動——他的需要使學生覺得是一種實現的生活需要。第二，這些青年男女可以得到動勞、負責、和創新的習慣，（除了學生的自己的課外活動）平常的大學是這樣惋惜

沒有這些習慣的第三，對於生活的態度，是活動的合作，而不是寄生的放縱。

平常大學生活中最大的弱點確是這種不負責和冷淡漠視的態度。這種態度常可延展到大學畢業生五年十年的生活工作中。一個事業界的人，在數月前嘗告訴我：他與大學畢業生沒有什麼關係。他說這些畢業生是很無定見和很難去訓練他們有事業的習慣的。不錯的，這些青年，在四年當中，除了設法避免分數不及格以外，沒有一些要負的責任，則在此時期以後，除了絕無定見以外，尙有什麼可以希望他們呢？

安提阿對大學的教育問題的最大貢獻，或許就是在於他能成功減少那爲道德弱點的絕無定見，和絕不負責的大學生的品質。安提阿的學生很早已學得負責、順從、和勤勞的習慣。當他們畢業出外入事業界，他們就不必改造他們的習慣和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並有許多暫時或永久的失敗，如平常一般大學畢業生的事業所特有者。除了這些利益之外，安提阿還有進一層的利益，就是他們可入到一種早已訓練成熟，和早已進去的職業裏。安提阿這種職業方面將一方受人熱烈歡迎，而一方又受人批駁。然而成人們可以明白安提阿的計劃是文化與職業並重的。關於課程方面，他曾成功

了一種新創造，使課程趨於構成一種理想的文化的最低限度，而為一個欲得大學學位的學生所必須修習。這種必修的功課，比起指導的科目在別間大學裏實驗，實從同一的前提出發。然而關於學生在宇宙內的地位，他實企圖給學生一些更極端的，和更合理的指導，而且他擴張到全個大學的功課裏。

關於方法問題，安提阿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開始一種二年級以上學生的自導研究的新計劃。四班高年級的學生不須每日聽講和討論。全個學期的工作大綱預先發給學生，學生就自由地用自己的方法去精通各學科。當需要時，有教師來幫助他們。然而學生並不被人勸告去求助他人，除非他已用盡了他的能力，尚難單獨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極端注重發展學生為自己而思想的能力。其次，時間的限制是沒有的，因為這常是遲鈍學生的阻礙。對於偷懶的，沒有效率的，極不負責任的學生，學校規章明言「按時舉行嚴格的口試和筆試，至於那些不能盡責的學生就將請其退學。」

安提阿的結果怎樣呢？兩年前，第一屆的畢業生初出問世，其中有一個來我這裏當教員，我發覺他實有一些我嘗渴望教育制度養成的好品質——對於工作有好的

態度，富於適應能力，富於創造性。同時我亦知道有許多商店主人都極喜歡安提阿的畢業生。在文化方面，我相信安提阿的主張是對的：就是要刺激起完滿的文化發展，和將那些決意視生活爲一整個，和爲着永存的價值而工作的畢業生遣送出外。換一句話來說：安提阿的職業方面的教育絕不侵害文化方面的教育。他只去刺激文化方面的教育。

安提阿的記錄上說：「安提阿貢獻出一種新的大學教育，而絕不會犧牲及各種學科的好處。」如果這是真的，哈柏德（E. Hubbard）和他們校長實有無上的光榮。在哈柏德所稱爲外國流浪人（*Peripateticism*）所入的平常的大學裏，實沒有很多文化得到的。如果安提阿能給學生以平常大學一樣多的文化，此外又從負責當中訓練學生得有一種極優越的品性，那麼，他在美國之實際的、活動的、和創國時期的開墾者的品性的大學領域裏，必將贏得一種確實的表現。

八

安提阿的運動很能明白照耀如何使大學青年去研究這條問題。西門（*Simmons*）

大學及其他一些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也是這樣。在所有這樣子的學校裏，我們不會找到偷懶和放縱的青年。游樂與愉快在負責之後纔會談到；決不拿來代替負責。學生誠實地工作，因為他們明顯地見到介乎他們的教育和他們生活需要的關係。

多爾曼(Henry J. Doernann)在他所著的大學一年級生之指導一書裏說：「對生活的聰明指導需要了解包在生活內的許多活動。人類所做的，和幾乎將一半醒的時間耗費在其中的作業，必須包括在人類經驗的聰明把握中，而這種把握，凡曾受過教育的人都應具有的。文化教育要將自己發表在休閒時間的活動裏的那種概念，其錯誤及奇異之處，正如宗教的訓練包含着一个人的宗教怎樣，應以他在安息日裏的活動怎樣來衡量。文化不是一種活動，他亦不是來自各種研究的及格考試。他是一種心靈的與感情的態度。文化的所有者將在他所說的和所做的當中，表出這種態度。一個人，如他充分懂得古今所曾說過和想過的最好東西，但不懂得一些他當代各種的作業活動，他們與別物的關係，和他們彼此的相關，那麼，他在近代世界裏就絕不算曾經好好地受過教育，亦不算曾經聰明地受過指導。」

「我們深以爲現在一代和將來一代的人，應該在他們時代的工作中去找尋那些爲着高貴的思想與高貴的言詞而有的題材。能發生有目的的選擇之職業指導，必可以惹起事業的動機。沒有別種動機有教育的潛力，只有這種事業的動機纔有。沒有一種指導是完全的，除非已經找到了一種生活的事業。一當找到了這種事業，一切指導都變簡單了。那些有一種有力的終身事業目的的學生，必定覺到給一切影響中那種最穩定的影響所支配。這種最穩定的影響將給他的一切經驗以意義與重要。」

將學生奮力於一種事業的一些學校的用功學業的高度性質，與別的學校的用功學業的低下標準一相比較，那或者立可看見近代大學的失敗與錯誤，而其中最甚的當首推隔離學問與生活的深坑；移去這度深坑，而不要變更或矯正任何其他原素，你就可以創造出一班誠懇的大學青年了。

那些將學問離開生活的人生學者，關於昔日之古典教育，亦沒有一種合理的基礎。昔日那些課程，那些古典的制度，在大多數大學生的心裏，是與事業的動機密切相聯的。大學在我們祖父母的悲傷慨嘆，和田園色彩的時候，實純粹是一種準備職業的

學校，引導學生到教學、律師、醫生、牧師等等所謂有學問的職業去。很少入大學的人而不準備一門這些職業的。平常的學生的工作因此就為事業所鼓動，而普通都是勤懇的。這不只為着文化，這實在大半為着文化，我們的祖父母纔進大學。大學對於他們是一種必要的階段，是一種實際的職業事業的準備。

大部青年入大學而不想着準備一種這些職業，這只是近年的事。大學因為這班沒有慎重目的，或教育宗旨的青年，便生出許多廢物。為着這種緣故，所以現在有些大學常問「你入大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作為他們的取錄的測驗之一部。又為着這種緣故，所以大學要用一種指導的科目給與新生，作為幫助他們聰明地選擇事業的一種方法，使這一種選擇可以給他後來數年的學業以一些尊嚴和重要。我們不需要抱怨美國這種實際的趨勢。他原是美國人的氣質表現。在大學的課程和生活中愈早找到他的常態的出路，則愈早能達到一種平衡，和大學愈早能解決他的迫切問題。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覺到美國大學雖然未能供應今日的需求，現在實已有或將有一種很大的變遷，這種變遷之為革命的，正如中小學裏的變遷一樣。今日最新的大

學遠離三十年前的大學，正如實施新教育的學校，遠離昔日的頑固的學校。新的例證與格言現已擠逼入內。別的大學畢竟不能不抄取這些教育的計劃與方法，因為這些計劃與方法在那些更新的學校進行中已表明能增加公衆的智慧。

第十五章 初級大學——一個解決

「我們可以視現在廣佈於全美國的初級大學運動爲現世紀美國教育中最滋養的和最有意義的遭遇。」

——Ray L. Wilbur——

所有男女青年，當無法走進大學那塊神聖的領域時，他們會變成怎麼樣呢？其次，中學裏無數的身手活動的青年，雖有一些求高等教育的幾微欲望，而甚或不敢嘗試去應大學的入學試，那又怎麼樣呢？

大學的問題，決不能只是關閉着門，不容納這些青年，便可以解決。因爲大學對青年和對社會的責任，必須足夠廣大和宏量，好能在一種滿意的辦法中去應付那些有合理的欲望去擴大他們中等教育以外教育領域的人們的問題。大學因爲地方不夠

來收容這些青年，或大學的課程不够適應他們，因而遂把他們遺去。這種現象，必須從一種更廣大的社會觀點來看，要看作大學方面的失敗，而不是青年方面的失敗。

因為這種觀念不久即會實現的，即是：社會實有些教育的責任去教育那些誠心求更多的知識或技能訓練的人，而不去管他們現有的教育程度。其次社會亦不能以經費問題來搪塞這種責任：第一，教育經費與人類生活之完成，二者輕重無論怎樣都不能相等。第二，我們的經濟學者告訴我們美國空前的工業繁榮，大部分靠着一般人有高等教育的智慧，那就表證出經濟方面亦希望盡力之所能去增加一般人的智慧到一種最高訓練的和完全的程度。國家繁榮中的收入，將百倍於用到這種實驗裏的金錢，只是一種發明或發見每年增加國家的財富已能多過每年全部的教育經費。

這種實現或許就能對那種不平常教育的發展負責，即我們知道的初級大學。學問的會堂已經擠擁到門戶了，而大呼請求收容入內的人們還有千萬，那必須舉行過滿的集會了。在何處舉行呢？不能再招集國內各地的青年聚到教育上已有人滿之患的中心地方去，只可在各地組織小規模的初級大學，收容大學第一二年級的青年學

生，好去供應他們高等教育的需要。這些地方初級大學，又可以減輕州立各大學第一二年級的擠擁，因為他們以基礎的關係，亦不能不選擇，而必須如私立大學一樣將學生遣去。還有一種直接的利益，就是有許多不能離家而去寄宿大學的青年，亦可入本地的初級大學來做一個走讀生。

或許就是這些直接的理由去產生真正的初級大學。而這種運動，盛行在地方遼闊的、物料豐富的、和富於悟性的一個省分內——即加利福尼亞省內，那亦是很自然的。初級大學因為得到這個進步省分的努力與成就，就不再留為贊成的或反對的討論了，他已成了一種實現的完成，他發達與生長得這樣迅速，甚至公衆也幾乎不能認識他。因為當許多有智識的人，還不大知道有所謂初級大學或什麼是初級大學的時候，美國已有三省以初級大學為他們教育系統中必要的一部，所有省分的教育行政當局都已認識這種趨勢，而許多城市且設計建立公立的初級大學。

加省現有三十一間公立初級大學，那是依據一九二一年省立初級大學的法規來組織的。這三十一間初級大學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有學生六三零一人。華盛頓

省與得克薩斯 (Texas) 省最近亦建立初級大學。現在全美有公立初級大學約一百間，私立的亦有許多間。

大學對初級大學，或初級大學對大學的態度究竟怎樣呢？那不能有普遍的見解，因為美國各大學對於初級大學的關涉是各個不同的。然有許多贊同的大學，如那產生初級大學運動的利蘭斯坦福 (Leland Stanford) 大學等，就覺得初級大學如做一個專收大學第一二年級學生的教育的單位，將很可以解放大學本身，使其能注全力於高級教育，因此，利蘭斯坦福 大學認定到一九三四年，便可注全力去教育第二二年級以上的學生。約翰霍布金斯 大學宣言更嚴厲處置第一二年級，他從一九二八年起已成為純粹研究的機關。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也正討論着建立初級大學的問題。

大學很久以前，已憤恨自己的教育經費和能力多為第一二年級生所消耗，所以一當想到將自己的能力完全用到高年生級去的時候，他自感覺到很愉快。第一二年級的學生，對於大學確變成一種過度的擔負，阻礙其不能有更精美質的貢獻。近年各州立大學報名入學的學生這樣多，確使第一年級笨重不堪。

至大學對於一年級的學生亦顯然未能盡其教育上的責任，此點可於一年級生失敗的統計上看出。例如一九二零年，民涅梭塔（Minnesota）大學的學生有一千一百人，而當未曾完結第一年功課之前，他們就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數離開該校，最後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即只有三百零八人有滿意的報告來畢業。在西北大學，一九二五年班於第三學期之末，共有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數退學。失敗的平均數（以大學總數來計算）東部十個大學為百分之三十四，西部三個大學為百分之四十五。

學生這種失敗，似多由於缺乏興趣，而少由於缺乏智能。試一研究西北大學犯罪的學生，即知在一百零三個所研究的學生中，只有四個學生的智力不够及格大學功課的標準。豪厄德（Howard）教授在他研究的報告中說：「我們研究的結果沒有比這種發見更為有意義及更有趣味；就是這失敗團體的平均智力，其高度與通常及格的學生一般無異；至使學生失敗之最混雜的條件，都是那些關於學生興趣方面的。」

大學不能供應他的少年僱客的需求，那是顯然的。這與其說是個人的錯過，無寧說是制度的錯過。老實說，大學對他的低年級生確不大有興趣的。他的全副機器，原在

於學問的出產，更適於高年級生，而少適於第一二年級之未有成就的學生。因此，大學很可以熱烈歡迎這種初級大學的運動，因為這種運動不特可使學生不擁擠，而且可免大學發生第一二級生之嚴重的問題。

二

四年的初級大學的發展，比較上面所說的二年的初級大學，更有希望能較大的改變我們的教育系統。有幾間初級大學現正建立四年的課程，他大約要把學生前段的教育生活從新劃分，劃為六年文法學校的課程，四年初級中學課程。至於初級大學之組織，就是把中學原有之最後兩年與大學的最初兩年合攏起來。

此種六四四制的初級大學，有兩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一九二四年所建立的帕舍第拉 (Pasadena) 初級大學，與密蘇里 (Missouri) 地方一九二七年所改造的史梯芬 (Stephens) 大學。帕舍第拉初級大學組織的歷史，嘗由他的校長攸英 (William F. Leving) 在所著的初級大學 (斯坦福大學出版部印行) 很有趣味的說過：這種計劃最初為初中教師、高中教師、大學學生、父母、納稅的市民等等劇烈反對，但經過公眾六

個月之長久的討論，而在一九二四年三月的表決中就得了極大的勝利。帕舍第拉初級大學開課時即有兩百個學生。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有六百三十四個正式學生，四百四十六個每日讀一部分時間的成人學生。（初級大學運動給與成人教育以一個極大的可能於此可見。）在一九二九年帕舍第拉的其餘教育系統就完全依據六四四制來組織了。攸英說：「帕舍第拉大學現在已是一宗已成的事實，他已受了國家和地方的承認。」

史梯芬初級大學從兩年制改到四年制，比起帕舍第拉初級大學之設立，在教育上似更有意義。因為他曾由「中北部中學大學聯合會」特別允許，而在這會的監導之下經過五年的試驗期間的。中北聯合會委任一個委員會來主持此事，這個委員會包含芝加哥大學查德（CHAD）教授，民涅梭塔大學顧司（MOSS）教授，和亞克琅（ALTON）大學校長及過去聯邦政府教育委員庫克（COOK）博士。

如一研究這兩間初級大學的課程、教法及普通的教育目的，更從論理方面去分析一下這些事情，便可見到我們教育系統這種改造的利益。其中有些利益是無論兩

年或四年的初級大學都具有的，我們假設以四年的初級大學及其將來的模樣爲理想，而去表顯初級大學運動的好處：

(一)從純粹機械的立場看來，將省立大學人數極多的最低兩級分割出來做成一種較細的單位，以供給大學高年級之需用，這顯然是一種利益。

(二)若就地方的需要言之，如有一大學設在其中，那亦自然是一種利益。有人以爲普及教育向上擴張兩年，乃是初級大學運動之邏輯的與必然的發展，中等教育現在實際上既已變成普及教育。高等教育當有希望跟着普及，那從現在許多人欲入大學一點觀之，即可以知道。史梯芬大學校長伍德 (Wood) 博士說：「實際上這是每個父親與母親的野心，以爲他的兒女總應得有一種大學教育之實際的和文化的利益，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之下，這幾乎留爲智識階級或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如在所提議的組織之下，文理科大學自己在每一地方都大開門戶，只要這個地方現能維持一間初級大學，所以從這種合併的辦法，那就可將大學帶到每一地方的門前去。」

(三)教育上六四四制的劃分，比起現在的八四四制的劃分似更有心理上的根

據，這種所提議的變更，能將未入大學年齡的整個時間歸在青年期內，——代表青年前期的四年就歸在初級中學裏，因為初級中學，能將他的課程教法，適應青年前期的需要；青年後期的四年就放在初級大學裏，因初級大學亦能適應他的方法到這時期，青年的需要，現在的八四四制，未免把過早的心理年齡的青年送到大學，去負擔大學所給與的完全自由的責任。初級大學在他的組織裏，能採用無論那一程度的限制或自由都可，只要是他們認為適合於青年們品性構成的時期的；這個時期，是變化多端的生死關頭。歐洲在他的教育系統裏正採用一種劃分，就是青年開始入大學的時，間，要比我們的大學制度延長兩年；所以比起我們，他的教育心理就似乎更穩固健全，我們對於彼岸的教育朋友的舊經驗，是有留意的必要。

(四)初級大學的教師純以教授能力如何而被選擇，這樣便可免除大學第一二年級生教育的弱點——研究學問的學者不善於適應教學的，他的最重要的興趣及野心似多在於研究學問，而少注意青年人的智識發展。

(五)初級大學對於普通教育改革有一種最主要的利益，就是他能在這裏創出

一種自足的和獨立的教育單位。從這裏，中等階級的教育，無論在課程方面或教法方面，都終竟能脫免大學的專制，初級大學可有機會採用那些革命初等教育的新方法；鼓起工作的動機，使工作與生活需要相聯絡，和打破在中學校在小學更爲利害的隔離學問與生活的深坑。

在我們現行的準備大學的中學教育裏，缺乏豐富的文化材料，此爲中等教育不能保持學生趣味的重要原因。假如有足够的文化與有趣的材料，又有一種教育事業合理的最低限度的基礎，然後用妥善的方法去教授青年，在教法中，務使他們能够不爲獨斷主義所壓抑，又這種教法務要應用最新的觀念，使教育有一個機會，給學生以比較的研究及發表。這樣，他的結果必能使我們在中學或大學一二年的青年對教育所有那些心志游移的、缺乏興味的、甚或比乏味更壞的態度盡量免除。

如將美國青年教育耗費的歲月，變更爲誠懇用功而得到成就的歲月，單就社會一方面所得的利益而言，已足够撐持初級大學去解決中等教育目前之困難，和已足够使他成爲教育界最偉大的最進步的運動。

(六)在別方面，初級大學又熱烈地響應新教育者的挑戰——就是無論什麼人，凡是誠懇地欲求多受些教育的，則無論他此刻的教育程度如何，教育機關都應接受他，和幫助他如願相償地去謀進步，這正是帕舍第拉初級大學所進行着的——據我所知，在我們公共教育系統裏，這是第一次的慷慨，雖然只有中學畢業生得被允許修習那些可憑他來入大學初年級之「初級證書的功課」，而其他任何學生皆可投考文憑或投考「職業的課程」（非大學準備的）如果高興時，他們得補充欠缺之處，並得以職業課程轉入大學證書的功課。

這是應該的，無論那一個青年（或成人）如欲得到更多的教育，都應幫助他求得，而不應過問他以前的學歷是怎麼樣。一個極端的新教育者常使大學校長異常驚駭；就是他常宣言每一人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絕無入學的限制，這樣的教育慷慨或許永不能在傳習的大學裏見到的。他對各個人都容許其來的。設置確是太耗費；然而初級大學則情形不同，他可能，或必能容許一切來者到他的門前。他將不問「你知得多少？」——他只問「你想知道得什麼？我們怎能以教育幫助你？」

(七)初級大學在各地地方裏成爲實施民衆教育的中心，那是很可能的。在帕舍第拉的成年人早已得到這種機會的利益。去年共有四百四十六個成年男女報名入該校的下午補習班。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美國正發生一種與丹麥民衆高等學校運動同樣的成人教育運動。我們都知道丹麥教育者均信丹麥的民衆高等學校運動，能够負責教育和繁榮丹麥民衆。至於這種學校的歷史，與他們對於丹麥生活的偉大影響，已由哈脫（Joseph K. Hart）在所著的北方之光（Tight from the north）裏敘述得痛切。

(八)初級大學與生活意義及生活需要互相聯絡，比起中學與他們，更爲密切。帕舍第拉初級大學章程上說：「若學生在生活工作上尙未得到一種聰明的決斷，那就無論如何，不能離校，此爲帕舍第拉初級大學的目的。此外初級大學還要繼續用力使學生認識自己的特能，與人類努力的各種領域之需要與要求，及給他以一社會的觀點，使他在決斷上有一合理的基礎。」然而教育與生活間之互相關係並不忽視廣大的文化基礎。（在上面敘述指導的科目時已經說過。）「我們希望學生用力爲着文

化的廣大建立一種基礎，使他能實現一些可幫助他去達到穩健判斷的幾種更重的智力與精神洞見的方法與結果。」

三

初級大學有三種重要的駁論，就是耗錢；缺乏明確的功課標準；利用一種年限太短促趨向太實利（而學生亦太限於地方的）的教育計劃，去代替昔時大學生的文化風氣與精神，使那對於文化原來很有貢獻的大學，現在就再不容易把文化光大與發揚。

關於耗費錢財問題，初級大學在各城市的預算中，誠然容易成爲浪費。地方的豪氣與爲青年取得教育機會的情緒的要求，確使許多城市愚笨地和盲目地從事初級大學事業的進行。然而浪費與愚笨的消耗，並不能當作非難的真因；生活藝術中一切發明與改進，都無不帶有同樣的危險性。關於最低限度耗費的性質，我們可以說：平常的耗費只是一種組織力，所以關於初級大學耗費的問題，就應歸入下邊這種討論，就是：地方社會應不應該增加組織力的分量到教育裏，到一種工業裏（我們可視教育

做一種工業。明知這種教育像科學研究，雖此刻非生產的，而終竟會引到一種更大的國家生產與繁榮，和智慧的及文化的豐富呢？

教育標準的問題是很嚴重的。人們既經悠久努力將大學的程度升高到某一定的高度，今將初級大學的榮譽賦與粗浮的教育標準的準備，則教育中之有威權者自必睨視這種新運動。我們對於這種非議只可答以同一的教育組織力既能為大學程度去建立一種確切的組織標準，則自當同樣能如初級大學建立一種可用的標準。

那種大都浮現於大學人員心裏，和像判麥 (G. H. Palmer) 這一類文化學者的心裏的危險，就是恐怕破壞古昔的大學精神，這種精神原是從一團人四年之久在一個純粹文化的小世界而且沒有實用到人類塵世裏的目的內工作生出來的。（在這裏，未知判麥教授會不會想到現存大學的理想究竟是不是這樣）然而如果初級大學變四年而非兩年的制度，那種危險的重要原因就不會存在。所以初級大學要建立一種自己特有的文化環境，不同大學本身的環境，然而比起英國的勒格比 (Harrow Rugby) 的公學（與初級大學生同年齡的）所建立的強有力的傳習精神

與學校風氣總不會不及其健全與有效。

這就是有許多熱心的支撐者與許多劇烈的反對者的初級大學了，他將像一切其他偉大的社會運動，無論人們怎樣寫及他，他總會依着自己的優點而進步。他在開始時無論有什麼不完全或危險性，如能滿足公衆的需要，他便繼續生長。在別方面，他如果在我們已經負擔極重的教育系統內，只是一種不需要的試驗，那麼，他因缺乏根據之故，不久自會消滅。然而此刻尙難下一個武斷的結論。

四

新教育者的興趣很爲初級大學運動所吸引，因爲初級大學對新教育運動當前的限制有多少改善——即對着大學入學的問題，及他影響到中學的教法與課程的結局等結果，有多少改善。我們可以絕不懷疑地說：在中等教育部分，沒有一間進步的學校能够弄到他所期望與愛好的這樣子進步。所有他們都爲大學準備的限制所阻礙，無論二年制或四年制的初級大學，因能更自由去解釋什麼是教育，和關於教法方面能不爲傳習所縛束，所以都能供給進步的中學之畢業生以一更富吸引力的教育目標。

和在我們所謂中等，而實則早已可受大學吸力的影響，不再是一獨立的單位，而只爲大學準備的時期教育階段裏，供給他們以更大的自由。

初級大學——在他的教育態度裏比起大學更簇新，更和諧，和更自謙；在他的目的裏，又更與生活需要相接近——那很可以使他的下級學校成爲一種自存的，獨立的，和高貴的單位，同時他自己亦有一種誘人的面貌，因爲他正是受過新教育的青年可以進去而不必爲幻像和官僚主義所苦的這樣一種機關。

五

爲着教育的慈善而有的一種最有結果的領域，不用說就是初級大學的領域了。對於私人捐助的初級大學，例如喜歡採用四年制的史梯芬大學，有餘地和需要去實施一種健全而自由的教育方法，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并未能解決近來那些長足增加的需求，此尤在婦女高等教育爲然；然而男子方面雖比較婦女方面爲和緩，亦莫不如是。因爲初級大學富有實驗的可能，故我們大可以說，如陸續將有用的金錢源源接濟那富於柔性的初級大學裏，則其可以促進教育的進展，將遠勝於向其他任何的教

育目的上去用錢。因為如果初級大學能成功使教育受人愛慕，有如新學校在中小學教育之所爲，則大學教育此時自必變成一種「簇新的和誘惑的投機事業」了。

屬於這一類學校的，如在紐約布龍格司微爾（Bronxville）地方一九二八年創立的舍刺羅凌士（Sarah Lawrence College）大學，便是關於這種惟一的教育的試驗。該校校長科次（Marion Coates）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在進步教育雜誌裏寫過一篇文章，名曰初級大學爲新教育之第二步。他說舍刺羅凌士大學並沒有什麼預立的目的。他只收容從中學而來的女學生，和實驗去看看他們更高一度的教育，究包含些什麼。此種制度並非基礎在學生已經取得的事物上，而是基礎在他入大學後所希望得到的事物上，如果他是從新學校來，和具有原來而並未損壞的好奇心，他就要知道許多關於他生活其中的世界，他要知的將比起要做的更多。有了這樣目標，我們就訂立一種課程大綱，至於工作則組織在導師的基礎上，好俾每一女生在他自己的知識追尋裏，都能前進到滿意的限度，和都能向着自己滿意的方向而前進，而不必顧及各種知識領域間的界限。

這一類新式的初級大學，如果能夠成功，那他不特能為後來的初級大學樹一種模型，而且他對於現存的古典大學，和中學都必能與以極有力的進步影響。新教育者之看初級大學正如科次校長一樣，視他為「新教育之第二步」。

在我們心靈的背景裏有一種由初級大學運動所產生出來的希望，這種希望，我們是不敢大膽表達出來的。他就是這樣：如果兒童由新方法去教育，從極早的年期一路教到初級大學，則他在初級大學畢業後，其在文化修養內，在智慧能力內，和在知識內的發展，可以如現在的大學畢業一樣——這樣就可開始職業的練習和進到一種自給的事業裏，比起現在要早兩年。

愛略脫(Chales N. Eliot)遠在一八九零年已有過這樣子的夢想，因他當時提議將小學教育時間減至六年，中學減至四年，好節省教育上的時間。近代大學既不能供應生活的需要，又因缺乏事業的動機，不能維持青年的熱心，如他果能在這方面來圖補救，則對於教育上的進步，當亦極端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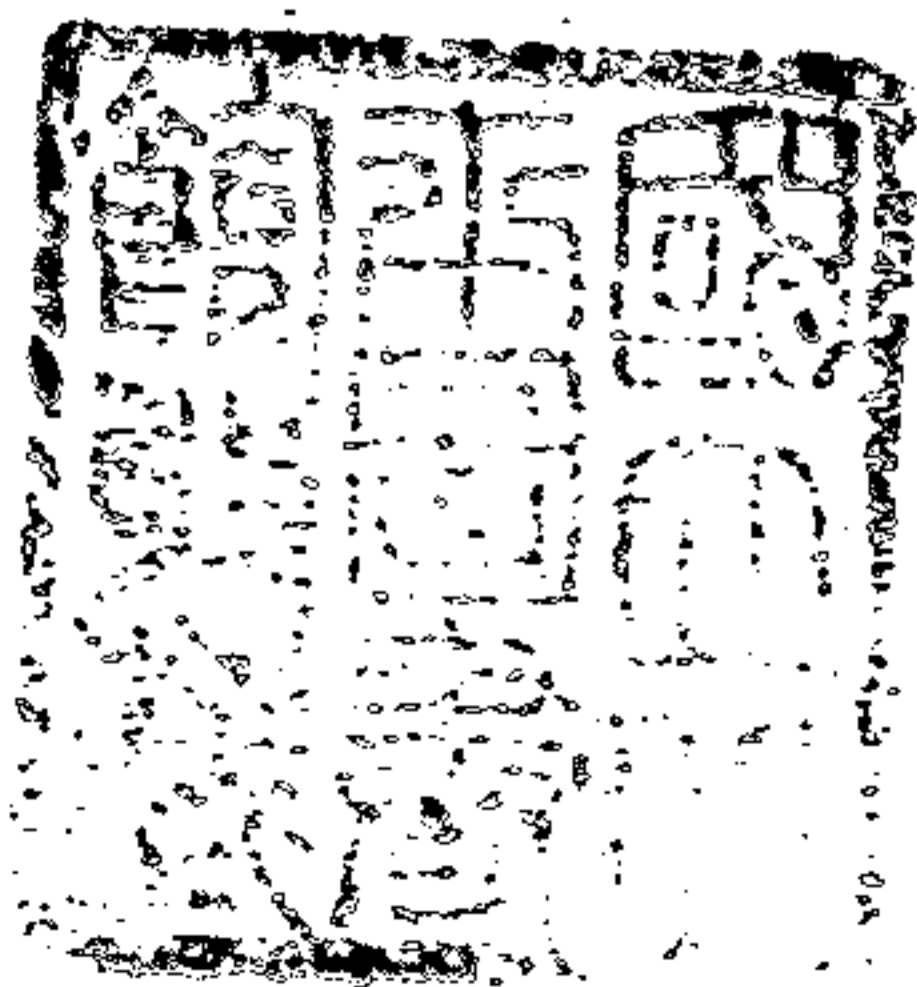
除了這樣子的可能，新教育者和一切心裏有新教育其物的人，都很喜歡見到新

教育的領域，因初級大學之故，而擴張到中學以外兩年。又那些抱怨現代青年的時間與能力因為他們，在這種年華內呻吟憔悴而至盡量消失的人們，自很高興和很熱烈見到今後青年，一年一年的前進，誠懇受教，莊重、自助、負責，有如我們美國創國之日的青年，未到正式年齡，已能出而幫助創造歷史。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九日

新教育的原則及實際終

贈送



中國教育建設方針

舒新城著

一冊七角

中國三十年來的新教育，都在模倣工業社會的教育制度，其結果對於中國社會，固不能適應，對於天才與無力就學者的一般教育，尤無法補救。本書著者是專治近代中國教育史的，以十餘年的經驗與研究，從歷史及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尋繹建設中國新教育的方針，而尤注重於用考試制度發展天才提倡自修；同時在原理上，提倡教育與政治協調及教育工具說。全書正文八篇，附錄兩篇，約可分中國教育建設原理、及教育行政制度、學校行政制度、教育經費問題諸類。篇首除自敘兩篇外，有陸費伯鴻先生之敘及三軌制教育長文一篇，更爲現在學校制度對症的良藥。凡治教育及關心教育建設者，均不可不讀！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英美德日 四國兒童教育

胡叔異編 一冊 一元四角

本書以客觀的態度，敘述英美德日四國兒童教育之近況，其中英美德三國之材料，係根據日本教育家參觀時之報告；至日本之材料，則係編者在日本考察之所得。故書中對於四國之幼稚園小學校等，記載詳盡，并於學校教育外，兼及教科用書義務教育問題，故不特為學校教師所當購置；即教育行政人員，亦宜人手一編也。

兒童論……余家菊……一角半册	兒童心理學……葛承訓……一元五角册	一個小學十年努力紀……二角册	歐洲新學校……唐現之……七角册	美國教育概覽……汪懋祖……八角半册	英國教育要覽……余家菊……七角册	法國教育概覽……周太玄……二角册	新興俄國教育……祝康……九角册
----------------	-------------------	----------------	-----------------	-------------------	------------------	------------------	-----------------

中華書局發行

新(363)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發行

新教育的原則及實際(全一册)

實價 十圓

(外埠另加郵匯費)



原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柯 布 Stanwood Cobb

崔 戡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瀋陽 吉林 煙台 香港 新加坡

標商冊註

